

现 当 代
世 界 文 学 丛 书

斯通家史札记

The Stone Diaries

〔加拿大〕卡罗尔·希尔兹著 刘新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斯通家史札记

〔加拿大〕卡罗尔·希尔兹著

刘新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平知覺

PDG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斯通家史札记

〔加拿大〕卡罗尔·希尔兹著
刘新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通家史札记/ (加拿大) 希尔德 (Shields, C.) 著;
刘新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2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

书名原文: The Stone Diaries

ISBN 7-5327-2545-6

I. 斯... II. ①希...②刘...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048 号

《现当代世界文学丛书》选收现当代、重点是当代世界文坛上的名家名作, 暂定三十种。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社会 and 主要文学流派的风貌, 并有助于我们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11 字数 255,000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册

ISBN7-5327-2545-6/I · 1484

网址: www.stph.com.cn

定价: 25.90 元



凯勒和默西，1902

鄧平知

PDG



节奏和动作女子俱乐部



汉娜·古德
威尔(凯勒·古德
威尔之母)



贝茜·麦克
戈登, 斯通沃尔
孤儿院女总管



克莱恩廷
姨妈, 1916

克莱恩廷

巴克





亚瑟·霍德太太



哈罗德·A·霍德

“小豆子”安东尼



玛丽亚



“胆小鬼”霍伊特 (A. 波波夫速写)



沃伦



胆小鬼霍伊特

维多利亚



知
道
PDG



车道大街 583 号



艾丽丝

从左到右：曼纳利太太，贝弗利，曼纳利先生，安格斯·曼纳利，沃伦，艾丽丝





艾丽丝·唐宁



朱迪思·弗莱特·唐宁

贝思·泰勒



雷恩·泰勒



知
道
PDG



利萨·泰勒



吉利·泰勒

索菲·弗莱特-罗伊



休·弗莱特-罗伊



愛

PDF

平凡中见伟大 淡朴中见深邃

——评卡罗尔·希尔兹及其《斯通家史札记》

(代译序)

卡罗尔·希尔兹是加拿大近年来极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她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奥克帕克市，一九五七年毕业于汉诺威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当年，她与加拿大人、建筑工程学教授唐纳德·休·希尔兹结婚，并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九七五年，希尔兹毕业于渥太华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她现定居于温尼伯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希尔兹曾任《加拿大斯拉夫文集》助理编辑，一九七四年起转为自由作家。

希尔兹早在五十年代上中学及大学时便写过诗歌及短篇小说，但那时她从未奢望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言，这种奢望犹如“想当电影明星”那样远不可及；她母亲曾劝她刻苦学习，力争通过教师许可证所要求的各门考试，以备将来守寡、离婚等不测，也好有立身之本。然而，希尔兹婚后在丈夫的鼓励下，去夜校修了一门写作课。在夜校学习期间，她创作的一篇短篇故事被加拿大广播公司购去，并在电台播出。希尔兹得知后，对自己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惊诧不已”。在

渥太华攻读文学硕士期间,希尔兹因撰写有关加拿大十九世纪著名作家苏珊娜·穆迪(*Susanna Moodie*)的硕士论文而创作了一部较为贴近自己生活经历的小说《苏珊娜·穆迪:心声与梦幻》(*Susanna Moodie: Voice and Vision*)。这部小说再次获得成功,并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同年,希尔兹的另一部小说《细微礼仪》(*Small Ceremonies*)问世,荣获加拿大作家协会小说奖。在此后的年月里,希尔兹又创作并出版了多部作品,如:《偶然事件》(*Happenstance*)、《爱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ove*)、《香橙鱼》(*The Orange Fish*)、《万千奇迹》(*Various Miracles*)等。至一九九三年《斯通家史札记》(*The Stone Diaries*)出版,她共发表两本诗集、两部短篇小说集及八部小说,成为加拿大文坛极负盛名的作家。她的《斯通家史札记》一书,曾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的两年里先后荣获英国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全国书评界奖及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足见希尔兹及其作品在英、美、加三国的强劲地位。

希尔兹的创作风格颇具特色,善写常人琐事,尤精于展现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她的这一创作风格在《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这部小说以自传形式叙述了一位普通妇女黛西·古德威尔自出生至逝世的主要经历。一九〇五年,黛西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中部的一个小村落——廷多尔村。出生当日,母亲便因产后惊厥而死去。此后,黛西便由邻居、被她称为“姨妈”的克莱恩廷带至温尼伯克莱恩廷的儿子巴克的住处抚养,而她做石匠的父亲——古德威尔先生除每月寄来抚养费外,并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克莱恩廷靠卖花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艰难,黛西十一岁那年,克莱恩廷去世,她便被父亲接走,后因父亲去美国布卢明顿的

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就职,便随父迁往布卢明顿市。二十二岁时,黛西与哈罗德结婚,但就在他们去德国度蜜月期间,哈罗德却因酗酒坠楼而死。一九三六年,即黛西三十一岁那年,她与克莱恩廷的儿子、五十三岁的农业研究所所长巴克结婚。婚后,夫妻恩爱,生活倒也平和。一九五五年,巴克去世,黛西遂接替丈夫充任《记录者》杂志的园艺栏目编辑。她勤奋写作,将这个栏目办得颇有生气,成了众人景仰的园艺技能女士。然而,一九六五年,做了九年园艺专栏作家的黛西却被编辑部辞退。她于是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后来,由于时过境迁,黛西心中的悲哀逐渐得以缓解、淡漠,她晚年倒也度过了一段悠闲安逸的时光。九十年代初,黛西终因衰老、疾病而与世长辞。

就情节而言,这部小说所谈多为常人琐事,似乎并无扣人心弦之处,然而,正如作者希尔兹所言,出生、爱情、死亡才是最原始的“大情节”。平凡中见伟大,淡朴中见深邃,这也许便是《斯通家史札记》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

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通过叙述黛西一生的平凡经历,展示了西方妇女孤独的心境及她们自强不息、自立于社会的意志和决心。

小说伊始,作者便将孤独这一主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代表人物便是黛西的“姨妈”克莱恩廷。克莱恩廷尽管有丈夫和三个儿子,但平日里他们(除大儿子巴克在温尼伯念书外)均在采石场做工,她孤身一人在家操持家务,天长日久,孤独之感在所难免;而她与丈夫马格纳斯的婚姻亦无爱情可言。马格纳斯为人寡言少语,有时还显专横、粗鲁,因而对妻子并无温存、柔情,加之经济拮据,又对妻子十分吝啬、苛刻。因此,

夫妻间除了简单、必要的日常交流外,再无生活情趣可言。为了排遣心中的孤独,克莱恩廷常读些小说,在书中寻求一丝慰藉;她犹寄情于黛西的母亲默西·古德威尔,因为在她看来,“这个惹人爱的可怜的年轻女人,也挺孤独”(p.19),“无论默西怎样心怀无人知晓的一腔柔情,也无论她年轻的丈夫怎样向她耳朵里灌进多少喁喁情话,无论怎样,她和默西在这个世上仍然是形单影只,仍然是两个孤独的人儿,各自住在并排相邻的两座房子里,都被禁锢在同一个焦躁与渴望的圆箍之中。”(p.19)这里的“圆箍”一词形象地表现出二十世纪初西方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及其孤独的处境,而“焦躁与渴望”则有力地传达了妇女渴求真正的爱情,追求人格独立、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

女主人公黛西本人亦是妇女孤独心境的化身。自出生之日起,她便失去了母亲,而在她孩提时代的十一年里,她亦未受到父亲的关爱,甚至常被父亲遗忘,尽管有“姨妈”克莱恩廷及其大儿子巴克照顾,但她内心仍是那样空虚、孤独。她的这种孤独、与世人了无联系的心境在她十一岁那年罹患麻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觉得自己缺少了别人所拥有的“真实性这一核心的东西”(p.74),因为其他人都能挺直腰板,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从而影响这个世界,而她却不能。“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沉默无语……把她年轻的生命挤得空空如也。她的自传……将会是灰暗的虚无和不可填补的豁口。”(p.74)

黛西第一次婚姻亦颇为不幸。她本指望与丈夫哈罗德长相厮守,不料哈罗德却是个本性狂乱之徒。在他们去德国度蜜月途中,哈罗德一面没命地开车,冲着空旷的天空不断按喇叭,一面还狂饮杜松子酒,根本不把他和妻子的性命当回事。

哈罗德这种狂乱的脾性终于酿成自己酗酒坠楼而亡的惨剧。从此，黛西再次陷入深深的悲哀与孤独之中。

黛西丧夫之后，接踵而至的便是社会的不公。“无论她去哪里，她人还没到，她的故事已先她而至，为她鸣锣开道，宣布她的到来，同时也抹杀了她真实的自我。”(p. 120)面对社会的不公、男女的不平等，黛西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为什么允许男人享受他们生活奇遇所带来的殊荣而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胸前还挂满了各种奖章，而女人则被她们的生活经历所压制，灰溜溜，一声不吭地走路？”(pp. 119 - 120)黛西忿忿不平的呼声道出了二十世纪初西方妇女屈从于男子的凄惨命运，更表达了妇女要求男女平等、自强不息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六年，已届三十一岁的黛西，一个被她自己称为“被随意取了名字的女人，一个意外地被放错了地方的女人”(pp. 143 - 144)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已是进退维谷，别无选择，她不得不投靠比她年长二十二岁的巴克，与其结婚生子。尽管他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尽管她已为人之母，膝下已有两女一子，但在黛西心中刻下道道印痕的深深的孤独感却无法得以排遣。在宁静的夜晚，她有时会“突然感到阵阵悲哀。她患的这种病症即是一种孤独症”。(p. 186)每当孤独向她袭来，她便感到深深的恐惧，甚至因形单影只、内心苦涩而潸然泪下。她心中的孤独、苦涩即源自其孩提时代，并在她一生蔓延开来，吞噬她的心灵。

小说第六章以书信体形式叙写黛西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参加报社工作的一段经历。一九五五年，黛西的丈夫巴克去世，黛西以其出众的写作才能接替了巴克在《记录者》杂志园艺专栏的编辑工作。这年，尽管她连遭丧父(这年四月

逝世)、丧夫之痛,但她并未消沉、颓废,而是发奋写作,竭尽全力为读者排忧解难,办好园艺专栏。从众多读者及黛西亲朋好友的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黛西已不是以往那个心中苦涩、孤寂的黛西,而是一个奋发向上,锐意进取,受众人尊敬,甚至崇拜的职业妇女的形象。她“高雅谦和”的话语,“扎实稳健”的文风,中肯的建议,娴熟的技巧可谓魅力无穷,征服了众多的读者,令他们折服,也为黛西赢得了极大的声誉。黛西在工作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也有效地排遣了心中的悲伤与孤独,这充分说明了妇女争取平等、自由,自立于社会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六章是全书最重要、最精彩的一章。

6
小说的第七章(“悲伤,1965年”)在为主题服务,强调妇女自立自强上与第六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六五年,正当黛西乐滋滋地享受工作给她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时,一个叫富勒姆的男编辑抢走了她的工作,她于是被编辑部辞退。对黛西而言,失去了工作,便意味着失去了精神寄托。原先那个活跃、受人尊重、名闻遐迩的园艺技能女士突然间被解雇了,变得无所事事。这一强烈的反差将黛西“扔进了更深、更痛苦、更加空荡苍茫的绝望之中”(p.243),“她举起双拳捶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最后一次同富勒姆见面的情景,反复唠叨他说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话,和他做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事”。(p.255)黛西对富勒姆的抗议实为对社会不公、男女不平等的强烈抗议,从而再次喊出了西方妇女要求平等、自由,自立于社会的时代呼声。

晚年的黛西,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渐渐冲淡了她对某些往事的记忆,她因此而度过了一段安逸的生活——她烫头发,涂指甲,打桥牌,外出旅游,可谓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然而,

“她的生活似乎是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即她那份没有归宿、不属于任何人的失落感,即便她的梦幻也释放出强烈的空虚的气味”(p.284);她时常“诅咒她出生时被投进的那一片虚无”(p.284)。黛西心中这份空虚、孤独之感犹如芒刺在背,驱之不去,一直搅扰、折磨着她,直至她生命的终结。

这部小说除了主题颇耐人寻味之外,其艺术手法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并无扣人心弦的情节,即不以情节取胜,而是着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展现人物复杂、细腻的情感世界。这里举两个例子,作些分析。在小说的第五章里,黛西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去温尼伯的丈夫归来。这里,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以展示黛西孤独的心境。她想到自己分娩后几分钟便死去的母亲,想到自己出生时的那枚钱币、母亲的结婚戒指,甚至还想到自己做姑娘时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时偶然遇到的那个陌生男人。这一系列思绪的描写与意识流的手法颇为相似,但黛西的思绪最终还是定位在母亲和丈夫的身上。“今晚,弗莱特太太[黛西]甚至被连接她和她死去的母亲——默西·斯通·古德威尔之间那一丝感觉所打动;这一时刻自然很短促,来得轻飘飘的,只是感到一丝呼吸,一个手势,一抹光的色泽,在记忆中并无指定的位置,然而奇妙的是,这丝感觉突然间完全颠倒过来,闪现出一幅扭曲的、怪异的图景:弗莱特太太生下了她母亲,而不是母亲生下了她。”(p187)这段心理描写何等细腻,何等生动,又何等怪异,看后令人怦然心动,又令人凄楚伤感——黛西心中深沉的孤独感已使她的记忆和意识发生了扭曲。当她想到与丈夫做爱的情景时,

她心中没有欢愉,没有激动,有的却是如雨点般降落在她周围的桩桩往事——周年纪念、怀孕、度假、饭菜、疾病和康复,她甚至想象自己被一个男人整个地压在下面,将她牢牢地钉在这个世界上,她的感觉将会怎样?她最终认定:这个世界太残酷了。由这里的心理描写可以看出,黛西这份孤独与不平之感已深深地嵌入了她的心田。

在第四章里,巴克前往渥太华火车站接黛西。作者对巴克一路上的心理描写亦可谓浓笔重墨。他首先想到如何向黛西问候。比黛西年长二十二岁的他早在二十年前便对少女时代的黛西心存恋情,十九年后与黛西重逢自然令他心神激荡,紧张不宁。“他该如何向她问候?他的勇气时而升起,时而降落,像是一个回声,随着他记忆的收缩、释放而时高时低。”(p.133)一路上,他想到黛西婴儿时睡在抽屉里的情景,想到她十一岁那年身患麻疹,躺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的情景,想到他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给黛西写过的一百三十二封信——那些多情的岁月;此外,在他的思绪中,还有他儿时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各种花草动物的术语——那个令他陶然忘情的植物世界……也是在这一章里,作者还对黛西去渥太华投奔巴克这一路上的心境亦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这类心理描述在全书随处可见,俯拾即是,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

这部小说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采用多视角叙事手法,而其视角之多,变化之大,堪称一绝,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本书第一、二章的叙述者主要为书中的女主人公,即黛西本人,至第二章末,这一叙事角度发生了变化,由一名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讲述黛西的故事,而这两个叙事视角在全书交相使用,如在小说的第四章,叙事人又成了黛西。第六、七两章

是全书叙事角度最多的两章。在第六章里,作者以书信体形式,即以六十一封信从黛西的读者及亲朋好友等众多角度,叙述她九年工作期间的经历及心境,展现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而在第七章中,其开头和结尾的叙事人均均为故事外的叙事者,而中间则采用多视角叙事法,即从黛西的亲友——艾丽丝、弗雷迪、贝弗利、沃伦、琼、杰伊、拉比纳、科拉梅、斯古特等九人的角度叙述黛西内心悲哀的原因。更令人称奇的是,小说的第八、九两章以“我”即黛西的口吻叙述弗莱特太太(亦即黛西本人)晚年的生活、疾病与死亡。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弗莱特太太已从多年的精神痛苦中恢复过来……”(p.284);“我仍在这儿,在这些(粉状的、碎裂的)骨头里,在踝骨、我的眼窝、肩膀、屁股、牙齿里,我仍在这儿,啊,啊。”(p.358)作者采用多视角叙事手法,甚至自我叙述的手法实属罕有,足见其匠心独运。

本书使用大量照片(共二十五幅,另有一幅素描)亦可谓一大特色。据希尔兹自述,这些照片并非小说中的人物,而是她从博物馆、古董店、邮市中寻得,最后两页照片实为她五个孩子儿时的照片。用他人照片充当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以表达她对书中人物的情感,这种构思与手法颇为新颖,给人以亲切感、真实感。

最后尤应提及,本书众多议论、描述、抒情或颇有见地,令人耳目一新,或娓娓道来,令人感慨万分,或奇异独特,令人赞叹作者超群出众的想象力。这里抄录几段有关译文,权作本篇译序的结尾:

“她[黛西母亲]那一丝丝气息在屋里驻留,如皑皑的白雪,如灼热的阳光刺激着我紧闭的眼帘,呼唤道:张开来,张开

来。”(p.39)

“发生在女人头上的种种事情,能将它们自己吹得像气球那么大,将女人生活中以天计数的刻度整个儿地填满,还死命地膨胀、挤压,弄得那些简单明了的时间分割——小时、星期、月份全给挤没了,不见了。这真是一场讽刺……”(p.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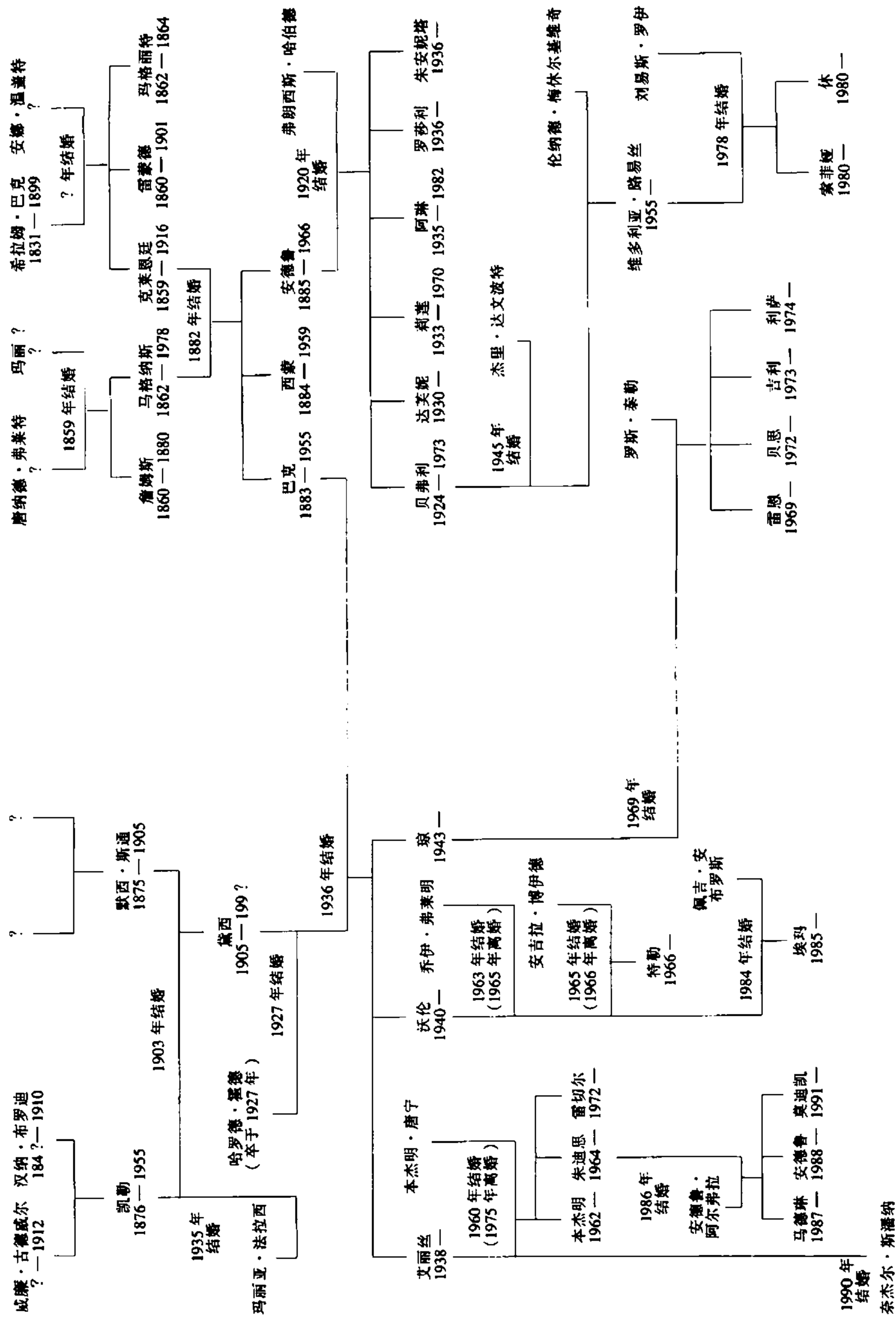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就尊重它,即便它听起来虚虚实实,也别去管它;而如果说某事是虚构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真实、正确——我们都嗤之以鼻。”(p.334)

“虚荣心这东西又何尝不是如此?它决不肯销声匿迹,硬是要将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挤得皱皱巴巴、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令人如饮迷幻药般紧张、激动。”(p.340)

“她[黛西]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她似乎一直明白,但却从未说出口的道理:我们还活着时,死亡这一时刻便已存在。生命大踏步径直朝那堵幽暗的死亡之墙走去;一个极端的状态撞击另一个极端的状态,它们不喘气,不眨眼,撞击在一起难分难解。”(p.346)

刘新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于河海大学



《斯通家史札记》

卡罗尔·希尔兹（1935—），当代加拿大极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曾任《加拿大斯拉夫文集》助理编辑，1974年起转为自由作家，发表过两本诗集、两部短篇小说及近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多部荣获普利策奖、布克奖和奥林奇奖等文学奖项或提名。《斯通家史札记》曾与1993年至1995年的两年里先后荣获全国书评界奖及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希尔兹认为，生死、爱情、死亡是最原始的“大情节”，平凡的事情可以表现深刻的道理。本书以自传形式叙述了一位普通妇女黛西·古德威尔自出生至逝世的主要经历，展示了西方妇女孤独的心境及她们自强不息、自立于社会的意志和决心。

本书的艺术手法颇具特点，如：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采用多视角叙事方法；使用大量照片给人以亲切感和真实感；以及在全书安排有大量颇有见地令人感叹的议论、描述或抒情的段落，使全书别具风采。

Copyright: 1993 by Carol Shield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ella Pomer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1998 - 076 号

目 录

平凡中见伟大 淡朴中见深邃

——评卡罗尔·希尔兹及其《斯通家史札记》…………… 1

家系图

第一章	出生,1905 年	1
第二章	儿提时代,1916 年	41
第三章	婚姻,1927 年	77
第四章	爱情,1936 年	117
第五章	为人之母,1947 年	155
第六章	工作,1955—1964 年	195
第七章	悲伤,1965 年	231
第八章	安逸,1977 年	267
第九章	疾病和衰老,1985 年	311
第十章	逝世	347

第一章

出生

1905 年

我母亲名叫默西·斯通·古德威尔，才三十岁就犯了病。那是个能把人烤焦的大热天，她站在后面的厨房里为丈夫的晚餐做一块麦尔维恩布丁。桌上摊着一本烹饪书，食谱上写着：“取几片陈面包、一品脱醋栗、半品脱木莓、四盎司白糖，如果备有甜奶油，可适量添加。”当然，她是把这食谱上的量减半了的，因为家里就他们两人，醋栗也缺，加之凯勒（我的父亲）对食物很挑剔，吃得也不多。母亲管他叫鸟啄食的男人，能吃食物，或者说，能剩食物。

男人吃那么一丁点儿，挺让她难堪的。他总是将调羹在自己的盘子里懒散地舀上几口食物，也许还会抬起眼睛，向桌对面的她瞥上一两眼，投去羞涩、感激的目光，但他绝不会再吃下去，而是将整盘食物留给她来吃完，还用一只手做出梦幻般恍恍惚惚的姿势在空中划动，催她吃下去。在她吃的当儿，他那柔情而傻乎乎的脸上始终堆满了笑容。食物对他这样一个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麻烦，令他心神不安，甚至意味着一种代价，为能站立和呼吸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嗯，对她，对我母亲来说，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吃饭对她就跟上天堂差不多。（在我们这个年头，我们也与母亲一样，有

股狂乱的激情,这可是出了名的。)

吃饭如同上天堂,做饭也差不多像上天堂一样——她做起饭来竟是那样自豪、得意!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对天堂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她的天堂,就是站在自家屋子后面那间热得要命的厨房里,手拿一把干净的木制汤勺,向前探着身子,眯起眼睛看着烹饪书上纤细的字迹,精心设计、调制菜肴。

她全神贯注,将炖烂了的水果倒进花式模子,将切得密密匝匝的面包屑撇入溢出的果汁中,感觉到面包屑变软并渐渐显现出木莓的红色。她看着这已成形的布丁,脸上露出激动的神情。这时,看她那张热气腾腾、专心致志的面庞,真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麦尔维恩布丁这几个字她也格外喜欢,觉着它们如同糖脆饼般在自己的舌头上溶化,而她的舌头也变得像糖脆饼一样甜蜜蜜的。她就像个艺术家那样——几年后,我对这种艺术已确信无疑——搅拌、布排着,还撮起下嘴唇盘算着。她准能做成这样一道点心——色彩浓重、如海绵般松软的布丁。(隔壁的弗莱特太太让母亲在她家的灌木丛里采了些醋栗,而木莓则是她自己在村子南面小路上找到的,虽说她这么胖,天又那么热,差点没把她晒死。)

她在布丁上又洒了些糖,先是一勺,接着又洒了一勺,然后将糖勺放进嘴里,那粗糙晶莹的糖颗粒让她提神、使她兴奋。这会儿是下午三点——马尼托巴腹地,也是加拿大腹地的一个盛夏七月的下午。客厅里的落地时钟刚报过时(这座时钟闪耀着金刚石般的光泽,钟座也镀了金,是她婆家,即斯通沃尔镇的古德威尔家送的结婚礼物)。凯勒五点整将从采石场回来;他会在厨房的水盆里痛痛快快地擦洗一番,五点半时,两人便会在餐桌前吃晚餐——就是这张餐桌,仅铺上一块

干净的桌布(隔天换一块干净的)。晚餐的大部分时间两人都不说话,因为我父母生性羞怯,且自小便笃信:说和吃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各自占有不同的时间段。今晚他们将吃带有家庭风味的冷藏咸牛肉、外加拌了调味品的马铃薯,喝几杯甜茶,再就是这块精美的布丁。我那二十八岁、结婚已两年的父亲凯勒·古德威尔长这么大还从未尝过麦尔维恩布丁,他的眼睛将会瞪得大大的(她就准备着看他这副模样:他那诧异、略显迷惑的神情,那因惊奇而张开,透出柔情和感激的男人的嘴。如此让他感到意外的惊喜,是她不用多费力就能做到的)。她小心翼翼地将一只只有鲜花图案的盘子盖在布丁上,然后又在盘子上压了块石头。

食谱上说:“将模子放在阴凉处”。(这本烹饪书已很陈旧,是三十多年前在英国出版的,纸张已变得软绵绵的,可作者的语气却是那么铿锵、不留情。)然而,像今天这么个大热天,默西·古德威尔又怎能找个阴凉处呢?即便是地窖台阶下的深色石头地板——这是她存放牛奶、黄油和猪油的地方——也变得热乎乎的,这两个星期以来一直散发出一股怪异的酸味。隔壁的弗莱特家新近买了一台镀了锌边的拉布拉多牌冰箱,弗莱特太太曾小心翼翼地向默西提起过这台冰箱,说到它的特性,它的通气管、闪亮的锡制食物架,还说,大热天里,一小块冰过二、三天都不会融化。

不知什么钻心的思绪,也许是担心怎样使布丁保持冷却,也许是妒忌弗莱特家那台崭新的冰箱;总之,这钻心的思绪使我母亲首次感到一阵疼痛。她禁不住轻轻喊出声来,眼珠紧紧地挤到内侧眼角,仿佛有谁揪住了她的头发,使劲往上猛拽,使她头皮撕裂发响一般。如果有谁在那狭小的后厨房里

目睹这番情景,也许担心她会就此昏厥过去,尽管我母亲不会轻易遭昏厥袭击。她当时的感觉是胸腔底部什么东西移动了一下,先是往上升起,接着便陡然下沉,恰似向侧面拉开的手风琴猛然受到挤压一般。

她低头向下一看,惊愕地发现自己围裙上蓝白相间的条纹破裂开来,变成了带有颜色的碎片,而她的双手则径直飞向空中——这是一种为抵御重压而作出的自然反应。她挺起腰板,将双手平放在桌上,探出身子,长长地发出一声轻柔的抽噎。这声发自她双唇的抽噎松散、无形,宛若一条迷惘的波纹。(后来,松散、迷惘这些词比其他任何词都更加深深地烙在了我对母亲的印象之中。)母亲体态肥胖,可她并不怎么出汗,即便盛夏酷暑也是如此。如果有谁知道这一点,她会因自己不爱出汗而感到一种略带羞涩的自豪。然而此刻,湿漉漉的一大片汗水在她围裙里面延伸开去,在她脊梁沟里流淌。她急促地喘着粗气,双眸随着一阵阵紧箍腹部四周的疼痛闭合、张开。在腹部的皱折里,她感觉受到了侵犯,那是海啸,是洪水。

整个春天她一直为消化不良所困扰。她经常在清晨,或是在夜里趁年轻的丈夫熟睡之际,从床上爬起来服用毕晓普柠檬酸泻盐。当她喝普通牛奶,或是甜茶、加糖柠檬水时,总是贪婪地大口喝下;可当她服用冰凉的毕晓普柠檬酸泻盐那乳白色药液时,她却将它倒进一只瓷杯,款款地小口呷着,显出一副深沉、专注、矜持的神情。她自己也不知道病在哪里。今天相信是她的肝脏出了毛病,明天又觉得是肾脏不好——尽管她才三十岁,可肾脏会在年轻时就发病,尤其是我母亲这样异常肥胖的女人更易得肾脏病。没准这毛病是因便秘而引

起的。隔壁的弗莱特太太说起过这种可能性,并劝她服用大黄药片;若不是便秘引起的,说句悄悄话,那便是什么妇女病了。她告诉默西说,失血过多会造成许多年轻妇女身感不适——默西有没有对斯皮尔斯医生谈过?斯皮尔斯医生对女人的病痛十分敏感,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看病挺特别,问起些微妙的问题时,总是紧闭双眼;而他说起人体自然周期、生理平衡,还有生育的时机,果子盐^①的作用什么的竟跟作诗差不多。

没有,默西并未去看过斯皮尔斯医生;她绝不会对斯皮尔斯医生说起这种事,她对谁都不会说,连她丈夫也没说过——特别不能对丈夫说。她一生就来过两次月经,经血从外阴处的软垫里渗出,把内裤染得通红,怪怕人的,还嘲弄着她过安稳日子所需要的小小的面子和职责,譬如针线活、日常家务、熨烫手艺、制作蜜饯和泡菜、准备清爽的亚麻织物,还有她每天早晨都要擦得亮光光的玻璃灯罩。

柠檬酸泻盐这种药剂几乎不起作用,而果子盐则更加重了她的痛苦。整个春天,她的腹腔一直在痉挛,总是胀鼓鼓的。她时常感到担心:她腹腔的内膜会因压力而胀破。胆汁常常涌到她喉咙里,浑身上下到处都痒,还常受肠胃气胀痛苦的折磨,尤其是在夜里睡在我父亲身边时。父亲出于对她的爱和体贴,常假装熟睡——她能从他恭恭敬敬地蜷缩在床上自己这一侧看得出来。

似乎只有面包才能缓解她的病痛——黄油面包,而且还要大块的,就是她听这个村里的人称作“门槛”的那种厚块面

^① 一种能帮助消化并起轻泻作用的药品。

包。她经常是面包一出烤箱就吃，一块接一块，有时根本不用刀切，而是干脆将面包掰开了捧在手里吃。有一天，她一个人呆在厨房里，从中午到晚餐吃掉了一整条面包。（后来，她急于向丈夫说明为什么少了一个面包，便对丈夫说，她把一个面包烤焦了；似乎我那脾性恍恍惚惚的父亲会注意这么不起眼的一桩小事，似乎任何男人都会发觉这种事情一样。）她时常将糖洒在黄油面包上，面包的表皮闪烁出熠熠的光泽；那晶莹的糖粒在她牙齿间磨擦，给她以力量。她想象那柔软的面包滑进胃里，给这鼓胀得厉害的容器四周带来棉絮般的温暖，吸除、中和她体内的毒液。

8
她无法感受爱的乐趣，她的这种功能已随吞下的糖、酵母、猪油及面粉而降低、消失。她知道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但她还想试试，或者如人们鼓励妇女去做的那样——假装自己舒服。然而，当家里只剩下她一人时，她常受饥饿的袭击，而她为此所作出的努力也因饥饿而归于失败，正如她在这个七月的大热天，置身于马尼托巴一个灰蒙蒙的内陆小村时感受到的一样。（村里有五、六条未经铺砌的街道、一片商店、一家旅馆、一座卫理公会教堂、加拿大太平洋火车站，外加比晓普路拐角处那所专供单身男人寄宿的公寓。）她似乎总在企盼自己身上出现新的变化，但她对所谓“新变化”的憧憬却常因自己的无知和体内组织的膨胀而变得暗淡、渺茫。到了夜晚，她常因难堪而将睡衣紧紧地裹着身子。把灯吹灭后，她便再也不知自己等待什么，或是丈夫喊叫起来，也不知如何是好。幸亏他俩居住的这所木结构的公同住房掩盖了丈夫的叫声。这所房子楼上两间、楼下两间，后面还有一间厕所。她只知道自己游离于任何互有联系的历史之外，与通常亲情间的

慰藉无缘，而在过去的两年间，她则反反复复被凯勒·古德威尔那巨大而渊深的激情所包容。每天晚上，当他爬上她的身子，对着她体内的皱壁汹涌喷射时，她所联想到的，便是那波涛滔天的尼亚加拉河。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她感到自己被深深地掩埋了，仿佛她，默西·古德威尔，只是她自己血肉之躯——那宽阔的脸庞、如面团般厚实的脖子、硕大而松弛的乳房及鹅卵石般坚硬的胃囊——内一次血液的跳动。

母亲站在后面的厨房里，她的大腿内侧如同软塌塌的白肉（让人想起牛肉、鸡肉或肥猪肉），在她汗湿了的棉衬裤下相互摩擦。她突然觉着衬裤湿了，而且从里到外全湿透了。她的脚脖和手腕都有二、三层肉褶，这些呈垄沟状的手足因汗水而变得滑溜溜的。她那肥大而又肿胀的手指紧紧地抠进料理台的面板里，她的左手（结婚戒指被埋在了松软的肉里）因体内的毒素而颤动。她仿佛看到眼前如扇子般伸展开一抹微弱的淡绿色光。她这般情形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远比以前糟糕。她心里想道，她的身子不知会不会破裂开来，骨头从肉里穿出，热血喷溅到地上和墙上。她想象自己的血不是红的，而是黄的。一团厚实的、蜂蜜色的血泥使她浑身松软，没能向隔壁的弗莱特太太大声喊去。

弗莱特太太碰巧在屋外的晾衣绳上夹她的粗布床单和枕套，相隔不过四十英尺远，很容易听到喊声。要是她知道默西·古德威尔的痛苦，准会跑过来的。她会立刻赶到那儿，劝慰这可怜的女人安静下来，央求她在厨房的长沙发椅上躺下，用块冷毛巾敷在她宽阔、湿淋淋、毫无血色的脸上，帮她解开

衣服，拽掉系得紧紧的鞋子和厚实的长统袜。弗莱特太太挺喜欢默西，喜欢她为人处世之道，喜欢她那专心致志的作风。当然也必须承认，她对默西的爱总的来说还是出于对她的痴迷，也是出于对她的同情，对那个硕大、柔软、行动缓慢的躯体的同情——诸如默西那年轻的脸庞两侧不甚清爽的皮肉，她上嘴唇的曲线，或淡褐色的眼睛微微露出的痛楚神情在某些光线下闪现出的俊美。当她凝视默西那双牛犊般的眼睛时，她所想到的不是“真像个孩子”，而就是“孩子”。可怜的女人，没指望的可怜虫。要想再把自己的孩子呼来喊去，做这样的母亲，已是不行了。而现在，从她那模样看，她也不会再有小毛头让她摇摇篮，让她唱歌了——虽然这种事情谁也看不准，谁能预测未来呢？

弗莱特太太(她的教名是克莱恩廷)有三个成年儿子：西蒙、安德鲁和巴克，但没有女儿。老大巴克去了温尼伯^①，在那儿上大学，老二、老三随她丈夫马格纳斯在采石场做工。马格纳斯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生性冷漠，身材瘦削。他是奥克尼郡^②人，十九岁那年移居加拿大后，便一直保持着他的奥克尼作风。这人凡事都喜好简单——一所陈设简朴的住宅，一座精心料理的花园，餐桌上是粗茶淡饭，晚餐就喝麦片粥外加熏鱼，甚至一盘涂了黄油的面包，就着茶水便能吞个精光。他一看到从玻璃模中取出的麦尔维恩布丁，上面还涂了奶油便直倒胃口，尤其是在一九〇五年盛夏的一个普通星期一(那是我出生的一年，那天也是我出生的日子)，晚餐吃这么一块

① 加拿大中南部城市。

② 英国苏格兰原郡名。

布丁更让他痛苦不堪。

弗莱特太太——克莱恩廷，身材匀称，皮肤与蘑菇一般颜色，她对三个孩子儿提时代的记忆被失望冲刷得清晰鲜明。她曾梦想将默西那又大又干的手握在自己手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从未感到生命在她心脏下方躁动，那她的生活便连一盘大白菜都不如。搞个小东西养养，看着他长大成人，这就是爱。我们常说爱丈夫，我们站在教堂里说，我们如何永远永远爱他们，直到死才分开，可我们真正爱的是我们自己的血肉子女。”

她喜欢送东西给默西。就在今年春天，她清扫屋子时发现了一只做果冻用的旧白铁模子。这模子就是今天默西用来做麦尔维恩布丁的那只。她将园中的鲜花采来送给默西，还给她豌豆、烟草、康乃馨、屈曲花、金鱼草等。莴苣上市时，她也会给默西；她还给她小红萝卜、胡萝卜、蚕豆。此外，她还给她成罐成罐的浆果酱或大黄泡菜。有一次，她送给她一套四角绣花的茶巾，还有一次送的是一条中间镂空的贴花床罩。对了，默西一直十分喜欢的那本烹饪书也是她给的，现在这本书已用得很旧了。圣诞节那天，她给了默西一块天芥菜花香的香皂，还是用包装纸裹着的，清新馥郁。有一次，她竟莫名其妙地给了默西一个镶着彩带边的 U 字形的镜子。这些东西经她的手传到默西手中，倒也一时间闪现出熠熠光彩，尽管她送这些东西时所说的话听起来却不觉得她多么慷慨大方：“我自己一点儿也用不上这东西。”或者“我这儿还多着呢，足够一个部队吃的”。要不就是“这东西对我们太花哨了，但配你挺合适”。再就是“弗莱特先生受不了这股子香气，可这玩意儿挺不错，能派上用场，扔了怪可惜的”。

默西那柔和而浓浓的感激之情，那渐渐漾起、略带迷惘的笑容，以及她那清纯、未被世俗玷污的神情使弗莱特太太久久地将她拥在怀里。从默西那起伏的胸脯上，弗莱特太太自然能想象出，默西心中那浓重、满当的激动、陶醉之情冲压着她衣着整洁的前胸。她会对着默西那苍白、肥胖的脖子、对着她柔软的肩膀和卷曲的棕色头发喃喃自语道：“我亲爱的。”

这一时刻虽在将来，但它终究会到来。她站在似火的骄阳下，一边在绳子上晾晒洗净的衣物，一边这样想道。她先晾亚麻布衣服，接着晾她的围裙和衬衣，再就是他们父子夏季穿的工作服。外面几乎一丝风也没有，衣服会被晒得硬邦邦的——两小时就晒干了，天就是这么热。她今天衣服洗迟了，一会儿还得去园子里锄草，还要去摘些晚餐吃的豌豆。她做什么事都不及时，脑袋里总有那么个尖厉、刻薄的声音响着，一会儿是“该擦烤箱了”，一会儿又是“该把那些东西补一补了”，要不就是“窗帘布该浆洗了”。脑袋里那嗔怪的声音是她自己的，那样刺耳，那样急促，然而又那样无力，对她毫无作用。家里的男人——她丈夫和两个儿子，七点整去采石场做工，五点钟回来。她一整天做了些什么，他们会怎么想？当她这么恍恍惚惚打发日子时，她觉得不止一双眼睛能透过她家的屋顶和四壁，看着她与懒惰这个诱惑人的家伙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讨价还价。一想到这，她心里就发抖。

当然，上帝能看见她；他准能。当她站在窗前直愣愣地盯着锦鸡树的影子在路面晃动，或是坐在厨房一张椅子上，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木然地看着一只苍蝇爬过桌子，这时上帝在注视着她。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变成一小时，有时两小时。这些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出现这种恍惚状态的次数

越来越多，自打夏季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她早晨醒来时还很清醒，但随着时钟指针的向前移动，她就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召唤她——懒散与一人独处那撩人的诱惑力在召唤她，没一会儿工夫，她便乖乖地做了俘虏。将她包容起来的无论是什么，都是那么柔和。它像一片芬芳馥郁的云彩盘绕着她升起，既不露脸，又悄无声息，只是弥漫出一种柔和、连绵不绝的香气。这令人心醉的香波钻进她的喉咙，沉入她的体内，使她女性的隐蔽处和她柔软的大腿肌肉紧缩起来。四周寂然无声，然而寂静也是一种折磨。总有那么一缕赤裸裸的思绪在撩拨她——上帝对她的过错不闻不问，他根本什么也没对她说过，一点儿要说的迹象也没有，甚至不想自找麻烦去戳穿她，尽管她在厨房的墙上挂了一块刺绣亚麻布引诱他：

耶稣是这房子的主人
是每餐饭桌上
不露面的客人
是每次谈话
静静的听者

她能欺骗周围的人，这太可怕，却又很刺激；她那些浪费了的时间，栩栩如生的梦境和断断续续的话语，似乎使她过着两种生活，而不是一种；而那第二种生活被秘密地包藏了起来，这倒是件新鲜事儿。

那么，她是不是在欺骗自己？当她在采石场路偶尔遇到斯皮尔斯医生时，他的确抓住她的手腕，以最为奇特、最为诚恳的口吻向她说，“女人需要与其他女人为伴。”他先是彬彬有

礼地谈了会儿天气，然后突然这么说道。“小笑一声，心旷神怡；比如一句无害于人的闲言碎语。什么针线活俱乐部啊，或是母亲联谊会什么的——而且我相信，弗莱特太太，你曾经是妇女节奏与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知道你以前曾在兴高采烈的下午聚会中寻得乐趣。我太太对我说，她们最近一次关于中国人使命的谈话挺有趣味，也挺有启发性。”

“我家务很忙，”克莱恩廷·弗莱特对斯皮尔斯医生说道。

“那当然，那当然，”他很快点了点头。“也许你打算去温尼伯玩几天。我想你每年都去那儿和你儿子巴克住上几天。他还在那儿，对吧，是在学习吧？如果我还记得的话，他学的专业是植物学。”

“是的，”她回答说，“花卉、植物。”

“我肯定他为你争了光，真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还记得，那些提名他竞争艾普沃斯奖学金的人，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当然记得，真的记得，呃——”

“那为什么不去看看他，给他一个惊喜呢？我们都时不时需要换个环境，特别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如果你同意，我去对你丈夫说——当然是间接地。我可以对他说，小憩几日会给健康带来好处。”

“请别，”她说道。她心里盘算着离开斯皮尔斯医生后便可进入那寂静的椭圆之中，那闪射出柔和的珍珠光泽的椭圆之中。“没那个必要，我可以自己对他说。”

母亲联谊会，在温尼伯小住几天；这些消遣的主意如果是早几个月提出，也许会吸引她。她也许真的会对她丈夫马格纳斯提起去温尼伯住上一星期。也许在她做什么寻常家务时，如擦干晚餐的盘碟，或是将挂在窗前的那盆海棠花上的枯

叶剔去时，她会把这些话说出来。她丈夫可不是个爱说废话的人，但他们夫妻俩多年来还是维持了简洁而必要的婚后交流方式，如：三个儿子的抚养、订购生活必需品、对天气、疾病、园子里种什么蔬菜等等的讨论。她曾经猜想——不过她又怎么能知道这种事？在这个世界上谁又会告诉她？——她曾猜想，她丈夫的要求方式，并不比其他男人更粗鲁。“如果你愿意，孩他娘。”在他俩那黑乎乎的后面卧室里他这么说道，一只手在她睡衣上摸着。一千次，五千次——“如果你愿意，孩他娘。”这句话在她的意识中已刻出了一道沟槽，她几乎听不见它。之后便静悄悄的，仿佛坠入一个洞里；或是听到一种她认为是满足的哼声。

“那我们就结婚吧？”这是他二十年前说的求婚的话。它袅袅盘升，打消了她一切疑虑。那会儿他来加拿大还不到一年，在拉克迪邦耐特（这地方离她父亲的农场不远）一个破旧的花岗岩采石场干了八个月。他的奥克尼口音很重，非常刺耳，虽然她似乎觉得自己在他的口音里听出了什么柔和些的东西。那是个暖洋洋的四月的夜晚，在米尔纳教堂做完祷告后，他送她回家。满天星斗密密层层。她感到自己能像服用营养品一样大口吮吸清新的空气。那已是他第三次送她回家了。她知道——他也心知肚明——他有权要求吻她。出于好奇，她同意了。他的上嘴唇压着她的嘴和脸颊飞快地蹭着，蹭得太快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们结婚吧？”

他的专横鲁莽打动了她，两人真像孩子般天真烂漫。她忍不住想笑，想逗他玩——那年头她知道怎样才能快活——可他的脸贴得太紧了。

“你到底怎么说？”他追问道。他的面容被夜幕所掩盖，但

她还是能感觉到他在自己脖子上呼出的热气。她变得浑身酥软,于是准备着耳边响起一些缠绵的话语。

“我挣的工钱足够的,”他说道,“而且我的工作也很稳定。”

这话一点不假。她无法提出什么来反驳他。她从未真正学会如何去反驳他。他说话的方式很特别,不会让别人提出异议。比如那台新冰箱吧,那是他写信订购的。他悄悄将定购单寄到伊顿邮购服务部,而现在它已占据了厨房的一个角落,硬是这么突然出现了。几个月以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拒绝去斯皮尔斯医生那儿看他耳朵根下面的肿块,后来便在冰箱上花去了十一块钱,十一块还外加运费。贴在冰箱上的那块金属牌上写道:“新一代改良型拉布拉多牌冰箱”。她从未要过这玩意儿。冰箱买回来的头一天,她看着他用手指抚摸冰箱那光滑的木板和铮亮的金属铰链,心中禁不住想道:也就是这些手指触摸过我,触摸过我赤裸的身子。

她这样的念头越来越频繁。这几个月以来,她的内心躁动、狂乱。她这个女人的性欲犹如沉到了一只裂了缝的大水罐底部,在那儿期待着。

即便此刻,就在她晾衣服这会儿,她都觉得自己在晕乎乎地企盼着。可是为了什么呢?拥抱我吧,她冲着滴水的床单和枕套说道,搂着我。可她说话的口气又是那样沉闷,那样毫无希望。凸出地面的一块石头上放着她那只旧的木洗衣盆,这会儿已经空了。头上的天空寥廓、湛蓝;抬眼望去真让她头晕目眩。她感到鼻孔里似乎被什么扎了一下,便伸手到围裙口袋里摸手帕。洗涤碱的气味钻进了她的鼻子,刺得她直想打喷嚏。“我不愿意了,”她暗自忖道。“我不再愿意了。”

她估摸着已经三点了。今天她不想再去园子里锄草。丈夫或两个儿子不管谁问起,她便抱怨天气太热了。像今天这样太阳火辣辣的,干嘛拿身体去冒险呢?她自然更想去前厅,坐在黯淡的角落里那张罩了绣花毯的椅子上凉快一下。她以前也这么做过,然而却无法经受自己内心的哀愁。她视如珍宝的那盆伯利恒花在它自己的瓷花盆里坚实地扎下了根;她喜欢探究它那灰绿色叶子的奥秘。而那些墙纸的图案——一排排棕色的、粉红色的、交叠重复的花朵同样能吸引她的注意力。那把栎木框的小斜角镜子映出了她的模样——扁平的头发和眼睛,而她的脑袋里却如石头般发烫。

“我爱你,”她听到年轻的凯勒·古德威尔对他那体态臃肿的大个子老婆默西说道。“啊,我多么爱你,全身心地爱你。”

她是在一个傍晚听到默西这么说的。那天和今天一样,也是星期一。当时她双手抱着一篮邻居送给她的丁香花,驻足于古德威尔家的门前。(其实,她发现自己很难离开。她感到这个新婚之家有一股神奇的魔力。这儿的气息比其他家庭更温馨,声音也更柔和,窗帘布是代用品,地毯也是便宜货,可在他们家里都显得那样漂亮、鲜艳。)古德威尔家的厨房窗户迎着外面清新的春风大开着。他俩坐在桌旁(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俩),默西坐在桌子的一边,凯勒坐在另一边;白色的餐桌布和晚餐用过的盘碟还没拿走。

由门口投射进来的光线照在我母亲宽阔的脸庞上,漾出熠熠的光彩。我父亲向她探出身子,手握着她的手。克莱恩廷·弗莱特觉着,他俩这姿态亦可以成为一幅会客室画画的题材,例如一幅以淡蓝色和灰色等色调画成的水彩画。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母亲是个异常肥胖的女人,加之她

果冻般的相貌,恐怕只能算个相貌平平的女人。诚然,她的邻居弗莱特太太从她那双被挤压的眼睛和那悬垂如袋的下巴里发现一种美,可我手头的一帧照片——她的结婚照,却让我不敢恭维。我母亲身材高大,浑身肉滚滚的;而我父亲却截然相反,是个小矮个,骨架矮小,身上瘦精精的,脸上常常掠过一种迷惑不解的神色。也许不难想象,村里那些男人们常会贬损他,开些粗俗无聊的玩笑。

我全身心地爱你。弗莱特太太听到他对我母亲这么说。说完后他似乎便精疲力竭,靠在了椅子背上。我全身心地爱你。这种话可是小说里的情人们创造的。谈情说爱的话语,卿卿我我的话,缠绵销魂的诗句。克莱恩廷·弗莱特有时也看些廉价的小说,不过得瞒着她丈夫,因为他总认为读那些玩意儿是浪费时间。书里的人物互相间说话都那么情意绵绵,可她再也没想到,这种话竟会在马尼托巴的廷多尔村中一个普通采石工人家里说出来;她也没想到,他们说这些话时的声音或语气竟是那样充满了柔情蜜意:“啊,我多么爱你!”凯勒·古德威尔对他妻子默西说道。他是以极度渴求的口吻喊出这话来的。这种极度渴求的话语克莱恩廷·弗莱特简直无法从记忆中抹去,整个春天都留在了她的脑海里,如同春雨般流淌在她那张干涸的日常生活的网上。此刻,就在她站在晾衣绳前打着喷嚏,在耀眼的阳光下眨巴着眼睛,竭力抵御着下午就此歇工回家的诱惑时,那话语仍在她耳边萦绕。

她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烧一壶水,邀请默西过来喝茶。

对,烧一壶香喷喷的茶水。克莱恩廷主意已定。她要拿出属于她母亲的最好的玫瑰花茶杯——皇家阿尔伯特茶杯。在她烧水的当儿,她还要准备一盘果酱饼干。女人需要与人

为伴——斯皮尔斯医生那天对她高谈阔论一阵，说的正是这一点。也许这就是她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只是孤独而已，别无其他；并不是日子过得不舒心，而只是有时会遭到孤独的袭击，仅此而已。再说，默西·古德威尔，这个惹人爱的可怜的年轻女人，也挺孤独——弗莱特太太陡然意识到这也是事实，她觉察得出来。无论默西怎样心怀无人知晓的一腔柔情，也无论她年轻的丈夫怎样向她耳朵里灌进多少喁喁情话，无论怎样，她和默西在这个世上仍然是形单影只，仍然是两个孤独的人儿，各自住在并排相邻的两座房子里，都被禁锢在同一个焦躁与渴望的圆箍之中。为什么她以前就看不见这圆箍呢？正因为如此，克莱恩廷·弗莱特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被锁在家中，远离母亲联谊会和针线活俱乐部，也没去温尼伯小住几天。但如果要她走出将她俩——她和默西·古德威尔，两个以独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教姐妹——锁在其中的这个让人软弱无能的圈子，她又觉得受不了。

最终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她肯定要干的。她要立刻去敲默西的门，把她叫过来。她要把茶沏得合默西的口味：淡淡的、甜甜的。也许她还能——她突然觉得自己胆子大起来，想下午举办一个茶话会，就是斯皮尔斯医生的太太和采石场主的妻子霍普斯潘太太搞的那种茶话会。喝了一、二杯茶后，她也许还可以请默西用她的教名称呼她。“你干嘛不叫我克莱恩廷呢？”她会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实际上我还喜欢你这么叫我。我们已做了两年邻居，嘿，你就跟我女儿差不多。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是你也能说出自己——”

然而这时，她的思绪被打断了。她听到了谁的声音，一个男人在尖声叫喊。她抬起头，见是那个犹太佬从园子对过蹒

跚地向她走来。

这年头要谈论那犹太佬可真不容易。这事还挺复杂。您的思绪得倒卷回去，直到“犹太佬”这种话能公开说出的那个年头，犹太佬，瞧，说谁谁就到了。

只见他那脏兮兮的黑衣服在热浪中飘动，乱蓬蓬的头发怪里怪气地长在脑袋上。他戴一顶不知什么式样的帽子，又破又脏，那帽子被他推到了后脑勺上。他颧骨突出，脸颊蜡黄，如核桃般布满了皱纹。他脸上这些饱经风霜侵蚀的道道皱纹里嵌满了灰尘；如果不是灰尘，那便是他外来人种皮肤那怪异的气色。

他的马，那可怜的东西站在路边，被拴在默西·古德威尔家门边那棵小白杨树上。看这情形，他肯定是胡乱将马拴了了事，因为他满可以挑那栅栏格子拴马的。再瞧那马车，破破烂烂的，整个儿地散了架；它嘎吱嘎吱、一瘸一拐走在路上，吓得田里的乌鸦四处乱飞，瞧它那模样也配叫马车？

他的到来使人人自危，个个侧目，因为他几乎毫无例外地向人们索要咖啡或冷水提神，等他走了以后，大伙便忙着煮茶杯和玻璃器具消毒。这老头冬天在遥远的冰岛人聚居地阿尔伯格周围走乡窜村时，还经常大着胆子提出借宿的要求。人们也不得不向他提供被褥等住宿用品，但第二天同样要煮过消毒，还将各扇窗户大开，通风透气。他把自己身上那股子臭气——大蒜、洋葱、霉菌、不洗澡等散发出来的臭气带进了这些干净、节俭的家庭。他叫卖的东西，像钮扣、靴带、针头线脑什么的，虽不易买到，仍不足以补偿臭虫及一些可怕的、叫不上名儿的疾病所带来的危险。他的舌头厚厚的，发出阵阵

酸臭；他的眼睛给人一种迷惘的感觉；他还会花言巧语地蒙骗人。他把当地所有的女人都称作 meesus^①，把她们的丈夫称作 meester^②，而对于那些住在寄宿处的年轻男人则向他们兜售淫秽之物。他大约四十岁年纪，也可能六十了，常带些经过挑选的药丸、洗涤剂、小刀，还有小玩具、烟草、硬水果糖、各类劣质酒等。据说他常在鸡舍里顺手拿鸡蛋，在菜园子里偷摘番茄，将茶匙塞进大衣里带走。他还常常趁孩子不在意抓住他们，伸出黑乎乎的手拍打他们的脑袋，让他们的父母好不舒服。

人们常在村间小道见他鞭打他那匹可怜的老马。他拖着脚步走到人家的门口敲门，听那敲门声一副讨好巴结的样子，可又非把你的门敲开不可。一听那敲门声，你就知道谁来了。他走路已无步态可言，总是慢吞吞，毫无节奏地拖着脚走，让人联想起旧世界的传染病。可是这会儿，七月的一个下午，他却歪歪倒倒地直奔克莱恩廷·弗莱特太太而来。弗莱特太太正站在她的晾衣绳旁——那如横幅标语般的床单、毛巾，恰似一幅烤干了的木板人体画。

他先是一把抓住她的衣袖，而她则本能地让开身子，一边喘气，一边申斥，可他自不肯罢休，又抓住她。这次他粗野地抓住了她的手腕。此时，他的脸呈扭曲状，露出一副苦巴巴的样子，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太太，太太，”他那张脸紧挨着她的脸，使她能闻到他呼吸和身体发出的恶臭。

“哦，太太；太太，哦。”

① meesus 为 Mrs 的不准确发音，意为“太太”。

② meester 为 Mister 的不准确发音，意为“先生”。

他发疯般地喊着，声音尖厉、恐惧，那音调之高恐无男人可比，而他吐出的这些字又是那样急促、含糊。他嘴里只剩下三颗牙齿，见他这模样，她着实吓了一跳。一处疮疤使他的上嘴唇变色发黑。克莱恩廷·弗莱特躲让着他，心里直犯恶心，差点没昏过去，然而她又无法将自己的眼光从他那干巴巴的疮疤移开，反而莫名其妙地渴望伸出手触摸它。

他抓着她的手不肯放松。

“哦，太太。”

她的手腕被他死命抓住，使她难受得直想呕，可看到他破破烂烂的大衣袖口，苍白的手臂露在短了一截的袖子外面，她竟止住了呕吐感。

弗莱特太太注意到，这是一个普通男人的手臂，也只是稍微难看一点而已，与她丈夫马格纳斯的手臂相比，也不见得有多大差别——每当她丈夫的手臂星期六晚上滑出袖口，伸进满是泡沫的肥皂水中，便露出疤痕道道，一用力紧绷绷的，青筋暴出，但令人吃惊而心动的是，它却又有点像女人的手臂。

她暗自忖道——所有这些想法都在几秒钟内聚到了一起——这犹太老头也可能在这附近一带有什么亲戚，有一间屋子、一个温暖的炉子和属于他自己的一张床，这样也好有个归处。假如这样的话，他还可能有个女人与他同床共眠；他两腿之间自然少不了男人都有的那个青灰色的软肉袋。这些想法真叫人恶心，她得将眼光移向什么好的、健康的东西上。名字，他一定有个名字，否则谁也进不了这个国家，成为这儿的公民。也许他还有两三个名字，没法发音，也拼不出来。准有什么人给他起了这些名字，可这人是谁呢？

这些问题冲击着她，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她又

想到了自家那间幽暗的客厅，那带有凉丝丝坐垫的手扶椅，那在一个角落里已经破旧的绣花毯，想到自己如何时时小心，将那角落遮掩起来，不为外人所见。这个思绪如清凉的涡流，与那些问题交织在一起。

那犹太佬仍然用一只手抓住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拚命朝默西·古德威尔家的厨房那边指去。“太太病了，”他终于说出话来，“病了，病了，”她终于明白了。

两幢房子之间的这块地高低不平，布满了石头、树根和一簇簇乱草。他俩一起踉踉跄跄地朝洞开的厨房跑去，你撞我，我碰你，这犹太佬的手从未松开过那女人的手腕。

我真忍不住要冲到从我母亲双腿间挤出来的那个血淋淋的肉团跟前，将手搁在这团血光闪亮的浆状物中自己那颗跳动的的心脏上、扁平的脑袋上和柔嫩的双臂上。我的母亲默西·斯通·古德威尔就躺在那儿，躺在那张套着廉价但整洁的花布椅套的躺椅上喘着粗气。她侧躺着身子，好像什么人将她推倒在地上一样；她粗壮、柔软的双膝向两边分开，阴部暴露在外，如同贝壳，又像个压扁的果子。

她那条沾满了血的衬裤仍在她扔掉时的原地，也许是在地上，没人看见。

无论你怎么想，这幅情景并没有什么丑陋之处，也就是说，没什么不自然的；既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它呢？因为我渴望将各种不协调的因素协调起来，虽然在我说起此事之前，我就知道，我所作出的努力将可能成为一种辩护。鲜血和无知，这两者会产生什么结果？再就是脉搏跳动、无意识状态、还有从我自己刚刚出生的那团肉中淌出的胶状物；我非将它变得完整而洁净不可，并在它的下方写上一行文字，也许

写一句拉丁文的座右铭。

我还要说一说我父亲，因为他这会儿也过来了，正沿采石场路朝家走来。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拍打着白蛉虫，还用工作靴踢起灰尘。他已累得精疲力竭了。干了九小时砍大石块的活，谁不精疲力竭？他一小时只挣一毛四分钱，还不到他妻子默西去年冬天做圣诞节布丁所用的韦斯蒂萨葡萄干一磅的价钱。可他还是吹着一支欢快的调子，也许是《小棉娃娃》，要不就是《打盹的朱姆，朱姆》。走到通向坟场的帕克路时，他停下来撒了泡尿。

从加森至廷多尔有两英里路。采石场的其他工人，即那些在石灰窑里干的或那些抡铁镐采石的工人在干了一整天后，都乘坐公司的马车回廷多尔的家去，他们将靴子挂在车的两边。健壮的马队——这种漂亮、肌肉发达、价值诺亚方舟的牲畜现今已很难见到——拉着他们朝家奔去。可我父亲却不在其中，他宁可走路。他是个怪人，这一带的人都这么说他；一个不合群的人，看上去傻里傻气，专走自己的路，一个小矮子，不过干活挺利索，人很精明能干，还精通各种机器设备；很有个性；遇事沉着、冷静，来自斯通沃尔镇，妻子也是。至于他妻子，哼，（说下面的话得挤挤眼睛，捣捣胳膊肘）她这个女人足以使二、三个男人忙个通宵的。

在弯了一天腰面对石灰石，或是一整天窥视那台轰轰响的老式凿沟机的内部结构之后，他喜欢让双腿活动活动。采石场开张不过几年，是一八九六年被一个当时在屋后挖井的农夫发现的。四年后（有人说这是一桩不正当的交易，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将这采石场卖给了威廉·加森，即现在采石场的地主兼业主。被开采并已运走的石材已达十万吨，因此

采石场的地貌也发生了变化：地表逐层下移，形成一个圆形的露天竞技场，而各层的扁平石块均有十二至三十六英尺高。地下究竟有多少石头，这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照现在这个情形，这地方还能开采五至十年；还有些人较为乐观，见识也多一些，据他们估计，这一带的石层有半英里宽，一直延伸至温尼伯以外的地区。

这儿的石头是白云石，比我父亲熟悉的那些产于马尼托巴斯通沃尔的石头要漂亮，也比较容易开凿。自然界的化学作用使这儿的石头表面呈独特的花边状，其颜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淡黄夹棕色，另一种（我最喜欢的）是淡灰底色夹带稍深一些的灰斑纹。有些人管它叫地毯石，他们还特别珍视这种石头形状各异的化石，如：螺蛳、腕足类动物、三叶虫、珊瑚、蛇等。当这些曾经活着的动物的肉腐烂后，一种石灰质的泥土便填入这些动物躯壳内，风化变硬，成了石头。我父亲读书不多，但被上天赋予了一种自然学家的好奇心，不久前，他曾挖出一些更为有趣的化石，并将它们带回家给妻子默西看。（她在我出生那天用来压麦尔维恩布丁的石头便是融三块化石为一体，极为罕见，至今仍未被适当归类。）

为什么凯勒·古德威尔下班后要走路回家？那会儿太阳还黄黄的，挺烤人；他又为何一路吹着口哨？我刚才已经说了，他在劳累了一天后喜欢舒展绷紧的肌肉。我猜想——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他喜欢伸胳膊踢腿的，这样可以使他在离家越来越近时觉着自己高大一些，强壮一些，与他自己心目中的他更接近一些。他是丈夫，是爱人，还有人在等待着他。有人在等他，这可是一种意想不到的令人幸福的礼物。他拥有自己的住房（当然是租来的，可仍然是自己的窝），一张

已上好晚餐的餐桌,还有一个自己崇拜的妻子,肉体和心灵都崇拜的妻子,他崇拜她。

在他过去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他产生爱的想法。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受到过一些损害——一个脸如针尖般的父亲,一个邋里邋遢、如棍子般的母亲,又没有兄弟姐妹,这些先天不足使他相信:他这一辈子都不会长大成人,食量会如孩子般小得可怜。

古德威尔这一家子似乎落在了养育他们的那个严厉、古板、乱哄哄的世纪后面,全家三口,父亲、母亲、儿子,都一个味儿:软弱无能,外加精神不振,身材矮小。他们居住的那所房子正对着斯通沃尔的石灰窑。那房子位于一条脏兮兮的路的尽头,门廊歪歪斜斜的;窗户也被石灰窑冒出的黄烟熏得斑斑点点,年复一年从未洗过;厨房的屋顶漏水,从未停过,一到下雨天,烟囱便浓烟滚滚。这个屋子烘出来的面包都是未发酵好的,表面凹凸不平,样子实在少见。本可以用来修缮房屋或购买小小的奢侈品的那部分工钱却放进了一只果酱罐里,那些纸票子像压皱了的树叶一样堆在里面,脏兮兮的,却散发出一股香味。在夏天,镇上的男人们会聚集在杰克逊街和玛丽亚街的街角上,搞一场钉马掌比赛,可古德威尔家的人,不管父亲还是儿子,很少被邀请参加的。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别人觉得他们对各种消遣玩乐不感兴趣,或是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技巧,或是怕他们那副怪异的无精打采、郁郁寡欢的样子破坏了大家的情绪。目光敏锐的古德威尔太太就不同了,由于受一些古老的基督教教义的感化,她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在头上套一顶毡帽,去长老会教堂做礼拜,但谁也不会建议凯勒一块去的。

从未有人问起过他的精神状态或健康状况。谁也不会就什么问题去征求他的意见。尽管他的石匠手艺日趋高超,但很少有人谈起过。在他结婚那天以前,谁也没想到过要给他照张像,也从未有人提起过他的生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不会收到任何礼物,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热热闹闹的仪式,尽管他十四岁生日那天,他父亲从那盘烤猪肉和马铃薯上抬起头咕哝着说,他该离开学校去父亲自己受雇的斯通沃尔采石场干活了。打那以后,凯勒的工钱也进了那只果酱罐。这种状况持续了十二年。

要我理解时间的泯灭,如同别人那样接受时令季节的消长、或是有意识地明白旧年结束,新年开始这种事实,那真是太困难了。我的这种心态说明了人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助的,而我们生活的主要部分都被白白耗费或处于浑沌之中。即便是“十二年过去了”这句话的各个部分攥住了我们的舌头,以致说出这句话便能否定传记文学的逻辑,即便如此,这么长的时间怎会包含如此少的内容?这十二年又怎能从我们生活中消逝?当我们的精力最为充沛,准备迎接(将来不会再有第二次)感情的冲击之时,多少个月,多少星期,多少天,多少小时却虚度磋砣;这可是人生最宝贵的时间。从十四岁至二十六岁,在这十二年里,我的父亲,年轻的凯勒·古德威尔,每日早起床,喝一碗燕麦粥,穿过马路去采石场做九个半小时的工,再回到他父母那阴冷、简陋的家中,准备早早上床睡觉。

讲述一个人的生活实为了一件骗人的勾当,没错;我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然而我们仍笃信我们人生这一简单的容器,这的确是个奇迹。在那十二年里,我父亲早餐吃的燕麦粥,可能有时稀一些,有时

则厚一些；同样可能的是，他曾揉搓过情欲的器官，或许是因为偶尔听了工友之间的谈话，或许是青春期发育的必然行为，要不就是听了一些流行小曲的歌词，或是偶尔喝一回烈酒。他的确参加过一年一次的单身汉聚会，也的确与一八九九年乘船路过此地的老斯坦利勋爵握过手。尽管他年轻时生性呆板，但他既不瞎，也不傻，在家肯定曾反复观察过，注意到即便是在他父母那心如死灰的家中，仍然有些许心情的变化，闪现出各种细微情感的亮泽。然而，自从他离开学校起，十二年过去了，直至他与默西·斯通相遇、相爱，他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奇迹般的改变了。

在那个年头，斯通沃尔是个只有两千人的小镇，但某种历史变故或观念将他们两人阻隔开来。他在这个镇上无论是儿时，或是长大成人，都从未见过她，也从未听谁提起过她的名字。她如同修女被关在修道院里一般，是在与世隔绝的斯通沃尔孤儿院里长大的。这孤儿院坐落在镇的最东边，虽算不上冷酷无情之处，但也是个严厉清苦的地方。在这所斯通沃尔孤儿院里，人们出于一种对秩序或民主尊重的冲动，把凡是没有父姓的孩子，即那些被未婚母亲送交孤儿院照看的婴儿都叫作斯通。于是，名单簿上的名字都差不多：伯思·斯通、卡罗琳·斯通、加雷思·斯通、海拉姆·斯通、拉马廷·斯通等，直至我母亲默西。母亲的家世与其他孩子一样，根本无人知晓。不过，她的肤色、柔美的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都显示她的父母是乌克兰人，或冰岛人。她刚生下来没几天便被包在天鹅绒毯子里（因为六月的夜晚还是挺凉的），遗弃在靠近孤儿院后门的那只旧面粉桶里。这些面粉桶婴儿，后来人们这么叫他们，由镇上收养，让他们接受基本的教育，教会他们一门手艺，

十四、五岁时便送出去就业,可我母亲例外,她颇有管理家务的才能,院方视之为宝,不忍将她送走。十六岁那年,她便经常协助孤儿院的管家管理日常事务。四年后,老管家去世,她便承担了管家的全部责任。

看她的身躯便知道她爱吃面包和粥。尽管她膀大腰圆,十岁时就已是“重重的”了,到了二十岁更是体大如象,尽管如此,她还挺喜欢跪在地上擦地板,直至把地板擦得光亮亮的。有时,当 she 从热乎乎的烘箱里取出一排馅饼,看到黄灿灿、脆生生的酥油饼皮,吱吱冒泡的甜果酱的可爱颜色和质地,她就觉得挺自豪,竟飘飘然起来。对住在孤儿院的十二、三个男女孩子,她只是偶尔关心一下。“默西·斯通,四十块石头之重”常作为一种节奏跳跃的顺口溜在孤儿院的女孩子们中间传唱。但她还是喜欢布置餐桌,搅浓调料,平整衣袖,浆洗、熨烫、折叠干净的衣物。她很能干,而她的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孤儿院里生活邋遢的现象是可想而知的。当她走进一间宿舍,比如说,女生宿舍吧,她的目光便四下里扫视,只要看到东西乱放、破损或需要擦干净的,便随即卷起衣袖,径直干起来。

在她二十八岁^① 那年春季的一天,阳光灿烂,寒风习习,她发现孤儿院正门的门槛向上隆起,显然是霜冻使其变了形,致使大门开关困难,并发出尖厉的声音。她于是请来一位石匠,重新放置石门墩。这石匠便是我的父亲凯勒·古德威尔。

母亲温柔的姿态,脸上显露出的端庄的神情,以及站在他旁边心慌意乱地挥动双手的模样——一只手竟绕进另一只手

① 原文恐有误,照年份推算似应 27 岁。

里,也许是因为某种模糊的社交责任感所致,这一切很快感染了我父亲。然而,连父亲自己也没想到,使他怦然心动的竟纯粹是她的身体。她那一层层宛如涟漪般的肉体,当她指着门框歪斜处时裸露出的光洁、雪白的双臂,深深地搅动着他的心田;还有她那高耸的发髻,胖鼓鼓的脸庞,胀起的领口和圆滚滚的肩膀,都显示出她的纯真无瑕,一种似乎在高喊着请求保护的纯真无瑕。他渴望将嘴唇贴到她胳膊肘的内侧臂上,用指尖触摸她双眼下柔软的皮肤——那细巧的半球状凸出部。

他干活时,她就站在一边陪伴他,嗫嗫嚅嚅地说起这个多年来最寒冷的冬季,刺骨的寒风,厚厚的霜冻,还有廷多尔南部眼下似乎正发大水的事情。

不错,父亲附和道,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严肃的嘴。他已听说了发大水的消息,灾情很严重,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耸了耸瘦小的肩膀,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生水灾的。

他发现,母亲的肥胖已吞没了她大部分五官,但还是留下了她那双纯净、边缘柔和的眼睛。

他不肯收工钱,说他只干了不到一小时便将石墩磨正了,说他干这些活挺愉快,让他在采石场单调的活计中得到些调剂;此外——他朝孤儿院的大门、屋顶、外观及在路旁那群吵吵闹闹玩耍的孩子茫然地点点头——他又说道,能尽其所能做点事也挺让他兴奋。这么一来,她便硬要他到宽敞、温暖的厨房,给他喝了杯咖啡,又给了他一块自己烤的褐色糖饼,还是刚出炉的呢。这些糖饼甜得特别,脆得出奇,那一层层酥油面整齐、漂亮,中间的夹心味道浓浓的,十分可口。

他将咖啡杯碟放在双膝上。后来,他想起自己曾低头瞅着自己的大拇指,看到指甲里那一圈标明边界的黑乎乎的脏

东西。他的双手颤抖起来，不过他最后还是说道：“我可以再来吗？”

她两眼紧盯着他，想象他衬衣里面那瘦骨嶙峋的板状前胸，然后便忙着收拾杯盘，走开去了。这个求她的男人并不为她所理解。话从他嘴里说出，消融在厨房温暖的空气中。不过，她倒更喜欢他了，就因为他颤抖的双手和他带有淡淡的洋葱气味的体汗。她不由自主地又折回身来，冲他不自然地笑了笑。

“我们能出去散散步吗？”他提议道。

“我不是一个擅长走路的人，”她无可奈何地说道，转过身轻轻地朝他做了个手势。

“还是去吧，”他说道，并对自己的勇气很是吃惊。“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谈。”

她淡淡地、羞涩地瞥了他一眼，而他则把这个眼神当作一种应允。

在他的前面，犹如一本厚厚的书被一页页翻开，真是困难重重，他看到自己所必须学习的东西，如：恋爱、婚姻、家庭的建立，新的说话方式等都是那么困难。一想到还要作如此巨大的努力，他几乎要打退堂鼓，可他又觉得被什么力量驱使着向前走，去学习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考验自己的毅力。没过一个月，他便硬逼着她同意了。她将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将搬到三十英里外的廷多尔村，他已在那儿新开的一家采石场里申请到一份工作。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父母亲——他们惊得哑口无言——于是婚礼也挑定了日子。

人们见到他俩在一起便发笑——这个胆怯、孩子般矮小、痴痴迷迷的年轻人，殷勤地倚靠着这个肥胖的大个子女人，将

她一只又宽又重的手放在自己腿上，温柔地抚摸着。人们发现，他比她要矮一、二英寸。站在孤儿院的门口，他一边道晚安，一边将手放在她宽阔的脸上，抚摸她曲线般的溜滑的粉红脸蛋。

从一开始他便知道，默西·斯通的激情比不上他的激情，而其种类则更与他的激情迥然相异。不过这对他来说似乎挺自然，也挺恰当。在他二十六岁这年，那突然使他心激神荡的、芬芳而强烈的情爱，却被默西报之以几分温和的迷惘；虽然她对他并不冷淡，一点儿也不，但对他第一次羞涩、急切的拥抱，她却以叹息、默认回应。对于两人将来的生活，她似乎并无好奇之感，几乎漠不关心，虽然他们将租用一所不大的公司住房一事也的确曾激发起她的兴趣，因为她如愿以偿，有了自己能安排、布置和管理的寓所。我挺喜欢那样，她曾羞涩地对凯勒说。而这所房子则是她从未奢望拥有过的东西。你可以这么说，她是连半个面包都认为很有价值的女人。

我父亲是一九〇三年与默西·斯通结婚的，那时他对女人可谓一无所知，她们身体上的峰峦和凹谷，她们思想方面的倾向都不甚了了。而对如何组织家庭，从哪里开始，将来如何等，也十分茫然。当然，他不可能将他寡言少语的父母奉为楷模，虽然他们也曾的确打起精神，同意参加他简朴的婚礼，送一份结婚礼物，也就是那只会报时的金钻石闹钟。这闹钟可从未失职，一直在提醒他抛弃他那些过时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作出新的、给人带来欢愉的安排；这样，他才会走运。结果，他生活中一切惨淡凄切之处都被重新布置得井然有序、清新亮堂。

他已不是从前的他。焦灼的情欲如同汹涌的潮水在他体

内横溢,就连构成他身体的基本物质都似乎发生了变化。他感到自己将某种古老的、微妙的记忆带进了头脑里——那是一种熠熠闪光的、能被证明和具有可能性的意象,即那幸福之岸,欢乐之土。他没什么学问,对历史和文学知之甚少,从未有谁告诉过他:在中世纪,男人上了床便患上了相思病;但此病只不过是一种玄奥、不可理喻的袭击,它太神奇,太顽强,简单的情欲根本无法驱除它。

父亲在采石场干活,吸进大量的矿物灰尘,可他整天思念着他的默西,想她身上的皱折、她的隐秘之处,她那肥硕的乳房、乳沟,头发、气味,还有她转身朝他走来,投进他怀里的样子——先是羞羞答答,随后便神态自然、动作大方。当他俩拥抱在一起时,她总要叹气——这是确实的,他无法否认——但他甚至喜欢她叹气,喜欢她叹息中所蕴含的无力和服从。当他俩躺在那张浅浅的木床上时,他对他的双手所为很不好意思;尽管她的手指也会在无意间有一、两次擦到他的隐私部,触到他围绕那个部位的阴毛,提醒他极乐世界的真谛。对她发颤的肥硕的躯体——手臂、大腿、乳房,他并不感到恶心,一点儿也不;相反,他欲将自己掩埋在她的丰饶之中,似乎他长这么大一直被剥夺了享受女人肉体的权利,而现在,却可以任意享有,再无不足之虞。他心里清楚,没有默西·斯通那令他舒适的肥硕的躯体,他绝无可能感知世界的真实,懂得其他人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而获取的情感与思维的点点滴滴、枝末细节。

他不敢去想将来,唯恐搅扰了现在。然而,他有时又想有一个更加欢闹的家庭,晚上点起更明亮的灯,或许(为什么不呢?)还有孩子睡在楼上的卧室里。他这么想着,心里美滋滋

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曾料到会这样开心。在凯勒·古德威尔结婚后不久的那段日子里,每当他看到厨房架子上的布排,他就想哭——那码好的盘碟、分开配置的刀具、放得整整齐齐的食品:米、面、糖,显示出妻子为将来所作的令人感动而大胆的物质准备。不过,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现在。

爱情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爱可以大声地表达,而他这样一个从人生的开端便因贫困而变得胆怯、萎靡、发育不良的人,竟也能将自己心中炽热的感情诉诸言辞,同时吐露女人需要听的悄悄话,这简直是个奇迹。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起先十分惊讶,语言竟能如泛滥的河水径直从他喉咙中喷涌而出,他似乎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语言。回想过去,他真无法想象为什么他一直认为自己不能表达炽热的情感。

他怎么会仅在两年时间里就踏进了一个刚刚创造出来的世界,这就是他从采石场回家的路上所想到的。一路上,他简直跟个孩子一样,用靴子头踢着一块游离在外的石头,将悬浮在地上那干燥的灰尘吸入肺里。没有什么比一九〇五年七月这条采石路上的空气更更好了。下午收工后,他浑身很累,但他觉得累得舒服,他甚至珍惜筋骨、肌肉间每一处小小的酸疼,因为他知道,他的每一天,即便是像今天这么个星期一,都会以欢愉而告终。他一到家便要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就着茶水好好吃一顿晚餐,不等太阳落山,便立即进入那另一个现实里。这个现实比任何想象中的单一的床所能提供的现实更宽广、更丰美:渐浓的柔情蜜意,不断涌起的热血,黑暗中下沉的销魂的漩涡,然后便是(这对他似乎格外宝贵)奇迹般的奖赏:夫妻双双入睡;他的心上人躺在他身旁,两人的呼吸交融为一体。她的一缕头发总会松散地落在两人合用的枕头上,

他会亲吻这缕头发的发梢，而不致惊动她。

他走过了多么遥远的距离！现在，每当他注视着其他男人的脸，甚至他自己迂钝的父亲，他心中便想到，瞧，这就是我们用劳动换来的报酬——世界所赋予我们的、那宝贵而欢乐的火花！

一阵微风吹了过来，他不禁加快了步伐。这条采石场路带着他穿过平缓、低洼的田野，时而也能碰到沼泽般的地方。这里土壤贫脊，杂木丛生，地平线低矮，压在简陋的粮仓和住房的屋顶上，真令人喘不过气来。这地方新近迁来了几户加利西亚人，他们盖的房子矮墩墩的，没有窗户，四面墙壁则由妇女们用泥和着稻草糊得严严实实。他曾一度看着这些农舍，想象着里面除了痛苦以外，别无其他。可现在，他的看法转变了。现在，他所看到的是天堂乐土，无处不在的天堂乐土。

生活永远需要不断地添补见证人。当我们言行放纵或内心惭愧时，我们需要别人的注意，我们需要有人关注我们。我们记忆中的一切太宝贵了，这是我对记忆所能说的最美好的言词。当然也需要其他的说法，不同的观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一生中最重要仪式——出生、爱情、死亡，都会有人在场，有物见证。这真是机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自己出生时曾有克莱恩廷·弗莱特在场。这个女人因绝经、孤独，及哀叹自己默默无闻的生活而变得半疯半痴的。两个月之后，她将登上去温尼伯的火车，永远地离开她丈夫。她倒不是因为丈夫打她，或背叛她，而是因为她一颗牙肿了起来，需要两元五角钱去看斯皮尔斯医生，可丈夫硬是不给她。

我出生时的另一个见证人,就是那个使劲拧绞双手,号啕大哭的三十四岁的艾布拉姆。戈赤德·斯库塔里,本地人都叫他犹太佬。他是个卖零碎物品的小商贩,出生在普里兹伦^①市郊的阿尔贝宁村,父亲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后裔,专做铁钉生意,祖父则是位犹太法学家,曾祖父是犹太法学博士,而其曾祖父——这段历史(由老斯库塔里在加拿大的孙子撰写,后由麦吉尔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一直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是当地一位因生了二十八个孩子而出名的女人所生,所有那二十八个孩子都活了很大年纪。当这个女人死时,他们都前来吊唁,可随后便为她的床上用品及坛坛罐罐而撕破脸皮,大吵大闹。

我出生时在场的还有五十五岁的霍顿·斯皮尔斯医生,他当时是由那犹太佬急急忙忙找来的。医生正和妻子罗莎蒙德尽情享用午后的咖啡。罗莎蒙德那会儿刚从村北的林子里兴冲冲回到家,因为她找回来一只新品种的蝴蝶标本准备收藏。她的几本书在桌子上摊得大大的,而架在她那又长又窄,挺难看的鼻子上的眼镜在鼻梁上滑动着,她正试图找出这只蝴蝶的名字和所属的门类。斯皮尔斯医生为人热情、机敏、沉稳,内心情感丰富、几乎如女人一般,但从不外露。

在场的也有我父亲凯勒·古德威尔。他很年轻,下颌显出坚毅、勇敢,浑身充满健康的活力,而对生活意想不到的恩赐,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已是饥肠辘辘,急于享用已准备好的晚餐,享受这个晚上所能带给他的任何柔和、温馨。当他那张小

① 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省城镇,14世纪曾是重要的文化和贸易中心。

黑脸和健壮的身体冲进后门时，他的眼光落到了这幅混乱的场景上，一路上吹着的那支曲子戛然消失在双唇之间。想不到家里竟来了这么多人，真叫他忍受不了，一股刺鼻的气味直冲他鼻孔，还听到高声、有节奏的悲哭哀号——这哭声从哪儿来的？哪儿？——这些令人可怕的元音：咿……欸……，声音往上缭绕盘旋，汇入混乱的衣物和空气之中，而在其中心则躺着他的妻子，她躺在沾满鲜血的厨房躺椅上，印花布的椅套已皱成一团——我的母亲，她那巨大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已经闭上。“惊厥，”斯皮尔斯医生神情严肃地说。他拽起一张床单，——不，不是床单，而是桌布——盖在她的脸上，然后盯着我父亲，铁板着面孔说道：“几乎可以肯定是惊厥。”

从洞开的房门投射进来的影子落在地上。我躺在厨房的桌上，湿漉漉的，刚从胎儿的世界里拽出来，浑身被包裹着，一丁点儿大，眼前一片茫然，呼吸则取决于各种如花瓣般脆弱，尚未完全张开的脉管瓣膜。上面压着那块古老石头的麦尔维恩布丁弄哪儿去了？您会问。它连同我母亲的那本烹饪书给扔到了一边。这两样东西再也不会在这个故事里出现。我被什么东西团团包住——什么东西？一条厨房用的毛巾；也许是从克莱恩廷·弗莱特的晾衣绳上胡乱扯下来的什么东西，一只在马尼托巴的太阳下晒得又干又硬、皱巴巴的枕头套。我的嘴张开着，它就像一只起皱的细线圈，已经开始搜寻，要求，也许还在某个无意识的层面得知，我们出生时便竭力想攥住的那根丝状物即将飘然而去。

在这个狭小、拥挤、闷热、散发出刺鼻气味的厨房里，每一个人——弗莱特太太、那犹太佬、斯皮尔斯医生、凯勒·古德威尔——都应邀参与了这一历史的时刻。

历史,真是的!好像这一微不足道的短暂一刻也值得叫历史一样。是突发的事故,而不是历史,才把我们召唤在一起的,再瞧瞧他们这一群人,乱成一团,吵吵嚷嚷;他们的喊叫显示出无能,预示着凶兆。哀悼者只会互相责备,使气氛紧张,但这群人还不是哀悼者,一种绝望无助的狂乱状态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或者准确地说,将他们相互分开。

那金刚石闹钟敲响了六点,在它敲响最后一下时,这些见证人转身面面相觑,又将目光投向我——一个不速之客。他们各自内心的隐私、秘密及谎言,如同原子跳过磁场一般,使这个房间——这个低矮、简陋的乡间厨房,充满了震颤,完全与龙卷风来临前的震颤一模一样。我几乎能够肯定,这间屋子根本没有告诉它的居住者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该说些什么话,宽慰人的东西会是什么,是茶、威士忌,还是异口同声、结结巴巴的虔诚的祈祷。这些善良的人们(他们的确是善良的)历来被仅在地板下几英寸处闪烁着白光的毒老的石灰矿层所支撑着,然而此刻,他们却个个感到飘忽不定,在摧毁生灵的死亡与笨拙蠕动的新生之间的那个世界里叫喊着四下里飘散。

由于难堪,或许是因为惭愧,他们将目光最后一次投向那块大白布覆盖着的默西·斯通·古德威尔的躯体。她像一条船,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面前,尽管她曾拥有过生命,但已成为这个世界的陌生人,她已为自己的孩子吐出了最后一息。

我恰恰接住了这口如翼儿拍动的气息。即便现在,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这么说。我绝对相信它实实在在的量和水汽,因为无论我作出多大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能确

信,除了这一事实——她那最后一息。她那一丝丝气息在屋里驻留,如皑皑的白雪,如灼热的阳光刺激着我紧闭的眼帘,呼唤道:张开来,张开来。

第 二 章

儿 提 时 代

1916 年

巴克·弗莱特三十三岁时开始驼背，平时郁郁寡欢，但见过他的女人都觉得，让他这个男人开心并不是件难事。

她们渴望为他熨烫那件廉价的绒线外衣，那是他给学生讲仙客来花或藏红花的生长周期时穿的，他的衬衣也可以更整洁些，领子更服帖些，而他那几双磨损了的牛津鞋则急需抹油擦亮，等等，等等。弗莱特教授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点点女人的关心，女人的爱。别笑话他；而要同情他，爱他。

他常常心神不定地赶到学校，有时迟到五分钟上课，有时竟迟到十分钟。他一边瞅着那一张张等待着他的面孔，一边在包里翻他的备课笔记，眼里露出迷茫吃惊的神色。好了，他找到了备课笔记。他将笔记在讲台上理顺放好，可随即又蹙起双眉，一阵慌乱。他的眼镜，他忘了带眼镜。不，它就在那儿，折叠着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他拿出眼镜，将金属线柄脚套在他形态优美的耳朵上，先套左耳，再套右耳。然后，他将中指紧贴在鼻梁上，将眼镜柄脚拉直。他眨了两下眼睛，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课。

他的嗓音很动听，其质地犹如织得密密的毛衣；如果他的声音有颜色，那将是一种暖色——栗褐色。而就其音调、流畅及洪亮程度而言，都符合男人嗓音的要求。他的嗓音还带有

一点苏格兰人的粗喉音(不过比他的这张栎树讲台的漆面要薄),使他的嗓音具有一种必要的硬度。他径直爬上以句子砌成的墙上;而他短暂的停顿则为学生的感觉提供了通道,否则,他的学生便会云里雾里了。

事实上,他的学生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尤其注视他那张漂亮、忧伤、学者型的嘴巴,只是在确有必要时才低头将他为他们挖掘出来的一连串词语记下来——某种花的各个组成部分:雌蕊、柱头、花柱、子房、雄蕊、花粉囊、花丝、花瓣、萼片、花托等。他通常使用黑板,可今天他忘了带粉笔,便在空中将这些不同部分的形状画出来。他那细长的手指绕着这些空中的形状一伸一缩。他的两只袖口竟是这副样子,真令人遗憾,他的左边衣袖看上去好像——嗯,没错——还少了一颗钮扣,可他自己并未发觉,这正是他的女学生们觉得巴克·弗莱特教授的魅力所在,即他那男人的忘却自我的才能。

这是一九一六年的秋天。在选修植物学概论这门课的十四个学生中有十二个是年轻女孩子。韦斯利学院所有的男人,除了患癫痫病的爱德华·伍德和畸型侏儒克拉伦斯·雷德菲尔德(他只有四十八英寸高,一条腿向外弯)以外,全都穿上自治领军服参战了。弗莱特教授自己却没去前线打仗,这是什么原因呢?

传言很多。有人暗示说,他也许是个绥靖主义者,一个尚未公开宣称的绥靖主义者;还有人说,他的心脏衰弱,而他那半透明的皮肤便是这种症状;要不就是他的视力使他不够入伍资格,一个戴眼镜的人是很难面对敌人的;也可能是他拄的那根带菱纹的柳条手杖,他拄着它装模作样,或许他真的需要;也可能是他眼下从事的有关小麦新品种的研究对这场战

争至关重要。早在一九〇五年,巴克·弗莱特攻读理学硕士时,便参与进一步改良当时那种已经改良过的名叫“侯爵”的新杂交麦种。这是一种通红颜色的春小麦,现在他正打算将它与“加尼特”这一品种杂交,因为“加尼特”的收获期整整早了十天,所以可避免早期霜冻带来的损害;说不定他不够资格服兵役,是因为他老母亲和十一岁的小侄女的生活全靠他一人负担,这最后一种说法传的人比较多,再说也是真实的,或几乎是真实的。

他从未提起过自己的老母亲和小侄女,可他的学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有一个学生,就是那个金发女生贝西·珀费克特,她在唐宁街的一所房子寄宿,离弗莱特一家三口住的西姆科街仅隔两条街。还有一个学生杰西·索尔特米厄,她星期天去做礼拜的教堂就是弗莱特家每星期日都去的那个第一卫理公会教堂。再就是莉娜·巴伦廷小姐这个学生。莉娜·巴伦廷的父亲是个牙医,与老弗莱特太太挺熟,而且还的确为她装过两次假牙。还有谁呢?对了,那个小矮人克拉伦斯·雷德菲尔德。他有一次周末在外闲逛,正好碰到弗莱特一家在雷德河边散步。当时他们还带着一个装野餐的篮子和一小块准备铺在地上用的折叠好的地毯。人口少的家庭显得多么弱小、无力,然而他们的自信自足给予他们的补偿倒也十分丰厚。

在韦斯利学院的门厅、走廊里,人们聚集起这些零零星星的传言,并在心里琢磨着。索尔特米厄小姐说(这差不多是她事后的想法),弗莱特教授的母亲其实并没有那么老,因为春夏两季她都在西姆科街住所旁的一块空地上种一大片花,卖给在城里开店的各个花商。另有一人又说了这么个情况:他那个“侄女”并不是他家的真亲戚,只是他家一个熟人的女儿,

此人的妻子生产时死去了。所有这些传言对那些学植物学概论的学生来说都是那么新奇有趣,但最富吸引力的还是弗莱特教授本人,仍是个未婚的单身男人。这一令人称奇、妙不可言的少有的情况为她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一个三十三岁的英俊男人要找一个生活的伴侣。

她们禁不住要问:他以前是不是很惨,订过婚又吹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都猜测过这种可能性,到现在,这种可能性已被蒙上了一层坚不可破的光泽,成了事实。流传的有好几种说法:他的心上人被夏季热病夺去了生命;未婚妻宗教思想太浓厚、不合适;或是品行不端,或是家族有遗传精神病史,或是韦斯利学院的教授薪水无法满足她的生活需要。

事实上,巴克·弗莱特的过去并不存在破裂的婚约,灵魂与肉体的联结也从未割断过。弗莱特教授对有关他的这些花边传闻了如指掌,可他只是一笑置之。他的笑与他的嗓音一样美,然而,他的笑却源于一种畸型的苦行主义,源于他心中的疑虑:爱情只是自我伤害的昵称而已。他自己的小圈子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冬日里安静的房间,一把椅子,圆圆的台灯光下一本打开的书——这可谓是一种令他舒适的苦行生活。要不就是独自一人在夏日的草地上漫游,整日里采集植物,仅与他的小刀、标本袋、一、两个三明治为伴。诚然,他成年后曾有三三次去过希金斯街的妓院,但他认为,去妓院也是一种接受教育的形式,因而并未对他产生过实实在在的影响。有些男人对女人既怀有温柔的情感,但同时又抱有很深的敌对情绪。弗莱特也许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不管怎样,他并不像他的学生所相信的那样,哀叹失去的爱情,他所感到悲哀的是他过去曾短暂拥有的那种简朴的生活现在已不复存在。

他二十二岁那年,即一九〇五年的夏天是他将幸福攥得最紧的时候。当时他独自住在西姆科街寄宿公寓顶层后面的两间房里,坐在他那张小小的学生用桌前,埋头撰写他关于杓兰属的西部杓兰花的论文。

他喜爱这种花(花名中的“女士”自然是指维纳斯^①)。他甚至能在睡梦中画出它那极富美感的形状。远轴萼片、柱状花蕊、侧边萼片、叶鞘、苞叶、花盘、根茎。不错,它只是一种普通的植物,但却属于生于异国的兰花科。这种优雅的、带褶边的花属于他。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研究它(她),现在已拥有了它所有合拢交叠、平滑如丝的各个组成部分,掌握了促使它在这贫瘠的大陆中部土壤里生长,向人类眼睛,特别是他的眼睛(他相信这并非出于虚荣),展示其全部美的那种单纯和极为优良的再生机能。

他对这单独一个生命体的凝神关注,唤醒了他心中复杂的渴望之情。他又一次企盼自己肉体的宣泄,去找那些希金斯大街的姑娘们;渴望湮没他迄今为止生活中一切粗暴残忍的东西:他父母及兄弟愚蠢、粗鲁的火爆脾气,他那无力接受教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语言修养的家庭;他渴望摆脱自己度过了童年时代的马尼托巴省廷多尔村那些粗糙、简陋的街道,摆脱他在自身周围到处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原始的、盲目索求救济和性交的情景。无上的幸福存在于他试图在这张上好的纸上画下的这朵简单的花里:一个花瓣构成的有机体,自身完整的生命体,它不受制于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只服从其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几年以后,当他回溯这段往事,他想起自己当

① 杓兰花的英文名为 Lady's-slipper,此处的 Lady 即为 Venus(维纳斯)。

时曾轻轻地将那支水彩画笔握在手中,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射在他的手腕和盛水的画杯边缘,而他的整个身心也随之变得那么轻松、舒畅。

他心中的欢愉却是短暂的。学院的麦金托什院长要他将 48 自己的研究转向更为耐寒的小麦品种的进化过程上来,还提醒他,卫理公会派教义是一种社会的,也是一种精神的宗教,因此关乎人类生活的品质(说到这里,老人情绪激动地强调了这些话),关乎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生活。为了开导年轻、可塑性强的巴克·弗莱特,他引用了江奈生·斯威夫特^①的话:“谁若能在原先只长一棵玉米的地方种活两棵,谁就应该受到人类更好的礼遇,谁也就能对其祖国作出重要贡献——比所有的政治家所作出的全部贡献都要大的重要贡献。”

于是,年轻的弗莱特不得不放弃他对杓兰花的尝试性研究,转而研究杂交麦种;更有甚者,似乎他这种牺牲还不够大,院方又给他加重了教学任务:教授化学、物理及植物学三门概论课,而且一年以后,由于可怜的布莱泽被解雇(被院方发现喝烈性酒),于是学校又要他讲授基础动物学这门课。他原本专一的研究方式似乎一夜间全给打破了。

更加糟糕的是,在九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当他回到西姆科大街的住处时,他竟发现母亲也来了,在她的腿上还躺着一个不点儿,那孩子胃部拱起,肺部鼓鼓的,挥胳膊踢腿,大声哭喊着,抗议这个世界的不公。

^①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十八世纪著名作家、讽刺文学大师。

我不是说过克莱恩廷·弗莱特太太一九〇五年离开了她丈夫马格纳斯吗？我不是提起过她带走了那个她负责照看的婴儿，就是生孩子死去的那个邻居默西·古德威尔的孩子吗？

弗莱特太太离开的那个月正是九月。一连几夜霜冻后，天气变得寒冷起来。那婴儿——一个性情温顺的小姑娘被包在一件对折的女式薄棉布套裙里，外面裹了一件无袖平纹法兰绒衣服，再外面又裹了一件带钮扣的白色细羊毛背心；所有这一层层衣服都用别针别得牢牢的，最外面还包了一块宽大的针织披肩。

那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早晨。九点零七分，当弗莱特太太在廷多尔火车站登上皇家号火车时，她确信自己的生活已被毁掉，但她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挺直了腰板，还作出了一副既沉稳专注、又轻松愉快的样子。有些人看到她购买去温尼伯的火车票——她用的那张纸票子是头天晚上从她丈夫的衣领盒里拿的——可他们一点儿也没注意，她买的只是张单程票。这些人如果当时就站在她身边，他们也许会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很浓的，但并不难闻的气味。原来，她走以前曾将一小团棉球在丁香油里浸过，然后将它紧紧地贴在她那颗跳动的白齿上；那气味就是从这团棉花球上发出来的。她戴的那顶帽子真不值得看第二眼。这帽子边沿镶着普通的绸缎和日本缬带，但在她那颗如船尾般的小小的脑袋上，这帽子戴的角度却恰到好处，因而使她平添了几分时髦，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而她实际上已四十五岁了。对旁观者来说，她抱着的那一大抱秋花只是一种女人的嗜好，无论谁朝她的旅行包瞥上一眼，便会发现里面仅装了一件她自己的折叠好的毛衣、一打上好的法兰绒婴儿方块尿布，再就是一只婴儿奶瓶和三只橡皮

奶嘴。她将这三样东西：旅行包、花束、婴儿抱在怀里真够别扭的，可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神情坦然、自信。

旅途并不长，只需五十三分钟，先经过一片片谷茬地，再是一座座沐浴在阳光里的村庄——加森、东塞尔科克、冈诺尔、伯兹希尔、华蒂尔章克申。在这段时间里，克莱恩廷·弗莱特怀里的孩子睡了，她便开始为自己的生存问题筹划起来。她早饭吃的燕麦粥仍使她感到胃里重重的，可她的思绪却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起来。她看到自己从前的生活已被甩在后面，可谓泾渭分明、清清楚楚，仿佛她用刀将它一刀砍去一样。（她压在手帕盒下面的那张写给丈夫的字条上只写了两个十分潦草的字：再见。）前面等待着她的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风险和机遇。她一下火车，便会走入温尼伯市加拿大太平洋火车站前那条繁华的大街，向路人兜售她带来的花。城里人对鲜花可谓情有独钟，即便是像这些十分普通的花也是如此。它们在这一带任何一块荒地上都长得非常茂盛，当然，你得知道去哪儿找它们。她要分四次给这些花喷水——这些深蓝色的紫苑花，人们也常叫它们 Michaelmas daisies^①，然后加上几片薄薄的皮草叶子，再用带来的丝绸带子将这些花一束束扎得漂漂亮亮的，每束卖一角钱，便可租辆马车，去西姆科街儿子巴克的住处。一到那儿，她便登上那六层阶梯的木楼梯，敲响儿子的房门，请儿子允许她进去。再以后，她就要等等看了，多长个心眼，放机灵些，看等待着她的是什么。

“我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克莱恩廷·弗莱特写道。她的

① 紫苑花的另一英文名。

字写得很大，圆头圆脑的，显然没受过什么教育。“谢谢您托人带来的口信，我现在立即给您回信，黛西——我已这么称呼她——被照顾得很周到，身体也好极了，请您尽管放心。我很高兴您赞同我的意见，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在女人的照看下会长得好一些，至少眼下情况是这样。我唯一遗憾的是，上星期二晚上，我因心神不定没能给您留个话解释一下。您不用为您的宝贝孩子担心，因为在我儿子家里我们觉得很舒服，也很卫生。您目前深感丧妻之痛，我对此非常同情，因为您知道，我是全身心地爱您亲爱的妻子默西的。我在这封信里夹了一绺您女儿的头发，相信它会给您带来一点安慰。不过这恐怕是很小的一绺头发，事实上只有六根，因为她现在还没有什么多余的头发。

巴克·弗莱特，这个学植物学的高个子学生，脸色憔悴、衣着寒碜。他弓着背坐在那张堆得乱七八糟的桌前，低着头。他低头的角度显示出他内心的痛苦。他烦躁地叹了口气，拿起一支钢笔，在桌上的墨水池里蘸了一下，飞快地写道：“我亲爱的父亲，谢谢您寄来的信。得知您不愿直接写信给母亲，我很伤心；但我还是认为，如果您主动请她回去，语气恳切、言辞婉转，或许还能促使她重新考虑她的处境，最终回到家中（写到这儿，他顿了一会儿，转而凝视屋外敲击着窗玻璃的雨水）。同时，我求您对母亲略加照顾，是不是每周给她一、两元钱，还望您体念。如您所知，我还得为母亲和那孩子再租一间房，可学院提供给我的奖学金并不足以支付这笔额外的、完全不曾预料的费用。此外，我这儿还有几张医生的账单，因为母亲拔牙以后发生严重感染，而那孩子则日夜不宁——斯特林医生

说她患了胸闷症。也许您知道,您的邻居古德威尔先生曾同意每月寄八块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他尽管已很慷慨,但这钱也只是刚够用的。我向您,也向我亲爱的弟弟,致以亲切的问候。巴克·弗莱特。”

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

您每月寄来的信总是很受欢迎的,而对您这次寄来的特快汇票,我向您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太谢谢您了。我很高兴在此写道,黛西还是那么胖乎乎、乐呵呵的,而且她的双腿也越来越有力。我儿子和我都认为,不出这个月,她就能走路了。随信寄去您要的照片(再次感谢您寄来必要的钱款)。您将能亲眼看到,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摄下了她与众不同的髻发,那色泽十分美丽,即是我听人描绘的那种“草莓色”。我还要告诉您,温尼伯这儿的空气十分清新、非常有利于健康,这与您以前听说的不同,切望放心。此外,我们也很幸运,因为我们住处旁边便是一座漂亮的大花园,到了春天,小黛西便可在花园里四处玩耍。

祝好

克莱恩廷·弗莱特

亲爱的父亲:

我已应您的要求和母亲谈过了,但我觉得她很坚决,不愿再回廷多尔,尽管您很宽宏大量,愿意接她回家,甚至闭口不提她突然离家出走,并长期不归这一事实。

至于您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

您,此事不可能。因我觉得,如果您到这儿来,只会给她精神上造成刺激;而眼下,她正忙于整修园子,与小黛西玩耍,心情十分平静。不过,我们要为你们将来的和好而努力,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此外,我也很遗憾您对钱款的决定,这对我将是永无穷尽的烦恼根源。

您的儿子

巴克

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

您几乎难以相信,只要再过十天,黛西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她已经将字母表熟记在心,还会背《主祷文》、《第二十三首赞美诗》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圣歌。再说,我们园子里所有花卉品种的俗名她都能背出来,大约二十五种吧。我很高兴地说,这两个月以来天气一直不错,加之每日晚上睡觉时给她敷一剂毛蕊花叶泥敷剂,她的胸闷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至于我自己,一切都好。

您的忠诚的

克莱恩廷·弗莱特

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

谢谢您二十八日的来信。黛西目前身体非常健康,请您放心。她在学校的朗诵篇目“水手的挽歌”表演得情真意切、热烈奔放。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到上星期的《论坛报》上刊登了您站在您那座著名的石塔前的照片。我儿子弗莱特教授看到报纸上那不甚清晰的塔身,愈发

好奇，极想实地看一看它真实的风姿，不过您也知道，自从他两个弟弟去了西部，他就不再去廷多尔了。

您最诚挚的

克莱廷恩·弗莱特

亲爱的父亲：

再次向您要钱，我心里非常痛苦。可我还是要恳求您，望您以仁慈之心，念及您和母亲和睦相处、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那时，她尽心尽责，对家人无比关爱，而从未想过获得任何报偿。我们的日常生活眼下尤为艰难，故我觉得，我购买西姆科街这座住房及与之相连的一块地的决定并不成熟，尤其是在本城居民皆向南搬迁，且现在又有战争传言之际更是有欠考虑。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之所以这样做，出发点仍是为黛西着想，她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少女了，我希望能为她买一所可靠而体面的住房，一所她永远不会感到难堪、寒碜的住房。不错，母亲卖些花花草草的确挣了些钱，但她建暖房也花去了很多。您说我的“侯爵”这一杂交麦种已获认可证，因而收入增加了，这当然也不错；但这笔钱的四分之三是归学院所有的。我殷切期盼您对我的要求给予关爱的回复。

您也许会有兴趣了解一下“古德威尔石塔”的情况。城里的人都这么叫它，很多人都在谈论它，听说它吸引了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前去参观，甚至还有来自美国的参观者。

您的儿子

巴克

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

我希望这封短信能使您放宽心，黛西已从麻疹的折磨中完全恢复过来。这段时间我们的心情极为沉重，多少个星期以来，黛西一直待在一间不见日光的屋子里，而她又生性好动，原本也非常健康，真把她关得够呛，烦闷透了。不过，后来她在上星期的《家庭使者》上发现了您站在您的石塔旁的照片，心情倒是开朗了许多。“这真是我父亲吗？”她问我道。我向她保证，那照片上真是她父亲。于是她急火火地想要去见您，而且有好几天除了说要见您外，别的什么话都不肯说。可弗莱特教授和我一样，都觉着她去见您，对她这样一个刚从严重疾病中恢复过来的孩子来说，过于兴奋对她不利。

我们一直非常感谢您按月寄来的钱款。对于我们不算宽裕的经济收入，我们总要让它发挥最好的效益。令人高兴的是，我这花园里的小本生意已经开始兴旺起来，似乎整个世界都发现了这简单的花能给这战争时期原本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欢乐。

您的真诚的

克莱恩廷·弗莱特

亲爱的古德威尔先生：

对于您的祈祷和您的唁电，我向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可以真诚地告诉您，我亲爱的母亲在她临终前并未受罪，因为在事故发生的当时，她便已失去了知觉。在她床边为她守夜的亲朋好友们从她安详的永眠中寻找到了—种力量和鼓舞的源泉。我的两个兄弟及时从西部赶

来向母亲表示哀悼，因而她最终得以在朋友和亲人的陪伴中安睡长眠。如您所知，我们的父亲自始至终表现得十分坚强，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为他祈祷了。至于把母亲撞倒的那个骑自行车的年轻小伙子，他被罚了二十五元钱；我听说这可怜的年轻人也因悔恨而着实病了一场。

最近几天以来，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黛西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深深地爱着她——事实上是溺爱她。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少女与我这样一个既无妻子，又无财力雇人照看她的男人同住一处，显然极不合适；对此，我相信您一定与我看法一致。无论情况怎样，我反正很快得离开温尼伯，去渥太华与那位自治领谷物专家和他的委员会继续我的研究。烦请您写封信给我，将您对黛西一事的全部想法告知于我，看我们能作些什么安排，以保证她将来的生活和幸福。

您的忠实的

巴克·弗莱特

我的父亲凯勒·古德威尔既已体尝过人生的极大乐趣，缺了它便觉得生活无味。

一旦觉醒过来，他便十分敏感。妻子早早过世以后，他也许可与诗歌为伴，或饮威士忌取乐，或投入女人的怀抱。然而，正如他那个年头许多年轻工人一样，他却找到了上帝。对他而言，上帝化为天上的彩虹，正在采石场路东头（离我母亲长眠之处不远）等待着他。

这事发生在十月的一个清晨，头天晚上曾下过大雨。

他肩上背了一只布袋子，里面装了块八边形的石灰石（大

约有只甜瓜大小)。他打算将这块石头放在他死去妻子的坟头上。他爬过泰勒角的藩篱,想抄近路穿越一块谷茬地。当他正在这块泥泞、高低不平的地里行走时,太阳突然喷薄而出,先呈微黄色,随即愈发浓烈,热气很快穿透他身上那件灰棉布衬衣。他抬眼望去,便见那彩虹横贯长空。

他以前自然见过彩虹,每次总要停下脚步,如乡野村民一样,赞叹它淡淡的颜色。不过,在马尼托巴南部一带,彩虹并不多见,因而人们见了总要议论一番。“瞧那儿,”总会有人手指天空,大声叫喊,一种虚幻的愿望随即便在心中油然而升,一种模糊隐约的想法,企盼好运降临,或至少希望心情就此得以改变。

在凯勒·古德威尔一生的这个时期,他还没有开始他那漫长的对《圣经》的潜心研究,因此还不会(如果您问起的话)引用上帝在洪水过后对挪亚说的话:“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①

与此同时,他也绝不是一个愚昧无知、信奉迷信的人(虽然他并未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因而懂得彩虹的一般原理,即:五光十色的彩虹是因光波通过微小的水滴时发生折射、反射、离散等作用而产生的。他还懂得这种自然现象既会消失,也无实体可言——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石头、与坚硬的边缘和可确定体积的物质打交道的人。彩虹的弧状光彩不可触及,其大小无法测量,而其颜色,正如它可被肉眼捕捉,亦会消褪。就这一点而言,很多思想单纯的人相信:彩虹是无法拍摄下来的,因为它那短暂而飘忽不定的虹彩与反射强光的镜头相抵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九章第十二行。

触,致使经化学处理的印象纸上无法形成定影。

然而,我父亲在一九〇五年十月这个早晨(他妻子死后仅三个月)所见到的彩虹却与往常不同,它的颜色显得清新鲜亮、生气勃勃,而其形状如孩子的蜡笔画那样显眼。这弯彩虹似乎是由玻璃,或是一种半透明的大理石一类坚硬的东西组成,显得意味深长,逼人注意,且有针对性——针对他,为他而来。他并未看到它那有形的光彩如何形成,只知它突然间出现,那样坚实、那样完美无瑕。在它洁净的门洞里,但见天国一隅金光闪闪。

彩虹出现时,他驻足站立,但随即便在他妻子默西的坟前跪下。

他是个石匠,墓碑自然由他自己打制。这墓碑呈斑驳杂色,楔形,开得很薄,磨得光亮亮的;石碑的中央深深地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份。

默西·斯通·古德威尔

1875—1905

深爱的妻子

沉痛的悼念

刻写碑文开初那几天真可谓凄风苦雨,令他痛苦不堪,心神错乱;但他几乎同时发现,仅有这块墓碑还不够,对这个曾是他的心上人、妻子和至爱的女人,这石碑委实太轻,太单薄了。后来,他每天从采石场带回来一两块小石头,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存放在泰勒角的一丛柳树后面,那儿离帕克路拐角处不远。这些石头都经他仔细挑选过,因为他作出了一个奇怪

的决定：不用灰泥将它们搅和在一起。仅凭地心引力便一定能将这些石块固定住，即通过地心引力和平衡，每一块石头都会包容与它接触的其他石头的形状，这种想法符合近来一直在他头脑中如白日梦般活跃着的一个抽象概念——这是一个由悲哀和迷惘组成的梦幻般的结构。他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一个声音，同一个声音，询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妻子没告诉他，她怀了孩子？

石塔的四周围墙已建到齐肩高了。他砌墙用的石块有些并不比他的大拇指或拳头大，有些直径则有八到十英寸长。今天早晨，在彩虹那艳丽的光彩里，这些石头的表面似乎与近日到处盛开的簇簇黄花一起翩翩起舞，节奏和谐，配合默契。太阳、雨、云和光，鲜花与石头——它们紧密地拴系在一起，几乎是如预言般地结合起来；眼见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神圣的聚合的中心，他油然感到一阵欢愉。他心中充满了他自己的欣慰的喧嚷——那是销魂的叫喊，狂喜的呼嚎。

他曾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形单影只，但实际上他是那弯实实在在并且凝视着他的彩虹的儿子，是百折不挠、形状各异的光和阴影的儿子，是物质和蜉蝣的儿子，是大地的儿子。

只是后来，在他穿过印着条条车轮痕迹的田野时，他才想起大声喊出上帝那纯洁无瑕的名字，向给他带来幸福的上帝致敬。

他曾一连好几天，竟忘却了自己已为人之父，有一个名叫黛西的小女儿；但总有什么东西会摇响铃铛提醒他，他这才瞥一眼挂在厨房墙上的日历，发现这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二很快就要到了，这是他给温尼伯的克莱恩廷·弗莱特寄汇款的日

子；如果天气变暖了，他也会留意村里的那些孩子，他们为在采石场做工的父亲们送去中饭，再在那儿待上一二个小时，玩玩蝌蚪或是没用的小石块。这种情景总让他想起自己的女儿，她会是怎样的一个孩子？

有时，弗莱特太太也会写封信，夹张这孩子的照片来，说她一天天长大了，脾气很好，在学校也很能干等等。照片上的黛西看起来挺温顺，衣着整洁，身材苗条。女儿这样，他觉得自己该满足了。她的笑容既不显放肆，又不显胆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由于某种原因，他无法判断她长得是不是漂亮；也许她并不漂亮。）最近寄来的一张照片是她与弗莱特太太和巴克·弗莱特教授的合影，他们两人分别坐在黛西的两侧，地点看上去是绿草茵茵的河岸。照片上那柔和的浅灰色使他们三人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一家三口悠闲自在，相亲相爱，看不到一点不和谐的踪影。

有时，他从睡梦中醒来，浑身颤抖，头脑里如浸满汗水般充斥着对往事的回忆。那间厨房里的情景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跳荡摇晃的四周墙壁，那一圈惊愕的面庞，还有他亲爱的默西那寂无声息、覆盖着床单的尸体。一切都是那样混乱、骚动。时钟敲响了，可这钟声似乎一直在响啊，响啊，从不停止。它在他眼睛后面发出，这当当的声响消除了幻景与往事间的距离。当其他人如泥塑木雕般站在那儿呆呆地瞪着双眼时，他奔出厨房，一头栽倒在地上，滚来滚去，叫喊着，哭泣着，紧握双拳在焦干的地上撞击。“她没对我说，”他对着空旷的天空大喊，“她从来没有告诉我。”

令他百思不解的问题是：他的默西为什么要保守如此重大的秘密？

他觉得,他必须把她的沉默看作是一种背叛,甚至是一种敌对行为,但他又常常想起,她过去一直不善言辞,也无力承受这个世界强加给她的种种繁难的模式。他试图想象这个肉球在她肚子里不断长大时,她内心的感觉是什么,她如何应付它蜷缩成一团的手臂、双腿和跳动的肝脏,她是否对它闯入她的体内感到恐惧,或许她深深地爱着它,根本无法说出它的名字,不愿将它的存在及为它的降临所作的安排告诉别人。

他暗自承认,他对死去的妻子的爱已因她的沉默而改变。他越来越觉得,她的过错不仅仅在于对他保密,更在于惩罚了他,使他在别人面前无地自容。他想,人们现在准是把他看成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或是一个草率粗鲁的人。一个连对自己妻子怀孕都一无所知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丈夫?

是的,必须承认——几年以后,我对此已十分清楚——我父亲对母亲的爱已经泯灭。有时,特别是当他从一个活生生的梦中醒来时,他甚至怀疑自己还会不会爱这个孩子——这个被相机镜头摄定于此的十一岁的黛西·古德威尔,这个戴草帽的小姑娘,这个被置于河岸上,固定不动,嘴角露出捉摸不透的笑容的孩子。一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是件十分反常的事,但凯勒·古德威尔的爱只是一种由社会习俗的气氛而引起的微不足道的爱。他必须履行职责,寄钱给她生活;他写信给弗莱特太太,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表示关心,但他很少真正这样想过。这孩子是谁?是他自己的骨肉吗?(他并不愿意选黛西这个名字,但这孩子总得叫个什么,而在我出生以后,他根本无心给我取名字。)他端详着她的照片。一天闲下来时也想这孩子,他断断续续地也会对这孩子稍微感点兴趣,有时还略有点担心;而近来,他得知她饱受麻疹病害的折磨,

暗自琢磨要不要哪个星期天早晨坐火车去一趟温尼伯,看看她,自己也好放心。

然而,与女儿如此尴尬的会面及对旅途的迷惑、不知所措,又不免使他畏缩不前——他从未去过那个城市,也从未发现有任何去的理由——无论如何,他不愿意为此放弃整个星期天,因为星期天他要读圣约书,祈祷上帝的宽恕,还要建造他的石塔。

又到了星期天上午,这是六月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廷多尔卫理公会教堂尖塔上的铁钟正召唤着那些虔诚的人们前来做礼拜,然而,我父亲并未被它铿锵的叮当声所吸引。

宗教并未将凯勒·古德威尔变成一个去教堂做礼拜的教徒。他刚信基督教那会儿,做过三四次晨祷;还有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他往西步行七英里去奥克弥顿,坐在那儿糊里糊涂地参加了一次希腊东正教会神秘的弥撒仪式。公众宗教仪式上的喧嚷嘈杂——歌唱、祷告、吟诵、布道说教,搅得他心神不宁。那些信徒们的弥撒祭服,甚至卫理公会教徒那简单的白色衣领也刺激他的感官,将他逼到信仰的边缘;而教堂里的尘埃、椽子、香气、亮漆等也袭击着他,贬损着他,嘲弄着他。再者,这些宗教仪式的程序,人们喘着粗气说出的祷文、阿门、编号的圣歌,以及仪式过后须按教规与做弥撒的其他教徒握手,冷静地与人互致问候,还要说些应酬话等,所有这一切都刺激着他,令他难以忍受。

于是,几乎出于某种偶然,他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独自一人的冥想之中。这种个人冥想的模式与在亚洲次大陆流行了几百年的那种神态恍惚的沉思冥想并无多大区别,而这种做法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即愚蠢的六、七十年代在我们的文化里则变得十分时髦。

就他而言，这种沉思冥想是一种极度欢愉的心灵交流。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按照仪式，一步步走近他的缔造者：拂晓起床，早餐喝茶、吃面包，然后，无论晴雨，都步行去采石场路附近的坟场；一路上，他口中念念有词，反复背上一段经文，通常是一首圣诗。

上帝的神圣无人可及，
谁也不能与您相匹论比。

一次又一次，这些诗文如第二脉搏一般敲击着他的太阳穴。他的靴子则和着这一节拍踏着路面，将他引入正常意识的帘布之后。一路上，他没有遇到一个行人——无论是人或牲口，这时都太早了。他用自己一辆以零碎部件修补起来的手推车运送他砌墓穴用的石头。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大地中粗糙的矿石即是圣歌的音符，因而能会集聚拢，化为赞美与肯定。他还带了一把木槌、几把小凿子，都挂在了腰带上的匙圈里。他用自己的身体运去他所需要的一切——他的工具、他的音乐，他的供物。

我母亲原先那块孤独的墓碑所在之处，现已矗立起一座约摸三十英尺高的石塔，而且还在不断增高。筑塔用的石头都是因其质地坚硬、外表美观，及有利于整体设计而挑选出来的。盘旋而上的一级级支架或石阶突出于塔身之外，这些石阶能使他如昆虫或蜥蜴爬墙一般轻易登上陡峭的塔身。

父亲想以精致美观的花押字装饰塔身，虽然廷多尔的石

头因其斑驳色杂而不宜精雕细刻,但父亲这种愿望还是越来越强烈。刻在这种矿石上的图案似乎总是逃避眼睛的观察,你得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在特殊的光线下才能看出它们。然而,这种不甚便利之处对父亲来说却成了那矿石魅力的一部分,因为他雕刻在上的文字、图案将会若隐若现,因而将折射出这个业已显露的变幻无常的世界。他在这儿刻上圣洁的只言片语,在那儿又雕上鸟儿、花儿、鱼儿、人脸、太阳、月亮什么的。一个他半个手掌大小的天使被刻在了他已雕刻完毕的天空中;一匹小石马在石头刻出的草地上吃草;还有丘比特、美人鱼、蛇、树叶、羽毛、藤蔓、蜜蜂、家畜、彩虹、一张具有某种结构的兽皮等。整个石塔简直是一个由各种翻腾蠕动的图案所组成的博物馆——有些图案是他从《加拿大农民历书》中找来的,有些则来自伊顿公学便览或他自己那本带插图的《圣经》。

冬日的夜晚,他这个鰥夫在自己厨房的凌乱的地窖里,支起一条带老虎钳的工作长凳,点上一盏明亮的气灯,雕刻这些图案。在采石场干了一天活以后,吃几个煎鸡蛋和罐装豌豆权当晚餐,便准备使石头灰四处飞扬了。他的工具很简单,雕刻技巧也不那么正规——他毕竟是个自学成才的雕刻匠,通过长期对明暗、凹凸效果的追求,及对石头所能显露出来的简约特征的检测,他的手艺才得以长进。他慢慢地干着,不禁觉得自己周围的世界在缩小,小得像只布丁盘一样。从刮擦到开槽,再将直线与曲线连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注意力逐渐集中起来,精心雕刻着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当初在他脑海里闪烁时只不过如原子那样大小。他既充分展示这一形象的各种特征,又保持了它原本固有的形态及其精髓——这是

最艰难的一部分工作——并在心中等待着这一石头形象完成那一刻的到来。(但愿您能有机会看到这种雕刻出来的形象,它们怎样将业已体现出来的某种启示反映在您的眼睛里。尽管它们看上去到处都是父亲留下的那些令人遗憾的笨拙之处,能看出他所花费的气力,然而,它们又是那样巧妙地捕捉到了宝贵的光线。)

父亲很有才气,但他从未感到雕刻是件轻松的事——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他全神贯注,五官扭曲得像只猴子脸,他这副神情您只有在真正的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脸上才能见到。(当然,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他的单纯犹如空气、水一般大大敞开着,毫无遮掩。)只有当他完成一件石雕,并将它运到石塔旁时,他才感到一种超然物外的兴奋(尽管“超然物外”犹如“艺术”一词,不是他所能说出的,甚至连认都不认识)。当那块雕刻好了的石头最终悄悄地溜到为它留好的地方时,他所感到的是上帝之手落到了他的头上,那圣灵欢畅地大叫一声,进入了他的体内。

众所周知——当然我也知道——宗教的冲动是很难说得十分准确清楚的。有欣喜若狂者,如我父亲,他们沉溺于精神交流的圣洁氛围之中;也有头脑较为冷静者,他们声称,宗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我们忘却自己的荒唐行为。

对凯勒·古德威尔这样一个并未受过传统宗教熏陶的人而言,人与神在一个令人震惊的等式两端获得平衡:人创造了上帝与上帝创造了人完全等重,一个统一的头脑,如蛇一般弯曲,拱卫着大地与苍穹间的弧圈。(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弄明白其中的含义。)

对于一九一六年在温尼伯市被解除卫理公会教牧师职务的七个绥靖主义者来说,宗教在坚如磐石的个人良知与同样强硬的政治舞台之间找到了其自身最终的价值。

对于那些正在(即六月)重建被所谓的爱国主义者焚毁的连锁湖会馆的农民及其家庭,即公谊会这批教友而言,宗教即如水泥,将他们通向世界的大门堵死了。

对克莱恩廷·弗莱特而言,当她在波特奇街与梅恩街交汇处被自行车撞倒后处于昏迷状态时,宗教则如被和风吹散的花瓣,飘啊飘,最终静静地落在她生命的黄昏上。那个十七岁的屠夫的儿子瓦尔迪·古德曼森,他的自行车(速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速八英里)应对这起事故负责;对他而言,宗教即是一瓶肉汁,一瓶他如半夜饥饿的婴儿般要吮吸的肉汁。如果你寻求宽恕,你就会如愿以偿。对卖给那小伙子自行车(二十五元)的艾布拉姆·斯库塔里而言,宗教既是一扇敞开的窗户,也是遮暗窗户的窗帘。

还有廷多尔的石匠师傅马格纳斯·弗莱特,就是那个被克莱恩廷抛弃了的丈夫,对他而言,宗教既是一个记忆罐子,又是这罐子中的水,里面装着克莱恩廷起居室里那株称作伯利恒花的枯萎叶子,他将它们奉为神物(即不许碰触);宗教亦是他鲜明而有触觉的记忆中家乡奥克尼那些松散的石矿层;还是他记忆中父母亲的形象——两人在黄昏中将干草拖进牛棚,他父亲停下来,弯下腰,用舌尖舔去落在他妻子眼里的一個异物。

对韦斯利学院的麦金托什院长来说,宗教犹如一帖药可使思想正确,生活廉洁,祈祷虔诚。“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后果之一,”他在写给《自由通讯社》的一封信中说,“便是使我摆脱

了自我满足的心态,因而使我们离我们的缔造者更近了。”

对贝西·珀费克特,即韦斯利学院那个热恋着植物学教授巴克·弗莱特的女生来说,当她头靠枕头,低声呼喊他的名字时,或当她唱着:“当我们的心在渴望,让那壁炉里的火烧得旺旺”时,宗教便是哽在她喉头的令她痛苦的异物。

对于他自己——巴克·弗莱特,教授、学者、十七种不同品种的杓兰花的收集者来说,他认为,宗教可比喻人的欲望,这个比喻可谓妙不可言;从来就没有上帝,也没有上帝的儿子,没有圣家庭^①,也没有耶稣的复活,唯有欲望。欲占有更多的东西,欲尽善尽美,欲有自知之明,欲得到所有五十种已知的杓兰花品种,欲以睡眠忘却一切,欲行善,欲亦作恶,欲求销魂的交融。他当然也很清楚,人之所欲,可以是,或者经常是一场骗局。最近,他一直在阅读有关植物授粉机理的内容:一只雄性昆虫被一些小巧玲珑的兰花所吸引,而这兰花的唇瓣则充当了雌性昆虫的性器官。作为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弗莱特对这一现象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和烦躁,尤其是那只兴奋起来的雄性昆虫在无声的花瓣边缘所作出的交合姿态更是搅挠着他的心田。他也同样被与他同住一处的十一岁的黛西·古德威尔搅得心神不安(尽管这一点还有待他承认),她那毫无顾忌,毫无害羞心的身体动作,她穿着夏日衣裙裸露着的手臂,加之近来他一走进她那间昏暗的病房,看到床单下她那美妙的躯体,他便会产生一种异样的、不应有的渴望。

一九一六年的温尼伯还是一个挺令人惬意的地方。尽管

^① 指图画或雕刻中描绘的圣婴耶稣、圣母马利亚、圣约瑟等。

这地方交通闭锁,尽管大洋彼岸兵火连天,温尼伯人仍然过着安适、体面的生活。即便在严寒、漫长的冬季,通常遵纪守法的人们也都心满意足地挺了过来;况且冬季还使这里表面粗糙的木建筑和毫无规划的城市面貌变得祥和、清爽。

不过,这座城市也在变,变得越来越体面迎人了。多条宽敞、崭新的林荫道正在规划之中,而一座崭新、宏伟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立法大厦则正在建造之中。这座大厦是一九一三年破土动工的,而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需要大量的石头,廷多尔采石场因而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石匠们工作稳定,远离了德、奥皇帝战争魔爪的侵袭。城市商业区的街角上都建起了教堂,有时一个交叉路口同时出现两三座不同宗教派别的教堂。(“让我们希望上帝有幽默感”,一个颇受人尊重的浸礼会牧师在最近一次民众集会上不无幽默地这样说。)这些教堂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许多漂亮的银行、保险公司,包括著名的韦斯利学院及那座新建的法庭也都是石结构。如果您浏览一下这座城市的风貌,您禁不住会在心中感叹:这太惊人了!在柔软的大草原上竟平地拔起一座石城!(一位著名的芝加哥建筑师见到大块大块光亮亮的廷多尔石时说,美国的建筑商只要看到廷多尔石头的美,必会争相购买这种石料。)

冬季的温尼伯可谓好戏连台:溜冰聚会、舞会、晚餐。而在夏季,阔佬大户去森林湖避暑消热,不那么富裕的人则在白天去维多利亚海滩或去这一地区其他有玩头的避暑胜地。最近在年轻人中,比如那些十八至二十五岁的人中,乘火车去廷多尔村游玩极为普遍。火车票价并不算贵,而且年轻人在外野餐,吃三明治、喝凉茶,好不痛快。在这个战争年代,女士比男士要多得多;虽是男女性别不平衡,但一点儿也没有挫伤这

些年轻人的兴致,反而营造了一种异样而欢快的氛围。许多人带着泳装,因为采石场里那部分老的、废弃不用的矿坑蓄着干净、清凉的水,很适合游泳;但他们来此游玩,主要还是想看一看古德威尔石塔。

当然,去石塔得先花半小时走过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挺累人的,还要沿这条小路向东走一段,再拐上一条小土路。但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段徒步跋涉正是他们白天旅游的乐趣之一。他们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乡间的新鲜空气、几个小时从城市较为冷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欣慰、以及远离了正在大洋彼岸进行的那场恐怖的战争,这些都令他们精神十足,痛快淋漓。

在低缓的田地对面,那座石塔清晰可见。“它就在那儿,”有人会喊出声来。(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已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这儿了。)

当太阳高高挂在头顶上方时,这石塔呈白色;下午晚些时候则显柔和的蓝灰色。

在这群年轻人中,总有一、二个人会突然跑起来。谁先跑到那儿,谁就是头饿坏了的熊。他们跑到这座公墓低矮的石墙边,翻过墙——全然不顾门上生锈的铁钩——在林立的墓碑和一簇簇带刺的蓟花间迂回奔走。终于到了!他们拍打着粗糙不平、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塔身,又在石墙边的踏脚石上爬上爬下。年轻的姑娘们常常得有谁来哄一哄,帮一把,才能一直爬上塔顶,因为她们怕爬高,或是怕露出她们的内衣。不过,她们还是坚持着往上爬,因为周围乡村的风景据说美极了;再说,她们个个都很好奇,要从塔顶向下看一眼这座空心塔底部那一圈杂草,而在杂草的下面躺着一块小小的墓碑

——不过这只是传说而已。

这种外出远足，总能听到他们不断地叫啊、笑啊，谁发现了美人鱼石，谁又找到了雕刻的石猫，石塔旁刻有“悲哀”一词的小石块等等。这群人中最有见识的会谈起这座石塔的历史：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生孩子时死了，年轻英俊的丈夫悲痛不已——这人偶尔还能见到——每日清晨以石砌塔；按现在的标准，虽然他已不再年轻，不再英俊，砌塔的热情已不如从前，但他停下手头的活，与参观者聊聊天打发时日，其实也挺快乐。再说那孩子，那孩子怎样了？似乎谁也不清楚，这倒挺让人放心不下，真的。

好了，看看现在几点了；这群白天外出游玩的年轻人必须回村里赶火车。太阳这会儿已经西斜，可他们走得更慢了。其中有几对情人手牵着手，或是互相挽着胳膊走着。有一、二个人还出于冲动，回头朝那石塔看上一眼。大家听到他们大声评论着那座几乎是中世纪风格的结构，在这草原的中心地带竟耸立着这么一座石塔，让人见了真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还提起那些漂亮的石灰石，它们几乎与意大利大理石差不多。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还装了一小袋雕刻过的小矿石，一路走，一路用手指捻摸着。还有一个姑娘，看上去文绉绉的，轻声谈起遥远的印度那座泰姬陵，说那也是一座为失去的爱而建造的陵墓。

一个诗人怎样知道自己一首诗写完了？那是因为它已扁扁平平，紧紧绷绷，不可增删一字一行。

一个女人如何知道自己的婚姻完结了？那是因为她生活之路突然被割裂成两股岔道：过去与将来。问问克莱恩廷·

弗莱特吧。

我们常说，一场战争因一方投降，一纸停战协议，一个条约而结束；然而实际上，那是战争自己拖垮了自己，它自身已无以为继，似乎突然变得不体面，成了这个世界广为存在的鲁莽行为的一部分。

万事自有开头，也有结束。当我们似乎到达了一个安静之处，我们却在身体平稳的墨守成规的机能和欲破裂的需求之间被突然卷起冲走。我们常做非理性的事情，荒唐的事情；不然的话，也会有什么东西冒出来干预一番，即那个无法想象的敌人。艾布·斯库塔里年复一年地在马尼托巴农村挨家挨户兜售零碎杂物，但后来却被伊顿邮购服务部挤垮了生意。谁会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呢？他除了向皇家银行贷款又能怎样——他借的第一笔款子寄给了他在以色列的一个儿子——之后他在温尼伯市的塞尔科克大街开了一家自己的零售商店，经营男式工作服、鞋袜、园艺用品和自行车。一扇门关了，另一扇门又开了，这是斯库塔里先生自己说的话。

一九一六年是巴克·弗莱特教授在温尼伯居住的最后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他的信念泯灭了。他对自己这具堕落的三十三岁的躯体感到恐惧；他对这个世界也同样感到恐惧，即便它仍兴冲冲地招呼他，满足他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欲望。他必须重新生活，向前走，搬到东部去，准确地说去渥太华，自治领的首都。

我那在马尼托巴廷多尔村的父亲凯勒·古德威尔已造好了他的石塔。他如何知道塔已竣工？那是整个石塔的匀称协调告诉他的，高度、宽度、周长等整体配合得当，令人满意。如果塔顶多一层石头，整个石塔便会失去平衡。他看着这座石

塔,心里感到轻松自在,甚至懒洋洋的了。最近前来参观的人很多,还有不少新闻记者。(他猜想很多人带走了他那些雕刻好了的石头,当他听别人议论此事时也只好耸耸肩了事。)前来参观的人把他搞得飘飘然起来,近来他甚至忘记了当初促使他建塔的那股子冲动。他乐意,甚至急于和参观者交谈,不过他对自己执意建塔的根本原因避而不谈。古德威尔先生,您孜孜不倦地建造此塔,究竟原因何在? 嗯,一个人开始一项工作,那这工作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上帝已经隐退,他只是个影子,至于默西——她的坟墓深深陷下,周围长满了杂草——他已想不起她的面容,忘记了她的体态。他的短暂婚姻,他的改信基督教——这些对于不断向前延伸的生活而言,只是它奇妙的交汇之处而已。

温尼伯的巴克·弗莱特教授寄来了一封信,谈到了有关监护人的安排分工,以及今后为照顾黛西还要做些什么等问题。

还有一封信是昨天刚到的,写信人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总裁。信中说急需熟练石匠,报酬丰厚,还说在威尼格希尔(不管那是什么地方)的克罗斯街已预备好一套舒适的房间供他居住,将为他和家人及家具等的搬迁安排交通工具。古德威尔先生有家庭吗? 需立即回复,请打电报。

贝西·珀费克特因将麻疹传染给黛西·古德威尔而受到责备。贝西发了烧,喉咙也疼,本应卧床在家,而不该站在弗莱特家门口,将她迟交的植物学笔记递给黛西,还以她少女的激动,唾沫飞溅地说了一通道歉的话,并冲着那孩子易感染的、十一岁的脸打喷嚏。

于是,病毒便顺着黛西的呼吸道进入体内去,没过多久,她便出现了所有的症状。克莱恩廷姨妈(因为黛西一直这么称呼她)仔细看了这孩子的口腔,真把她吓了一跳:到处都是疹子。这可怜的小家伙于是被安置在一间暗室,房门一直关着,只有克莱恩廷姨妈一个人照顾她。谁都说这女人尽心尽责地侍候这孩子。她给孩子送来冷湿毛巾降温退热,每日早晚用含硼的洗液给她冲洗眼睛,用她自制的草药乳剂给她止痒,还给她送来一盘盘软性食物——水煮荷包蛋、炖过的水果——吃完后,她还严格要求黛西用食指裹着棉球清洗口腔。黛西开始好了一些,但她同时又觉得腻烦了;结果,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变得比以前严重得多。

请来的医生——我不能,或不愿透露他的姓名——说她患的是支气管炎。为了让克莱恩廷姨妈搞明白这病,他还画了一张树枝形支气管图。现在治这病只需一支磺胺,或者抗生素类药,就能缩短这姑娘的病程,可在那会儿,卧床休息,喝点药液,再加保暖便是唯一的治疗办法。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后,由于没人想起拉开窗帘,或是点上一盏灯,因此,黛西·古德威尔第二次生病那段时间也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再说,屋里的灰尘、羽毛枕头等气味散不出去,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她一辈子落下的过敏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她那会儿准是睡得很多,否则她这么个好动的孩子怎能忍受这段无所事事的时间?不管她什么时候醒来,她都觉得身体僵硬,加之无名的焦虑,致使她脑力下降。个中原因,与她在人生的中途突然体尝到生活的空虚不无关系。她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东西,她躺在那间昏暗的病室里,身上重重地压着层层被单,望着她胸腔里那棵颠倒过来的树的形象。就

这么过了好几个星期,她才闹明白她少了的东西是什么。她所缺少的是真实性这一核心的东西,而她周围的人似乎人人都拥有这一内心的宝矿。克莱恩廷姨妈在楼上的走廊里迈着轻快的脚步走来走去,乐滋滋地忙这忙那,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突然笑起来,以嬉戏的口气说她如何感谢“深爱这个世界的上帝”,感谢他决定让她依自己的意愿行事。巴克叔叔(黛西在那个时候就这么叫他的)手里握着那支菱纹手杖,脚上穿着一双鞋底磨坏了的鞋子,踏着步子向学院走去。尽管他唉声叹气,很不情愿,但他仍刻意显出他那年轻男人的执着。其他人的腰板也是挺得直直的,因为他们能影响这个世界,并对这个世界作出反应。然而,不知何故,黛西·古德威尔却不能。

她只能凝神瞪着自己内心这一缺失,像看太阳那般,一次只能看上几分钟。

嗯,您也许会说,肯定是我发高烧才使我心神错乱的。一点儿不错,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我常受到古怪离奇的幻觉的折磨,而且我的这双肿胀的眼睛在那间暗室里也常召来种种可怕的意象。

长期的与世隔绝和沉默无语,加之心中的烦闷,所有这些折磨着我,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压在年轻的黛西·古德威尔身上,把她年轻的生命挤得空空如也。她的自传(如果写自传并非不可想象的话)将会是(如果真的有人来写的话)灰暗的虚无和不可填补的豁口。

她躺在病床上,想着自己周围不停息的生活,愈发加重了她内心的悲伤。她能听到附近的狗在叫,鸟儿在放声鸣唱,还有那送奶人在西姆科大街上送牛奶的声响,他的马在街角处发出一声哀怨的嘶叫,重重地踩着它的蹄子,连屎带尿地拉了

一地。有的人家开了门,有的关了门,邮差送信来了,人们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人声喃喃,水壶里的水烧开了,门厅里的钟嘀嗒嘀嗒响个不停。

她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式思维方式出发,感到十分惊讶:没有她,周围这一切竟也照常发生。阿伯丁学校不会因为她生病而停课,不,不会的。校园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气勃勃,学校的铃声也同样会准时地,厉声地响下去。她还知道,即便她一回半回不去克莱恩廷姨妈的园子,在那儿摘去金鱼草的花头,让这小小的花朵“咬”她的手指,即便这样,到了仲夏时节,园子里还是会长满金鱼草的。当她躺在这间又热又黑的屋子里,她就是这么回想来着,她知道,这是个她将住上一辈子的地方,一个她事实上一直在此居住的地方——一个不为人所见,被扼杀了的,从她生活经历中被抹去了的地方。

她心里明白,如果她要抓住生活,不让它逝去,她就得拯救它,采取一项基本行动——想象,以补充、修正、召唤各种必要的联系;想象一幅田园生活的美景,或是英勇壮观的场面,不管什么都行,甚至可以在梦幻中建造一座灰石塔,但须偶尔将其中细节加以篡改,公开夸大或撒谎,编造子虚乌有的达官贵人们的书信或谈话,或将某种猜测投掷到美丽的光亮之中。(黛西亲爱的克莱恩廷姨妈在昏迷了整整一星期后,于六月下旬去世。黛西将她放在一张扎满了三色紫罗兰的床上让她飘然升入天国。也就在这时,她将她叔叔长期以来隐含着性欲的目光——这的确是事实,理解为受消化不良症的折磨所致。)

她执意要让自己坚强起来,而当她终于见到自己的真正的父亲凯勒·古德威尔时——他满头大汗地赶到西姆科大街

家门口，身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外套，看上去又矮又黑，真让人失望——她鼓起勇气让他吻了一下，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她还不习惯这样。他根本没握住她的手，那张脸看上去一副可怜、苦巴巴的样子，但他的嘴巴倒还显得亲切。他俩坐在楼下的起居室里，他坐在那张皮扶手椅里，她则坐在沙发上。两个陌生人面面相觑，沉默无言。黛西穿了件埃及棉布做的带黄条子的衣服。她父亲彬彬有礼地清了清嗓子，这足以让他放松一下舌头，随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向她谈了他们即将乘火车走的这趟旅行，以及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后的住处——一套住房，别人这么叫它。他说这词儿时的语气显得十分珍爱它，似乎想让她也明白它的价值。

两人从高脚杯里喝着柠檬汁。

这柠檬汁是谁调的？肯定有人榨好柠檬，在糖水杯里搅拌，再加上冰块，但黛西想不出这人是谁。然而，她的手指将永远记住那些高脚杯的感觉：薄薄的粉红玻璃上镶着灰白色凸起的条纹。可是，她所记得的主要还是那太阳，它就像玉米面那样黄灿灿的，透过夏日单薄的窗帘晒满了整个房间。阳光在她裸露的手臂上留下的印记，流进她喉咙里那清凉、甘美的柠檬汁，还有父亲衬衣上的颗颗钮扣，如一串眼泪般闪亮——至少这些东西她还是可以相信的。

她的双膝屈成小小的山包，从黄色的外衣下突出来。父亲的话宛如暴风雪的颗粒朝她袭来。

那天，她喜欢这个世界了。

第三章

婚姻

1927 年

约瑟夫·弗兰兹曼太太昨日设午宴款待布卢明顿的黛西·古德威尔小姐，应邀赴宴者计十人。

奥蒂斯·克莱因太太今日午茶时会见今年六月即将成为新娘的黛西·古德威尔。古德威尔小姐曾毕业于图德霍尔中学及朗女子学院。

阿尔弗莱德·怀利太太星期四下午于自家厨房为今年六月即将成为新娘的黛西·古德威尔举行新娘送礼会。宅中各个房间均以紫藤、风铃、条幅等装饰一新，华美绚丽。来宾包括：亚瑟·霍德太太、斯坦顿·梅里尔太太、阿·卡普托太太、贝·格琳德尔太太、弗莱德·安东尼太太、拉比娜·安东尼小姐、艾尔弗雷达·霍伊特小姐及梅里·安妮和苏珊·科切斯特两位小姐。

下午期间，格雷斯·希利小姐演唱并弹奏了几首优美的歌曲及钢琴曲。

昨晚于采石场俱乐部举行“白色”晚宴，款待布卢明顿之未婚妻黛西·古德威尔及未婚夫哈罗德·亚·霍德。

菜单包括月桂干贝、多佛鲷鱼片、浇了白汁的鸡块佐以奶油洋葱,还有双鸽式香草冰淇淋。来宾为:亚瑟·霍德太太及公子朗斯·霍德和哈罗德·亚·霍德、霍顿·格拉夫夫妇、赫克托·麦基赖斯夫妇、拉比娜·安东尼及艾尔弗雷达·霍伊特两位小姐、迪克·格林先生、斯坦顿·梅里尔夫妇及奥蒂斯·克莱因夫妇。华美风雅的餐桌中央摆设着琳琅满目的夏季花卉。桌上点着象牙般的细小蜡烛。餐桌主持人为凯勒·古德威尔先生,亦即晚宴主人及未婚妻之父。现为莱皮斯肯联合公司合伙人的古德威尔先生口才颇佳,终以时间与偶合之酬报结束晚宴,寥寥数语,颇富哲理,耐人寻味。

这十五位志趣相投的宾客晚宴后将各自的椅子拉离餐桌一、二英寸,以坐得舒适一些。烛光里,他们的脸庞显得那样柔和。“时间,”凯勒·古德威尔此时对他这十五位宾客说道,“时间与那个有趣的老家伙——机遇协力合作,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归根结底,”说到这,古德威尔先生伸出一个手指解释道,“还是因为有了这片温暖、清澈、给人带来好运的浅海,差不多三亿年前它就存在于此;想想看,我的朋友们——时间与偶合的联姻生成了这妙不可言的印第安纳石灰石,给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带来了许多滋益。”(听到这些话,众宾客颇为赞赏,于是掌声四起。)
“现在,如果这海水,”古德威尔先生继续说道,“略微凉一点,那么,无数的海洋生物便无法繁衍生息,它们的生物壳也不会如以前那样在海底积聚;而如若这片古老、宁静的海域不那么洁净,水中便会有许多泥沙及其他淤积物质,从而影响海水的沉淀。最后,我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这

片经古绵长的海域略深一、二英尺，海水便波澜不兴，动物的生物壳便不能破碎分解，成为尺寸划一，大小均匀的碎壳散布在这若干平方英里的海底。总而言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里美丽的塞勒姆石灰石——大地赋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便决不可能出现。我以为诸位会赞成我的观点，即上述各种情况在同一时刻会聚到一起，赋予我们一曲胜利的三重奏——挑战，”他戏剧性地顿了顿，“繁荣，”他又顿一下，“和幸福。”

酒杯里的红葡萄酒已所剩不多，美妙的烛光闪烁起来——因为晚风从一扇被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古德威尔先生挺了挺胸，兴奋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同样有幸的是，我亲爱的朋友们，就在十一年前的这个月，我和小女黛西迁来布卢明顿。我常想，我们来此的时机极佳，真是天赐良机，因为过去的十年，正如各位所知，是石灰石工业飞速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时期；但就我本人而言，更为奇妙的是，我和小女竟受到欢迎，”说到这儿，他伸出双臂，做了一个大大的拥抱的姿势，“受到友情和机遇的欢迎。多年前，当格拉夫先生及麦基赖斯先生——今晚他们两位和他们漂亮的太太都在座，当他们邀请我参与他们新办的事业时，我自然深感荣幸；同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证明，幸运之神向我们的事业微笑。我们不是为自己的事业成功而感到荣耀，我们要感谢的是时间本身。”说到这儿，他收住话音，缓缓地扫视四周的宾客，依次与每个人的眼睛相遇。“时间，机遇，命运的一对孪生子，我们自身命运的奇妙的支脉。”

几名侍者在暗处站立等候，他们巴望着这个晚上早点结束，好回家睡觉，可古德威尔先生还没说完。

“看看我们今晚这对年轻的情侣——黛西和哈罗德，我们

中又有谁会认为,他们不会受到时间和机遇的恩惠呢?我们生活在非同寻常的公元一九二七年,新的时代真正开始了,如果我们中还有谁对未来心存疑虑,那么,我们则在一月前被一个名叫小查尔斯·阿·林德伯格^①的人所说服。”(他此时提及这位先生,拨动了众人的心弦,古德威尔本人于是领着大家热烈鼓起掌来;女士们将她们雪白的手臂伸得高高的,兴奋地拍着巴掌,男士们则拍打着桌面。)”“再者,我的朋友们,”他现在开始作结束语了,而他结束语的节奏可谓抑扬顿挫,美妙动听。“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国的纽约市即将矗立起一座令世人惊叹的宏伟建筑——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所梦想的那样,这是塞勒姆石灰石的巨大力量及人类智慧的崇高见证。从这一刻起,我唯有向前迈进。”

说得好,说得好!

“现在,我请大家起立,为我们这对年轻情侣的幸福干杯。机遇将他俩结合在一起,时间向他俩热情地微笑。”

我父亲凯勒·古德威尔怎会有这等口才?

他已五十岁,但行动敏捷,精力充沛。仪容整洁,衣冠楚楚。他身着精美的英国府绸衬衣,白得耀眼,并经专门洗烫,且每日换一件新熨烫过的衬衣。他穿的西服都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或芝加哥专门订做的。这些西服适合他的身材——他无法买到现成的西服。他如同蛇蜕皮一样将自己身体的缺陷

① 查尔斯·阿·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21日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单翼机,以 $33\frac{1}{2}$ 小时第一次完成纽约至巴黎不着陆飞行,立即在大西洋两岸成为英雄人物,并获2.5万美元奖金。

抹去，这倒不是说古德威尔那豁达、充满活力的实业家脸上还有什么东西如蛇一般阴险狡猾。他的外貌自然没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个腿短，肩膀窄的人，然而，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已不是人们过去看到的那个人了。人们看着凯勒·古德威尔那黝黑、结实的小脸——五官如上了发条的闹钟一般紧挨在一起，紧绷绷的充满了爆发力，——便会在心里想道：站在这儿的这个人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生机活力径直从他的双眼迸出。他的眼睛仍带着青春的纯洁，闪射出犀利的目光。在他那个社区里，他受人尊重，为人钦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还是当他张口说话时，他才更具有超凡的魅力。

那条能说会道的舌头，它是怎样来的？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人不赞成这么说——问得不那么贴切，因为我们大家来到这个世界时并不会说话，我们只能指望我们中少数有天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口才，但从这部分有口才的人中将会出现极善言辞的奇才英秀。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大自然的安排，或曰天命，一种遗传喷裂，将一把七弦竖琴置放在喉咙里，一把凿刃贴在舌头上。懵懵懂懂的儿童没有必要弄得那些生来便能说会道的人无言以对，否则，那就太狂妄了。然而，懵懵懂懂的儿童倒的确可以将干渴的智力赶到语言的井边，命它畅饮一番。

凯勒·古德威尔自己相信（尽管他并未对别人提起，甚至也未向自己坦白说出），他的口才是在他与默西·古德威尔婚后那短暂的两年里获得的。在他俩那张垫了床单的宽大的羽绒床上，他那男人的粗糙皮肤找到了他妻子柔软、丰硕的肉体，于是围裹着它，进入它。也就在这时，他喉咙中那块石头

被移走了。一次飘飘然令他陶醉的喷泄使他的舌头获得了自由；或者准确地说，是在季节蜿蜒前行的曲线上所引发的一系列喷泄解放了他的舌头，即在马尼托巴廷多尔村许多个空气干爽的秋日的星期天，或是一长串正月寒冷的夜晚，还有春日的傍晚，微风滋润，太阳还挂在西边的天空中，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灰白色的刺绣枕头套上，洒在妻子富有曲线的肉体上——他的亲爱的、亲爱的，心甘情愿的默西。每当这时，话语便聚集在他的嘴里，他从不知晓这些话语竟属于他生命的一部分。它们跳出他的嘴唇：他的感激，他的激情，他的最隐秘的渴望；在他心上人的耳边，他喁喁呢呢，将它们吐出；而她呢，那样淡然，静静地躺着，向他传递着一种无声的鼓励。至少她没有不高兴，甚至没有惊讶，也没认为他表达的方式愚蠢或不自然。

不过我自己倒觉得，父亲是在钦定本《圣经》经文那华美的圣乐中找回了他的嗓音，真正地，永远地把它找了回来。当年，他在我母亲的坟旁信了基督教，也就是那弯突然出现的彩虹，那个在十月里按天意选定的信仰。在那以后的年月里，他日夜潜心研究《圣经》。书里的故事使他迷惑——留着胡子的国王和先知们的游行，他们那些奇妙的疯言疯语。《圣经》中的警句咒语径直在他那颗寻常思维的脑袋上盘旋，但经文的节奏却直接渗进了他的身体，包括句法、色彩和其中令人联想的音调。不然的话，又如何解释他所运用的那些古体词和规范的话语，如何解释他说话中短语的平衡及巧妙的运用，怪异的倒装和夸张的比喻？语言经过他说话，而不是——如通常那样——倒过来，他说出语言。

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之所以口才见长，是因为大批的人去

北方参观他亲手砌的那座石塔，那座他为纪念妻子而建造的石塔。毕竟这些参观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闻记者，他们手拿铅笔和记事本站在凯勒·古德威尔旁边。古德威尔先生，就提几个问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些年轻、精明、随时准备惊讶咋舌的记者来自北美大陆各地，有的甚至来自远在英国的伦敦。这些记者带来了一连串问题：如何啊、何时啊、为何啊等等。凯勒·古德威尔成了个受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也许是个怪人，一个毫无城府的工匠，但并非不可接近，决非如此。相反，他这个人，只要有人问他什么，他就很容易说出来；只要有人采访他，他也很容易接受。这种时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对此，他一定心知肚明。他的舌头因此而学会了跳舞，学会了如何回避、渲染、虚构和岔开话题等复杂的谈话技巧。您可以这么说，他的生活就是谈话，诚如其他人的生活便是家具或举止仪态一样。同时，他还培养了自己一股韧劲，即那种演说家的耐力，话匣子打开了就没完没了，也并不见得总有什么内容（这一点倒是应该承认的）。

他站在讲坛上的耐力最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喝采。他的肺，或说他的肺泡，他那个膨胀的器官，那个胸腔，充满了急于外泄的气体。他的双手也和着肺泡跳舞，那姿态真可谓刚劲、有力。去年冬天在劳伦斯县举行的实业家午宴上，他不用提纲便一口气说了六十分钟。他那副次中音的嗓子似乎从不知疲倦。在贝德福德商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男子聚会上，他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小时带一刻钟。（根据《星凤凰》的报道，他说得还挺轻松愉快。）就在一年前六月的一个晴朗的上午，他在俄亥俄河岸边对朗女子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发表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说，他的女儿黛西便是被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之一。他演讲的题目是“石头的传统”，谈及商业与地质如夫妻般密不可分的关系，真可谓神话诗一般。那次演讲的时间可谓前所未有，竟达两小时之久。事后据说在那两个小时里打瞌睡的姑娘总计不到一半。“那人可真有一套美妙的乐器，”女子学院的院长在他演讲结束后举行的草莓脆饼招待会上说道，“真是津津有味，劲头十足。”

然而，凯勒·古德威尔最长的一次演说，长得出奇的一次演说，是一九一六年在火车上发表的。火车从马尼托巴省的温尼伯驶往印第安纳的布卢明顿市，其间距离为一千三百英里。他的听众只有一个人，即他年轻的女儿黛西，当时她不过十一岁。蒙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凯勒·古德威尔的新雇主的厚待，他们白天旅行，坐的是一等车厢。那长毛绒的绿色座椅宽敞、豪华。还能向前后倾斜，挺舒服的。一块精巧的红木板往下一拉便成了一张桌子，旅客可直接把茶——有一小片柠檬插在茶碟边上——要到这张桌上。父女俩并排坐着，中间只有一小条木头扶手。这两人实际上就是两个陌生人，因此，谁也没将手臂放在那光滑的木头隔条上。那次旅行整整三天，中途先在法戈和芝加哥换车，后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换车，真是乱糟糟、闹哄哄的。父亲在那趟旅行中自始至终不停地谈啊，谈啊，谈啊。

他脑袋里的一个开关被移动了，也许完全是因为紧张的缘故吧，至少开头是这样。他以前还从未“旅行”过。从车窗望出去，大自然的景象比他原先想象的要开阔，景物也更稠密。所见之物令他惊讶，也使他兴奋。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及威斯康星州的森林和田野在他看来似乎因生机勃勃而浑厚膨胀，在闪亮的雾霭映衬下，显得郁郁葱葱，高大突兀。大

地时而下倾,时而升起,令他不知所措。他惊奇地发现,人们已开始割草晾晒,在那个季节算是很早的。城镇一座接一座地跃入眼帘,相互间距离短得惊人,名字也陌生得很。他看到男人(女人也一样)无拘无束地从火车上走下站台,有的则从站台下走上火车,轻松自在,漫不经心,互致问候,欢声笑语,似乎将他们所经历的地理环境的突然变更抛于脑后,对距离和他们所进入的环境所带来的差别也毫不在乎。许多人不戴帽子,衣着颜色鲜亮。他们手拎旅行箱,但从他们拎的样子来看,那些箱子简直就像羽毛一般轻,而其用料——稻草、帆布——则嘲弄着他自己这只几天前刚买的、现在还挺新的深棕色旅行袋。

火车向南,再向南驶去,如同一支银白色的箭穿过无动于衷的景物。太阳闪耀着灿烂的光辉。随着火车的突突声,一英里,又一英里过去了;对古德威尔来说,这个世界的严肃性似乎正在减弱。当他们越过伊利诺斯州的边界,驶入印第安纳州时,休息车厢里一遍又一遍地传出歌声:“她多甜美”。河流、圆圆的山包、铺得平平的道路、围了栅栏的田地等一一从眼前闪过。粮仓的墙上出现了咀嚼烟的广告。一座座城镇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脏;电线如剃刀般切割着闪亮的天空。

旅途的头一天是最糟糕的。他拼命说话,像发了疯一样,因为他知道,他和女儿很快便要叫到餐车去再坐上一次,而对这一新的刺激,他深感恐惧;过后不久,太阳就该下山了,他就要面对那张自己从未睡过的普尔门卧铺,将自己的身体安顿在那间遮有窗帘的小卧室里,整个地淹没在他乡时空的粒子之中。

他的谈话就是在对这一切的恐惧中进行的。

他对女儿谈起了他在斯通沃尔镇的儿童时代,向她描述了那儿的街道,他父母亲位于石灰窑边上的住房,冬日早晨燃烧着的石灰散发出的气味,他有时怎样闷闷不乐,有时又怎样开开心心等。他毫无保留地向她说出了自己简单的娱乐活动,说他喜欢做苦活、累活,很容易便适应了采石场的工作,以及他与石头和大地间那根奇妙的纽带。

火车不停地向前驶去。晚餐来了又去。车厢左右摇晃,捉摸不透,这小姑娘胃里的鸡块和肉汁沉甸甸的,使她感到恶心、头昏眼花。在餐车里,她曾将这种黄黄的肉汁溅在了白色的餐桌布上,在布上留下一条汤迹。她父亲扯下系在自己衬衣前的亚麻餐巾,将它盖住汤迹,即便在此期间,他仍滔滔不绝,从未停止谈话。这会儿,他正在谈他死去的妻子,这孩子的母亲;她的名字叫默西——默西·古德威尔。这个年轻的女人做馅饼、蜜钱的技术和管理家务的能力可是无人能比的。

他所谈的这些事情,有些黛西听了进去,有些则没有。时间已经很晚了。她醒醒睡睡,忽睡忽醒,但即便是醒着,她的思绪也一直往回飘,飘回到温尼伯西姆科大街上那所她住了大部分时间的房子——那安装得妥妥帖帖的门窗,那通到地下室,或伸向屋边花园的一段段木楼梯,还有克莱恩廷姨妈在园子里种的那一排排鲜花。克莱恩廷姨妈的笑脸飘了过去。(这张脸现在准已变成了泥土,她这么想倒挺舒服,因为泥土并不陌生,哪儿都有,挺友善的,一点儿也不吓人。)巴克叔叔恐怕要将他的仪器和标本打包装箱,准备去渥太华,也是乘火车去,不过向东走,而不是向南。他曾在地图上指过渥太华的位置,那是一个小黑点,位于鸟窝般的水域交汇处。

这小姑娘顺着倒流的时间回忆着往事,各种形象在她脑

海里再现。她惊奇地发现,逝去的东西永远存在,您不会仅仅因为上了火车,朝某个方向奔去,就会将它们赶走。这一想法使她对自己将来仅与单亲——父亲共同生活充满了希冀,尽管她以前从未见过父亲,也尽管在她仅两个月时,父亲便将她交给了别人抚养。

她瞌睡难忍,闭起了眼睛,可父亲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她似乎觉得父亲的声音响了一整夜,但这不可能,因为她曾醒来一、二次,发现自己独自睡在柔软、凉爽的床单上,下面铺了条厚厚的垫子,周围一片漆黑。

第二天早晨,一切照旧,他俩又去餐车吃早饭,早餐有软乎乎的水煮荷包蛋,切成三角小块的奶油吐司,她父亲则还是不停地说啊,说啊。他心里这会儿被搅得纷乱不宁,到了无法自抑的地步。这孩子不得不堵上自己的耳朵,她需要的是安静,而不是这种杂乱的回忆对她的侵袭。她将自己封闭起来,又开始在自己的脑海里重新构造以前在温尼伯时,位于阿伯丁学校后面的那一块块草坪和卵石地,还有那碰擦着校园边上粗糙的栅栏的丛丛灌木。她父亲一直在唠叨雕刻石头如何复杂,必须挑选合适的凿刀,必须小心握住它,用力过度凿错了地方,石头就会破裂,一块好端端的石料就毁了,还有什么世上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封裹了一样东西的石心等等。

一路上跃入眼帘的田野里长满了绿油油的玉米,那一排排玉米一晃而过,消失在视线里,但却整整齐齐、完美无缺。每一株玉米都是一个身披长叶的绅士或淑女,将头探向自己的邻居,在微风中喁喁哝哝,窃窃私语,一个个那样高高大大,彬彬有礼。她父亲此刻正在解释沙岩与石灰石、花岗岩与大理石之间的区别。她感到父亲的声音渗进了她的静脉和动

脉,在她的记忆里漫延。

他在自己那口生活之井里越沉越深:一弯彩虹、一块墓碑、一抹倾斜的晨辉。

他想以谈话打破令人可怕的沉默,忘却对将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但主要还是为了要回自己的孩子。他自然感到,他有责任原原本本地将他离开她的那些年的具体情况告诉她,还有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他那在矿野里挖掘出来,最终见了天日的生活。他必须向她讲述每一分钟的经历,每一种情感的波动。他欠她的太多,太多,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偿还。

当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们一般都认为,过去的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比较简单,塑造他们的诸种力量也是原始而不可削弱的。我们自然认为,我们的先辈思想动机比我们纯洁,头脑也更为单一;比如说,他们相信早期的科学家全心全意地从事科学研究,其“坚定的意志”牢不可破;艺术家们则在某种永恒的灵感所燃起的火焰中工作。然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前辈任性固执,捉摸不透,而其欲望则朝三暮四。因此,他们与现代人可谓毫无二致。只要有一丝微波,无论是性欲的或是心理的,哪怕是自然界那一丝丝微风,那带有令人神清气爽的氧气和活力的微风,都足以使我们偏离我们前进的道路。举一例则明。凯勒·古德威尔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变换他生活的角色。在他二十多岁时,他是爱神厄洛斯的俘虏,三十几岁时是上帝的子民,而再后来,则醉心于艺术。现在他五十几岁,又致力于商业。当然,他这些各有所专的生活阶段较为相似,因为在它们之间总会有很多相互重叠雷同的因素,这是很自然的。诸如他在生意场上多少还讲一点精神,

在他的艺术实践中也会想起以往缠绵的性爱,以使他的艺术更为柔美;而他所专心从事的各种事业亦均在相同的盘根错节的生活根基上萌生,然后分叉、繁衍;然而,总的说来,他对这些事业的迷恋亦伴随着某种节制,即“一次只做一件事”,这便是凯勒·古德威尔的生活准则,而他则像个孩子一般奉行着这一准则。

对于他生活中几次角色的变换,他并不作任何辩解,很少往回看,从未有一时一刻向愚蠢、毫无价值的怀旧感妥协过。“人是会变的,”人们听他这么说,或“如此这般只是我生活中的一段经历而已”。他边说边耸耸肩,同时也耸动一下他那矮小、硬朗的身体,他那张如小皮包般的脸上也绽出了笑容。不管怎样,在他当采石匠的那段时间里,他毕竟亲眼目睹了汽压钻孔机代替了星头钻机,机械框锯取代了手工横割锯。在一九一六年那会儿,他还是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雇来的一名雕刻匠;而如今,他已成为自己那家分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他亲眼看到,石灰石取代了质地较软的沙岩而成为全国受青睐的建筑材料。(去年,即一九二三年,一千三百万立方英尺的印第安纳石灰石被开采、销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建造纽约和华盛顿两市诸多华美炫目的纪念碑、馆。)一事连一事,这就是生活。

您应该知道,当凯勒·古德威尔说(他近来常这么说)“生活在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或者“作为一个令人骄傲、自由的国度的公民”,他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他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加拿大自治领。加拿大连同她的森林、湖泊和辽阔的空域,如同她短暂、令人寒心的历史一样,现在已躺在了月球的另外一边。布卢明顿市有些受过教育的人——他每天都遇

见他们——从未听说过马尼托巴这个省，或是即便听人说过，也不能正确地把它拼写出来，或在地图上指出她的位置。他们以为，渥太华是伊利诺斯州中南部的一个小镇，而多伦多则位于俄亥俄州北部那些个小镇之中；似乎一块巨大的橡皮擦从天空降下，将北美大陆的上端整个儿地抹了去。不过我父亲始终忙于他那些雕刻合同、投资及向公众演讲等事情，并未有一时一刻哀叹他那默默无闻的国家。

当然，那个国家决不会默默无闻，尽管有关它的消息、新闻只是偶尔刊登在芝加哥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日报上。美国的读报大众完全卷入了他们自己国家里那生机勃勃、高度紧张的社会生活，因而不能指望他们对北面那个彬彬有礼、如蜗牛般爬行的邻居感什么兴趣，尽管它幅员辽阔，有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国王（这个星期他满六十二周岁），还是温度较低的各种族同化的熔炉。在加拿大这个国家里，似乎什么也不可能发生，它是一个总是穿着星期日去做礼拜的服装的国家，一个您决不会想再跳一曲华尔兹的国家。它纯洁，信基督；它沉闷乏味，悄无声息。但是在成长；是的，必须承认，自治领在成长。

上个星期，七百个开拓者（他们几乎代表了欧洲每一个民族），乘坐四条乱哄哄的轮船——“利蒂西亚”、“阿西奥尼亚”、“彭兰德”及“伯根夫乔德”抵达蒙特利尔。您会说，就那么七百个人，能对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起什么作用？那只是在沙漠上加了一勺沙，或是一匙水滴进了大海而已。再说，还必须考虑到反转移民这一因素，即那些无法适应者，他们过了一、二年，或有时是二十年、三十年，又返回他们原来的国家。

马尼托巴廷多尔的那位退休的石工马格纳斯·弗莱特便

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即将返回老家——奥克尼群岛。那个人的境遇可真够惨的,这是至少一打熟人说起他时的原话,因为他没有一个可称得上是朋友的人。这个可怜的人,不幸的灵魂,过着悲惨、孤独的生活。在他这种生活的血脉里孕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凄清,至少有些人会这么认为。

他出生于一八六二年,现已六十五岁;他精神受过创伤,牙齿已全部脱落、患有关节炎,右耳已失聪;他饱受十二指肠溃疡的折磨,原本高大的身躯已变得腰弯背驼;他头发花白,皮肤干裂,肌肉干瘪,睾丸萎缩,双脚变黄。他打儿童时代起便住在自治领,这个他曾带来自己年轻、强健的体魄——这便是他所拥有的一切——和他的石匠手艺的地方,这个他曾来寻求出路的地方。在这儿,他认识了拉克德邦耐特镇的克莱恩廷·巴克,一个农民的女儿并与之结婚,后生有三子:巴克(现在是渥太华一公务员,爱谈幻想)、西蒙(埃德蒙顿市一机械师,爱喝酒)及安德鲁(浸礼会牧师,现住萨斯克彻温省克莱马克斯市,膝下已有一女)。您会认为老马格纳斯·弗莱特会在这个新的国家扎下根来,家庭和职业的纽带能把他紧紧拴住,他会希望当他大限之日来临时,能被埋在马尼托巴土质稀疏的盐碱地中,立一块杂色斑驳的廷多尔石碑。然而,他却拿出了大部分积蓄支付他返回奥克尼老家的路费;据他自己所知,他在那地方已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他自己也不清楚回奥克尼以后该怎么办。他虽已鼓起勇气离开加拿大,但他仍在等待光秃秃的奥克尼在他眼前升起,等待它给自己一些提示,告诉他下一步必须做些什么。他可以肯定,在他过去的经历中定会有什么东西——某种智慧挺

身而出,拯救他最后的时日。他的这一信念产生于虚无之中、记忆的空白之中。尽管他隐隐约约记得家乡的荒山野岭和那寸草不生的低谷洼地,记得它们陡峭、突兀的斜坡,肆虐乱窜的疾风;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但最清晰的莫过于他父母家那间烟气熏人、不通风透气的厨房,那熏得乌黑的天花板,还有他们被呛得喘不过气来的情景。这厨房给人以安全感,但同样也构成一种威胁。他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低矮的房子里,扯开嗓子大吵大闹的情形屡见不鲜,而且还持续了好多年。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父母和一个长兄被埋在桑德威克的墓地里,他觉得自己也迟早会与他们见面。由泥土而来,复归泥土中去。鬼魂的聚会。这总算是个结局吧。

他先坐了四天火车到蒙特利尔,接着又乘船在海上呆了八天,到达利物浦。他有一笔存款,相当可观的一笔存款;还有一只箱子,里面装满了御寒的衣物,足够他在剩下的时日里穿的。箱子里还有一些他在加拿大四十六年的纪念物:几块石头标本,是廷多尔白云石,美极了,被小心翼翼地包在了羊毛内衣里。还有他的工具、他的烟斗、五磅他最喜欢的烟草、四本书——用三层报纸包好了的——他从未与它们分开过;还有一些家庭文件、移民批准书、出生证(三个儿子的,他们是他的后代,是他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留下的唯一痕迹),以及他妻子的告别字条,那是她一九〇五年放在她手帕盒子里留给他的。再见了,字条上说,就那么几个字,结婚二十五年后,再见,还是用铅笔涂写的。

还有几帧照片。他的结婚照,姿势很正规,一八八〇年照的,他那年轻的新娘坐在照相馆里的一张木雕椅里,双手僵硬地放在腿上,头发往后梳得平平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呢,

是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这一点无可否认——六英尺三英寸高，站在她身后，左手伸到耳垂，好像在扯它，或是抓它。是不是摄影师要他这么扯耳朵的？如果是的话，他为什么要服从呢？

另一张照片是三个男孩的合影：巴克，六岁，板着脸望着镜头；西蒙，四岁，（穿着天鹅绒裤子，这裤子漂亮极了，从哪儿买来的？）翘着二郎腿坐在包了软垫的长凳上；还有安德鲁，两岁，他在动——肯定在动——坐在西蒙的脚边。他这些儿子，他亲爱的儿子，都离他而去了。

还有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集体照，没有日期，但他相信是一九〇一年或是一九〇二年照的，那时他妻子还没有变“怪”，一切都还没有改变。有谁在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他不认识那笔迹——“妇女节奏与运动俱乐部”。照片上共有六个女人。他认出了那位医生的妻子斯皮尔斯太太。他还认出了站在后排的莫德·利特尔和玛米·赫夫特纳。他认出了每一位站着的凝神专注的女人。啊，瞧她们那自鸣得意的样子。看了这群人，真叫您忍俊不禁。她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裙子和紧身背心，领子处围了一圈带颜色的边饰，外加一条宽宽的饰带，从肩膀一直披到臀部。她们一脸蠢呵呵的样子，但同时又露出怪异而严峻的神色。她们用牙齿和嘴唇说话，还耸着肩膀：我们还真漂亮，我们真是变了个人似的。他妻子克莱恩廷·巴克·弗莱特在前排，她比其他女人略矮一点，又苗条，又漂亮，看上去挺调皮，也挺厚脸皮的。她已四十出头，还生了三个儿子，可那模样就跟水灵灵的大姑娘似的，真让人难以置信。她咬着下嘴唇，好像生活就是一只美妙的云雀。她很快活，不错，可快活

得似乎有点放肆。

这张妇女节奏与运动俱乐部的照片，马格纳斯·弗莱特看了不下一千次，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张张脸看过去，每次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妻子挺快活，这已是被证明了的事实。

他曾听人说，一幅画往往会给人以假象，而照相机却无论如何都反映真实。他那个小巧玲珑、细皮嫩肉的老婆被团团围在中间。在那个年头，她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凡是头脑正常的人看了这张照片都不会否认这一事实。她飘然升空，领略了得意的时刻，抑或愚蠢的时刻，得意也好，愚蠢也好，反正都一样。他的妻子。她那孟浪的微笑，她那弯曲的膝盖，还有她那条映射出亮光的饰带。她丈夫那么粗暴，可她这样子一点儿也看不出是他的老婆。她不可能在二十五年里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受折磨，受虐待，这种想法简直不可思议。

他这么想着安慰自己。

他还记得，她曾有过一种自尊心，即尊重自己的劳动。比如说，她不愿将她梅子布丁里的梅子去核，而让那些吃她蒸好了的布丁的人在他们的嘴里与那些梅子核搅和去。他为此很钦佩她，钦佩她这种不愿把自己累着的奇怪做法。

他三番五次地否认——可有谁会听呢？——他曾在一九〇五年的初秋，不许她去斯皮尔斯医生那儿看她那颗肿得化脓的牙。那不是事实。不是。他会很乐意付那两块五毛钱的。就在她突然犯牙病时，他只是告诉她，他前一年春天患耳道感染时并没去花那挺贵的医疗费，那耳朵就自己好了。（这固然不错，但他那只耳朵最终还是失去了一半的听力，这也是事实。）

在他们夫妻共同生活的那些年月里，他让她住上体面的

房子,而且总是非常仔细地将柴堆贮存好备用,每日早晨去采石场干活前,还将干柴搬进屋子。他与其他许多男人不同,每星期总要交给她一笔钱买生活用品,而对她生活上的奢侈品及女人的各种欲望他也常放在心上。有一次,他从温尼伯给她买来一把镶着彩带边的U字形镜子,可她却把它给了隔壁的默西·古德威尔那个肥婆。这哪里还像他老婆?他还买过一台冰箱,那可是最新的款式,漂亮极了,本想给她一个惊喜,可谁知竟惹她发了一顿脾气,骂他乱花钱。

他曾两次主动表示要接她回来,全然不顾邻里们会怎么说,也不考虑自己会受她什么样的脸色。在她离家出走后的那些年,他有好几次坐火车去温尼伯,在西姆科大街和阿伯丁路交汇的街角附近,像个囚犯一般偷着看她几眼,看她走来走去,看她在花园里像加利西亚女人那样把腰弯了个对折,在自家园子里干活。有一次,他看见她站在那所房子的门口,她围着白色的长围裙,还是那么苗条,他听见她喊了一声,叫那姑娘——黛西进屋,说饭已摆好在桌上,要她赶快进来吃,立刻进来。她的嗓音尖厉,欢快,充满了慈爱,跟以前完全不同,而那孩子还不是她亲生的,只是隔壁那个死了母亲的孩子。

一个抛弃自己丈夫的女人一定有理由,一定能拿出理由来,可他妻子能说出来的便总是说他是个守财奴,把钱抠得紧紧的,还说他说话、举止不柔和。咳,她跟他结婚那会儿就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根本就不是那种能和女人唠唠叨叨、谈情说爱的男人。

她走了一年以后,他将整个客厅,包括地毯、椅子等所有的东西全部清理打扫了一番,清除灰尘,通风透气。在她针线篮的最下面,他发现了四本小书,浪漫小说,他想这些书是这

么叫来着,或是女人看的书,软纸封面的,一本九分钱,价格印在封底上。是“九分钱”图书馆的书,他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搞到这些书的,不过他猜想她是从那犹太贩子手里买来的。她这么偷偷买,偷偷看,好像他连这么个小乐趣都不给她一样。

他自己也开始在冬天的夜晚读这些书。总比傻望着那只钟,听它的嘀嗒声强;也比听树上的冰落到屋顶上的声音好。那时候,他已在客厅安装好一个墩墩实实的烧木材的取暖炉,以驱赶冬日的寒气。这是他妻子原先一直做的事情。他看得很慢,因为说句老实话,他一辈子也没读过一整本书。从来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一本书。他一页一页专心读着,心里挺开心,因为大部分字他都认得。这几本书是《为心灵而战》,作者是劳拉·琼·利比、《金子所不能买的》,作者是个叫亚历山大太太的人,还有弗洛伦斯·沃顿的《任由今世摆布》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这最后一本是他最爱读的一本,书里一些精彩关键的地方总让他觉着满喉咙像针扎一般刺痛,然而又是舒心的刺痛。每当这时,他总觉得他妻子离他很近,近得他伸手便能摸到她柔滑的大腿内侧。他觉得很惊讶,这些书里竟充满了各种人物;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内有家具设施,住了人。再瞧那些书里的人真能说话!他们说啊,说啊,简直就是活在他们的舌头里。他们说的很多话都是愚蠢的,然而又是合理的。说话能使他们不发火,而那些话语就像钞票换商品一样被人来回交换着。书里有些语句就跟诗差不多,一点儿也不像普通人说的话,可他还是大声读给自己听,还牢记在心,以便万一妻子决定回家,再据主妇之位,他也有个准备。如果她最大的需求就是这些傻里傻气的谈话,那他也就有备无患,能应付她了。到时他会像个水泵,灌满了甜

言蜜语、铭感五内一类的话：啊，美丽动人的眼睛，啊，至珍至爱的容貌，啊，柔嫩白皙的肌肤。或者说些心胸激荡，情欲急切的话，或是说自己突然明白了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致意相迎的乐趣一类的话；甚至干脆直截了当地表达爱意：我爱你，他在她等候着的耳朵旁轻声说道，我崇拜你的全副身心。

如果这些话他很难说出口——他估摸着自己很难启齿，那他干脆就凝神注视她的眼睛，呼唤她的名字：克莱恩廷。他试着在他舒适的、散发着木头味儿的客厅里喊她，真臊得他从头红到脚趾：克莱恩廷。他先喊得很轻，就像你抚慰一只发脾气的小动物，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柔和，径直对着那张脸说话，那张永远属于妇女节奏与运动俱乐部，而不属于他的脸，那张可爱的、凝神专注的脸。克莱恩廷。克莱恩廷。

后来，也就是她在温尼伯市被一个莽撞的骑车人撞倒，又被甩到皇家银行大楼墙根之后，她的名字便成了哽咽的哭喊：克莱恩廷，回家吧，回家吧，我亲爱的，我的唯一，唯一的爱人。

黛西·古德威尔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举行婚礼的前一周，新郎的母亲亚瑟·霍德太太打算设午宴招待未来的新娘，以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意。午宴就她们两人，在侧边阳台上放一张纹板餐桌，上面放些普通瓷器，乳灰色亚麻餐布和餐巾，或许再将一朵粉红色的牡丹花插在一只小玻璃碗中。洛比利亚梅通常星期三来搞卫生并做烧烤食品，届时将会拿出她的名菜——金枪鱼色拉及一大壶冰茶，然后，这个厚道的女人便会十分得体地离去，留下这未来的儿媳和婆婆单独商谈她们之间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

霍德太太不想让这姑娘感到拘束，因此那天穿得很随便，

只穿一件在家穿的印花休闲装,脚上穿的是一双白色驯鹿皮的轻便鞋。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说话冒昧,黛西。我对你的感情除了爱以外,别无其他;但是,我对你的爱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你是在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中长大的。这一事实,正如我们所知,可能成为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障碍。你父亲是位挺不错的先生,也是位很有爱心的父亲,你不可能再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父亲。但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里女人占据着支配地位。首先,我想说,你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利条件,对文科有一定的研究,但我的确希望你不要让这一优越条件影响正常婚姻生活的和谐。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不要总想着在那些没和你走一条路的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学识。就我个人而言,霍德在学了一年工程后便放弃了这一专业,这的确令我大为失望,但话又说回来,他一直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对他自己在家庭事务中的位置看得十分清楚,尤其考虑到他父亲死得早这一因素。顺便说一句,黛西,我总认为说‘死’要好一些,而不要说‘过世’、‘去世’什么的。同样——我觉得非提一下不可——我们请人吃饭,而不是为饭请人。^① 当你摆桌子吃饭,不管是早饭、中饭,还是晚饭,一定要将餐刀刀口朝里;朝里,不是朝外。色拉用叉当然不可与其他餐叉混放。哈罗德早餐总是吃葡萄干,这是关系到消化和全身健康的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问题向你说清楚。我说的是肠蠕动。哈罗德从小时候起,他的那部分功能就不好,很受罪,所以必须吃

① 这里英文原文为 we invite people to dinner, not for dinner,句中 dinner 前的介词应用 to,不用 for。

葡萄干,这也是一种非常经济的食品。黛西,我们决不可因为节约而感到羞耻。顺便提一下,早餐决不可吃番茄汁,只能在中餐或晚餐前吃。早餐最好吃桔子汁。如果没有新鲜桔子汁,或是有时间上的考虑,罐装桔子汁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哈罗德对自己用的梳子、刷子等十分讲究,总是定期清洗它们。他喜欢一把硬橡胶梳子,我总是预备一、二把相同的,以备他万一找不到时好用。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威尼蒂安韦尔瓦护肤液,用它护肤。我觉得你不必过多地考虑皮肤护理问题,在你这个年龄还没有必要,但面部皮肤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会很快变粗糙。上床睡觉前将这种护肤液涂在脸上,小心揉擦,以划圆方式揉,使之渗入皮肤。决不可用肥皂,决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也许会问。因为肥皂具有极强的干燥作用。再说洗澡粉,我建议你用丁香粉。有些洗澡粉简直让人难受。男人就受不了刺激性很强的气味。我看你没吃橄榄,黛西,无论何时,如果你发现自己盘子里有什么东西不合胃口,就将它塞到其他东西下面,以免得罪别人。你那盘子里的生菜叶子就挺合用。你知不知道床单布是可以论码买的,而镶边一般是免费的?白颜色的鞋子只能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这段时间穿。对‘第一道菜’这个词你要小心,它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指主菜,而是指主菜之前的那道菜。哈罗德对他父亲的历史非常敏感,我指的是他父亲早死一事,我相信你已知道有关的事实。哈罗德一听人谈起这件伤心事就烦乱不宁,我想你最好不要提起他父亲,我们从来不提。星期天我们总是待在家里,这是我们家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我们绝对不出门。你一定要在两个月之内向送结婚礼物的人表示谢意,有些人允许三个月内完成此事,但我这个人是个老

古板，仍坚持两个月。素净的请帖最合适，或者用边缘凸起的那种。哈罗德有一次吃一把爆玉米花，当时便咳了起来。每当我们晚上吃爆玉米花，我总是要对他多加注意。最后，对你们度蜜月，我还要说几句。你以前没去过欧洲，所以你对旅馆客房里一种挺奇特的小用具可能会感到惊讶。我说的当然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和意大利。这是一只小小的瓷盆，但不能被它的外观所迷惑，因为它是欧洲人为个人卫生而使用的。你必须格外小心，不要去碰这些瓷盆，因为它们带菌，到处布满细菌，绝对带菌，而且是危害最大的细菌。这种细菌会给你带来一辈子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又会传给别人，甚至会传给下一代。一个女人结了婚，她就必须时常警惕可能出现的危害。她不能只想着她自己。打从男女双方在圣坛旁相互表达誓言那一刻起，女人的丈夫便成了她神圣而可信赖的人。”

*

“她指的是男女做爱的事，”艾尔弗雷达·霍伊特对黛西说，“就是女人洗下身的盆。你把它装满水，然后蹲在上面，把你那下面擦洗干净。”

举行婚礼的前几天，她和黛西、拉比娜·安东尼三人聚在马歇尔妇女用品商店后面一间用帘布隔开的房间里，最后一次试穿礼服，那位负责剪裁和试样的裁缝到仓库去拿一板新别针了。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但一台小电扇将姑娘们的裙子吹得起伏飘动，倒使她们觉得挺凉快。艾尔弗雷达(弗雷迪)和拉比娜(比恩斯)充当伴娘，她们将穿相同的服装——粉蓝色绉纱服，袖子和领口饰有乳白色的花边。黛西的婚纱则是一件后襟为皱绸料的缎子拖地礼服，上面饰有珍珠和多角

形钻石；她的面纱是一块带饰边的雪纺绸；而她的婚礼花束则将由铃兰、兰花和王紫萁等组成。

弗雷迪去年夏天曾去欧洲游玩，在船上她经历了两件挺浪漫的事，一件是在去的路上，一件则是在回来的路上。在欧洲期间，她在佛罗伦萨待了五个星期学习艺术史。有一次，她旁听了一节人体画课；课上，一个年轻男子摆着姿势，赤身裸体躺在台上。除此以外，她还去了巴黎，爬到了埃菲尔铁塔的顶上，还站在凯旋门那永不熄灭的浮雕火焰旁，还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了一枝洋葱——她一片一片地将它的叶子扯下，再将叶子放进一小盘醋里，用后部牙齿使劲咀嚼。“对于法国人你们需要了解的是，”她告诉黛西和比恩斯道，“他们在某些事情上很脏、很丑恶，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却又显得那么认真、得体。对法国女人来说，一只洗身用的小盆子是必需的——之前、之后都要用。”

“在什么之前？”比恩斯问道，“又在什么之后？”

“在做爱之前和之后。”

“哦。”

“她们做爱的次数要比美国女人多得多，也比英国女人多。”

“为什么？”黛西问道，“她们为什么会这样？”

“她们的性欲要强得多。她们认为，做爱是一个女人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对此极感兴趣，也极富创造性。”

“你说她们极富创造性是什么意思？”

“她们做爱的方式不同。”

“什么？”

“我是说，她们采用与一般方式不同的方式。去年夏天，

在我们住的一家旅馆,就在这种梳妆台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本书,是一本小册子,还配有图画,你知道的,画的是夫妻做爱的不同姿势。”

“你以前根本没对我们说过。”

“你们从没问过。”

“他们究竟怎么做的?”

“谁?”

“就是图画中的男女。”

“对,怎么做的?”

“嗯,”弗雷迪低头瞅着她鲜艳的、涂了油的指甲。“从那本小册子里的插画来看,好像,”她顿了一下,“好像他们在互相亲,亲下面那儿。”

“哪儿?”

“这儿。”她指了指自己衣服的下摆。

“咳,我的天。”

“你是说男人亲女人那儿,还是女人亲男人那儿?”

“互相亲。”

“啊,我的天。”

“我可做不出来。”

“我会觉得恶心的,我真会吐出来。”

“我就是这会儿想一想都觉得恶心。”

“对他们来说可是很自然的。他们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美国人那样拘谨,他们这样做挺习惯的。当然,这是一种,你也知道,一种保证你不致怀孕的方法。”

“我希望迪克对这种事一无所知,”比恩斯说道。她将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和迪克·格林结婚。

“我的天，你们觉得哈罗德不会想试一下这种事吧——”黛西看着弗雷迪和比恩斯。三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她们三人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她们会突然如此兴奋；这种情况在她们中间也不过是像突然来到的一阵风雨，并不多见。“别再让我笑了，”比恩斯喘着气说，“否则我那漂亮的裤缝就要开线了。”“哎哟，我这条漂亮的内裤要尿湿了。”弗雷迪尖叫道。

这三个人总是这么嘻嘻哈哈的，正如弗雷迪母亲说的那样，没命地笑。黛西有时想，她和弗雷迪、比恩斯三人活像一个人似的，没出世时便蜷曲在同一个母体之中，呼吸着同样多的空气，出世后又都长了颗爱嬉戏的脑袋。她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图德霍尔中学一起读了那么多年书，后来又一起上朗女子学院，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就是这样。她们还加入了同一个女生联谊会，并在六月的同一天上午取得毕业文凭。现在，只要黛西停下来考虑自己的蜜月计划，想象自己真的站在埃菲尔铁塔或罗马大剧院前，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弗雷迪和比恩斯也在那儿，就站在自己身旁，一起喊啊，笑啊，闹啊，就跟疯了似的。

然而今天下午，电风扇吹起了她的丝衬裙，她心中却是另一番滋味，她觉得自己将要孤零零地站在国外那些陌生的地方，只有她和她丈夫哈罗德·亚·霍德两个人。

哈罗德·亚·霍德的名字里中间那个字“亚”代表亚瑟，这是他父亲的名字，就是那个在东一街自家那幢石头房子的地下室里用枪自杀的那位父亲，那年哈罗德七岁。

这条街是各采石场那些有头有脸的老板们聚居的地方。街道阴凉、笔直,两边树木成荫,住家离街面很远,显得冷冷清清。霍德家的那幢房子坐落在金西家对面,是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的——屋顶陡直,烟囱呈锥形。这座房子不仅以方石砌墙,而且其他各个部分均以石头建成。完全是石结构。窗户全是用铅条玻璃,高大的前门是栎木做的,大门周边精妙的石雕是布卢明顿当时最著名的雕刻师霍顿·格拉夫的杰作,他后来与赫克托·麦基赖斯、凯勒·古德威尔合作,成为莱皮斯肯联合公司的合伙人(格拉夫干这活时还是个年轻人,那卷绕盘节的树叶、藤蔓,及一串串葡萄被认为是适应性新艺术的典范)。

星期天一早在地下室发生了那起自杀事件后,霍德太太将两个儿子朗斯和小哈罗德叫到身边,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你们可怜的父亲最近找了一位专科医生看眼睛,结果得知自己很快就会双目失明。他不忍成为我的负担,便走了这条路,以求解脱。”

她是怎么知道丈夫即将双目失明的?那个眼科医生有没有证实这一诊断?死者是否给家人写有遗书,说明原委?(此事发生后好几年,哈罗德想到了这些问题。)事实上没有。亚瑟·霍德让自己的死因蒙上了一层阴云,似乎是出于“保险的考虑”。但霍德太太总是信誓旦旦,说她确信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是事实,并说她能理解,也能谅解,而他们——死者的两个儿子也必须如此。

后来,哈罗德就在布卢明顿这同一所房子里渐渐长大(因为他们家办的这所采石场挺兴旺,一直延续到经济衰退时为止。),在此期间,他自然听说了很多有关他父亲经济状况不稳

定及他在贝德福德有位“女友”的情况,可哈罗德对这种恶言恶语并未大惊小怪。一种与生俱来的玩世不恭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驱之不去。他毫不怀疑,他自己的一生将成为一种长久的等待,他将怀着既欢迎,又恐惧的心理,等待一个可怕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他渴望获得有关此事的各个细节,但他一无所获;或者说,他感到自己无权要求获得这些细节。比如说,他想知道他父亲在那个星期天晚上为什么要去地下室。他用的枪究竟是什么型号的,他买这支枪是否专为自杀之用?子弹击出的洞口有多大,从哪里射进体内的?脑袋?胸部?流血了吗?流了多少?当时叫谁去清理血迹的?那致命的扳机是在炉子后面那一小块阴影下扣动的,还是在水果地窖里,或在那扇遮着帘布的小窗户下那个供洗涤用的炉灶旁?他父亲当时是即刻死亡,还是拖了一、二个小时,心里为自己的决定后悔,并以微弱的声音喊救命?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需要知道,但同时这种需要又使他感到无地自容。他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丑恶可怕的人?他这种行为——这种奴颜婢膝索要文件记录的不正常行为,岂不卑鄙、肮脏、怪诞可笑?做这种事,咳,还像不像个男人?不像个男人——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归结到了这一点。

他父亲的自杀很快被他母亲说成是一种献身行为——一个颇有爱心的父亲和丈夫拯救了他的家庭。她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执意将她智力不那么健全的儿子朗斯说成是“有艺术才华的”;还硬将哈罗德(因作弊)被工学院开除一事归罪于一位教授,说他神经兮兮,用心歹毒。她这些编造出来的话对哈罗德造成了很大影响,使他一直如醉酒般昏昏沉沉。生活在

母亲那臆想虚幻的不真实中,他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脑袋一直浑浑噩噩,思维迟钝。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很难进行有条理的思考,越来越难。二十岁刚出头,他便不由自主地真的喝起酒来,下午喝威士忌苏打水,晚上喝一瓶葡萄酒,还经常喝两瓶酒后,再吃糖果。甚至一九二七年六月与黛西·古德威尔的婚礼,他也是喝醉了去的教堂——位于第二街的圣路加圣公会教堂;令他吃惊的是,他竟也获准入内。他最要好的朋友迪克·格林在结婚仪式的自始至终都架着他。参加婚礼的宾客似乎变成了粉红色的、模模糊糊的一片,从他们的座位上冲着他打哈欠,有些人还从他们傻楞楞的眼睛里眨巴下几滴多愁善感的眼泪。

这么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据说还是印第安纳州最帅的小伙子,美国年轻男人最出色的典范。鹏程万里,前途无量。爱情和家庭。上帝和职责。祝福,祝福。

每个人的生活史里都有一些章节很少被人阅读,更不用说被人大声朗读了。

渥太华的巴克·弗莱特收到了黛西·古德威尔的一封信。信中谈起她将与一个名叫哈罗德·亚·霍德的男人结婚一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不断地隐隐作痛,他觉得这种隐痛与那烦乱不宁的疼痛或因内疚而引起的疼痛何其相似。他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戴着草帽,正准备上火车,但他不愿重温当时的情景,有什么必要呢,他过去时时刻刻都在涌动的那个邪念——紧紧地压在她的肉体上,压在她美妙的肩膀和蓓蕾初绽的乳房上,这一可耻的念头已被他拒之门外,他脑袋里那扇小门已咔嗒一声锁上了,关闭

了。

巴克·弗莱特新近受聘担任了农业研究所所长这一职务。有人说,他的精神,他的毅力都与拉丁语的特征如出一辙。他现年已四十三岁,仍是个单身汉;有人说他对性、亲热及私生活等持十分冷漠、自制的态度。偶尔同事间外出郊游,或搞晚餐聚会,他会感到一种欢愉的颤栗,然而这种愉悦之情又总被一种压抑感猛力拖回而荡然无存。“我咽下了几多苦涩,”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里不无浮夸地写道,“结果发现那苦涩颇合自己胃口。”他与人交往时举止言谈着实笨拙,可他又显得十分可爱,这真令人称奇;他本是个不苟言笑之人,可又急于表现得不那么严肃;而他那张苍白、瘦削的脸仍被女人们认为英俊耐看。谈起他收集的杓兰花——共计二十七个品种,每一件都保存得非常精美——他便滔滔不绝,可他对美国流行的狐步舞的重要性却一无所知;此外,他平日里太忙于自己的事,对查尔斯·林德伯格最近一些英勇行为亦不甚了了。他通常在周末独自一人去乡下长时间地散步,此举至少使他身体保持健壮;因此,即便到了四十几岁,他的头发仍那样稠密、乌黑。(在他的毛裤和内裤里面,他的阴毛乱蓬蓬一大堆,活像个隐秘的私人花园。)多年来,本市传言很多,说他是同性恋者。幸好这些传言没传到他耳朵里,否则,他会感到十分难堪,手足无措。他对男人的身体毫无兴趣;至于女人,他对她们既怀有深深的敬慕,又表现出一种飘忽不定的厌烦感。他曾偶尔读到过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意识到他这种厌烦感源于他对自己母亲的怨恨,一个惯于惩罚,压制,摧残人的母亲,一个给予乳房,又收回乳房的母亲。

然而,每当他想起自己那矮小、终日忙碌、胸部狭窄的母

亲,想起她对物品价格及自己生活计划的关心,他心中只觉得暖洋洋的。克莱恩廷·弗莱特是个有人格缺陷的女人;是的,她扭曲并重新编造了自己的历史,抛弃了丈夫,拒不履行自己做妻子的义务。她在精神上的生长发育,已随着她的儿童时代,随着那时她对创造世界的上帝怀有小小的不满而告结束;因为那时,上帝这个专横的父亲在她的花园里横冲直闯,践踏她最喜爱的花朵。但是仍然……

啊,是的,他仍然常常回忆起母亲,而且他的回忆总是那样温馨;正如他常想起年轻的黛西,以及他和母亲共同照看她的那些愉快但模糊了的岁月。

今天,他坐下来给黛西写信,祝愿她今后美满幸福,还在信封里夹了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并解释了这笔钱的来由:他一九一六年卖掉了母亲的花卉店,之后将那笔钱作适当投资,现在已翻了三倍。“这笔钱是你的,我亲爱的黛西,”他在信中写道,“这是母亲原本想要的钱,因为她觉得每一个女人,无论结婚与否,必须存有私房钱。零碎小钱,她会轻描淡写地这么说。”

作为他自己要送的结婚礼物,他给黛西寄去了全套手工着色的凯瑟琳·帕尔·特雷尔的《加拿大野生花卉》画集。对于一个即将开始新的生活的女人,他想象不出有比这更好的、更合适的礼物了。

在凯勒·古德威尔位于霍桑街住宅的餐厅里,陈列着各种结婚礼物供人观赏。四只酒精炉盆、供十二人用的一套水晶玻璃器皿、两套瓷器、镀银及纯银餐具、一副烤蛋奶格子饼的夹板铁模、亚麻织品,几条厚羊毛毯、一个瓷器大花盆、糖果

盘、坚果盘、佐料盘、枝状烛台、全套咖啡用具、全套茶具、一只新郎送给新娘的白金手表、凯勒·古德威尔送给女儿的一具用作草坪装饰、以石灰石雕刻而成的三英尺高的小精灵。

这个小精灵是他自己雕刻的，也是他几年来尝试雕刻的第一件作品。看起来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玩意儿挺寒碜——工艺粗糙、又不起眼——它与马尼托巴那座石塔上轻快活泼的小美人鱼（可惜现在已遭侵蚀）及支撑伊阿华州国会大厦中心柱子的赛勒姆石天使均出自同一只手。他的雕刻手艺已生疏了，他的感悟力也退化了。他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这当然不错，但他的石雕手艺已经荒废，对表现流行新艺术的柔软卷须等细活一筹莫展，又缺乏石刻这一行所使用的新型机械工具。“石头的奇迹，”他一年前在朗女子学院毕业典礼上致词时曾说，“就在于一块僵硬、毫无活力的东西从地里挖掘出来并被赋予其翅膀。”

这当然不错，但同时也需要雕刻师奇迹般的想象力和清新的视觉。

这只可笑的花园小精灵却既不清新，又无想象力可言。它恶作剧似地咧嘴笑着，瞧它那张得圆圆的嘴巴，那双在袋形石脸颊上方眨巴着的欢快的眼睛；而它躯体上方那颗过大的、雌雄难辨的脑袋又显示出一种近亲杂交的畸型。此外，这具小精灵本可以用水泥浇铸，以使其表面质地平滑、柔和。这件“艺术品”即将成为那些滑稽可笑、毫无品位的礼品中的一件，就像那只陶瓷龙虾托盘和那只差劲的素瓷挂匾一样，将很快被送到地下室或车库去，而最终成为私下谈论的家庭笑话和轶事趣闻。

没关系。这尊小精灵是以爱和讨人喜欢的天真雕刻而

成。当凯勒·古德威尔将这尊丑陋的小土地神递给他可爱的女儿时,他的眸子里滚动着泪珠。

见此情景,黛西的双眼也泛出泪花,可她叹了口气,因为她知道,父亲又要以他洪亮的嗓音发表空泛的演说了。

他哪里知道,他说话的才能也已耗尽枯竭;他已进入巴罗克式^① 怪异的人生阶段了。无论他以前说话怎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这种流利现在却走向了反面,对他有害无利,正如他的动脉日后有害于他一样。他那舌头创造出来的语句变成了骗人的鬼把戏,即便他一年前在朗女子学院发表的演说也使黛西深感难堪,致使她当时辗转不安,手在淡灰色帽子下面和衣裙上动来动去——只因他说话时那传教布道式的节奏、令人生厌、堆砌而成的句子和陈旧迂腐的观点。他并不是以审美家的眼光看待石头——这还可以接受——而是从一个道德说教者的角度谈论石头。数千、数万个词如奶油般喷涌而出,太滑、太浓。难道他看不见在他面前那一张张哈欠连天的脸吗?难道他听不到人们厌倦的叹息声吗?也没察觉她焦躁不安的羞愧之态吗?瞧瞧他,在空中挥舞着手臂,俨然一矮个子新贵——夸夸其谈,言之无物。怎么会出现这等糟糕的局面?她知道问题的答案:他与外界的联系、他的听觉都出了毛病。

在那个六月的上午,他没完没了地说啊,说啊。他踮起脚跟以便能看到讲台架的上方,不断解释并引申他最喜欢用的比喻。他对被他迷住的听众说道,赛勒姆石灰石是一种奇妙珍贵的石头,一种自由的石头——他的意思是,这石头可由任

① 指十七世纪欧洲一种过分雕琢和怪诞的建筑风格。

意方向均衡切割,因它本无自然形成的斜面。年轻的姑娘们,我对你们说,当你们步入这个世界,请将这种非凡的自由石作为你们生活的基料,你们就是石头的雕刻者。智慧的工具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可以创造这样的生活,也可以创造那样的生活;你们可甜,亦可苦;可亮,亦可暗;可以是生机勃勃的力量,也可是懈怠懒散的力量;可以成为奋斗者,也可沦为落伍者;你们可能失败得很惨,也可能飞黄腾达。这个世界年轻的公民们,这些全由你们选择。

“别,”她记得曾对他说。

“别什么?”

“别那么做。”

黛西·古德威尔和哈罗德·亚·霍德结婚前几天去了布卢明顿的几个公园散步。“别用棍子挥来挥去,”她对他说。

哈罗德百无聊赖地在空中挥动着一条柳树枝,刷下许多飞燕草、石竹花、矢车菊、蝴蝶花等的花头。

“谁在乎,”他说着,侧过脸来看着她,那宽大、富有弹性的脸抽动着。

“我在乎,”她说。

他又用力挥了一下,同时刷落了三朵花:近东罌粟,花瓣飘落在沥青路上。

“别挥了,”她说道。他于是才住手。

他知道自己多么需要她。他渴望改正,渴望爱,犹如渴望一把手术刀,一根鞭子,以遏制他狂野的冲动和不健全的病态心理。

她打心眼儿里相信自己能改变他,控制他,使他狂乱的本

性变得高尚、正直。她知道,他急切地想压抑自己的脾性;他那柔和的、男性的嘴,还有他那张油润而凄惨的脸告诉了她这一点。事实上,这便是她嫁给他的全部原因,外加她已届“婚龄”——她毕竟已二十二岁了。她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展、形成,正聚拢在一种等待召唤的迫切的欲望周围。她想要得到某种东西,但又不知允许她得到什么。她想作好充分准备,她想变得坚强有力。

然而,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她却无法制止年轻的丈夫喝酒。在火车将他们带往蒙特利尔的路上,他整夜拿着瓶喝杜松子酒。在他们那间头等卧铺包厢里,他喝啊,睡啊,打呼啊,还在那只小盆里呕吐。他在乘船横渡大西洋的八天里没继续喝酒,但那只是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晕船,如她一样。时值六月下旬,但今年大西洋北部洋面上的气候却异常恶劣。海浪汹涌起伏,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到达巴黎时已摇摇晃晃、精疲力竭。她在大学里学的法语根本不管用,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在维克多·雨果街上的旅馆。两人在旅馆里一张硬邦邦的大床上睡了足足三十六个小时。醒来后,两人觉得全身酸痛,唇干舌燥。他对她说,他痛恨这该死的巴黎,诅咒这些咿哩哇啦说法语,还在大街上撒尿的法国佬。

他在一个小时内便设法租到了一辆宽敞的轿车——德拉济鱼雷牌,黑得像台灵车,车后部的窗户是方形的,活像惊呆了的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手握着方向盘,似乎一时间复苏了一般,亮开嗓门五音不全地唱了起来,似乎度过了一场大难,虽然他的舌头还散发出轻微的杜松子酒味:黛西,黛西,真实地回答我,对你的爱,我已如痴如狂。他驱车疾驶,越过巴黎市郊,驶进乡村,冲着过马路的行人、冲着牛、鸡,冲着灰白空

旷的法国天空不断按着喇叭。他们驶过乡间无数的林荫道，越过一块块茂盛的罌粟花和金黄色的荆豆田，不知过了多少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阿尔卑斯山区。

她一直求他停下来，先是哭泣着哀求他，后来便大声喊叫：哪能像这样没命地开车，还一面开一面喝着酒，简直不把他们的性命当回事。听了他这亲爱的、爱骂人的新娘的话，他几乎快活得呻吟起来，她是如此醉心于改造他。

他们终于到达陡峭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科普斯镇。车轮擦着地面在一条布满卵石的路上停住，他们遂在邮政旅馆登记住宿。一个看起来有些驼背的搬运工拎着他们的旅行箱上了两层狭窄的楼梯后，拐进一间客房。这房间挺简陋，天花板是倾斜的、房里仅有一扇窗户，上面挂着厚厚的窗帘。

黛西躺在那张凹凸不平的床上，她已精疲力竭了。那件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乔其纱裙服在她身下摊开。她简直无法想象她到这间阴暗、发霉的房间来干什么，但她又感到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四周墙的表面和裂缝都那么熟悉，好像是画在哪本不足为信的杂志里一幅景物画的一部分。她已瞌睡沉沉，但仍抗着不睡，眼睛在四面墙上到处搜寻，希望能发现一点鼓舞人心的痕迹。她看到一张印花纸，它给这间屋子增添了一点可怜的，然而令人舒畅的美。这张印花纸也是那样熟悉。这会儿已是傍晚七点，她仰面躺在法国中部一间旅馆客房的床上。世界在她上方旋转，不断地旋转。这个陌生人——她年轻的丈夫已将窗户打开，接着又推开护窗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房间。

他坐在窗台上，稳稳当当的，挡住了阳光，形成一大团阴影。他一手握住一只酒瓶，时而喝上一大口，另一只手抓住一

把生丁硬币，向聚集在楼下一块四方卵石地上的孩子抛下去。他在笑，那是一种狂乱的、四分音符的尖笑声。

她能听到硬币落在地上发出的那音乐般的叮铃声和孩子们唱歌般的尖叫声。她意识的一部分已飘向睡眠，她在那儿会非常安全；但另外一个东西却在拉扯她，那是一股力量，一股执意向前的力量，她以后将堂而皇之地把它看作是一种悲剧的责任感。她神情严肃地盯着天花板和肮脏的涂墙粉。她在等待。

这时，她忍不住要打喷嚏——她以前就对羽绒枕头过敏。她这个喷嚏打得很响，很有力，也很突然。她这声爆响锁住了她的喉咙，逼着她刹那间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时，哈罗德已不在窗台上了。她所见到的只是窗户上那四方形的、空泛、耀眼的阳光。就是这么一眨眼工夫，那么短促，那么宁静，脑子里根本没来得及留下任何印痕。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可她还是驱赶了这种不相信的念头。紧接着，她听到咚的一声，如西瓜迸裂、摔得粉碎的声音，一种对人有害的、讨厌的噪声；接着便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和在街上奔跑的人们发出的声音。

她记得自己在床上至少躺了一分钟才起来看发生了什么事。

第 四 章

爱 情

1936 年

这个世界的麻烦常常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协调——这是我的看法，我的一己之愚见，我早就学会这么看了。

然而，对男女间的不协调现象，我们女人也爱置之不理，还乐此不疲。我们习惯于忍耐各种事情，包括这样一种观念：男人与女人立身行事的方式各有一套，截然不同。您也许会说，这只是我们女人为自己上演的一小出杂耍表演，一种眯起眼睛斜视人们行为的方法，一种女人共谋的形式。然而，只要看看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怎样逆来顺受地苦笑，眨眼，点头称是；或怎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诧而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噢，对了，我们还说，那个男人是你的，嗓音里还带有一种会心的欢愉；或者说，女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将男女间不同的行为方式及他们不同程度的愚蠢看作是宇宙间的一件可笑的事情。至少我们在一九三六年那年是这么认为的，那年夏天我满三十一周岁。

那个年头，男人在我看来，似乎因他们生活中冒出来的各种经历而享受殊荣，而女人则更有可能会因她们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而受到压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允许男人享受他们生活奇遇所带来的殊荣而大摇大摆，高视阔步，胸前还挂满了各种奖章，而女人则被她们的生活经历所压

制，灰溜溜，一声不吭地走路？发生在女人头上的种种事情，能将它们自己吹得像气球那么大，将女人生活中以天计数的刻度整个儿地填满，还死命地膨胀、挤压，弄得那些简单明了的时间分割——小时、星期、月份全给挤没了，不见了。这真是一场讽刺，而它则一直困扰着黛西·古德威尔·霍德的生活，这个布卢明顿的年轻寡妇即将迎来她三十一岁的生日。她仍然生活在痛苦之中：先是遭丧母之痛——她的母亲死于分娩，接着又遭丧夫之痛——她的丈夫死于蜜月。我应该说，他死于他们的蜜月。

人们说，她的心一定碎了，可这不是事实。她的心只是遭到挤压，像是一块抹布暂时被挤干了一般，如此而已。

然而，无论她去哪里，她人还没到，她的故事已先她而至，为她鸣锣开道，宣布她的到来，同时也抹杀了她真实的自我。哎，她多么想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可她既已走进了自己这段乱七八糟的历史，踏上了它的节拍，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两年前加拿大一对普通农民夫妇生下的著名的迪翁五胞胎，她们的情况也是这样。首先人们想到她们卑贱的家庭出身，加之她们奇迹般地全部存活下来；而你所听到的传说又是那样有说服力，不怕你不相信，弄得那五个小女孩自己反倒被这涡流般的传说卷走，真实的自我将永远默默无闻。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一个例子，没这么富有戏剧性，但更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叫贝西·珀费克特·特朗布尔的女人（1896—1936）昨日午夜被杀，这一消息登在今日各家晨报上，甚至因某种原因还登在了《布卢明顿凤凰报》上，嗯，这是因为时值夏天，真人实事一类新闻很少。似乎此人是从加拿大太平洋火车站的一辆家

畜车厢里跳下或摔下的，出事地点离马尼托巴的特兰斯科纳仅一英里。她究竟在那个空无一人的调车场干什么？她的左臂和左腿被完全轧断、分离，出事后几分钟她便死了。她临死说的一句话是：“我浑身血糊糊的。”她的美貌、她的智慧、她多年来在特兰斯科纳教育系统中颇有灵感的教学工作，还有她与特兰斯科纳的司炉工巴尼·特朗布尔的婚姻生活，一切都消失在历史之中。她将永远成为“那个跳下或摔下去的女人”（这种惹弄人的、无法令人信服的说法），而且还在半夜，这个简直无法想象的时间，女巫出没的时刻，还有她的膀子和腿——想想看！——加上她临死前那可怕的、神秘的话：“我浑身血糊糊的。”除去这些以外，其他情况一概不知。我们向它悄然逝去的方向点头，但仍注视着那引人注目的亮点。

这种事多有不公——仅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便可将一个女人生活中美丽的菊花一扫而光。不过，这个世界已被可能出现的突发性逆转、流血，及重新安排简单事情的紧急需要而弄得糊里糊涂，晕头转向。黛西·古德威尔·霍德的蜜月悲剧，其关关节节如此奇怪，如此不可预测，以致使她正进行中的普通生活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其实，若将真相挑明，她的生活还是会宁静、惬意的，与任何他人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自打在法国发生了那场悲剧后，她便一直与她父亲（也是个丧偶之人）住在威尼格希尔那幢房子里。这所石柱撑起的房子宽大、阴暗，屋前是圆形的驾驶道，那只丑陋、矮小的土地神在屋前花园里狞笑，旁边是雪球般的灌木丛。

您也许会认为黛西已失去了快活的神采，其实不然，她虽然生活在她的故事里面，但更生活在她的故事之外。物换星移，冬去夏来，她的生活中有高尔夫球、网球、她的朋友、那片

花园——此外,还有她给予自己肉体的那份孤弱的、秘密的爱。事实上,她所学会的表达痛苦、驱赶痛苦的方法中还确有惊人之处——即同时表达和驱赶痛苦;所以您也许会说,她能从她自己的生活中逃脱出来。她擅长湮没自我。九年了,自打“它”发生后已经九年了。她离自己那个故事的涟漪、回声及其变化已越来越远。不过,它们仍执意影响她。

“她是不是那个——?”

“是在法国一个小旅馆,还是在瑞士?但不管怎么说是在二楼。”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那场婚礼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太妙了。”

“那个男人也挺妙,身强体壮,帅得像电影明星。”

“富得像克利萨斯,^①夫妻俩都富,当然是他摔下去之前。不过,钱有什么用,如果——?”

“她听到他摔下去的,他的脑袋开了花,就像熟透了的西瓜那样,是她说的。也可能是南瓜?当然调查了,不管那地方人叫不叫调查。”

“我的天,那会儿她准是刚二十出头吧?”

“还在外国呢。”

“人生地不熟的,一句外语也不会说。”

“他当时在分钱,你瞧,分给这些街头上的穷孩子,从窗台上扔硬币——”

“就在那会儿出的事。”

① 克利萨斯,公元前六世纪小亚西亚古国吕底亚(Lydia)王,以富有著称。

“他们当时行李还没打开,那些旅行箱还——”

“她正在休息,躺在床上,突然听到……”

“瞧她走了。”

“那是她吗?”

“那女人一定夜里做恶梦。”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可能真的恢复过来,从——”

“可怜的女人。”

除了黛西以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女人——弗雷迪·霍伊特和比恩斯·安东尼·格林知道黛西与哈罗德·霍德结婚后从未圆房:“他老是喝酒,”黛西在从欧洲回来后不久便径直告诉她俩,“要不就是生病,或是提不起兴趣。”

她坐在弗雷迪的床边,手里折着上浆金丝薄纱钩成的床单,谈起自己蜜月期间的全部细节(可怜的弗雷迪患了热感冒)。黛西向两个可信任的同窗好友说出了一切,但有两点她并未提起:一是哈罗德从窗台摔下去前她打了个喷嚏,二是出事后她在床上继续躺了一分多钟,两眼瞪着天花板,觉得自己已向这场灾难的那一头漂去。

黛西在弗雷迪床边向她们诉说的这些悄悄话又引发了她们过去的笑声,她们先是缓缓的,怯生生地笑,接着是忍不住噗哧笑;忧虑的目光先是在弗雷迪和比恩斯之间飞来扫去,但当她们最后尽情地捧腹大笑时,那情景又是多么欢快、可爱。她们的欢笑使黛西解除了心头重负——或准确地说,解除了她胃里的重负,因为她的震惊和悲哀都贮存在她腹部里。

悲哀?为谁悲哀?为哈罗德吗?噢,不。为她自己的草

率,为她所听任发生的事,为那件她允许发生并将她淹没的大事。

“我的天,那不是意味着你还是个妙不可言的黄花姑娘吗?”这个不再是处女的比恩斯·格林说道,她的双眸猛地一睁,哈哈笑起来。

“她可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处女,”弗雷迪说道。她最近与布卢明顿一位著名的美术教授“尝试”了男女交欢,而那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老得足以做她父亲。

布卢明顿还有其他一些人也知道黛西的处女膜仍保存完好,知道的人还不算少。对这一情况黛西一无所知,这真是她的福份。在这些人中有老马尔代夫医生,他曾在黛西回布卢明顿后为她作过检查。此后不久,还是这个马尔代夫医生出于好心将黛西未圆房这一奇事告知她父亲凯勒·古德威尔。(这么做似乎是他的责任,一件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事。)这位好心的医生还将此事告诉了他妻子格拉迪斯,这次他可就不那么好心了;而他妻子呢,转而又将此事说给她在桥牌俱乐部的熟人亚瑟·霍德太太听,还添油加醋,将此事说成是令人挑眉瞪眼,惊诧不已的无稽之谈。亚瑟·霍德太太则对此事下了定论,还将她的定论在布卢明顿任何一次社交场合加以宣布:年轻的黛西·古德威尔是个有严重性冷淡的不正常的女人,她禁锢了一个健康的年轻男人——她的儿子的激情,然后又挫伤他这种激情;或许还逼着他做出某种决不可公开说出的事情。

黛西所知道的只是她婆婆待她甚为冷淡。她俩几乎难得见面,事实上,从未有过此事。有人劝她放弃霍德家地产的要求,她很乐意便接受了。钱对她并无必要,她目前生活得很舒

适,而且她还比较年轻,也并非特别不快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那时经济很不景气,可我姨妈克莱恩廷·弗莱特却意外地发现她经营的花卉批发生意十分红火;而到了现在的一九三六年,尽管石灰石工业萎靡不振,大部分采石场都归于倒闭,但石雕艺术却繁荣兴旺起来。似乎在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需要点装饰,需要美的东西以减轻生活的重负。我父亲凯勒·古德威尔和他在莱皮斯肯有限责任公司的那些合伙人竟能在世界范围的这场经济衰退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每天都要与一些名气很大的单位签订合同——俄亥俄州立大学新图书馆、位于阿肯色州小石城那座宏伟的战争纪念碑、芝加哥谷物交易所的带状装饰等等,您还可以列出许许多多。

古德威尔先生总是在抱怨缺少优秀的雕刻师。他说,老的雕刻师逐渐谢世,而新人则太浮躁。最近,他不顾路远,亲赴意大利寻找有才华的新人。结果,回布卢明顿时,为莱皮斯肯带来三个新的雕刻师,还给自己带回来一个新娘。

她的名字叫玛丽亚。一个年轻的那不勒斯新娘还能叫什么别的名字呢?可是,她究竟有多年轻?谁也说不准,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问。她那些移民文件上写的是二十八岁,可有谁会相信这种官方文件,而且这些文件本身看上去就是假的——纸质过脆,印章和签名的痕迹过重。她的年龄估计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但肯定不超过四十五岁;不管怎么说,她比她丈夫——已是快六十的人要年轻很多。

他很崇拜她,这一点显而易见,就像您脸上长了个鼻子一样明明白白。

自从他第一个妻子一九〇五年死于分娩后,他一直就这么过来了,没有寻求任何性爱的慰藉。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说不清这么多年没有女人的慰藉是怎么过来的。如果有人问起,他也许会说,他一直很忙。当然,他心里还想着其他事情:他的事业,他要出人头地,他还有个女儿要抚养等等。如果您问他,他会耸耸肩,粲然一笑,以他那讨人喜欢、迷迷惑惑的样子抬眼望天。大多数失去了爱情的人都会撒谎,变得虚伪、精神颓废,只有少数人能逆风前进,保持乐观的心态,而凯勒·古德威尔似乎便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而现在,幸运之风给他带来了玛丽亚。

这个女人的身体可谓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胸脯很宽,脚脖子却很细;柳条细腰,却长了个大屁股。她走在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那些高雅优美、绿树成荫的大街上,的确与众不同。她步速快,且显出一副目的十分明确的神情,因为她并不仅仅是出外兜风,不,她是去做买卖,总希望能发现新鲜事和赚钱的生意。她回家时手臂上总吊了个沉甸甸的帆布口袋,里面装满了宝物:红色的洋葱、新鲜的欧芹、花菜、西红柿等等。她拎着这些东西就像拎一小捧羽毛那样。她那结结实实的腿肚子表明她过去常在崎岖不平的乡村小路上行走。不过她的脸蛋则是另一番光景:五官生得甜甜的,一双眼睛清澄柔和,一只鼻子大而细长,嘴的轮廓也挺美。她的左边脸颊上有一条难看的疤痕,但她一笑起来便几乎看不见了。她很讨厌口红,妓女才涂口红。不过她的又厚又黑的头发闪闪发亮,显然是用散沫花染料染过的。只要有谁好心问起凯勒·古德威尔,他与玛丽亚是怎么认识的,他总会向他们讲述一番,说他是那在不勒斯一家海鲜餐馆认识她的,她在那儿做招待。“就

瞧这么一眼，”他带着天真，对布卢明顿的朋友们说，“这事儿就定了下来。”

她咿咿呀呀说啊，说啊，可谁也听不懂她说些什么——除了她丈夫，他声称自己常能懂个大概。这个“大概”显然对他已足够了。他自己的舌头突然间变得沉默起来。他端详着自己的新娘，不无惊讶地摇摇头，脸上绽出快乐男人的微笑，特别是当妻子弯下腰——因为妻子比他足足高了三英寸——吧地一声亲吻他头顶上秃了的那一块时，他更是笑开了怀。即便是在公共场合，她也这样弯下腰，声音很响地亲吻他。比如在他们的赴晚宴的采石场俱乐部、在布卢明顿基金会举行的市民招待会上等等。遇到这种时候总让人觉得难为情，可他却无所谓，一直笑眯眯的，好像夫妻之间这么做没什么不正常。

科拉梅·米尔汤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古德威尔家(父女俩)管理家务，可现在她提出辞职了。她说，倒不是她不喜欢玛丽亚，只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无用武之地。玛丽亚像孩子那样生气勃勃，精力充沛，一刻不停，让人看了都觉着累。她每天六点半就起床忙活开了。她喜欢在家里人下楼吃早饭前就将厨房地板拖干净，接着再拖着脚步四处吸尘，又干上一个多小时。她身上穿的是件红色的丝袍子，露出她带有棕黄色长条纹的双乳乳沟。过些时候，或者再晚一些，她会换上一件宽大的做家务穿的棉质便服，腰间围上围裙。如果有人来访，她常常围着这条围裙开门，有时手里还拿着削皮刀，或者畚箕、马桶刷子以及其他什么她正好拿在手里的东西。她那满口的牙齿准备欢迎任何前来拜访的人，这当然不是因为她能说句把普通英语。“阿啰，”她喊道，伸出两条手臂向前向上胡乱挥舞一通。她整天喝不加牛奶和糖的浓咖啡(放在炉子后背煮开

的),到了晚上,她为丈夫和新认识的继女黛西端上一盘盘热乎乎、炖得烂烂的汤水食物。他们是在厨房吃饭,而不是在餐厅,因为餐厅那张饭桌上现在放满了她正在做的那些衣服和纸样。她不停地说着话,舞动着双手,做着各种手势:再来一盘?第三盘?他们要是不想添了,她就满脸不高兴;要是再来一点,她就笑盈盈地乐得像个天使一般。古德威尔的一个同事在采石场俱乐部曾将玛丽亚说成是个十足的印第安种的意大利女人,这话说得太粗鲁,太损人了。

一种复杂的明争暗斗在黛西和玛丽亚之间逐渐展开,这种争斗自然绝对不可公之于众。

黛西对弗雷迪和比恩斯说,“你们会认为她觉得孤独,会在一个既不懂语言,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的陌生的国家里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她有你父亲,”弗雷迪说,“也许他就是她所需要的一切。”

“噢,天呐,”黛西说道。她转动着眼珠,想起夜间听到的那些噪音——那些做爱时狂乱的叫喊,有他的,也有她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比恩斯——即迪克·格林太太——开口说道。“她整天忙个不停,”黛西告诉她们。“烧烧煮煮,打扫清洗,缝缝补补,没见她停过。她一直想给我做件衣服,便拉拉我的裙子,就这么拽两下,然后乱叫几声,皱皱鼻子,再把衣服纸样拿出来,巴特黎克式的,举着给我看。”

“如果这样能让她开心,也许你就应该让她做去,”比恩斯说道。她现在已为人之妇,又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总是想让别人开心。

“也许你应该考虑找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弗雷迪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无法忍受生活在一出正在上演的小歌剧

之中。”

“她总是亲我，早晨、中午、晚上，老吻我。”

“亲你嘴？”

“是啊。”

“哼。”比恩斯想到社交习俗，不禁颤抖了一下。

弗雷迪瞪着眼睛。“喂，你就对她说，你不想她早晨、中午、晚上都来吻你。”

“当然，身体间的亲密举动对某些民族来说是很自然的。”比恩斯换了副口气，嗲声嗲气地发表议论，差点没把弗雷迪恶心死。

“依我说啊，搬出去住。你都三十出头了，是大声提出要求的时候了。”

“他们两个都会伤心的。”

“他们慢慢会习惯的，我搬到新居时，我母亲哭了整整一个月，可现在呢，要是我搬回去住，她会恨得要命呢。”

“嗯，其实——”

“什么？”

“其实，”黛西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既想征求她们的同意、鼓励，也想给她们一个意外。“我想出外旅游。”

“就你一个人？”

“对。”

“你这家伙真走运。”

“去哪儿？”

“加拿大。”她回答说。

她让自己也吃了一惊。她拿了一叠火车时刻表和旅行指

南拟定了一个两周的度假计划。她这次旅行要去几个地方，因而路线安排有些迂回重复：她打算先去尼亚加拉瀑布，再去安大略省的卡兰德，去看那五胞胎姐妹，接着是多伦多，代她父亲去看看一座新建的银行大厦，最后一站是渥太华，拜访巴克叔叔，自打儿提时代以后她就没再见过他。她的行程安排很一般，甚至像个游客的行程，可她对此却很惊讶，似乎她这次小小的冒险旅行是一次神秘的行动，也许真是的，因为她以前还从未单独出过远门呢。再说，除了上次度蜜月期间在蒙特利尔待了几小时等着上船，她还从未回过加拿大——这个她在那儿出生并度过童年时代的国家。“我感到自己似乎已在回家的路上，”她在旅行日记中写道，但随即又将这一颇带感情色彩的话删去，换之以“我预感到自己在加拿大将会遇到什么事情”。

时值夏季，她乘坐的火车向北驶过密歇根东部一座座鲜亮明媚的小镇。镇与镇之间则是栽满果树的山丘和一片片园林。她心想，在那些山丘背后，就在那些树林和云层的后面便是加拿大自治领了。自治领；她神情庄重地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个词，将它在自己的舌头上滚来滚去：自——治——领。

但愿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愿如此。

在她的心目中，那是个凉爽、清静的地方；有国王、王后，还有身穿红色制服的皇家骑警，人们喝茶，相互间说话彬彬有礼。她心目中这些美好的形象与她对温尼伯那所乱哄哄的校园和西姆科街上的马粪这些真实的记忆相去甚远，但她全然不管。在这个六月的一天，当火车终于驶过密歇根边界，进入加拿大时，她似乎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能治人疾病、抚人创伤的王国。

在这儿，谁也不了解她的情况；谁也不知她的生活经历。在这儿，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人，身穿亚麻布裙服和一件外套，站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围栏旁，脸颊上沾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她试图大口吞下这自然奇观的轰鸣和雄伟，与此同时，她又敏锐地感到一种深切的痛苦。为什么这令人心荡神移的美景会使她油然而生苦涩？问得好。那是因为这景象还不够美，也不及她想象的那样大。再者，瀑布脚下的那些散乱的岩石也显得很不整洁。总体来说，这个瀑布似乎缺了点什么。不管怎样，她并没有像那本旅行指南所保证的那样，会令人“心神激荡”。可还没过一会儿，她又转悲为喜，因为她发现一个男人站在她身旁。他靠得很近，她能感到他的衣服擦着她裸露的胳膊。“哎呀，”他操着纽约口音轻快地说道。“看着这一大片瀑布，口会渴，对吧？”

她怀着极大的喜悦顺着他肩膀和上部衣袖的侧边望去。只见那儿云雾缭绕，蓝莹莹的天空如一方洁净的手帕。她真想靠在这个男人的胸膛上，假着他呼喊出自己心中的欢愉——竟偶然遇到对自己如此亲热的男人。然而，她抑制住了自己一时的冲动，只是为他轻松愉快的心情所感染。她心想，如果你让这个世界高兴，它就会突然变得欢快起来。这次巧遇恰似一个生灵，它的欢乐，它那隐秘的模样和笑容以及他们两人共同眺望的情景，较之那次蜜月悲剧里的桩桩件件给她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更加不可磨灭。她这次来尼亚加拉观景，竟有话语相伴，有清新的和风拂面，有失望与欢愉交织的情感，还有那男人工作服的衣袖随意拂摩她的肌肤，真令她怦然心动。

两天后,她到达安大略省的卡兰德,在烈日下与几百个游人一起排队等候。总算快到观赏区了,这时,人们按指令保持安静,不得惊扰正在一个与游人隔离的花园里玩耍的五胞胎小姐妹。她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在绿茵茵的草地映衬下那一件件小白衣服和一顶顶太阳帽,至少那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在哭。她后面的游人推搡着她,使她不得不向前走去。她感到自己成了人看人这个荒唐群体中的一员,因而她思维的一部分正在考虑要与这群人保持距离。他们个个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女人们穿着夏天的棉布衬衣,外面套了件羊毛背心,男人们穿着整洁的亚麻布夹克衫,执意要让自己开心一回。这番情景既有点滑稽可笑,又显得野蛮可鄙。然而,她为什么要如此大惊小怪呢?她来这儿观看这五胞胎姐妹之前就早已知道自己最终会愤然离开,而在她离开时自然是愤愤不平。

到了多伦多,在一间庄重得像教堂的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她递交了一卷父亲公司制定的蓝图,受到银行总裁的接见:“你这小鬼丫头打那么老远来,真有你的。”可也受到副总裁不怀好意的邀请:“在这儿,在这个美妙的夏日午后,就我们两个孤独的人儿。”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她对他说,“是四点钟的火车。”

“你不是刚到嘛。”

“我还得去渥太华,”她说道,“去看一个老朋友。”

“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她狠狠地盯着他,真想一巴掌打在他那张傻乎乎的、油光闪亮的中年人的脸上,将他的笑容打掉。可与此同时,她又希望这场谈话继续下去,看它究竟能将她带到哪里。“是个男的,”她大胆地说道。

“我知道，我知道。”

“您怎么知道？”这么谈下去太无耻，太可怕了。

“你的脸蛋，你的香水味，还有你说‘朋友’这个词的口气。对这种事我的鼻子可是挺灵的哟。”

“什么？哪种事？”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噢，不，我不懂，”她说，说着转过身去。

“我想你懂的。”

巴克·弗莱特当然去了火车站接黛西。实际上，他专门为此事将自己的哈德逊车送去清洗、打蜡，然后慢慢开往火车站，似乎车子会在他脚下爆炸，又好像这车押他前去接受《圣经》中的某种惩罚一般。

虽然从运河那边吹来的一丝令人神清目爽的微风钻进了汽车窗玻璃，可这个夜晚仍然很热。照以前的惯例，他是讨厌开车的，但正如他后来对黛西所说，他还是慢慢学着喜欢上了那种握着光滑方向盘的感觉，他还喜欢这辆宽大、毫无杂声的车子在夏日的黄昏中行驶的感觉——那宛若紫罗兰色调的天空上方覆盖着一层深紫色的云层。这番景象与他儿时看到的天空、与马尼托巴那种给人以粗糙、唐突之感的夜光真不可同日而语。

想到黛西，他该如何向她问候？他的勇气时而升起，时而降落，像是一个回声，随着他记忆的收缩、释放而时高时低。他还清楚地记得婴儿时的她，一连几个月睡在那只垫了棉絮的老式梳妆台的抽屉里；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一临时性的安排——孩子睡抽屉，一直是家里的一个苦涩的笑话，谈起来颇令

人伤感。打那以后,他的记忆里出现了一道缺口,平淡无奇,毫无滋味,因为黛西突然间十一岁了,躺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正从重病中(麻疹? 什么病呢?)恢复过来,她向上看着他,那双眼睛似乎已不再是孩子的眼睛了。另一方面,由于他对记忆缺失带来的损害十分清楚,因而他还是能很容易将当时的整个情景回忆起来:黛西那年轻、或许赤裸的身体躺在床单下面。虽然他还没有十分把握认为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但他无法从头脑中抹去这一记忆。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时这一情景——绝无淫荡之心,只是希望他自己记错了。他已五十三岁,自打他最后一次见到那孩子已过去了十九年。不,她不是个孩子了,而是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一个寡妇。

“亲爱的黛西,”不到一个月之前,他曾写信给她,“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没想到你打算到渥太华来,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还在信里写了些什么?

他不记得了,因为他不是那种用复写纸写私人信件的男人——对此做法他引以为羞,从不采用——不过他很有可能七拼八凑地写了些过去对她常说的老一套的礼节性空话。诸如殷勤地表示自己的情感、询问她的健康和日常活动、乏味的自我近况小结、渥太华的天气(不是热得要命就是冷得要死)、对官僚作风的愤懑,有时也对自然、人生、进步、二十世纪等发表一些高论;而近几年来,他在信中越来越多地以叔叔的身份给她提些言不由衷的劝谏。这些劝谏来自他——,她的长者,支持者,这个每月去蒙特利尔发泄一次情欲的男人,这个忙完了一天的文件、会议,回到家中不得不借酒度日,以平息心头对行政事务方面小怨小恨的男人,这个五十三岁、有时还在夜

晚抱住枕头痛哭的男人,这个在自己和女人之间放置了一道对女人深表敬畏的软垫,佯装崇拜她们,实则乞求她们保护的男入,这个殚思竭虑给她——黛西·古德威尔写信的男人。然而黛西,这个世上唯一使他牵挂的女人却与他并无血缘关系,她之所以进入他的生活是因为一个离奇的偶然事件(她母亲的死以及他母亲收养了她)。她的存在给他以慰藉,然而她却又从他的视线边上消失了。

除了黛西之外,他再无别人可写信。他只是每年圣诞节给两个弟弟写封信。埃德蒙顿的西蒙几乎不回信,安德鲁倒是每年都回信,可总是向他要钱。至于巴克·弗莱特的父亲马格纳斯,这个人已从地壳表面的一个洞口里掉了进去。如果这倒霉的老头儿还有幸活着的话,他准有七十多岁了;不过,他离开加拿大回奥克尼群岛已很多年,从未有谁收到过他的只言片语,谁也没听说过他一丁点儿消息,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即便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也不会有谁去关心马格纳斯·弗莱特的下落和他的精神状态,这个嘟嘟囔囔的老头子现在是死是活没人问津。

人们提起马格纳斯·弗莱特时,总是说他倒了一辈子霉。恶运始终追着他,直至他结婚、与儿子相处,甚至他后来上了路易莎号海轮,就是一九二七年夏天将他从蒙特利尔载往利物浦的那艘轮船,恶运也没放过他。

大家都知道,初夏这段时间,大西洋还是平和宁静的(当然也有例外),但马格纳斯·弗莱特在越洋过海的八天时间里,却饱受肆虐的海上风暴之害。老头子吃不下也睡不着,一有机会便往甲板上跑,对着一只搪瓷盆呕吐。在船上的那些日日夜夜都被搅和进了这无尽的痛苦之中。如果有人问他当时

心中可有所愿,他会直言不讳地说,他想死。一天早晨,当他趴在栏杆上呕吐时,他想起了廷多尔的采石场:阳光照射着斑驳的岩石表面,使它们变热,一整天的活在等待着他们。这时,他意识到自己离开那采石场真是太傻了。他一口吐出了这段回忆,将它彻底抹去。他吐出了他的痛苦,他的失望,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不忠的妻子,他将自己的屈辱一古脑儿地吐了出来;因此,当路易莎号海轮最终抵达利物浦时,他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恰如男孩子那般轻松。他匆匆走过散发着臭气的捕鱼码头,好好吃了一顿炖牛肉,在干净的被褥里美美地睡了一夜好觉,醒来后觉得自己多少年来第一次这么充满了活力,这么渴望生活。

他在火车站将行李托运至瑟苏,自己只留了一些换身衣服,少许零碎物品,还有那本《简·爱》;他还在利物浦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里买了一双结实的靴子和一只酒精炉,因为他已决定徒步穿越英格兰北部地区及苏格兰的荒原。他起初觉得自己这次徒步旅行似乎是一种反抗,接着觉得它难以抗拒,后来又似乎感到它成了一种如空气般简单而自然的行动。当然话又说回来,他一想到这即将开始的旅行,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天公倒挺作美,白日夜晚漫长而宜人,地面干燥,很适合行路。他凭借太阳判断自己的方位,仅此而已。当他走在北去的乡村小路上时,家,这个字眼在他耳边嚤嚤作响,那声音之甜美,任何偶尔传来的鸟叫声都无法比拟,恰似他饱食了一顿面包加奶油的美餐那样令他舒心。在一条小沟里,他偶然发现了一根光滑的木棍,握在手里正合适。于是,他攥着这根棍子有节奏地敲击着满是灰尘的地面。他的络腮胡子长长

了,细细的,白白的,软软的。

英格兰的山峦显得那样完美,那样彬彬有礼;他刚走过卡莱尔,这些山峦便变得陡峭起来。不过,他只要感到双腿乏力,便躺在树下休息一小时,打开那本小说读给自己听,以消除肌肉酸疼和血泡带来的痛苦。这真是一座岛吗?他自言自语道。他的目光投向天空,越过围着篱笆、牛羊成群的牧草地。这片宽阔、多石的绿色草地,或明或暗,色泽浓郁。他想到这片土地所经历的无数个不明年月的冬季,那皑皑的白雪,和那接踵而至、慢慢暖和起来的春季,心里便充满了喜悦。后来,他走过因弗内斯,到了寸草不生的荒原。这时,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在上帝那宽大、粗糙不平的额头上跋涉。过了荒原,地势逐渐平坦,给人以飘然而下的感觉。他兴高采烈,心情随之轻松平静下来。

一路上的乡村旅馆以其豪爽和平等待人的店风欢迎他,虽然他不是个喝酒的人,但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他还是滋滋有味地喝起了啤酒。他将鼻子凑到酒杯上,边闻边喝。在这些大众旅店里,人们无拘无束地自由交谈。“加拿大那边是个什么样子?”那些脸色红润、面目粗犷的农民们会这么问。有一次在杰德堡镇,一家旅店的老板娘跟他睡了几个小时。她的肌肤已变得粗糙,布满褶子,但散发出肥皂的清香。有时,好奇的孩子们直跟着他走到镇外,嘴里咿里哇啦地嚷个不停。一个咳得很厉害的年轻女人跟着他走了一两天,东拉西扯地跟他谈耶稣,他倒也挺受感动,因此分手前还给了她几先令。

他总算到了瑟苏。这是个荒凉的地方,天空低低地压在地平线上。他在火车站一间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自己事先托运来的行李,但他临时决定不去办理领取手续——那里面又

有什么呢，不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不要也无所谓，他这一路上已足以证明不需要它们。他搭乘圣欧拉号轮船去了斯特罗姆尼斯。这只是一段很短的海上旅行，且海水柔顺、平静。他终于回到了家乡。他往肺里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此时此刻，他想到了生活，想到了自己终于会过上甜美的日子。他打算在东比金村（他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一带空旷的田野附近给自己找一所简朴的房子，装个烧煤的锅灶，一张暖和和的床，如有可能，再设法装上电灯，把这个家搞得舒舒服服的。对了，再找个隐蔽处，把积攒的钱存放好。在这个安乐窝里，他会过上国王般的日子，还要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呢。

这么多年以来，巴克·弗莱特每隔一个月给黛西·古德威尔写一封信。

算起来，他每年写六封信，已写了二十二年，总共大约是一百三十二封。他对自己，有时也对别人说，他对这孩子负有一种责任。他没有使用“义务”这个词；如果他早一代出生，他也许会用的。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尽责尽心的人。此外，他这个人生性冷静，善于思考，亦不乏自我批评精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性中那无法自控的一面是什么——那是一种逃避不知之事的欲望，即不折不扣地游离其外，以求稳妥。他对古代隐士何以能在洞穴中生活，僧侣又如何能在陋室里度日十分清楚，并为自己了解这一切而颇感自豪。即便是在蒙特利尔，躺在女人的怀抱里，向她们体内宣泄自己的情欲，即便此时，他所渴望的仍是一张简陋的小床和那苦涩的孤独生活。他不得不与之抗争的是野蛮与混乱；而当他暂停抗争时，面对这个变得粗俗的世界，他感到头昏眼花，悲观失望。

他有时(但并不总是)参加了渥太华的晚宴后,呆呆地躺在床上,嘴里发干,心里忖道:在这种场合,自己像个有了一把年纪的老演员,强作欢颜,违心地说些高兴的话,真是荒唐之极;而事后,自己却以一杯温和的威士忌回击这个世界,试图逃避它。

他心里很清楚,他为人处事过于认真,过于诚心,因而反不为别人信任,而他对拉郎配式的夫妇间和不体面的凡夫俗子间那一出滑稽戏则充耳不闻。为了宽慰自己,他便想象起自己头脑的不同层面,觉得其间存在着空间,即在情欲与工作这两股力量之间存在着空白虚无之处。他与这些固定的虚无之处有何关系?对此,别人清楚,而他却一无所知。

他的父亲,即那个严厉、冷酷、粗俗的男人曾坚持要他几个儿子每晚擦靴子。对这一儿时的规矩,他逐渐明白并产生了感激之情。这个规矩使他能像男孩子那样生活,那样有节奏,并使大量令人迷惘之事变得井然有序。后来,他还找到了其他方法。

他已不记得什么时候学会说母亲花园里那些花草的名字,但他仍然记得那些名词术语曾使他多么舒心的快意。早些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在心理上是个永不知足的人,需要某种特殊的表示法,如表示植物、动物、星宿等的名称。此后不久,除了他母亲种植的花卉名称之外,他还学会了田野、树林间各种植物的名称,无论是普通名词还是拉丁文名词,他都很快便熟记于心。每一回,当他能将一种植物的标本与《斯波顿植物学札记》一书中的插图对上号,他心中便顿觉一股力量在涌动。这个充满了各种不同植物的绿色世界赋予了他一种怪异的忍耐性,因而使他得以保持沉着冷静。还在十二三岁时他便发

现,整个自然界分门别类,别人,而不是他自己,曾经预测到这种自然分类的必要;这一发现使他如被一道幸福之光击中,陶然忘情。他特别喜爱“口袋中的口袋”——现已发现的大的植物门类分解成了最小的分支,即在进化途中那幽深的角落里勇敢、顽强地活下去的最小的、最褊狭的生命形式。这个微型世界、粘菌、水藻成了他谈话的主题,诸如植物的遗传及其奇异、严格的美。他喜欢说自己的杓兰花标本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标本集之一,他最喜欢其中最稀有的那个品种,而对这一品种那特殊的花朵,他又将其中最小的那几片花瓣视为珍宝,常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它们,熟记那个最小的细胞的形状,赞叹其位置和功能,并认为其拉丁文名称的尊贵完全名副其实。

植物世界完整的组织体系宛如墙上的一幅图表,悬挂在他的意识之中。而其他人的头脑,他也只能想象为充满了类似的结构系统,诸如哲学、历史、对数表、课文,以及各种信念或是各种预先设想好的愿望,正如他自己头脑中那些生命物的纲、目、科、种及亚种一样。黛西的情况也悄悄溜进了他这个系统里。(这个系统并不如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工整、那样合乎逻辑。)她远远地坐在某一分枝的尽头,笑盈盈地招呼他。有时他闭上双眼,真希望她离开,可她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俨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回想往昔那股情欲,它那敏感的卷须挠得他心慌意乱。他无法抹去她的影子,就像无法去除兰花或蓼衣草的一个亚种一样。他隔着一定距离保持与她的联系,定期写信给她,等待她的回音。这已成了他生活中固定的节奏,它既给予他支撑,又令他心乱,成了他证实自己最具人性的情感的方式。

他给黛西写信一事还带有一种仪式的色彩。他选择每一个偶数月——二月、四月、六月等,且在该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才拿起他那支红色的沃特曼钢笔。一个旁观者也许会注意到,他的背部和肩膀弯曲得像母体中的胎儿。那间有落地长窗的书房里悄无声息,他的胳膊肘旁放了一杯淡淡的咖啡,但很快冷却了。他的头脑里充满了令他沮丧的恶梦和隐秘而难堪的情景,然而此刻,他却将这一切抛于脑后,因为他是个男人,他在写信,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将日期清清爽爽地写在信纸右边的角落里,还抿起双唇,在日期后的括弧里注以“公元”两字,从不例外,开个叔叔辈的玩笑。

接着,他吸了一口气,写道:我的亲爱的黛西。“我的”这个字让他挺为难,但若这次删去它,反倒引人注目。然后,他开始写一段段详细而枯燥的话。他的详细和枯燥倒是成功地堵住了他内心那份渴望。他写完了一页,又开始写另一页。字斟句酌,艰难地写着。虽说挺费工夫,但他将此看作是一种自我克制的表现,因而心里觉得挺踏实,潜伏在诸如他这支沃特曼笔及瓷碟里的孤独之情决不可流露,但他那张贴近信纸的脸却流露出非分之念。他渴望将这信纸亲满自己的唇印,并以此结尾:爱你的巴克,你的永远的,只属于你的。

然而他真正写下的却是句淡而无味的客套话:你的诚挚的,巴克·弗莱特。不过,他从未以巴克叔叔结尾,他还没迁到这种地步,尽管黛西在写给他的信中的确是称呼他巴克叔叔的。

黛西的回信来得很快,往往下班邮件便到了。看来她也具有他那种责任感,和他一样尽职尽责。

当他剪开那四四方方的蓝色信封时,他那颗心在胸膛里

怦怦直跳。她用的信纸也是蓝色的，四周印有平淡而程式化的花卉图案。对于这种信纸上的花，任何植物学教本都不屑去鉴别一番。亲爱的巴克叔叔。她叽叽喳喳地说啊，说啊，一页接一页，真是个姑娘，琐琐碎碎。她那些语句至少有一半像天书，意思很不完整，设计了许多令人心惊肉跳的破折号和省略号，着实让他颤抖、激动、恼怒。她的句子结构不清不楚，而她的措辞也很不规则。即便是在她那场蜜月悲剧发生之后，她还(勇敢地?)写道，她的情绪“十分低落”，但希望不久便能恢复正常。每次看完她的信，他总是被她那孩子般的平平淡淡，言之无物而弄得心灰意冷。他这种失望的情绪常常伴随他多日，可几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一过，等他再次提起笔给她写信时，他的责任心又恢复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误解，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似乎是二十世纪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以说，黛西·古德威尔保存了巴克·弗莱特的每一封信；她现在仍然保存着它们，尽管她很难跟您说清楚这些信放在了什么地方。也许在哪个抽屉里，要不就在哪个纸盒子里。

她给他的信却没被保存下来。

她也没有一张照片是在这一时期照的。

尽管如此，您还是可以想象，在她渥太华之行接近终点时，她会是个什么模样。当然，她毕竟心甘情愿地上演自己这出戏，因而也可能好好美化一下自己的形象；比如说，她已经看到自己摘下了帽子——女人出外旅行必须戴帽，这一点她非常清楚——下一步您知道，她会抖开她那一头红褐色头发，其间会冒出一些金黄色。夕阳的余辉透过车窗照射进来，照在她亚麻布衣裙的皱褶里(去除偏见，按印第安纳布卢明顿的

标准很漂亮)。她将紧握的双手放在大腿上,就像《红衣女郎》中的巴巴拉·斯坦威克那样,显示出活泼女性的坚毅。她还希望自己下颔的线条如嘉宝的下颔,也显示出执着的神情。

她将对他说些什么?第一句话又该怎么说?

一个情景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她抓住他的手,庄重地握着,同时让自己略显冷淡,不致让他感到惊慌失措。她真诚地、轻声细语地讲起自己的旅行。不,她并不太累,旅途其实挺愉快的。一路上景色如画,美不胜收,一英里一英里飞速前进。她急于要表示自己良好的愿望,可还是耐心等待坦诚的到来。

万一他们无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办? 嗯,那她就得找点什么来说,这一点她倒要好好考虑一下。

她又一次将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没戴手套,也没戴戒指。不认识她的人或许会想,她是在默默地祈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确是在祈祷,因为她那专注的神情挺虔诚的。她投奔巴克·弗莱特,诚如投奔一个庇护者,事情就是这样。她不可能再回威尼格希尔,去做凯勒·古德威尔的女儿和玛丽亚的继女,不会再回那所房子,再回布卢明顿,在她这个年龄办不到,决不可能。这一年里,她差不多快变成一个脾气古怪的女人,或者是那种连茶碟都不愿放在茶杯下的女人,这真是太危险了。她父亲那令人厌倦的比喻——自由的石头和他那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说教,又在她耳边响起。他说道,正如一块印第安纳石灰石,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劈开,全看他自己如何选择了。

然而,在她人生的这一时刻,她却没有任何选择;她,一个即将步入中年的女人——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一个被随意

取了名字的女人,一个意外地被放错了地方的女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她在自己人生的这段旅程上进退维谷,被牢牢地钉住了。

这时,一个想法钻进了她的脑袋:现在她不要再问自己可能做些什么,而是生活中还剩下哪些可能性。此刻,她显然是在做一次单程旅行,虽然她的回程车票仍稳稳当当地放在她那只皮手提包的口袋里。奇怪的是,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因为她知道,爱情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避伤害;再者,她对路途上的障碍已习以为常,只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目光或将自己的忧虑统统赶到黑暗的角落里,便可战胜任何障碍。

她闭了一会儿眼睛——不是嘉宝的眼睛,不是,绝无那种勇敢和冷漠——想着自己这最后几天的旅行。她的所见所为,桩桩件件乱哄哄地涌现在脑海里。她与各种各样素不相识的人的谈话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耳边响起,挺让她兴奋,但也累得她够呛——在尼亚加拉瀑布遇到的那个男人,那家伙真太过分了,不是吗?那帮人都是这样。

从过分拥有到丧失殆尽仅一步之遥。她不能走回头路,她要制定新的计划。这些计划虽然还杂乱无章,但已在她头脑里酝酿,它们已伸出触须,安排场景,拟定整套谈话内容。

见到您真太高兴了,巴克叔叔。

她的双唇默默地在车窗玻璃上移动。一条纤细的手臂伸了出来,与空气握手。太让人开心了。过了这么多年!

或许现在该告诉您,黛西·古德威尔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怎样将事情理出个头绪,即怎样将真实情况说出来。

她有一个金色的童年,她会很开心地这么对您说。她认

了一个慈爱的“姨妈”克莱恩廷,还有一个富有爱心的“叔叔”巴克。温暖祥和,安然无虑;河边的野餐,满园的鲜花。十一岁那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父亲,一个出类拔萃(人人都这么说)、自学成才的人,他给了她充裕的物质生活,向她倾注了深深的父爱。

是啊,童年时代是每个人都愿意记住的,也许除了在小说中以外,它不会留下任何陈旧迂腐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对黛西所说的事情感到怀疑,或深感怀疑。

她谈起自己生活中的那些细节并不总是可信的;许多她不得不陈述的事情其实只是一种猜测、夸张,根本不可能发生。(您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谁骨子里像她婆婆亚瑟·霍德那样无情,那样冷酷。)黛西·古德威尔对问题的看法有点不对头。再者,她从未来的角度去看过去的事情,因而严重歪曲了事实真相。她大幅度地跳跃时间,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事件。(比如说,她在图德霍尔中学及朗女子学院所接受的昂贵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她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构成了一系列的定义——她对自己是这么说的。她选择儿童的语言写信给巴克叔叔,故意表现出天真、痴心妄想、少女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安然无虑的假象。她有时隔着一段距离看待事物,有时则离事物很近。她的确坚持要在灿烂的阳光下表现自己,而很少让我们瞥上一眼我们都要经历的那种暗淡的预先警示。哎呀,真是的,她还深受孤独女人那种浪漫的幻想之苦,因而只能承受欢乐的结局。

她的叙述是凭空写成的,是用幻想那无形的墨水写成的。尽管这样,她的叙写却仍是独一无二的。

自从读了他那本伯特兰·罗素^①的书以后,巴克·弗莱特早就摒弃了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任。但是,作为国王陛下政府中的一名高级公务员(农业研究所所长),他又不得不遵循某种礼仪道德。金屋藏娇?别人会怎么看?

一个侄女,他会这么解释,可黛西并不是他的亲侄女。她是她的监护人?不是,他的监护人身份从未得以正式确立。他该怎么办?该怎样解释她的存在?

他想到他的管家唐纳森太太,她每天来清理屋子,并给他做一顿冷食晚餐。也许能说服她在黛西来访期间晚上不回家睡觉。他小心谨慎地把问题摆出来,征询她的意见,可她一口回绝了。毕竟她有她的家庭,她得回去,他要求的事办不到。

他叹了口气,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可他又开始担心起来,他和黛西的生活甚至还没开始便冒出来这么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要处理。

*

“再过一小时我就到那儿了,”黛西在她的旅行日记中写道,并在“那儿”两个字下划了三道横线。

车厢里热得让人受不了,不过她还是在列车员的帮助下打开了一扇车窗。这么一来,她的头发被吹得狂飞乱舞,加之渐暗的阳光照射,使她看起来头上像戴了一圈日晕,或是一顶用赭色的毛皮做成的帽子。

她将日记本藏到安全处,想让她那颗怦然跳动的心平静下来,至少她是这么想的;她再重新戴上手套。她坐直了身

^①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子，僵硬地挺着腰，显出一种能净化人心灵的宁静，俨然像一头狐色毛发的巴巴拉·斯坦威克。

请求原谅这一念头时常使她不知所措，这次也是一样。

此刻，夜幕渐渐降临，安大略上空布满了菱纹状的雾霭。她觉得这些细小的粒子与她毫不相干，一闪而过的座座村庄也显得那样陌生，它们似乎转过身背对着她，摆出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车厢里，在她对面那排座位的末尾处，四个男人正吵吵嚷嚷地玩着一种纸牌游戏——很有可能是在玩拉米纸牌戏——这些人口吐粗言，互相取悦，完全沉迷在玩闹之中。若是有人把她从车厢里绑架走，恐怕他们都不会朝她这边看上一眼。她心里明白，等火车一到渥太华，他们便都会匆匆下车，回到他们真实生活的小圈子里去，而她也将会投身于无常的命运随意为她安排的那个地方；她会毫无怨言，毫不怀疑地接受“它”，因为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她柔弱无力，没依没靠，只是个软绵绵的血肉之躯——一个女人。也许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是的，当然如此。

她想到自己应该把刚才头脑中的那一闪念记在日记里，否则她肯定会忘了它，因为她一贯是个学了忘，忘了又不得不再学的人，但若记录，她就得脱下手套，从手提包里翻出钢笔和日记本，而这又远不是她所能做到的。因此，她逼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心里怦怦地跳着。此刻，火车已轰隆隆地驶进了温柔、朦胧的渥太华郊区，加拿大自治领（自——治——领）的首都。

他在她到达前十分钟便已在车站等候了。他预先已考虑

到这一点,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定下心来,理一理思绪,也要调整一下举止仪态。“好哇,好哇,”他打算这么对她说,想以自己的诚恳和热心冲淡此刻见面的戏剧性,“看来这一切你就这么一气呵成了,是吧?”

或者谈点这酷热的天气,或者?——他不知还能谈什么,似乎一切都变得很危险,甚至他的两条长腿也站不稳了。

然而,他根本没想过在哪条漆得亮亮的长凳上坐一坐,没有。他挺着身子,肩膀、背部挺得直直的,双手反剪,在火车站大厅那大理石的地上款款走着。他收住脚步,抬眼凝视着头顶上方的圆屋顶,这建筑真美,是的,太美了。他仔细观看着它,端详着它装饰过的中楣,刻有凹槽和精美三角饰的花岗岩柱子。他在心里记下这些石刻装饰,眼睛紧紧盯住它们,似乎他再也没有机会看清楚这些石刻一样。

他的生活很快就要发生变化。爱情,这个能骤然间溶化艺术和本性,溶化语言本身的爱情即将使他心醉神迷。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抬眼看了看车站的时钟。不错,火车按时到达了,一分不差,准点无误。他对此深感满意,又忐忑不安。

那就是她,向他走来。

据说有些男人对脚踝很有审美眼光。巴克·弗莱特并不在其中,他根本什么眼光也没有,而对他应该得到什么,或他自己想要什么,他也一概不知。这个时刻,这次会面,早几年便已安排好了。

她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将戴着手套的手伸了出来。他似乎一时觉得自己已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它,与她握手——这是社交姿势,嘴里喃喃道:真高兴见到你,车里挤吗?是不是

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累坏了吧？

然而，他却将她拥了过来。他们并没有真的拥抱，只是身体凑到一块，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没有拥抱。他伸出双手轻轻地触摸着她的双肩，接着滑向她的胳膊上部（她的肘部以下裸露着，还有点汗津津的），然后又向上摸到她的脸蛋，用指尖碰触它，捧着它。他已将自己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的热血在燃烧。

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她的双膝开始发抖，而突然走进灯火通明的火车站又使她心烦意乱，她根本想不出什么话来说。

“黛西？”他在她那梳理整齐的发冠前轻声说道。他用的是问话的口气，几乎是一声哽咽。至于他还说了些什么，他已忘了。

*

在这个年龄的他已经不起正规婚礼的折磨、忙乱和紧张不安，因而他俩很快便在一个法官的办公室里悄悄地结了婚。那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他们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几分钟打了电报给布卢明顿的凯勒·古德威尔和玛丽亚·古德威尔，电报是用过去时措辞的：“我们刚刚结了婚，信随后寄来。”

黛西和巴克·弗莱特对他们宣布的消息都感到惴惴不安，多少怀着难堪的心理等待着回音。

性爱的王国是通向我们本性中尚未开化那一半的最近的人口。巴克·弗莱特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人的自我中，有一个部分是无法归类的，他必须学会接受这一点，并敞开胸怀，迎

接激情的到来,而不让羞耻感从任何窗户悄悄溜进来。为什么一切都被好与坏的熨斗熨倒,变得单调、呆板?为什么?

他向黛西坦白道,他过去曾为女人付过钱,以获取她们的关心。她轻轻将手指放在他的头发上,也向他袒露了真情:她还没被人碰过(她自己的话),她与哈罗德·亚·霍德那个短暂的婚姻有点不对劲儿,她说不清毛病出在哪儿,但她觉得自己可能要对这事负责。他不想听她这些话,在他生活中的这一刻,他所需要的是黛西对他的激情。

这些坦白,这种有关个人面子的事情,从近处观察它们,几乎总是那么滑稽可笑——若隔着一段距离观察它们,也同样是滑稽可笑的。这都是因为那不必要的羞辱和自我标榜的坦诚,事后呢,悔恨。这些东西有必要吗?当然没有。

150

有件事挺让巴克·弗莱特捉摸不透:他无法理解黛西丧夫后的那九年是如何过来的(他如此迷惑不解,与黛西无法想象她父亲是怎样在斯通沃尔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差不多——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他能想象黛西在布卢明顿市各处穿梭奔走:她身穿考究的衣服,脚蹬漂亮的鞋子,戴着好看的手套,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美国姑娘,到处游泳、散步、跳舞、打高尔夫球。可她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想你一定钻研过什么学问,听过什么讲座。”

她摇了摇头。

“读过什么书吗?”

她又摇摇头。

“那你父亲的家肯定是要料理的。”

“嗯”——她顿了顿——“我们以前有科拉梅·米尔汤,你

瞧，那么多年呢；后来就是玛丽亚。”

“那么，你的时间总会用来做些事，”他提醒她。“有没有做些慈善工作？红十字会？”

她显出一副茫然的神色，可随即又高兴起来。“花园，”她说道，“我料理过花园。”

“花园？”

“对。”

“噢，”他说道，“噢。”一星期后，他提出购买位于达乌湖畔德拉夫威街上的一座大宅子。

这所房子完全是以砖、石砌成，坐落在一大块足以盖三幢房子的地上，还带有一个已荒芜了的花园。

人们对弗莱特与古德威尔 联姻的议论

自治领总理（其本人为一单身汉）获悉巴克·弗莱特与黛西·古德威尔结婚时说：“婚姻是最崇高的天命，此后便是做父母亲，再后便是管理国家。”

农业部部长在看了报纸上刊登的结婚告示后对其妻叫道：“我的天，弗莱特结婚了，我一直以为这家伙古怪得像条熏弯了的鲑鱼。”

唐纳森太太——巴克·弗莱特的管家说，“逃出煎锅，落进火里。”——挺令人费解的。

埃德蒙顿市的西蒙·弗莱特寄来了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票子,外加一个字:“好。”萨斯克彻温省克莱马科斯市的安德鲁·弗莱特写道:“但愿耶稣的圣光照耀你们两人。”

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迪克·格林太太在写给黛西的一封信简短的贺信中说:“我的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一句成语:‘一忍再忍’。”

弗雷迪·霍伊特(对自己)说:“她失去了理智,但并未失去爱情。我本以为她会更理智些。少妻,老夫——导致灾难的配方,如果你相信民间故事的箴言智慧的话。”

亚瑟·霍德太太说:“恶心,乱伦,淫荡。毫无疑问,他有钱。”

凯勒·古德威尔夫妇在回电中说:“你们踏上了幸福生活的高速公路,可喜可贺,谨致我们良好的祝愿。”

凯勒·古德威尔对自己说道:“他差不多跟我一般年纪,他会经常不在家,一个眼神,或一个字便足以使激情泯灭。我可怜的黛西。”

“小毛头,小毛头,”玛丽亚喊道,用双臂做着摇篮的姿势。大家第一次听懂了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黛西·古德威尔没有写下对自己婚姻的看法,因为她已不

再记日记。最近她的旅行日记遗失了——此后再也没有找到——这使她暗地里好生悲伤了一番。想到这本日记不知会落到谁的手中，她便感到不寒而栗；日记里所有那些自我放纵的乱涂乱画应该属于少女时代——一个她不再拥有的时代。

第 五 章

为 人 之 母

1947 年

晚餐时间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把加拿大看作是一块冰和雪的土地。即便当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时，他们还是要抱着这一印象不放。

其实，七月的渥太华热得就像地狱一般。所以，今晚弗莱特一家便把他们那张特大餐桌搬到了封闭式的门廊上。晚餐将有长方形大块牛肉冻、西红柿片和土豆色拉，还有小玻璃碗装的洒了糖的木莓作为甜点。

您得知道那些木莓可是弗莱特自家园子里长的，是他家的孩子们一小时前刚摘来的。这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七岁的沃伦把他穿的那件棉质衬衣前胸弄得脏兮兮的，全是木莓浆的痕迹，他母亲刚叫他上楼去换件干净衣服。“快点，”他对他说，“你父亲马上就要回来了。”

那两个女孩——九岁的艾丽斯和五岁的琼刚才受了母亲的鼓励，拿了只裂了缝的旧奶油罐子摘来一小束花放到餐桌上。结果呢，她们采来的花色品种看起来很不和谐，长的、短的各色花卉混在一块儿，而且有些花已不那么新鲜了。“好看极了，”弗莱特太太说道，可她没一会儿又慌了手脚，因为那一大块牛肉冻粘住了底盘，根本不可能翻个身，干净利落地转放到她预备好的大玻璃托盘里去。“见鬼，”她压低嗓门骂了一

声,原本怕孩子们听到,可他们当然是听到了。“见鬼,见鬼。”这个食谱是从上个月的《女士家庭杂志》上撕下来的,是一篇叫“夏日冷餐”的特写,她仔仔细细地照着上面那些复杂的说明去做,直至用多香果果条和塞入填料的齐墩果片做配头。“我干嘛当初不去买点冷火腿呢?”她纳闷地大声嚷道。

“我可爱吃火腿了,”沃伦喃喃地说道,这话不假。他特别喜欢将一块煮过的火腿片放在手里卷啊,卷啊,然后塞进嘴里,好让那又软又甜的肉卷感觉像是自己舌头和口腔的一部分。

餐桌布是一块蓝白相间、印有方块图案的棉布。母亲的座位在餐桌的一头,父亲的则在另一头;这是一个通常遵循传统习俗和惯例的家庭。在每个人的餐位上,浆果勺后面各有一只高脚杯——今晚即便孩子们也能喝冰茶,这是对他们的奖赏,因为他们一整天表现都很好。

表现好——在弗莱特这个家庭中,表现好究竟是什么含义?艾丽丝和沃伦表现不错,因为他们早晨不用叫就叠好了自己的被子,艾丽丝还帮着母亲清扫前后楼梯,其实就是那一点点地毯没铺到的木板部分。战前他们家曾雇过一个女工每周来打扫两次,这个女人名叫唐纳森太太,出了名的懒,说话又尖刻,后来自己反成了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可如今,这样的帮工——除了曼纳利先生来帮着做点园子里的活以外——没有了,一是出于爱,二也是因为手头不宽裕,至少沃伦是这么听他母亲说的。

小小的琼表现不错是因为她中午时将她的鸡蛋差不多都吃光了,然后不哭不闹,乖乖地下楼睡午觉;还有,她大部分时候都能记着说“请”、“谢谢”等。今天家里也发生了一点小小

的争吵：孩子们的母亲弗莱特太太曾训斥过艾丽丝，但只有一次。艾丽丝有时觉得母亲喜欢她，有时又肯定母亲不喜欢她。艾丽丝总想讨好比她大的人，可她又发现，当自己竭力这么做时，她又觉得自己挺没面子，也挺累的。

终于，那牛肉冻的上半部分瘫倒在大托盘里，还发出吱吱嗞嗞如吮吸或在地面滑行发出的那种声音；剩下的一半牛肉冻很快被一把刮铲铲起，“见鬼，见鬼”——而两块牛肉冻之间的隙缝则被一片皱巴巴的生菜叶子及多香果果条包了起来。接着，大托盘被轻轻地盖上一张蜡纸，并很快被放进冰箱冷冻，使牛肉冻保持坚挺，以备晚餐之用。弗莱特太太抬头瞥了一眼厨房墙上的钟，其形状像个茶壶，还带有一张微笑的嘴巴，只见已五点一刻，她吸了一口气。“该把你们的自行车推进车棚里了，”她对三个孩子说道。“你们的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她便不见了——为吃晚餐“修整”去了。沃伦总觉得很奇怪，他还没在意就不见了母亲的人影，就像一天中少了一刹那，快得像是被偷走了一样。刚才他母亲还站在那儿，穿着厨房里干活的衣服，脸上汗淋淋的，一眨眼工夫，她已换上了红白相间的紧身连衣裙，外面罩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衣，衬衣领子上的抽带绕在她的脖子上。她还要去梳头，涂口红，是深珊瑚色的口红，滑溜溜、亮光光的，像块舔过的胶糖一样。她看上去就像奥克西道尔广告上走下来的人一样，至少沃伦是这么想的——打扮得漂漂亮亮，两眼流光闪烁，双唇张开上翘，嗓音柔滑自如。有时她还戴上一对银白色的耳环，——将它们紧紧夹在耳垂上。沃伦看到她打扮成这样走下铺了地毯的楼梯，处处修整得完美无缺，心里忍不住为她感到自豪。

“修整”是她做姑娘时的用语，是她那些印第安纳州地方用语中的一个——她父亲就是这么说的。她还会说其他一些怪里怪气的话，比如说“等候”某人，她却说“伺候”；再如“睡午觉”，她会说“把身子放平一会儿”。她的嗓音略带点沙哑，比别的母亲的嗓音平和一些，但更活泼。

“今晚咱们只能吃一顿郊游野餐了，”她对丈夫说，好像要降低他的期望似的，“就那么零零碎碎的几样东西。”

有时他还真的相信她那些姑娘般的逗趣话，但有时也不信。他亲吻她的脸颊，感到她的脸挺清爽，接着又一个一个亲吻孩子们的额头。这几个天真活泼的小家伙都与他血肉相连？他那年迈的血液在他们青春的血管里流淌？而他的骨髓也与他们的骨髓相匹配？他们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散发出阳光和灰尘的气味，他们的笑容那样美妙、焕发出光彩，但也显得有些犹豫。自打早饭以后，他就一直被孩子们说话时那羞涩忸怩的样子所打动。他摸了摸自己的亚麻布领带，想解下它吃晚餐。可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几十年异常孤独的日子使他养成了在自己生活中窥探隐秘的癖好，即便现在，他还是带着挑剔的眼光观察自己：一家之长，每天下班后问候自己的家人，端详自己孩子的脸庞，察看他们身后放了晚餐餐桌的封闭式门廊。门廊折叠式的后门上一块边角窗的玻璃捕捉到一线阳光。他几乎是以一种庄园主的眼光注视着这抹阳光，他的门廊门，他的四方形金色阳光。“你洗手了吗？”他听到自己询问自己最小的女儿，她立即伸出双手，掌心向上，给他检查。他这五岁的小琼妮，此刻屏住呼吸，转动着手腕，随时准备扑哧一声喷出气来。“真干净，”他赞许地对女儿说，那口气既公开又神秘。小琼妮随即

单脚起跳，上下蹦达起来，然后突然转着圈踉踉跄跄地跳走了。女儿的样子使他想起了战前从日本进口的一种卷绕起来忽上忽下的发条玩具。

“别转了，小宝贝，”他说道。

向她飘过去的声音是他的吗？“你的头会撞上门框的。”

“不，不会的。”

当然她不会。

弗莱特家晚餐时的谈话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孩子们无需汇报他们一天的情况，不必讨论“时事问题”，也不像在托灵顿克里森特街上哪户人家，只能说法语。晚餐时的谈话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中午温度多高啊，怎么对付玫瑰花丛里的蚜虫啊，该谁收拾桌子啊等等。弗莱特太太（黛西）不在意地叹了口气，她突然觉得精疲力竭，同时也无可奈何地发现谁也没再添上一点牛肉冻，尽管剩下的足够再分一圈的。“累了吗？”她丈夫（巴克）很快问道。“天太热了，”她说，用手掌扇着自己，似乎这样会好一点。他提醒她说，明天天气会凉快一些，晚报上是这么说来着，西边会吹来凉风的。“我还是等一等，明天傍晚再去锄草，”他说道。

她向他瞥了一眼，那眼神捉摸不透，关爱？恼怒？

他突然变得比自己想象的要老得多。再过几个月他便六十五岁，得从农业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告别宴会已开始筹备，发言啊，礼物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喧闹、吹嘘——他妻子很有可能这么形容告别宴会。接下来怎么办？这个问题让他觉得恐惧。他自己的父亲六十五岁时头脑变得怪怪的，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便收拾行李、回老家奥克尼去了。他中断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当然，他以前与家人的联系也不多。

这老头儿该有八十五岁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但这太令人怀疑了。北方的寒风恐怕不会让他活到今天,他还可能死于他脑袋里的毒物,尽管有人说,发火能让人长寿。他会是个什么样子? 巴克·弗莱特忍不住想知道。他俩只差二十一岁,就那么二十一年;过去两人间隔着的似乎是一条鸿沟,可如今那鸿沟已缩小,变得微不足道。他们的遗传结构,他的和他父亲的,一定差不多,几乎完全相同——四肢修长,头发乌黑、粗糙,还有那张显得伤心的嘴巴。除了天各一方,再没什么能将他们分开来;若不是那浩瀚的大西洋,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尽可并排站在一起,与其说是父子,还不如说是弟兄,两人的血液稀薄如水,而四肢则因无所事事而变得细弱无力。

无所事事:想到这他恐慌不安;而昔日的诱惑——孤独与沉默,同样让他不寒而栗。

男人失去了工作,情况会怎样? 巴克·弗莱特想到了他的岳父凯勒·古德威尔。他岳父身体仍十分健康,但只能外出旅游,或是佯装热心于后院的活计,权且打发空虚的时日。不,他决不让自己落到那种昏聩无用的地步。几个好心的朋友建议他写自传,可是不行,因为他生活的表面已被岁月磨得滑溜溜、亮闪闪,几乎抓它不住,从何入手? 倒不如继续研究他采集的杓兰花标本,自从他增加了一个新品种后已过了很多年了。此外,他一直想写一二篇文章——总体而言学术性不很高的文章——因为渥太华《记录者》周报的编辑曾约他就渥太华——卡尔顿地区园艺方面的问题写一二篇文章,甚至还可搞一个每周专栏。这么一来,他便要恢复以前的习惯,周末带孩子们外出散步,在安静的街上一路走,一路考他们各种树和灌木的普通名称。为什么他的儿女们对这些有关自然界的简

单东西记都记不住,这真让他百思不解。

其实,他所感到不解的,是他这些孩子的脑袋里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还有一点也使他感到纳闷:孩子们和他这般年纪的父亲走在一起,别人看了是不是会让他们感到难堪。自己老得足以做他们的爷爷,虽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可一次也没参加。自己也几乎没在后院和他们玩过一次抓人游戏,很少将他们举起来在空中转圈,晚上也不在床边和他们闲聊,每日下班回来累得连草也不想锄。

弗莱特一家今天的生活将在十一点结束,当然孩子们上床睡觉的时间要早得多。他们只盖一条薄薄的床单,不过他们脚头还要放一条折成扇形的毯子,以备清晨天气较凉时好盖上。月亮就要升起,她会像一只圆圆的桃子,悬挂在他们的窗口,散发出淡淡的光辉。榆树丛的枝叶刮擦着窗帘,窸窣作响,这轻柔的声音径直钻进了他们的梦乡。这儿的空气多么温馨,正值仲夏的这个北国城市多么美好,犹如天堂一般,而弗莱特一家又是多么幸福,尽管他们年龄悬殊,思绪隐秘,而且他们情况各异,并无多少共同之处。

弗莱特夫妇躺在他们那张宽大的带有好莱坞式床头架的双人床上,他在看最新一期的《植物学杂志》,而她则在翻阅《美化家庭和花园》一书。安静,闲适。一只孤零零的蛾子在两人的床头灯间飞来飞去。半小时后,似乎被什么铃声所召唤,两人侧身,热烈拥抱,随即关上了电灯。尽管天气很热,但两人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心里充满了对对方的信任。他们会互相信任的,不是吗!

巴克·弗莱特喜欢将他们的睡眠看得比其他人更柔和,更浓郁。他们的睡眠里有一种如洗净的羊毛般纯洁的东西。弗

莱特心想,这东西存在于他俩之间,尽管颜色并不鲜明,可却显得那样急切,那样清晰,伸手可触,根本无需提及。那么,这东西会不会就是爱情?要不然,爱情会不会是什么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它滑溜溜的,没有气味,就像一种骑在微风背上周游世界的透明气体;如果不是的话,那爱情便只是一个字,一个试图记住另一个字的字——他已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了。

他梦见了湖边盘旋卷绕的水草,梦见年轻姑娘的乳房,她们坚挺的乳头,还梦见一头两侧长满了粗毛的动物,在一个陌生小镇的街上追赶他。

艾 丽 丝

艾丽丝的母亲给她讲过生儿育女的秘密。这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不折不扣地令人震惊——男人的那个玩意儿进入女人下面那个地方。这番解释是在厨房餐桌旁一次长时间、紧张的谈话中作出的,比艾丽丝从隔壁那条街上的比利·拉伯处听来的事——男人在女人那里面尿尿更让人恶心。

“不对,”艾丽丝的母亲说道,她口气很坚决,这事——她顿了顿——这事跟小便毫不相干。这里讲到的液体含有种子,如果一个母亲想在自己身体里养孩子,那种子就是必不可少的。

男女怎么相交,这对艾丽丝来说似乎很难理解。

“母亲和父亲躺在一张床上,”她母亲叹息地对她说,“两人互相抱着。”

“什么时候?”艾丽丝问道。她的声音连她自己听起来都挺觉刺耳。

弗莱特太太听女儿这么发问,不禁面露愠色,她两眼间的

那三条皱纹竖了起来，如扇子一般，可她还是清了清嗓子说道，“嗯，一般都在晚上。”

“晚上？就在这儿？在我们家？”

“是这样，艾丽丝。”此刻她母亲正垂眼看着自己指甲根部的表皮，炉子上方的那只茶壶钟指着三点半，粉红色的玻璃盘中放着一块刚加过糖衣的、柔软的椰子蛋糕。

“再怎么样呢？”艾丽丝正等着回答。她不会放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艾丽丝。我也不喜欢你说话的样子，你的态度，一副皱着眉头的样子。”

艾丽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可她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这种事真恶心，为什么人人都要做这种恶心事？”

“这是真的，艾丽丝。”

“太丑了。”

“不，一点儿不丑。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很美的一件事。”

“可它让我倒胃口。”

“好了，你必须相信我，这是件很美、很美的事情。”

艾丽丝能感到自己五脏六腑在呜呜哭诉，可她还是竭力压抑住了它们的怨声。这清朗的夏日就这么给毁了，一切都变了样。这房子变脏了，特别是楼上她父母亲的卧室，里面那股神秘的、发了霉的香粉味，垫得硬硬实实的大床，还有那饰有簇绒的床头架。男人和女人真不干净，一切都那么怪异荒唐。她母亲每天早晨在卫生间梳洗打扮，还把门留一条缝让光线照进来，背过身子穿短裤和紧身内衣，钩上尼龙袜子。晚上，她母亲便将身子向她父亲那黑乎乎、毛茸茸的部位开放——艾丽丝曾一次又一次地瞥见过这黑夜中的情景——对这

种说不出口的事情，她并未加以阻止。它简直就像个肮脏的笑话，一个她所听到的最最肮脏的笑话。

她母亲说这事挺美，可她也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谈起过美术馆里那些裸体雕像，说它们也很美。

其他人肯定也干这种事——拉伯太太、哈塞尔太太、她的老师斯特朗太太。埃斯特·威廉斯，或是德博拉·克尔，或是英国的国王和王后也干这事吗，或许甚至连印第安纳的古德威尔奶奶也做这事——她和爷爷。

“女人即便不想要孩子也做这事吗？”她很小心地问他母亲。

“嗯”——这儿的停顿时间更长了些——“呃，有的做，有的不做。”

艾丽丝感到厨房里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她和母亲开始时都自觉自愿地坐在餐桌旁；后来差不多把比利·拉伯在邻里间散布的那些事给挑明了，而现在两人间的谈话似乎要结束了。这会儿她母亲正轻轻拉掉大拇指上一丝散皮，又抬头看了一眼被风吹得朝里鼓起的窗帘。艾丽丝意识到自己只能再问一个问题了。

“那么，您——和爸爸——还做那事儿吗？”

“呃——”

艾丽丝屏住呼吸等待着。

“呃，是的，”她听到母亲说，母亲遂又补充了一句，“有时。”这句附加语如同抽紧了的口袋收缩带一般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艾丽丝意识到，她中午吃的奶油芦笋汤马上就要呕出来，想着是否要去水池边，免得吐得一塌糊涂。

“不过，艾丽丝，你必须保证不把我们刚才谈的话告诉沃伦和琼妮，因为他们还太小，不懂这些事。”

沃伦和琼在后院正玩国王和王后的游戏。艾丽丝透过纱门听到沃伦正冲着琼喊叫，要她将他的王冠拿来，又听到琼大声应道，“是，国王陛下，给您，国王陛下。”

今天本该艾丽丝扮王后，可她下午没心思到外面玩，就让他俩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啊，她爱他们——她的弟弟和妹妹；她过去从未意识到自己多么爱他们。两个弟妹健康、漂亮、完美无缺，没有因知道那种事情而受到伤害。他们仍然能像往常那样看着父母亲的脸，冲着他们微笑，和他们谈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沃 伦

167

“您多大年纪了？”沃伦问他母亲。

她正在餐室的桌上叠床单、枕头套和厨房里用的毛巾。
“我的年龄我知道，可你得想办法知道。”

“嗯，您是哪年出生的？”

她想了一下说，“一九〇五年。”

“唔，现在是一九四七年。”

“不错。”

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我是哪年生的？”他过去常问起这个问题，可总是忘了问题的答案。

“你是一九四〇年生的，就是大战开始的那些个年头。”

这下他想起自己为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同样的问题。他是为了能听到那个令人颤抖的短语——大战开始那会儿。一

轮冉冉升起的太阳在他眼前浮现,血红血红的,恰似比利·拉伯钉在他卧室墙上的那面日本国旗。他同时还在想,嗒嗒嗒呼啸的子弹声划破了紧张、惊恐、寂静的夜空,而这断断续续的子弹声又伴随着更为低沉、雷鸣般隆隆的炮声。那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珍珠港事件那年吗?”他喜欢珍珠港这几个字;他喜欢自己,因为他记住了这几个字,真正理解了这个字。

“你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出生的,整整早了一年。”

“我为什么那年出生?”

“因为你就出生在那年。”

“艾丽丝是战争前出生的。”

“是的。”

“那琼呢,她是哪年出生的?”

他母亲的头发今天被一排排卷发器拽得紧紧的,上面的发夹被透过吊窗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她正在数枕套。他能看到她的舌头随着她的大拇指不断往下扒拉那叠干净的枕套时在轻轻报数:一、二、三、四、五。“琼?”她心不在焉地说道,“琼是战争中出生的。”

战争就像一条浑浊,温热的大河,这个世界一直在其中游泳;然而现在,自打胜利女神降临之后便什么也没了。和平对沃伦来说并未使他发生什么变化。他现在的身体即是他以前那具身体,他那擦破了皮的小腿和膝盖,那瘦骨嶙峋的双脚并无两样,而他映在门厅镜子里的那张脸仍是圆溜溜的,带着惊异的神色。不过,他有时夜里会犯胃病,痛醒了大喊着要妈妈。母亲则给他一种嘶嘶冒泡的药水喝,告诉他说他患了消化不良症,只要他吃饭吃慢一点,别狼吞虎咽就会好的。然而

他知道,是战争让他患上了胃痛病,因为自打战争结束以后,便再也没有什么能吸引他,能让他精神振奋,快快活活的了。

在他看来,他和姐姐艾丽丝、妹妹琼的关系,就像艾丽丝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小娃娃一般组合到了一起。他排行老二,居中,永远在中间,一个出生在大战初期的人——他必须牢牢记住这一事实,因为它给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的感觉;同时,中间这地方也有让人礼赞之处,是个专门为他——生于血雨腥风的战争初期的沃伦·马格纳斯·弗莱特——而准备的地方。

他几乎从未考虑过将来,虽然他也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最终会长大,会用梳子沾着水把头发往后梳,和那些大男孩在后面那条小巷子里玩“小猪快跑”的游戏。他突然想到,这个家庭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孩子,一个战后出生的孩子,而自己以前却从未想到过这种可能性,真是不可思议。他刚患胃病之初那种让他恶心的感觉又在他心中泛起。他本打算问母亲会不会再生个孩子,可又觉得这个问题太愚蠢。他不知怎样提起这事,怎样措辞,母亲也许会笑话他,要不就放下手中正在叠着的毛巾说道,是啊,当然会再生个孩子啊,那他还能指望什么!

要是再来个孩子就会把事儿给搅和了。这孩子睡在哪儿?给他取什么名字?他生下来会很虚弱,没一点儿肌肉,又弱又病,什么也不知道,准活不成。

母亲似乎正掂量他心里在想什么。她以前就这么做过,而在今天这个热得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她又在观察他的内心活动了。“你父亲和我都老了,不会再生孩子了。”她说道。

听母亲这么一说,他不禁心花怒放;倒不是因为她说保证不会再生什么战后孩子,而是因为母亲说这话时神情安然、严肃,他还从未见过母亲这么说话呢。她往常那逗弄人的声音,

又骂又哄的样子,还有那哼哼唱唱、唧唧啧啧的语调全没了,从中迸发出来的则是这个新的声音,尽管它怪异反常,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听到——也许是第一次听到——她真正的自我在说话。“什么?”他问道。

“你是说‘请再说一遍’?”

“请您再说一遍。”

她仔细端详着他,为他高兴,于是又说了一遍。“你父亲和我都老了,不会再生孩子了。”

琼

琼心里充满了秘密,有时她竟觉得自己会整个地爆炸了一般。她母亲每天晚上安顿她上床睡觉,弯下腰亲吻她两边脸颊,说:“我的宝贝小喜鹊,”可母亲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小女儿竟有满脑子的秘密。

还在五岁的时候,她就意识到自己注定会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公开的、为周围人所看见的自我,一个便是在她头脑里秘密长大的自我。

她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别人连想也想不到。

比如那台收音机吧。她父亲说这收音机是战前出品的。有一天,在起居室里,她硬是挤到那台北方电子公司出品的落地式收音机架后面又脏又窄的地方,透过网眼状的后盖窥看里面宛如山里村庄般排列的电子管,那些管子发出嗡嗡的声响,发出红色的光。这事她除了向母亲露了点口风外,自然没对任何人说过。

万一闲得无聊,她也知道怎样打发时光。只要她觉得无

所事事,她总是可以沿街走到托灵顿克里森特街与德拉夫威街相交的街角处,也就是布雷格曼太太家那所黄褐色大房子前,那儿有一座绿草茵茵的山坡,横穿她家门前草坪。她可以在那草坡上爬上滚下。谁也没说过她不能去滚草坡,谁也没想过这码事儿。其实呢,她很少去那街角处的草坡上滚着玩,可她还是喜欢保留这种可能性。再说,她也可以在自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跳格子玩。学会跳格子使她得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无论何时,只要她觉得心里不开心,她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痛痛快快地跳格子,滑一段,跳一段,再滑一段。在这个过程中,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头脑与身体分开了,晕乎乎的,所有不开心的想法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世界上还有谁知道这个诀窍呢,她感到怀疑;尽管她母亲有时在窗前向她招手,笑眯眯地向她招手。

171

在浴室的衣物篮盖子上贴着一幅转印图画,那是一只飞跃在绿色芦苇丛的黑天鹅。她记得自己曾看着母亲怎样将这幅装饰画贴上去的——先将它浸泡在放满水的池子里,然后将它后面透明的衬垫整整齐齐地剥去,再将这只天鹅贴在带铰链的篮盖正中,最后用一块湿布将它抹平。琼当时觉得那一刻实在太美了。然而,每当她独自一人待在浴室里时,她总要用大拇指刮那幅画。到现在,她已将画的边缘全部刮松了,并随时准备受到责骂,但她同时又觉得自己浑身是力,足以能从任何危险中逃之夭夭。

弗莱特太太的侄女

弗莱特太太的这三个孩子似乎总是你争我吵的——不管

怎样,她的印象就是如此。这真令她伤心,这个从小便没有兄弟姐妹玩耍的女人说道。

然而事实上,艾丽丝、沃伦和琼妮很长一段时间都能和睦相处,特别是夏天,因为那会儿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外出度假去了。三个孩子常在一起玩挺复杂的游戏,还做点建筑活——就在上个星期他们用毛毡将葡萄架围好,还往露营的帐篷里运去硬纸板、桔黄色的竹条箱,并从母亲缝纫柜里拿来的一条旧布。在这个帐篷里,三人以橘黄色竹条箱为桌,跪在桌旁,就着昏暗的灯光吃粗麦饼干,喝冰水,很自然地亲亲热热地怀恋起往事来。

他们这种怀恋往事的心态不同寻常,每人都觉得自己的往事非常丰富。他们不停地谈啊,谈啊,大家轮流讲述各自或是共同的经历,互相交流、反复述说,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从记忆中挖掘出来,大家都欢欣雀跃,乐不可支。就这样,整个下午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们觉得,沉浸在以前那些冒险事儿里可真是美滋滋的。他们回想起在布法罗湖游泳时,那湖底如沙滩一般,湖水又像浴缸里的水一样温暖。后来他们还去了一个冷饮小卖部,买了姜汁啤酒喝了个痛快。他们还想起去展览会玩阜式转轮时,琼妮吓得脸色发青。(“我当时真是这样吗?”她吃惊地问道,不过想起这件事她心里还是甜丝丝的。)他们还想起那次去看装了人工呼吸器的赖特曼先生时,他口水直流,可他自己并不知道。还有比利·拉伯在后面那条巷子骑自行车时摔了下来,摔掉了一颗门牙,他母亲开车送他去医院,车后面座位上给弄得血迹斑斑,而他们再也没将那座位清洗干净。还有那次他们与杰克逊家打刺果仗时,珍妮·杰克逊的母亲不得不把粘在头发上的刺果剪去,她那一头

金色的长发可像公主头发那般美丽呢。

每一件事的边缘都折射出记忆的光彩，如同固定在斜角镜中的形象一般。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艾丽丝总是很激动，而且像个领头人一样带领大家讲述过去的事情，沃伦和琼则加以补充、证实、加强，当然也少不了添油加醋。过去那些激烈而富戏剧性的事件使他们一阵阵战栗，而记忆的双重性、对他们极大的吸引力如同电话线或环绕在婴儿耶稣头顶上的光晕那般神秘莫测，令他们凛然敬畏。记忆可用一根棍子拨拉，亦可如冰棍一样含在嘴里品味，你永远不会有腻烦的时候。

还记得贝弗利堂姐来玩的那一次吗？他们到最后总免不了要回到贝弗利堂姐来访一事。这事已过去很长时间了，一年前，甚至可能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时谁也不知道她会来。她就在一个秋天的下午，穿着她那套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队员的军服来了。她按响门铃，是前门的，然后说道，“喂，你们好哇，我从萨斯喀彻温省来，是你们的堂姐。”

他们当然听说过贝弗利，她是他们六个堂姐妹中的一个，其他五个是朱安妮塔、罗莎利、阿琳、莉莲和达芙妮。她们住在萨斯喀彻温省一个叫克莱马克斯的城市。她们的母亲是范恩婶婶，就是他们父亲的兄弟安德鲁叔叔（浸礼会的一个牧师）的妻子。每年圣诞节，弗莱特太太——他们的母亲都要给萨斯喀彻温省的堂姐妹们寄上一大包圣诞礼物——新的游戏棋、棉法兰绒睡衣、羊毛手套、一只又大又圆的水果蛋糕等。每当她将她们小小的名片系在礼物上时，总免不了摇着头说道，“那一家子啊，不知什么时候能长大成人呢。”

可现在,这不,贝弗利来了,长成个大姑娘了,这可是弗莱特家的孩子们怎么也没想到的。只见她往长靠椅上一坐,喝起茶来。“嗯,这茶味道不错,”她对她伯母说道。听她那口气挺开心,也挺乐意发表意见,似乎她俩熟得很,常像这样在一块喝茶似的。艾丽丝和沃伦分坐在她的两边。(那天下午他们的父亲去哪儿了?或许去了多伦多,也可能去了蒙特利尔——他似乎总是搭上哪班火车,然后一走就是几天。)

贝弗利姐姐的军帽几乎贴在她的头发上,可他们仍能看到堂姐几乎满头都是髻发,也许是烫成这种经久不变的波浪式样,要不就是自来卷,像秀兰·邓波儿的头发一样。堂姐刚从英国回来,她在那儿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她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她说的忙得不可开交这句话。“噢,真的,”她说道,还在笑个不停,“我们可忙得昏天黑地,眼睛都没睁开过。”

她让艾丽丝试戴她的帽子。戴那顶帽子得用发夹,可艾丽丝一点儿也不嫌麻烦。“嘿,你看上去真漂亮,”她对艾丽丝说,“真是个活生生的玩具娃。”

“你有没有救过别人的命?”沃伦问她。他先是小声说了一遍,然后不得不提高嗓门又说了一遍。

她一听这话便笑了起来。“呃,我想我救了两次自己的命。”她说这话是不是在打趣,艾丽丝一点儿也没数。

然而,贝弗利姐姐脸上那俏皮的神色突然消失了,她禁不住伤感起来。过了几分钟,她向他们讲述了盟军反攻那天的情况:空军士兵执行夜间飞行任务,空袭敌军。接着她又说起一名飞行员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被击中,直往下坠。“他真可怜,”姐姐说道,“当时,他不知怎的没找到降落伞的绳索。后来,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竟用手指在自己的皮夹克

上钻了个洞,可见他当时找那绳子找得好苦。”

一个人用手指在皮夹克上钻个洞!还是在他从空中坠落时那性命交关的一两分钟里!您怎么解释这种事情?贝弗利姐姐说,这简直是个奇迹。虽然不像大多数奇迹那样令人开心。还有一个士兵的双腿给炸飞了,不过他至少还活着,至少他的脑袋没被打得稀巴烂,就像她认识的一个士兵那样……

他们本可以听贝弗利姐姐谈一整天的战争,可母亲打断了他们。“说说你父母亲的情况,他们怎么样,”母亲说道,“还有你那几个已回家的妹妹。”接着她又说,“哟,你的火车几点钟开?我们得保证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火车站。”

事后,艾丽丝忍不住一直在想贝弗利姐姐。贝弗利姐姐的来访就像电影般一幕一幕在她脑海里浮现。她的美、她头上的髻发、那涂了口红的双唇、那棕黄色的长统袜、锃亮的皮鞋、短裙式军服、她欢畅、急促的笑声、还有她说到那个士兵从空中坠下、又在自己皮夹克上钻个洞时耸耸自己小巧玲珑的肩膀时那副神情。贝弗利姐姐心里装着许多可怕的故事,可她仍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在这个世界上跑来跑去。她来这儿事先也没说一声,径直走到他们这条街上,按响门铃说道:我来了。可没一会儿——一两个小时——她又走了。 (“再见,孩子们,咱们电影中见。”)萨斯喀彻温省有多远?夜晚,艾丽丝躺在床上,似乎老是听到远方传来的嗡嗡声——虚无的震颤声。她觉得自己能闻到萨斯喀彻温省那边空气中翻滚着的刺鼻、料峭的气味。

“贝弗利姐姐还会不会再来?”艾丽丝有一次问她母亲。不知怎的,母亲好半天才接过她的话头。

“要是我啊,就不花这个钱了,”弗莱特太太慢悠悠地说

道。

“她真是棒极了，”艾丽丝轻声说道。

“呃，”弗莱特太太终于说道，“不管怎样，她挺有魅力的。”说完这话，她抬起眼睛向上看去，那神情仿佛是在竭力回忆一个古老故事的结尾，然后长叹一声。

艾丽丝紧盯着母亲那声叹息，或者说，察看着那声叹息的四周，发现这叹息声夹杂着责怪，同时也隐瞒了什么东西——某种至关重要的情况，“要等她长大”才能告诉她。恶梦、羞愧、启示、审判、失败的重负，所有这一切都将等待着她。至于将来，她不堪想象，这如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呼吸：一旦你开始注意空气从体内呼进呼出，你的呼吸就会堵在喉咙里，从而使你感到倒地死去是很容易的事。

176

弗莱特太太梳妆台抽屉里一封折叠好的信

亲爱的黛西：

今来信告知，我们的女儿贝弗利乘火车长途旅行后于昨天下午回到家中。火车里挤满了回家探亲的军人，而车快到温尼伯时，暖气出了毛病，因此她患了最为严重的一次感冒，清鼻涕直淌，喉咙也痛得很厉害。我不得不告诉你，她在你家时，你对她的态度使她感情上受到伤害——你并未请她留下来吃晚饭，也没有留她住宿，而是不客气地将她打发走。不管怎样，这就是她的感觉。如果她伯父当时在家，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可谁知道呢？如果她第二天乘早车回来，她就不至于病成这个样子。她本以为你见了她这个从西部过来的、你以前从未见过面

的,而且还为国家出过力的侄女一定会高兴得什么似的,因此她怎么也想不通,我和她爸爸也觉得不可理解,也许东边待人接物的习惯与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可是谁都欢迎的。

你的诚挚的弟妹

范恩·弗莱特

弗莱特太太年老的父亲

凯勒·古德威尔已年届七十,这是个驱灾避邪的年龄;他的妻子玛丽亚(也就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则刚刚庆祝了她的……嗯,谁也不知道玛丽亚多大年纪了。古德威尔先生过去是专业石匠,后来成了印第安纳州著名的企业家,现在也退休了。他和妻子最近变卖了他们在布卢明顿市区那幢漂亮的住宅,而在离市区二十五英里的莱蒙湖边买了一所小房子。为什么他们要卖了那幢舒适的宅子而买这所湖边小屋呢?因为玛丽亚想住在乡下,这样她可以在屋前的院子里种菜,而不会再有邻居鸣冤叫屈、大声抗议什么的。再说,凯勒·古德威尔先生在后院也会有足够的地方建造一座金字塔。

一年前,也就是他俩从尼罗河上游览回来后,他便开始筹划这座金字塔。他们在埃及时,几乎每天他都要给远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外孙、外孙女寄明信片。“亲爱的艾丽丝(要不就是沃伦或琼妮),你应该看看他们在这儿建造的金字塔,其中最大的一座有二百万块石灰石,每块石头重二吨半。”

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儿黛西,告诉她古雅的金字塔

是根据万道阳光洒向地面时的形状构成的。

“胡说八道，”黛西的丈夫说道，“太阳光是垂直，而不是斜着照向地面的。”

“好了，别管他，”黛西含含糊糊地说道，“这是他要做的事。”

他想造的这座金字塔将有两码见方，是真金字塔缩小了的复制品。他还根据那座大金字塔的尺寸算出自己这座复制品的大小尺寸。他要用的石块尺寸也相应缩小（比他的手指尖还小，只有八分之三英寸见方），一手可握六七块这种石头。这座金字塔的外表将使用印第安纳石灰石，但塔的里层他打算使用沙石、大理石、花岗岩、板石或其他什么石头。是否用灰泥？他决定用，这是一种很稀的混合物，实际上与透明胶水差不多。埃及人可以不用灰泥造金字塔，可他的石块太小，因此分量太轻。他计划使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石头。他和玛丽亚曾在夏威夷群岛度复活节，带回来当地的火山岩，他还从马尼托巴省、安大略省、田纳西州、密执安州、佛蒙特州、法国（勃艮第）、意大利、芬兰及不列颠群岛等地收集了许多岩石标本。他曾听说南非有石灰石矿层，因而他和玛丽亚眼下就在那儿度假，一边观赏风景，一边睁大眼睛看能否找到采石场和新的石头品种。这儿的石块迄今尚未被人开采过，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温暖，闪着光泽，照亮了他的思绪，照亮了他的梦幻。置身于这些新发现的石矿区，他渴望挥起铁锤，凿下石头样本，用报纸将它卷好带回家去。（他最喜欢的一句玩笑话是火车站上一个行李搬运工对他说的，那个搬运工说他旅行箱重得要命，里面是不是装了石头。）

“他现在是着了迷了，”女儿黛西说道，不过她说得挺开心。总体而言，她认为老年人宁可着迷的好，而不可空虚，无

所事事。

他为什么要建这座金字塔？很多人都问黛西这个问题，可她也不知怎么回答。他是不是想以它作为自己的墓穴？不是的，因为他和玛丽亚已在布卢明顿的公墓买了墓地。那这座金字塔是不是为了纪念什么？嗯，这倒有可能；目前还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

他希望别人会热烈夸赞他这些稀奇古怪的计划，而他也有这份自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急于求成。这是一项大工程，需堆砌的小石块就要超出两百万块。在塔底正中，即地基下将埋有一只表示时间的密封盒。他曾写信给他在渥太华的三个外孙、孙女，要他们提供藏品。他说，东西要小，还要有时代特征。小琼妮受到祖父的鼓励，寄来一枚两分钱的邮票，上有国王头像；沃伦则寄来了一片压平了的枫叶；艾丽丝经过仔细考虑，从报纸上剪下一条新闻标题寄来：伊丽莎白公主^①将于十一月与菲利普亲王结婚。

凯勒·古德威尔将这些东西——邮票、树叶、新闻标题放进一只金属盒里。他的第二个妻子玛丽亚用信封装了一袋茴香籽给他。古德威尔本人，这个古里古怪的傻老头，最后又加了一样东西——他前妻的结婚戒指。

这枚戒指以黄金打制，周边经过加工抛光。结婚日期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五日及新娘、新郎的首字母均刻在戒指内圈。古德威尔还清楚地记得做这枚戒指的花销：四元二角五分；戒指是十八K的，通过伊顿邮购服务部的订购物品目录册订购

^①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2月继承王位，1947年11月20日与远房表兄、希腊和丹麦亲王菲利普亲王结婚。

的。他记得两年后，他年轻的妻子死于分娩；当时，要不要在葬礼前将这枚戒指取下，着实让他左右为难。民间是个什么习惯，别人是怎么做的，他一无所知。

还是一个叫斯皮尔斯太太的，就是那个医生的妻子，叫他将这枚戒指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她还帮着他一起将戒指除下来：先在他死去的妻子手指上抹上点猪油，再慢慢将戒指抹下来。斯皮尔斯太太一边帮他，一边说道：“留着它，古德威尔先生，”她的声音极为柔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算计的神色，“好等你女儿长大了把戒指给她。”

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将戒指转交给自己心爱的孩子，把这事搞得隆重些，使它成为一个闪光的时刻，他也好借此机会将自己生活中分散的细节连接起来，并向女儿表示自己无限的祝福。

然而，他近来觉得自己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了，精神不振，反应也迟钝起来，这事最终也无法做成，近来连想都没精神去想。他该说些什么话才能使这一时刻富有意义？女儿又会说些什么？说声谢谢肯定不行，感激的话也不行；光说话、做姿势还不够，在他生活的这个单薄的以太世界自然不够。还是不要自找麻烦，将这宝物埋到石塔下面——这是他的金字塔，紧密、沉重、复杂、充满了秘密，它是一种机器，也是他最后的陈述。要么如此，否则耸耸肩交出戒指了事。

弗莱特太太的同窗好友

还是在印第安纳州时，弗雷迪·霍伊特就与黛西·古德威

尔·弗莱特一起上中学。两人同坐在布卢明顿市古德威尔家的门廊上,分享一袋袋炸土豆片。她们又一起上大学,还加入了同一个女大学生联谊会——阿尔法泽塔。打那以后,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都要互通三四封信,逢到生日或是圣诞节,还要互赠些滑稽可笑的礼物。两人已有多年没见面了,不过,弗雷迪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八月登上火车去渥太华,准备在那儿待一星期。

在渥太华期间,弗雷迪一直在想:这就是黛西·古德威尔,嫁了个颇有名望的丈夫,还有一幢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大宅子,三个漂亮的孩子。我们大家所想得到的,黛西都有了。而我呢,什么都没有,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真正的家,只是一小套房子,甚至连花园也没有。啊,瞧黛西那花园,那才叫花园呢。如果她喜欢剪枝、锄草、嫁接,把花园弄得漂漂亮亮,她从早到晚都可以在园子里忙乎。而我却是坐着工作,被办公桌和时钟所束缚,真是枉做了一回女人,什么也没摊上。

弗雷迪·霍伊特还会想:唉,可怜的黛西,我的天,瞧她胖的。可她倒也受人尊重,不过,穿她那种其丑无比的紧身连衣裙走来走去,谁还会有体面可言——要我说点儿什么吗?给点暗示什么的?还有她指甲根部的表皮呢。这十年来,我想她恐怕没读过一本书。哎哟,我的天,就看看这间客房吧,到处都是这些讨厌的粉红色贝壳图案,真没把我憋死。还有四天,瞧这些钩针编织的床单,她还自以为了不起,现在谁也不用钩针编织的床单了,哪怕您就是碰它一下都会做恶梦的。我真想把这鬼床单全拆了,我干得出的,就那么轻轻一拽。这些孩子逼得我要发疯,整天哭哭闹闹,溜来跑去,到了一天结束时,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活像小木偶似的,等候那个大男

人回来。在他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演这么一回戏,真是虚伪。

对了,我能对她说些什么?还有什么没说的?我看到你仍然像以前那样活着,看得出你还是用伍德伯里香粉搽鼻子。我还看到你丈夫总是到多伦多或到蒙特利尔去“开会”,他老往那些地方跑究竟去干什么,不知你到底有没有数。我注意到你仍然是早上起床,晚上睡觉。瞧,这多有趣。我相信你照样过着你的日子,你仍然有日子可过,对吧?算了,算了。

弗莱特太太与丈夫的亲密关系

弗莱特太太深切而热烈地、真心诚意地想做个贤妻良母,对《有效的家庭管理》这一杂志她可是每期必读。

她还读《麦考尔斯》及《加拿大家庭指南》等杂志。在化妆品专栏及食谱专栏之间,她偶然能看到女人如何在床上讨丈夫欢心的方法;还常常能看到刊登出来的女士们写的信,特别是咨询性生活方面的某些问题。有一位女士在信中写道,“我丈夫总要在每周一晚上他们保龄球联谊会活动之后和我亲热做爱,可不巧的是,我每星期一都要洗衣服,等到了晚上我已是精疲力竭,做爱也没兴趣了。”提供给这位女士的方法既简单又适用:“星期二洗衣服。”弗莱特太太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她是开怀大笑的;还希望她的好友弗雷迪能在这儿听到她的笑声。还有一位女士写道:“我丈夫身强力壮,每天晚上都想做爱,这正常吗?”回答是:“对做爱的模式无所谓正常不正常,夫妻卧房里进行的事是神圣的。”这条建议给弗莱特太太的印象不那么满意,实际上,她并没有完全弄懂它的意思。

不过她的确认为，“每天晚上”，这真令她难以忍受。

尽管这样，她仍然随时准备得好好的——将避孕用的子宫帽放到位，预防万一，虽然那东西枯黄枯黄的让她恶心，还得用冰冷、难闻的药膏涂它的边缘。这东西真讨厌，而且十有八九不需要，可对这东西她似乎还得受着。“要让您丈夫相信，您总是随时准备答应他的请求，即便他真正与您做爱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很难预料。”

难以预料，的确如此；不过，有两个时间弗莱特太太可以肯定他俩要销魂一番：在丈夫去外地之前（她有时把这看作是一种预防性注射），再就是他从外地回来时。今晚是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三，他在温尼伯待了几天后将乘夜车回家。家里整齐干净，孩子们已上床睡觉，她自己也洗了澡、搽了香粉，放好了避孕帽，穿上了轻薄的睡衣。“穿睡衣裤会把许多男人赶到别处去寻找感情。”

她心里琢磨着，他的情绪会怎样呢？

近来他情绪很低落，他并未说出口，但她能感觉到。他的六十五岁生日快到了；她知道退休一事让他挺烦恼，往后那空虚的时光他该如何打发。然而，比无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开了。最近他更多地谈起他在加拿大西部的两个弟弟，而他提起他俩的名字时总免不了唉声叹气。埃德蒙顿的西蒙是个酒鬼，已多年失去联系，而巴克与萨斯喀彻温的兄弟安德鲁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淡起来。安德鲁过去常写信，当然是为了要钱，但近两年他也只是偶尔写一封酸溜溜的短信，或是节假日问候一声，此外便再无其他联系。

弗莱特太太还知道，她丈夫常记挂着他在奥克尼群岛的父亲。他是不是该写封信去问问情况，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他也就这么拖着没写，似乎他也怕真正了解到他父亲的情况。弗莱特太太也常想起自己的公公马格纳斯·弗莱特。她从未见过他，但在她的心目中，他是个很可悲的人。妻子抛弃了他，三个儿子不认他，谁也瞧不起他，孤零零孑然一身。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丈夫巴克。马格纳斯·弗莱特究竟犯了什么错要遭此惩罚？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她那慈悲的心怀里，从未真正消失过。

然而现在——太晚了——他的儿子巴克渴望与他重逢。

最近，巴克·弗莱特家的另一条家庭纽带，即母亲与儿子之间这条生活中最重要的纽带被重新连接起来。最近几天，巴克去温尼伯并非参加他往常那些农业会议，而是出席克莱恩廷·弗莱特植物暖房的捐赠仪式。那是一座玻璃拱顶的大建筑物，位于阿西尼博伊恩公园的中央；其捐赠人是一位叫瓦尔迪·古德曼森先生，即那位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肉类罐头批发商兼金融家（克莱恩廷·弗莱特，即巴克·弗莱特的母亲，曾于一九一六年被一辆骑得飞快的自行车撞倒后死亡，肇事者即为瓦尔迪·古德曼森，当时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年轻人）。

“我当时感到极为内疚，而这种负罪感一直伴随着我，”在马尼托巴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古德曼森先生对弗莱特先生说。“一时的大意，竟断送了一条人命。如果我当时转弯时下车，或者骑得慢一些，那该多好。您可怜、孤弱的母亲被我撞倒在皇家银行大楼的墙根边，她的头撞到柱石边上。当时这一情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无论我做梦还是醒着，它将永远伴随着我。如果那块石头是圆的就好了，唉，可惜它如刀一般锋利。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向主祈祷，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为他人服务，而且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

以合适的方式纪念她。”(说到这儿,他拽出一块洁白如雪的手帕,对着这块浆过的、折叠好的手帕使劲擤了擤鼻子,发出一声如大雁般得意的哼声。“我左思右想,最后总是想到您母亲热爱花卉这一点。您也许会说,是她将鲜花带给了这座城市,让我们这些身处炎凉世态中的芸芸众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赐福。当然,我永远不可能完全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我的确希望这一小小的仪式能表明我对令堂大人之死深切的、持续的悔恨之心。我只是对您太太,我想她的名字叫黛西,今日未能前来与我们同聚感到遗憾。当然,若要她横穿大陆,把自己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那是很困难的,这我完全理解;而且我也知道,这种场合对她而言极易动感情,这一点我的确很清楚。那些在我们年轻时关心过我们的人将永远与我们同在,虽然他们的逝去无可挽回,但连接我们与他们的纽带决不会断开。”

然而,人在渥太华的弗莱特太太此刻正躺在床上等待丈夫的归来。她此刻所想,并非克莱恩廷·弗莱特,即收养她的亲爱的克莱恩廷姨妈,而是她自己的母亲,分娩后几分钟便死去的母亲。这根纽带现在似乎变得那样纤细,那样脆弱,甚至几乎成了一根人为的纽带,因为弗莱特太太所保留的她母亲的遗物只是一帧模糊的结婚照片及一枚小小的外国钱币,其表面已磨损,无法辨认。据她父亲说,这枚钱币在她出生时被放在她的额头上,至于是谁放的,或是出于什么目的,她不得而知。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属于她的那种乐趣——每日里触摸她母亲曾经触摸过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婚礼面纱、没有手工织的施洗礼仪式时穿的漂亮礼服,什么小纪念品一件也没有。几年前,她父亲有一次提到过一枚结婚戒指,说以后会给

她，可打那以后他再没提起过。或许他把那戒指给了他妻子玛丽亚；也可能他压根儿就忘了它。今晚，她盖了一条薄薄的毯子躺在床上，等待她丈夫——一个叫巴克·弗莱特的男人回来，心中升起一股失落感：失去了那枚戒指，实际上是失去了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她此刻忘却了自己的孩子，忘却了自己年迈的父亲，甚至父亲的名字也弱化成几个模糊的音节。她好像突然患上了什么传染病一样浑身颤抖起来。

她以前也像这样会突然感到阵阵悲哀。她患的这种病症即是一种孤独症——她如同您能察觉周期性偏头痛的发作那样能识别这种病症：这会儿它又发作了——它会反复发作——她躺在床上，陷入困境，动弹不得，没有性别，没有年龄，孤寂一身。

热泪涌入她的眼睛，她用毯子上的缀结擦着眼泪，屋里越来越黑了。

每当弗莱特太太觉得自己浑身被涂满了孤独之油，并整个地感受到它的压力之时，这便是她深感恐惧的时刻。说也奇怪，她不知怎的又回想起自己做姑娘时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时的情景：她站在那儿凝视着那浩大的瀑布，她的衣袖擦着一个男人的衣袖，那是个站在她身旁的陌生男人。他说了些什么使她哈哈大笑，可他说的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失却的记忆在她心中再次激起阵阵痛苦的波澜。

然而，在她焦灼的心灵内部，仍存有一股如宝石般清凉、奇妙的力量——能偶尔观察这活生生的世界的力量。她的眼前突然变得清澈透明，那是一朵浪花，点点繁星组成的浪花。她当然知道，这只不过是意识玩弄的一个小把戏而已；然而它却又有那么几分精美、奢华。故事的迷宫打开了，允许她从中

穿过；也许她会从自己这些生活的故事中被挤出去——她知道这是真的，且一直记在心里——然而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才能，她又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编织别样故事的能力。比如说，她能感受到孩子们不受管束的秘密，她父亲笨嘴笨舌地与这个世界争执不休的样子；还有弗雷迪·霍伊特对她一家既蔑视，又妒忌的态度。（自打她夏天来访后，她连一封表示谢意这种简单不过的信都没来过。）今晚，弗莱特太太甚至被连接她和她死去的母亲——默西·斯通·古德威尔之间那一丝感觉所打动；这一时刻自然很短促，来得轻飘飘的，只是感到一丝呼吸，一个手势，一抹光的色泽，在记忆中并无指定的位置，然而奇妙的是，这丝感觉突然间完全颠倒过来，闪现出一幅扭曲的、怪异的图景：弗莱特太太生下了她母亲，而不是母亲生下了她。

至于弗莱特太太的丈夫——呃，她丈夫怎么样了？再过两个小时她丈夫就要回来了；他总会像往常那样从火车站乘出租车回家。他会在黑暗的卧室里脱掉裤子，将它叠好挂在椅背上。他的裤子很有点神圣的味道，而前面两条裤缝的式样则如络腮胡子般对称。接着他再解下领带，脱去衬衣和内衣。他没有发现，在这个九月的夜晚，她的眼泪沾湿了毯子的缀结，也没意识到她深深的孤独感，因而他便趴上她的身子，并小心着别让她太吃重（一位绅士总是会用胳膊肘撑着自己的）。他会闭上眼睛，将激奋的雄性插进她的体内；接着便是几分钟有节奏的磨擦。

他们就这样做啊，做啊，而弗莱特太太此时却像穿越一条由印刷字体和狂乱的思绪混合而成的螺旋线，试图准确地回忆起最近一期的《麦考尔斯》杂志所提的建议，即有关妻子的

责任,她应表现得越来越亢奋;对,就是这条建议——激情和顺从仅通过一个微妙的身体动作同时表现出来;可这怎么可能?

弗莱特太太的脑袋、心和骨盆协同努力,试图解决这个矛盾。

她婚后生活中的桩桩件件如雨点般降落在她的周围:周年纪念、怀孕、度假、饭菜、疾病和康复,这一切纷纷从她与婚姻伙伴(她儿时那个男神)的关系这一戏剧般的——有人会说乱伦的——源头涌将出来。她似乎觉得婚后这些钙化变硬了的年头凝固成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她决不会再为什么吃惊了;这个决心几乎成了一种雄心。防止她作粗鲁、惊讶状,这难道不就是改善爱情的文章所许诺于她的吗?难道不正是它创造并维持了她对巴克的爱情吗?她丈夫那如斜坡般修长的大腿,加上她自己那如柔软的水果般、在坚实的床垫上铺展开来的臀部——难道它们不显示出一种信任?毕竟家庭种植的花草都能在某种地理与气候的真空中茁壮生长,她为什么不行?

当巴克·弗莱特在她身上大力抽动时,她的思绪很可能会飘向她去年夏天弗雷迪·霍伊特来玩时去看的那场电影《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那是战后的一部巨片,其中有一名士兵从战场上归来,原来的一双手不见了,代之而来却是一对粗糙的铁钩。

若是被那冰凉的金属弯钩,而不是被人的手指碰触,将会是怎样的感觉?一个男人的身体整个地压在她身上,将她牢牢地钉在这个世界上,她的感觉将会怎样?她要仔细琢磨琢磨,玩味一下这螺旋般的可能性。可随后她的思绪却会被喷

涌而出的液体所打断,接着还有第二次喷涌,不过这次喷涌而出的是丈夫的感激之情。在他的感激里还夹杂着战战兢兢的难堪,为他年老苍白的躯体,为他进不了几句体己的话而难堪。想不到男人和女人竟如此结合在一起!现实生活竟安排得这样残酷。

“睡个好觉,亲爱的,”他会说,意思是:“原谅我,原谅我们。”

弗莱特太太的住宅和花园

坐落在德拉夫威街 583 号这幢四方形的大宅子呈现一派灰蒙蒙的景象。屋里的家具、窗帘、地毯、厨房的地板等在战争期间全变得破败不堪。如今,在战后飞速发展的年代里,出现了亚麻油地毯全球性的短缺,尽管人们估计这种短缺将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缓解。(弗莱特太太已经在梦想那种阿姆斯特朗花式,即红、黑、白三色四方块混合组成的亚麻油地毯了。)虽然她已将厨房里那些玻璃纤维织成的帘布又全都洗了一遍,但她已在谈论定购花式图案的拉绳窗帘(她也说帷幔,这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用它来给自己的房间“提提精神”,给它们点生气。再说了,她对起居室里的糊墙纸已是厌恶透顶,那上面一排排蓝、黄、粉红色的牵牛花看了真让人发麻。下次她打算用单色、或许是威廉斯堡绿,再配上涂了瓷漆的白色木制家具以与墙面形成鲜明对比。那条又旧又破的地毯也让她难受,接缝处全破损了,致使里面的衬里全露了出来,难看极了,就像谁的头皮暴露无遗一般。说句实话,整个房间看上去似乎营养不良,不为人爱。不过,那张咖啡桌倒还

让她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点自豪,因为她最近在胡桃木桌面上添了一块玻璃板,又在玻璃板下压了几幅三个孩子的照片和她那张略微泛黄的结婚通告:

巴克·弗莱特夫妇

已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在渥太华

结为伉俪,特此敬告诸亲友

她这么布置咖啡桌是从《加拿大家庭与花园》杂志的一篇文章上看来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将您的气质融入您的装潢》。

家里的每一间房子,即便是楼上的浴室,窗台上都放满了蕨类植物,什么铁线蕨、鸟巢兰、矛状耳蕨、苜蓿等。(一九四七年这会儿,室内这些蕨类植物给人一种老式的、过分注重摆设的感觉,尽管至六十年代中期,它们的观赏性和普遍性肯定会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除了绿色植物和咖啡桌以外,其实弗莱特太太对自己的这所房子并不很感兴趣。她觉得自身的某些不足也反映在这所房子结构的粗陋、简单上。这房子共有八间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楼上、楼下各四间,总体给人土气、简陋的感觉;每间都是绝对的四方形,窗户开得过大,又显得单调、呆板。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非常刺目;到了冬天,房间的四壁冰冷,楼下房间的各个角落还透风。

如果要将弗莱特太太的真实情况说出来,那么,她是为夏天而活着,为夏天的热而活着,即为她的花园而活着。多么漂亮的花园!

弗莱特家这座挺不讨人喜欢的住宅倒是坐落在一块茶碟形的绿地上,前、后、周边,好大一块地,这在本市一带是不多

见的。春天时,圆溜溜长鼻子般的报春花根茎向四下里伸展,波士顿希尔锡爬山虎,即 *P. tricuspidata*^①,现已长满了四分之三的墙面。(住宅朝北的那面墙的爬山虎长得不好,这也没什么。)对了,窗台上还有许多花箱,五颜六色、生机勃勃。此外,弗莱特太太还在房子的根基四周种了日本紫杉,红松、矮松、矮云杉,还放了一个南非花箱。这些花草树木遮盖了房子根基部丑陋的石灰石,真是妙极了。还有她那些漂亮的丁香花!您知道,有些人愿意到外面随意买些长了多年的丁香花,回来后往地上一插,可弗莱特太太却要考虑丁香花整体的高矮、花色的搭配。她将一种叫“莱蒙婉夫人”的白色丁香与淡粉红色的波斯丁香、暗蓝灰色的“林肯总统”配种在一起。这些不同品种的丁香花是“搭配组合”的,而不是它们自己“冒出来”的。在房子的侧面,那排沿边缘种植的蓝色美洲石竹中间配种了点点黄灿灿的金鸡菊。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组合堪称真正的艺术家的手笔。一丛丛荷包牡丹种在——一种在,还没种呢——蓝色的风铃草的近旁;绝妙的搭配!后花园里的苹果树每季都要喷洒农药,以防苹果虫蛀,因而整个夏天里它们枝繁叶茂,在围了树篱的漂亮草坪上洒下多少万花筒般、形状各异的图案。这儿,傍晚的阳光在罌粟花间颤悠飘荡。瞧那些大丽花!弗莱特太太的丈夫曾开玩笑地说,那些大丽花大得要侧过身才能从后门抬进屋里。还有一条两边种了蔷薇的石子路通向葡萄棚,再蜿蜒伸向岩石庭园。弗莱特太太的这个岩石园里长着矮小的多年生植物,以及从欧洲买来的特种高山植物。园内草木葱茏,华美,温馨——它具有英国式的魅力、

① *P. tricuspidata* 为波士顿希尔锡爬山虎的拉丁文名称。

法国式的整齐、日本式的节俭。此外,那条蜿蜒的小路,那一块块弯曲的苗圃、以印第安纳石灰石雕刻的、咧着嘴笑的小精灵等都各具特色;还有那堵颇显突兀,名唤“大众丁香”的石雕墙,充满了深沉的智慧,您甚至可以说,显示出机智诙谐的特色。还有那些木莓,这里必须提一提木莓。巴克·弗莱特太太在本世纪中期这些平庸、毒气弥漫、令人压抑的年月,为北美大陆的渥太华市——这个拘执冥顽的北部城市带来了奇迹。对于这一奇迹,她自己是否理解?是的,她第一次完全理解了这一奇迹。

这真是个奇迹,她的好朋友这么说——但似乎谁也没提起过弗莱特太太众多的好朋友,好像她这个人有点木然,又无前途可言,根本不配有朋友似的。(传记、甚至自传,总是充满了系统性的谬误,充满了种种漏洞,若将这些漏洞连接起来,那便像一条弯弯曲曲、走势复杂的地下河流。)事实是,这个城市有许多人打心眼儿里喜欢弗莱特太太,他们欣赏她的谦逊,钦羨她的技能,特别是她在园艺方面的技能。这些朋友们说,她的花园芬芳馥郁,青葱茂盛,宁静宜人,一切都井然有序,光线与阴影交织糅合,令人心醉神迷;故而走进她的花园,世间的烦恼顿时抛于脑后。来此参观的人身临其境,有时觉得自己的心瞬间被锁住,凝神屏息地领略这朦胧而悠古的创世之景——它是伊甸园,亦是天堂。

您差不多会说,这片花园是她的孩子,她最亲爱的孩子,是她的子女中最美丽的一个,它柔顺,但又占有了它自己的全部领域,具有自身植物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她也许渴望知道这片花园真正的本性,但她更想融于其中,成为它神奇玄妙的一部分。她也许知晓它四分之一的绿色的秘密,仅此而已;然

而这花园对她却不甚了了,不知道她的历史,她的姓名,她的希望,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全身心地爱它,伸出双臂拥抱它,接受它本来的面貌: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茎,每一条根,每一种姿态。

第 六 章

工 作

1955—1964 年

W·W·克兰哈特, 法务官

渥太华, 1955 年 4 月 25 日

我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我很高兴地说, 您已故丈夫的遗嘱现已存档, 所有财产都已分割完毕。有关事项都得以迅速解决, 因为正如我在电话里对您所说, 这份遗嘱意图十分清楚, 并未附带任何棘手的条件。我相信您会发现一切都办得非常妥帖。

您若有任何问题, 尽可与我联系, 不必犹豫。您已故丈夫曾写信给我, 叫我将一密封信件转交给您, 今将此信随此份结案报告一同寄上。

您的真诚的

沃利(克兰哈特)

渥太华, 1955 年 4 月 6 日

我的亲爱的:

岁月短暂。肖特克利夫医生说我活不了几天了, 是这样吧? 当然这不是他对我说的话, 而是在我被送到综合医院后, 听他在走廊里轻轻对你说的。我的听力仍像

以前那样敏锐，这倒真奇怪。

我的头脑不如听觉那样灵敏，但对留给你和孩子们的财产我心里十分坦然。房子当然不存在问题——因为我相信你不会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尤其不愿离开你的花园——至于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也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你外出旅游会需要钱——我们为什么没出去玩过，你和我？——你也需要钱买些小小的奢侈品；对了，你也许可以把我的杓兰花标本集卖掉，我肯定它可以卖个好价钱。建议你与波士顿大学的伦纳德·李梅博士联系，其地址记在我的日记本里。我想你看了这个建议会叹气的，因为我非常清楚，杓兰属花卉不是你喜欢的品种。你会记得我们那次争吵——据我回忆，我们就吵过那一次——你认为杓兰花形态丑陋，因为它的茎秆细长、灰黑（如你所说）而它袋状的唇瓣，你则认为怪诞可笑。我当时指出（并不是我需要说），杓兰花的唇瓣具有一种狡诈的功能，即昆虫可能会很容易钻进那些唇瓣，但要想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的讨论这么多年来一直持续下来，我这教师般的嗓音总爱重重地压制一切轻率、奇异的想法。我叹息着写下这些话，哀叹我们之间说的那些话都是白费口舌。我曾经想，如果我们更坦率些，我们可能会说些什么呢？然而我甚至也哀叹自己这一想法。我的心上人，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过去的谈话常是旁敲侧击，不那么直截了当；这样的谈话使我们失去了什么？

回想起我们关于杓兰花的讨论，我很自然就联想到，你是否也这么看待我们的婚姻——将它看作一个陷阱，一个很难跳出去的陷阱。我们之间几乎从未提到过爱这

个字,我有时想,是不是因为我们之间年龄的悬殊使这个字变得傻乎乎的,或是成了我们本性中某种僵化、羞怯的东西,因而不允许说出来?对此,我表示遗憾。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尽情地使用这个字,也希望他们能敞开胸怀,接受它的力量。(艾丽丝的确让我担心,她性情太暴躁了。)

去年十月那一天,我第一次头痛得厉害,你还记得吧?我在厨房里找到你,当时你围着一条新的,很难看的塑料围裙。你立即抱住我,用手轻轻按摩我的太阳穴。那一刻,我是多么爱你。你的围裙碰到我的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它就像在唱歌,回应我心中的渴望(即便那会儿我也在渴望);它又像是在轻声催促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那时,我真想和你翩翩起舞,跳出后门,跳进花园,跳到街上,一直跳到地平线上。啊,我亲爱的,我本以为我们的时间尚多。

爱你的

巴克

渥太华,1955年5月20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您不幸丧夫,请接受我诚挚的悼问。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结识您已故的丈夫,并很珍视他每周给《记录者》寄来的稿件。您可以肯定,他这个专栏的读者——他们面广量大——将为失去可尊敬的“园艺技能先生”而深表痛惜。他那认真严肃的口吻为这个栏目带来了一种宝贵的学术意味,然而又从不给人以居高临下之感。

为了感谢您丈夫的贡献,《记录者》编辑部同仁汇集了他的文章,并专门装订成两册;一册将存于国家档案馆(当然须经您许可),一册则将在我们筹划举行的一个非正式悼念仪式上,赠送给您和您的家人。该仪式将在梅特卡夫街我们的办公室里举行,时间为六月一日下午四时三十分;这一时间是否于您方便,还望惠告。

同情您的

杰伊·W·达德利,编辑

又及:弗莱特先生的去世在这个时候似乎特别令人伤感,因为此时本城正是郁金香盛开之际。他那篇有关每年一度的郁金香节的文章是他最富有诗意的文章之一。

克莱马克斯,萨斯喀彻温省,1955年5月24日

亲爱的伯母:

收到您的信,得知伯父去世的噩耗,我们倍感忧伤。父母亲和我们几个姐妹深表同情,并告知您,他们将为您全家,也为他祈祷。不过,妈妈说,伯父的去世对您不会是一个过于沉重的打击,原因之一是他的年龄比您大很多。最近我一直在想,您的三个孩子尚未成年,又要料理一幢大房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幢名副其实的大宅子,当然我只去过一次。如此看来,您以后真够难的。回首往事,其实就像做梦一般。所以,在以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如果您恰巧需要人帮助料理家务,您可以给我来个信。我正考虑搬到东部去,因为我和我丈夫已不再吵架,双方声言作罢,主要问题是他酗酒,又懒,什么事都不做。

像我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竟被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逼得走投无路。我愿意为您料理家务,以换取食宿和每月四十元钱的薪水。我可是个挺不错的管家,如果我的确要这么评价自己的话;而且我非常喜欢烤蛋糕、馅饼、面包等等。我还喜欢洗衣、熨烫等。此外,我还能打字,您知道,每分钟能打三十五个字,那是为了通过一门函授课程,否则我也许能打六十个字。

爱您的侄女

贝弗利

又及:妈妈不知道我写信和您谈这事,所以,如果您回信的话,请寄至四二二信箱,这样信就不会寄到他们那里。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5年5月29日

最亲爱的黛西:

我真恨不得在这个信封里灌上清澈柔和的欢欣之情。我知道你这几天一定郁闷愁苦之极。呃,不,我并不知道你目前的心情——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你和巴克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却孑然一身,这份痛苦我是可以想象的,不过这种情况又能怎样呢?我可是这么过了二十年了。哎呀,它的确会过去的,我是说时间,这个卑鄙的强盗。艾丽丝明年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想想这一切在你老爸死后过得有多快。

不管怎样,我不会没完没了地在祷告时为你祈祷(哈!)再说,“时间是止痛药膏”,还有过去所有那些好笑的事情——你会从亲爱的老比恩斯那里听到许多。比恩

斯变得越来越虔诚,越来越平庸了。我妈去世时,她跟我说了不知多少安慰人的陈词老调,足以让我充填心中的裂痕,过上一个月的。老伙计,我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提醒你,你的时间还长着呢。我发现,五十岁这个年纪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可怕——这张老脸也许有那么点儿松弛如袋,皱皱巴巴,但“一切要紧的东西”仍都有条不紊,运转正常,一点儿也没遭灾。所以呢,你千万别穿上寡妇的丧服,从此一蹶不振,你这个人呐!今年冬天我们去芝加哥过上一星期,好好享受享受,你意下如何?届时我们可以看表演,住在帕尔默旅社,像猪一般好好吃一通。一月份对我比较合适——我们这个美术馆将在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闭馆,头儿“鼓励”我们通通开路。哎呀,还记得我们三年前那次,要不就是四年前,我们在纽约度过的那段时间吗?简直妙极了——那个挺逗的服务生,还有他那些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不知你当时有没有把所有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告诉巴克,有还是没有?你不用回答我——我会猜的。

好了,让我们向芝加哥进发,给我们的生活注入点活力,怎么样?会有人照看沃伦、琼妮几天的。你考虑一下。

爱你的

弗雷迪

渥太华,1955年5月29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很高兴您能参加我们为您已故丈夫举行的简短仪式。我还要补充一句,您的孩子如能前来,我们亦十分高

兴。

您对有关郁金香节的报道提出了您的建议,我们谨致深切的谢意。您能为此写几句话,我们不胜荣幸。大约五百字最为合适。我本应该聪明一些,自己提出这个建议,因为人们都传说您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著名的园艺家。

谨致诚挚美好的祝愿

杰伊·W·达德利,编辑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5年6月1日

我亲爱的老朋友:

最近几日,我们的心仍在为你悲痛。你心灵的负担沉重之极,四月失去了父亲,刚为他的灵魂祝福;而现在又失去了你亲爱的伴侣。我相信,你对你们夫妻生活的许多美好回忆,以及那些活着的你所爱的人和亲朋好友的祈祷,都将支撑着你度过未来一段黑暗的日子。尽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人,然而,时间的确能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这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迪克与我同感,这些草草写成的话表达了我俩对你的同情。(由于压力太大,他已同意调往设在克利夫兰的总部,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承受将我们亲爱的老宅子卖掉的痛苦——不幸的是,房地产市场目前很是低迷。看来石灰石已经不受人欢迎了。)

爱你的

比恩斯

渥太华,1955年6月5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您在我们昨日举行的简短仪式上发表了高雅谦和的讲话,仅写此短信以表达我们深切的谢意。我相信,您的讲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尤其是您谈到您已故丈夫对《记录者》周报的关怀,以及它在我们这个社区所象征的一切。

就我个人而言,能与您和您的三个可爱的孩子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请万勿以为您女儿艾丽丝说了我的领带,便冒犯了我。我知道,十来岁的青少年有时说话欠思考,过后便会后悔。我急切地盼望读到您有关郁金香节的文章。我想我曾经提及,写五百字较妥,但您若觉得有必要,请尽管延长或缩短。我们有许多园艺爱好者急切地等着欢迎您的见解。

诚挚的

杰·W·达,编辑

渥太华,1955年6月9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写封短信告知您,您的“初次飞行”(您这么称呼您的文章)将在下星期六的“运动与家庭”版面“降落”。从新闻写作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您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扎实稳健,却又满篇“妙语”,我最喜欢的是您描述的那些种得稀稀落落的郁金香,看上去恰如“傻瓜向野餐进军”,所言极是。

如果您同意,我们觉得或许可用“园艺技能女士”作

为您的署名。我本人对此建议略感不妥,似有不恭之嫌,这自然不是我的建议,故恳请来信告知,您是否持任何保留意见。

诚挚的

杰·达德利

渥太华,1955年6月15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您关于我们美丽的城市每年一度的郁金香节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全面,也很讨人喜欢。谨向您表示祝贺。为何说您的文章讨人喜欢?因为您提到了芬顿街上一个特别值得赞誉的屋前院子,说您曾看到院里一个“漂亮的伦勃朗风格的花坛,其背面为刷成灰色的栅栏”(第四段)。拜读大作之后,我太太和我便相信文中提及的花坛即为我们的伦勃朗风格花坛,而灰色栅栏亦为我们新近刷过的树篱;我们的花坛和树篱引起了您的注意,并被您诉诸笔墨而永存于世。

在突发植物虫疫后,如何使用杀真菌剂给土壤消毒,对此问题,您是否恰有见教?

谢谢

阿尔文·A·麦金托什

渥太华,1955年6月18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很高兴看到一篇从女性的角度评论郁金香节的文章,挺新鲜的。很喜欢您所谈的两次开花的品种,应该有

更多的人谈论这一话题。望您能将《记录者》上的这个专栏写下去。坦率地说,我过去常发现前园艺专栏作者——园艺技能先生对间种不同品种的花卉这一问题不感兴趣,而对肥料也谈得不清不楚,枯燥无味。

您的

多丽丝·格里斯沃尔德

又及:对菥蓝与单色花卉间种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克莱马克斯,萨斯喀彻温省,1955年6月25日

亲爱的伯母:

我一直翘首企盼您的来信,可一日复一日,至今尚未有此好运。说句老实话,我已经等得有点紧张不安了,因为,我不如干脆跟您说白了吧,我已经怀孕了,只是这儿还没人知道,特别是家里人,若是他们知道点风声,那简直会气死。说来话长,我是指这事发生的经过。但现在我的肚子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我得赶紧想办法,免得大家说长道短。我想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一切重新开始。到时生下孩子就送给别人收养,再凭我的打字技能找份工作。我知道,最终一切都会解决的,可问题是现在我不知如何开始,如果您知道我的意思的话。这事就好像一只巨大的轮子,我必须设法滚动它,可我就是没那份力气让它滚起来。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您或许能帮我几个月。我上次写信曾提到食宿和每月四十块钱的报酬,但我真正需要的只是食宿;实际上,您若能提供食宿,我将

非常感激。

怀着爱

您的侄女贝弗利

渥太华,1955年6月29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正如您能从所附的信中看出,您那篇谈郁金香节的文章非常成功。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您呼吁“应该更大胆的安排”这一点反应颇为热烈;而对大作的结束语:“美需要勇气,而勇气本身亦需要勇气”亦极为赞赏,说得太好了!

我真诚地希望——我的话代表编辑部全体成员——您能再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或是每月,甚至每周写一篇专栏文章,我知道我们在您丈夫刚去世时便向您提出这一请求,您可能很难毫无迟疑地作出承诺;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我妻子死了仅三年),我相信,工作是医治丧亲之痛最有效的途径。

现将您好意寄还给我们的支票再寄给您。我们必须给所有的作者支付稿酬,这是理所当然的。区区小钱,不成敬意。

您的诚挚的

杰伊

克莱马克斯,萨斯喀彻温省,1955年7月7日

亲爱的伯母:

匆匆写上几笔。我恨不得立刻见到您和孩子们,您

寄来的火车票,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是好。

深深地爱您。我的生活重新开始了,我感到挺有趣的。下星期三再见。

贝弗利

波士顿大学,1955年7月12日

我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您在信中谈到您丈夫精美的杓兰花标本集,我已看过,很是喜欢,可我觉得,如要谈购买,恐怕这份标本集尚不够齐全,亦不合我们博物馆的收藏标准,故无法接受;尤其是一些较老的品种,如蒲包花。

致以美好的祝愿和诚挚的悼念

伦纳德·李梅,生物系主任

208

渥太华,1955年8月17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我已按照您在上星期报纸上所说的方法去做了——给我的杂交茶树和四季开花的杂交花卉培土,并根据您的意见施了骨粉。到目前为止情况良好。虽然现在时季尚早,但可否给多年生的紫苑打桩支撑,不知您意见如何。

您的诚挚的

S·J·普罗沃斯特

渥太华,1955年8月18日

亲爱的弗太太: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又一篇极好的专栏文章,该文打

印得也十分规范！您说的“薄脆多汁的苹果叶”一语的确显示您很有办法。太好了。

望您安然度过这酷暑炎夏。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杰伊

珀斯，安大略省，1955年9月12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今向您的读者提供一个秘诀：如果修剪金光菊的枝叶，此花便会两次开花。实际上我在八月已这么做了。谢谢您关于白百合花的建议。我已将我的白百合花种下去了，我还非常隆重地祝福它，为它施了一点肥，希望会有最好的结果。

祝您健康

唐纳德·福尔梯尔太太

史密斯学院，北安普顿县，马萨诸塞州，

1955年9月15日

亲爱的各位：

哎呀，唔，我总算办完注册手续了，现在我感到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在话下。最后我还是被俄罗斯文学专业录取了。那位教授——大家都叫他宙斯——说，他简直不相信我在中学仅学了两年俄语就有这等水平。

这儿的每一个人不管上课下课下，到哪儿都穿百慕大运动短裤。如果贝弗利想找点缝缝补补的活干，我倒愿意再买几条穿穿。（你好哇，贝弗利，希望你心情愉快。）

我在想,咖啡色的花呢裤子(就跟烟草那颜色差不多)会和我那件高级羊毛衫很相配;也许那种带较柔和的蓝白色格子的料子最合适,不过格子不能太大。

我想“园艺技能女士”的名望与日俱增。这的确是件好事,真的,我是认真的。我以前曾说,找个人替换爸爸,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之类的话,但我的确不是认真的。整个夏天我的心情都不好,一直待在家里受热,怕出去买东西填肚子。说真的,妈那个专栏也算是一种才能的体现,您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不算您平时写的那些贝蒂·克罗克式的东西,您以前可什么事也没做过,也许您真的有什么藏而不露的才华,我是说您在写作方面。

我得赶快去图书馆,否则要关门了。我真的感到自己理解了契诃夫,我是说理解了他自己的语言,因为我突然觉得他的作品具有某种气质和深度,而这些东西在那些傻乎乎可怜的译本中是表现不出来的。

爱你们的

艾丽丝

渥太华,1955年10月5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噢,真的,读了您上星期有关如何对付病虫害及“邻里乱搞苹果树的小捣蛋鬼们”的文章,的确让我兴奋不已,同时也感谢您就如何对付沙果树提出了非常实用的建议。我最喜欢您最后一条建议:干脆把它们砍了。好主意。

贝蒂·辛格(一个真正的园艺爱好者)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5年10月6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我们希望您已故父亲的有关事宜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以圆满处理,然而,正如您所知,他的投资明细表较之绝大多数情况要复杂。这几天,我一直试图通过电话与他的遗孀取得联系,但尚未有任何回音。她提出的有关财产分割的意见已得以实施,重点是全力保护您父亲的金字塔,以便将它作为纪念他一生的“永恒的纪念物”,我们急于想请她在与遗嘱有关的几份文件上签字。您是否恰巧知道,她眼下在哪儿旅游,如果是的话,她何时能回布卢明顿?

您的诚实的

卡尔文·K·科普斯

(布雷格曼和科普斯)

211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5年11月1日

亲爱的黛西:

给你写封短信。真不走运,没找到玛丽亚的下落。乔治奥(我新交的朋友)和我星期天驱车前往莱蒙湖,发现她家门锁得严严实实。邻居们说已有足足一月没见到她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来信告知。

去芝加哥一事我已全部准备停当,还订好了房间,挺漂亮的,干嘛不住好房间呢?——你买了火车票了吗?

爱你的

弗雷迪

渥太华,1955年11月4日

亲爱的弗太太:

您打算写的那篇有关芝加哥植物暖房的文章,听起来完全适合在一月份那期上刊登,文章对莫顿植物园也挺有裨益。我自己尚未去过芝加哥这座名城,不过我知道那是一座极其美丽的城市,尽管它亦因歹徒恶棍、贪污受贿等恶名在外。我也想告知您,您若觉得自己无法再做专栏(由于生病或其他不便),我们可随时让编辑部的平济·富勒姆代替您。他通常只写有关社会事件方面的文章,但他酷爱园艺;顺便提一句,他还是您专栏文章的热烈的崇拜者。

您的

杰

北汉普顿,马萨诸塞州,1955年11月8日

亲爱的母亲:

关于那婴儿的事,我得马上对您说,您简直是糊涂透了。贝弗利想把这孩子过继给别人,然后重新开始生活,这就是她的全盘计划。沃伦现已十六岁,琼也已十四岁,把个哇哇叫的孩子弄到家里,您决没这个必要。他俩过不了多久就要上大学,您就能自由自在地和您那些女伴们到处游玩,这是您一直盼望的事。老实说,贝弗利是在利用您的慈悲心肠。她能帮些忙,这我知道,特别是您打算去芝加哥;她也能帮您打字,做点别的什么,可您也得想想她因此而得到了什么,食宿不花钱,还那么容易就

得了一张免费火车票，真够合算的。再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孩子非得放在我房间里，这么一来，我圣诞节回家该怎么办？究竟让我睡哪儿？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不过分的话。至于维多利亚这名字，既然您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名字太虚伪。我的房间里有个维多利亚，可她却是个小贱货。

烦劳您尽快将我的红羊毛衫寄来。

爱您的

艾丽丝

渥太华，12月14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您写的关于圣诞节的花木那篇文章简直好极了，读了您奋力保护长茎一品红的经过，我起先是笑，笑着笑着竟哭了起来。我这儿有一条建议，您可以转告您的读者，别让那劳神讨厌的东西沾上汽油，也不能让它吹风，或靠近散热器，这样，整个冬天它会长得很好。其实，它们长好了，老在您身边转悠，您还真会讨厌它呢，哈哈。还有，隔三岔五地再用火钳松松土。

预祝您圣诞愉快，同时也感谢您每周那些充满智慧的话。

霍利斯·桑德森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5年12月29日

黛西——

匆匆写几句话告诉你，你将会收到比恩斯给你的信，

她已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看芝加哥了。我当时根本没法拒绝她,对此你得相信我,她弄得我很难堪,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我想还是让她自己对你说吧。

另外,我们从律师那儿要来了莱蒙湖边那房子的钥匙,已在里面彻底找了一遍,这一点你尽可放心。但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玛丽亚究竟出了什么事,没有字条,什么也没有,不过,看她的衣服好像少了一些。(衣橱里的一些衣架是空的等)你已知道她从银行取钱的事——整整两千块;不过据律师说,恐怕还远不止这个数。顺便告诉你,你父亲后院里那座金字塔覆盖了一层清新的白雪,看上去倒有几分妩媚。乔治奥觉得可能有松鼠在里面做窝。松鼠小法老——你感觉怎样?

我这份圣诞礼物可真够我受的——一盏用长颈鹿脚制成的台灯;在印第安纳州,甚至整个西半球,拥有这么一盏台灯的恐怕仅我一人。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究竟从哪儿把他(她)弄来的?我想你又变成过去那个黛西了——不过我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收养了个孩子。咳。

不久再见面吧

弗雷迪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6年1月10日

弗雷迪肯定已向你谈了我的情况,就是迪克那位在克利夫兰的小“女朋友”;算了,我不想在这邮政明信片上详谈此事,只想离开两个星期,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已从市场上将房子抽回——不管怎样这是我的一

个决定。下星期二在帕尔默旅馆见。

爱你的

比恩斯

渥太华,1956年2月2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只是想告诉您,您有关芝加哥一些花园的文章按下了我丈夫的魔力电钮。大家都喜欢外出旅游,而我这位大人物对此却讨厌之极。但是,读了您有关莫顿植物园的介绍后,他便决定我们去一趟,亲眼看看它,所以我们准备四月份驱车前往。您又回来了,我很高兴。那个叫平济什么的,对哈里森蔷薇与波斯蔷薇的异同根本一窍不通。

您的一个忠实的读者

北汉普顿,马萨诸塞州,1956年4月6日

亲爱的各位:

很抱歉最近没写信回去,不过我这段时间学俄罗斯文学学得很糟,而且跟我那个教授(讨厌的家伙)和室友雪莉相处得也不愉快;雪莉则被她的男朋友(又一个讨厌的家伙)搞得闷闷不乐。再说,最近这儿雨也下个不停。我打算换个专业,学西班牙语,或社会学,或教育学,可我想到的专业似乎没一个合适的。

爱你的

艾丽丝

北汉普顿,马萨诸塞州,1956年4月20日

亲爱的母亲:

只是想告诉您,我的心情好多了。您要来看我,我很高兴,特别是我知道您以前从未坐过飞机,怕飞机出事怕得要命。我想您说得不错,我之所以心情不好还是因为爸爸,因为他刚去世一年,整一年。我曾和我的俄语教授长谈过一次。他说,他完全能理解我的感觉;有关此类周年纪念日的事情在感情上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冲击。他还说,如果我的期末论文迟些交也没关系。

我还是决定继续学俄罗斯文学专业,现已学到果戈理。他的灵魂太伟大了,体现了俄罗斯伟大的灵魂。

向沃伦、琼和贝弗利、特别是维多利亚转达我的爱,并告诉他们,我很快会再写信回去。

艾丽丝

又及:忘了评价您新做的发式了——妙极了,把您的脖子衬细了。您有没有想过染一染白发。

渥太华,1956年9月3日

亲爱的弗太太:

不知您是否有意与《记录者》编辑部同仁在出版社俱乐部共进一年一度的晚餐,时间为九月二十日晚间七时。平济·富勒姆每年都筹办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会准备许多优美的歌曲和幽默的故事、笑话等。如您有意参加我们的晚餐会,或许我能开车前来接您。请务必答复我。

杰

渥太华,1956年11月14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总算有人帮我解决了黑胫病问题。对蓟马科虫害您有何见教?

一个忠实的读者

北汉普顿,马萨诸塞州,1956年11月20日

大家好。期中考试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只想祝维多利亚一周岁生日愉快,真想马上见到她。

艾丽丝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6年12月20日

希望你能在圣诞节前收到这封信,祝大家节日快乐。比恩斯和我正考虑二月份去新奥尔良。你意下如何?反正跟乔治奥是全结束了。老是要抑制自己的胃口,我真是烦透了,还得伪装自己,充当他忸忸怩怩的小姑娘。

祝你祥和、愉快……

弗雷迪

渥太华,1957年1月15日

亲爱的黛西:

《记录者》编辑部各位都很喜欢你谈仙人掌嫁接的那篇文章——这是冬季搞园艺的人一个很好的话题。平济·富勒姆画了几幅插图(随信寄上请你审阅),因为他认为插图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中较为困难的步骤。他曾对我说

过,从很早起他便迷上了仙人掌,且对树木也很有研究。

你的亲爱的

杰

渥太华,1957年2月7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感谢您对我那些仙人掌插图的赞赏。不是自夸,我认为读者很喜欢我那几幅插图,它们使整个版面活泼了许多。至于在您去新奥尔良期间由我代替您做这个专栏,我将非常乐意。我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再说,老是写那些地方选举、校董事会吵架之类的事也真够腻的。

诚挚的

平济·富勒姆

218

渥太华,1957年6月30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很喜欢您《坚定不移地种好福禄考植物》一文。我已将它剪下收藏,还为我在卡尔加里市的弟媳买了一本,她看了定会兴奋不已的。

诚挚的

露丝·亨宁,一个正在受训的、
羞怯然而坚定的园艺爱好者

汉诺威,学院,1957年9月19日

想不到宿舍里这么吵闹,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已安顿下来,生活得很好。这儿天气好极了,贝弗利学商业

真是一大新闻，她会学得很棒的。

爱你们大家，特别是维基。

沃伦

又及：您说过明信片也可以的。

渥太华，1958年12月2日

亲爱的园艺女士，我亲爱的技能女士，
我多么、多么爱您
您心地善良、技能娴熟，致力于绿色世界，
我多爱您那浇水壶、肥料丸，啊，我多爱
翻阅这些柔软的纸面，在其中找到您
永远在印章与桥之间
在秘诀与宗教之间找到您
绿色的踪影，善良的心灵；啊，上星期
您用浸湿的布片
将那碧绿、碧绿的树叶擦净
它们多么晶莹闪亮，多么柔嫩，向着空气
敞开绿色的细孔，您说，您就像
擦洗婴儿的双手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啊，但愿我是
您的孩子
向着光明和善良被擦洗得干净、纯洁
如此我也会幸福，也无需任何东西；啊
我多么爱您，需要您，优雅、圣洁的
园艺技能女士

阿依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8年1月15日

黛西——你真会恨死我的,可我二月还是去不了佛罗里达。猜猜为什么——我要结婚了。是的,结婚!希望你这会儿还站着,呼吸得好好的。比恩斯说我脑筋错乱了,可我想你会喜欢梅尔的。他是个实验室教师,离过婚的,头发挺漂亮,还能在伤感歌曲四重唱中唱男中音,情况就这些。所以,你就别去佛罗里达晒太阳了,干脆到印第安纳州来参加我的婚礼吧。婚礼在法庭就举行五分钟,再快不过,可随后的盛大宴会可是你从未见过的。成桶成桶的香槟,如海的香槟。

爱你

弗雷迪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8年1月17日

就几句话。你还是得去参加那场婚礼,不过事后我们这两个老姑娘(你和我)可以南下到佛罗里达玩一个星期。(弗雷迪说,你已不再怕坐飞机了。)我需要晒晒太阳。希望梅尔能适合弗雷迪,他人不错,但毕竟离过两次婚!!!

比恩斯

渥太华,1958年3月4日

亲爱的黛:

你那篇谈棕榈树的文章《神秘的树》,写得非常精彩;

而读者对平济的插图也反应极好。

如果你能喜欢看一场《茶叶与同情》，那再好不过。
别人给了我两张票，是三月十五号的。

杰

渥太华，1958年6月2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您对天竺葵的赞美使我倍受感动。这些粗壮、意志坚强的宝贝们伴随着我度过了婚后五十个年头。它们静静地待在窗台上，陪着我削马铃薯皮准备晚餐，让我开心，给我鼓励。我丈夫在世时无法想象晚餐盘中看不到马铃薯，他就是这么个人。可如今，唉，我孤身一人，呆在人们所说的退隐之家——夕阳庄园，如果您相信的话；所以，我也用不着再削马铃薯了，可我仍在窗台上种满了鲜艳、美丽的小花小草。与您一样，我也喜欢用手指搓捻枯萎的花朵，闻它们的香味，只是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事听起来真不可思议。

诚挚的

艾丽丝·W·基弗

渥太华，1959年4月27日

亲爱的黛：

非常感谢你请我吃复活节晚餐。你真幸福，有这么个欢乐的家庭：一头红发的艾丽丝、害羞的沃伦、可爱的琼、你的侄女贝弗利，还有维多利亚那小家伙。当时我几乎忘了坐下来与一个真正的家庭共进假日晚餐，忘了去

享受这份乐趣。这顿饭真是太丰盛了！艾丽丝当时要“好好看看我”，请别以为她弄得我很难堪。

你的

杰

又及：希望下星期二仍没问题。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9年11月14日

黛西——

你的律师那天打电话来谈莱蒙湖边那所房子的事。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买主，但对方要求推倒金字塔，重新填好那块地方。你能否告诉我你对此事的看法，我们要不要进行下去？他们显然不需玛丽亚的签字便可出售这房子。万一她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也可以采取补救措施。

爱你的

弗雷迪(梅尔问你好)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59年12月13日

黛西：

梅尔和我祝你圣诞愉快。我已把你的意见转告给那些地产商。不，我认为你没疯。既然不需要用钱，为何匆匆将房子卖掉？当然，我也许要提醒你注意，这座金字塔似乎已引起了摧残艺术的人的注意，还可能遭到霜雪的侵蚀。祝你在下一个十年里幸福。有谁会想到我会变成个“结了婚的小妇人”，而你会成为一名“职业妇女”。不管怎么说，你还是适合做一名职业妇女。比恩斯和我如

果没在别的什么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对你倒都有同感——你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爱你

弗雷迪

渥太华,1960年4月3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哇,您在“是不是植物养料”一文中所谈的问题还真有点道理。我妻子和我在这个问题上已争吵了多年。因此,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今寄上(附在信中)将藻类植物清除出睡莲池塘(如果您有的话)的办法,别再让它们进来!告诉您的读者,他们能在任何苗圃店或五金铺买到硫酸铜。

再见,谢谢

罗曼·马特里斯基

渥太华,1960年8月12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真的很欣赏您与蚂蚁群所作的精采斗争,还有您关于欧洲叶芽虫那些富有启发性的话。您能将普通的事情说得有声有色,确有才华。

感激您的

南渥太华一位对杂草、虫子厌烦透了的人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60年11月4日

你好。刚收到艾丽丝的结婚请帖。我热烈盼望着参

加她的婚礼。我准备按你所说,带“一位客人”一起去。
我们打算飞过去,不坐火车。他可是个大富翁。

比恩斯

渥太华,1960年12月15日

亲爱的黛:

刚刚和平济谈过,他说他很乐意暂代你做专栏,直至你女儿婚礼结束。我知道这种事要做大量的准备、筹划工作。平济搞到了一些有关蕨类植物的资料,挺有趣的;蕨类植物看来又要卷土重来了。如果我能帮什么忙,请来信告知。

你的

杰

渥太华,1961年1月22日

我亲爱的黛:

请原谅,但我必须诉诸文字。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杰

汉普斯特德,英格兰,1961年4月20日

亲爱的母亲:

我们在这所小屋子里过得挺快活。我从未想到自己会这么幸福,即便是这儿的地址听起来也挺有诗意:布鲁尔伊巷一号。您觉得怎样!我想我活了这么大一直有那么点儿疯疯癫癫的,可现在我突然便好了。我打算一辈

子住在这儿,在这生儿育女,写契诃夫,过安乐的日子,保持清醒的头脑。谢谢您寄来的维多利亚的照片;只要想一想她,我心里就兴奋不已。得知您和比恩斯、弗雷迪决定今年去百慕大,我也很高兴。本和我一道向您问好。

艾丽丝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62年5月15日

黛西:

很高兴我们终于能参加施洗礼仪式。艾丽丝看起来很漂亮——嘿,她变得温柔了——小本也挺帅。(想必他们已回到汉普斯特德了)再说,终于和杰见面也很令人开心。是的,你说得不错,他的笑声的确很有意味,给人老于世故的感觉。此外,一个男人知道有关“伊万·斯卡温斯基·斯卡伐”的所有词语,倒也挺讨人喜欢的。他和梅尔有许多共同之处,我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在我们这个年纪,竟然大家都有情人,这岂不是件怪事,当然,我看梅尔已不够资格做情人了,因为他已为人之夫。顺便告诉你,比恩斯和布里克已谈到教堂的报婚钟这一步了。我本希望自己能对他有好感,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做不到。你觉得他怎样?倒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也不是因为他戴的那些其丑无比的领带,对吧?也许是因为他嘲笑肯尼迪一家的样子,也许是他戴的那枚西格马奇戒指,也许他什么都不好。

爱你

弗雷迪

渥太华,1963年6月6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牡丹虽美,但令人讨厌,对此看法我绝对赞成。这种花最讨厌的地方就在于它们不愿意挪窝,这也是为什么我丈夫和我欢迎您上星期提出的建议的原因。非常感谢,您的确是最棒的。

奥德利·拉罗奇(太太)

渥太华,1963年8月15日

亲爱的园艺技能女士:

您那篇谈蜀葵的文章简直妙极了。有关它们“镶着饰边的紧身连衣裙”和它们“害羞的、毛茸茸的茎秆”那一部分我很喜欢。我已经多年没在院子里种蜀葵了,但读了您那篇专栏文章,我径直跑到外面买了一包种子,尽管今年下种已为时过晚。

多谢了

莉迪亚·尼加德

渥太华,1963年11月25日

最亲爱的黛:

打电话没找到你,故匆匆写上几句。下星期“运动与家庭”这一栏目的大部分版面将因肯尼迪的报道而取消——因此我们将在下下个星期再刊登你有关岩石庭院的文章。这是个什么世道,一切都像散了架似的。

你的

杰

渥太华,1964年1月25日

亲爱的黛:

对这次的误会我很抱歉。现在我当然已意识到,当时就不应该在电话里对你说这事。我就知道你会失望,但没想到你会把这事看得那么严重。你一直在说,需要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要更多的时间外出旅游,或许去英国看看女儿什么的。希望我们能跟往常一样在星期二见面,像两个明智的人那样谈谈这个问题。

你的

杰

渥太华,1964年2月6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我仔细看了您的来信,因而非常理解您的感情,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但我相信杰已将报社的规定向您作了解释,即专职编辑可优先选择栏目。您自己非常清楚,您多次外出,而在您外出期间,一直是我做这个园艺栏目。对您说句老实话,读者已给我写了许多赞扬的信件,他们特别喜欢我的专栏配有插图,且是从男性这个角度看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这种感觉,即一份地方性报纸应是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有机体,而不应陷入僵化的模式之中。让我们这么来看:我们的读者总是在变,因此我们也必须变。您已做了九年的园艺技能女士,我相信您也欢迎某种改变。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詹姆斯(平济)·富勒姆

1964年2月20日

亲爱的黛:

对这一切,我深表歉意。我也的确认为,报社的政策委实荒唐,但这项政策在我的前任期间就已实施,这事与你作为专栏作者的能力毫不相干,对此你应该非常清楚。问题是,平济作为专栏编辑,只要他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才能,就有优先选择某个固定栏目的权利。我无法向你说清我对这事有多遗憾,可我也爱莫能助。

希望我们尽快见面,谈谈别的事情。我觉得你对此事太情绪化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你的

杰

1964年2月28日

亲爱的弗莱特太太:

谢谢您的来信。不过,我恐怕不愿在这个时候改变主意。坦率地说,我搞城市政策方面的报道搞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需要换个领域,甚至我的医生也建议我改变一下。我认为,您干了那么多年也急于要改变一下;变化才使我们永葆青春。

您的诚挚的

平济·富勒姆

又及:正如我早先对您所说,我不希望如此拒绝您会影响

我们之间的友谊。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64年3月28日

黛西:

比恩斯和我真感到纳闷,你是不是折断了自己的手腕。我俩好长时间没收到你的信了——写一两句话来好吗?

弗雷迪

汉普斯特德,英格兰,1964年4月10日

自您上次写信以来已过了好几个星期,希望您一切都好。英国这儿正是春天,美极了。朱迪已长到十二磅。您一切都好吗?我还是有点担心。您几个星期没来信,出了什么事?

爱您的

艾丽丝、本、本济和小朱迪

第七章

悲 伤

1965 年

一九六五年这一年是弗莱特太太极度消沉的一年。她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十分突然，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夜之间的事。她的家人和朋友在一旁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她这个平时沉着、冷静的人变得恍恍惚惚，继而离群索居，不与他人来往，还会突然发怒——源于情绪受到伤害的暴怒。在这段时间，她的外表失去了魅力，当然她还不至于显出一副绝望的面容，然而仁慈、美德毕竟不足以抵御恶魔的侵袭；您瞧，那仁慈美德太好了，好得简直傻乎乎的。一个每次睡不了一二个小时，饮食习惯也完全被打乱了的人，外表上很快便会变得憔悴、邋遢——您见过这种人，弗莱特太太也见过，他们拖着蹒跚的脚步走在公园的边沿，或坐在吹头发的吹风机下；他们脸皮下垂，衣着不整，看上去总需要好好修整一番。您很想跑到这些坠入地狱的灵魂面前，给他们以慰藉，然而，他们四周却弥漫着一种令人懊恼的、颓唐衰败的气氛，那几乎是一种气味。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和夏天，在那几个月里，弗莱特太太的情况非常糟糕。她沿着一条轨道一天天滑下去——先是万念俱灰，继而冷冰冰地沉默无语，再后来急转直下，怀恨、抱怨他人，遗世孤立，完全断绝了与儿女、孙子孙女、以及许多朋友、熟人的来往。

弗莱特太太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人们曾首先想到的是女人停经这一生理现象,但不对。一九六五年黛西·弗莱特五十九岁,快六十岁的人了,她的内分泌从未特别活跃过(有人这么说),而自从她四十九岁生日以后,一直非常稳定,如时钟一般(还有的人这么说)。她家里的一些人曾认为,她似乎患上了“迟来的哀伤”症,但这也不对。她一直深深地想念着她亲爱的巴克,这当然毫无疑问。她以想念他为荣,而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每次她在掌心里揉搓一滴杰根斯洗涤液时,她总是笑眯眯地回想着他,让自己飘回到那一时刻——那个非常隐秘的时刻,一个她决不会对任何人谈起的时刻,尽管她在此写了下来——在那一时刻,他称赞她关节柔和的手指,将它们比作漂亮、灵活、柔和的鱼。

鱼?这真是个令人惊奇的想法。她一下愣住了,因为那时她并不完全同意鱼和手指间有多少相似之处,但她至少能理解丈夫对诗歌的爱好。然而,她真的朝思暮想她那死去的伴侣?真的渴望得到那种心灵的宁静——那种由他们简单、乏味的爱情所赋予的宁静?在她所能支配的时间里,究竟有多少倒流到他俩共同度过的年月,即他们夫妻生活的二十年之中?

老实说,很少。好了,我已说明了。

她目前精神上的消沉,心与头脑的狂躁、紊乱,理智的沉沦,以及健康状况的恶化——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某种神秘的苦难的中心,而她周围的人只能对它加以注意、考虑、揣度而已。

艾丽丝的说法

十九岁那年,就在我差不多快变成某一类人时,我遇上了

一件事,于是我就变了,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刻在古典柱子顶部的那种东西一成不变。前不久,我读到——也许在星期天版的报纸上——一个美国女人的故事。一天早晨,她起床后便练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所有的字母都向后斜,而不是向前倾斜,特别注意书写字母中较小的、较为密集的圆圈。她这种书写方式简直和绘画差不多。她用这种不同寻常的书写方式将自己的名字写了十二遍,然后又写宪法序言和葛底斯堡演说。到了中午,她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在我身上发生的变化比书法带来的变化要深刻得多,也远远超出了诸如新发型、节食养生法等给人带来的表面的变化,尽管我在十九岁那年的确曾决定留长发,这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流行的发式,我也的确曾忌肉类和白糖,还戒了烟。

当时是夏天,是我在大学里念完第一年后回家的那个夏天。实际上是我回家的第一个早晨。就在我们渥太华那所寂静、破烂的大房子里,我一早醒来,怔怔地盯着天花板——那上面有个又长又圆的破裂处,形状活像老太婆后背隆起的肉峰,顶部高耸、呈圆形,下部逐渐变窄。自打我记事时起,很小很小的时候,那块破裂的天花板就一直在那儿。我一早醒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它,晚上最后看到的还是它;这个灰泥涂成的、如碑刻般的東西悬吊在我的上方,显得那样狰狞、恐怖。倒并不是我害怕这种女巫般丑陋的图形,真的不是——我非常清楚,说这种图形像人,那只是一种幻觉,一种自己臆想出来的东西。我还知道,其他一些人,即那些比较快乐的人,他们看到的也许是一条河,而不是一条病态的脊柱;或者看到的是一幅被掩埋的次大陆地图,如果再加點想象的话,看到的是

一座中国式的宝塔山,那塔顶是一个起泡的奶油做成的疙瘩。我们能看到我们想象的一切东西。我们的想象即来自我们最隐秘的各种需求,这些都是您在心理学概论中学到的东西(在我们学院它是一门必修课)。不,我怕的不是这些,那破裂的天花板之所以让我害怕,是因为它的执拗——它老是在那儿,硬是要陪着我,成为我的一部分。

我从地下室将梯子拖来,指望能够得着它(我们那所老房子的天花板简直高得离奇)。我又在花园小棚屋的一个架子上找到了一盒泥瓦匠涂墙用的灰泥,将它搅拌成一大团。又从厨房一个抽屉里找来刮刀,再一步一步移动梯子,将灰泥全部盖在了那块破裂的天花板上。我以前从未干过这种活,但我仔细看过灰泥盒子上的说明,最后倒也干得干净利落。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一个格外整洁、干净的人。“卷面整洁”是我的老师们在我论文最后常写的评语,还有“重点突出”及“充满活力”。

半个小时后,灰泥全干了,我使用沙纸将它磨光,让那些细细的沙粒洒落在我的头上,脸上,我吸进这些粉笔灰般的尘埃,用舌头品尝它的味道。我不觉得那味道很糟糕,相反还觉得挺不错的。接着,我又找来一个滚筒刷,将它固定在一根伸缩杆上,刷了天花板。到那天下午四点钟,我将天花板整个地刷了一遍;晚上睡觉前又刷了第二遍。

干完后,我便在黑暗中躺下。浓烈的乳胶漆味乱纷纷扑下来,会聚在半空中,准备疯狂地、酣畅地飘落开来。闻着这股味道,我差不多有点醉了。瞌睡很快向我袭来,我欢迎它,因为我急切地盼望早晨的到来,我要在曙光微露时醒来,神清目爽地看到我给这屋子带来的变化。

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真的，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这一大家子没有一个反对我修补、油漆卧室天花板的决心，甚至根本没人问我为什么要用梯子，为什么要在那小棚子里翻箱倒柜找油漆滚筒，询问我这种行为究竟是心血来潮，还是义不容辞、具有某种寓意的行为。全家人都赞成我做这件事，这使我十分惊讶。我母亲当然是在忙着为本地报纸写每周的园艺专栏文章（她的署名是园艺技能女士），我的弟妹们兴致勃勃地看着我做，或许心里还有点忌妒——为什么他们就想不到要修缮一下自己的卧室！贝弗利姐姐（她是一年前搬过来和我们同住的）则帮我在地毯上铺好报纸，还就如何油漆那些很难够得着的角落提出了挺有用的建议。至于我父亲，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给我泼冷水，不让我去做这种又脏又乏味的事，尤其是因为我是头一天回家；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会理解驱使我干下去的那股子动力。

仅在一天之内我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么说来，我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简单的道理并未大叫着要求对其作出解释，没有，它径直钻入我的血液之中，如同海洛因那样强劲有力，我完全能感到它在抽动、翻涌，使我的血脉变得如玻璃一般洁净光亮。那天早晨我醒来时，心里本感抑郁，颇有宿命论那种狭隘的感觉，然而此时，我却能在自己意志的风暴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的双眼一定会看到一片雪白、柔滑、充满了各种机遇的景象。过去那块令我恐惧的天花板，此刻已萎缩变小，成了记忆中的东西了。我并不仅仅是将它整个地油漆过，而是将它完全消除了，似乎它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事过后，我便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善待他人。我本不是个与人为善之人，但我相信：我能学。

首先,我把自己过去的日记,包括我在大学期间写给家里的信(全是些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话)全都扔进壁炉,付之一炬。这事被我母亲发现后,她十分关心地对我说,你也许会后悔的,因为你总会回想过去,看看自己十岁、十二岁,或是十六岁时是个什么样子。

然而,我知道自己并不需要这些日记或信件来刺激我的记忆。我以前曾是个小心眼、霸道的孩子,我很自私。我喜欢伤害别人的感情。我曾把我的妹妹琼称为“鬼鬼祟祟的小裤头”,将弟弟沃伦喊作“鼻子疙瘩”,我还把贝弗利姐姐使唤来使唤去,好像她是跟我们家签了合同的佣人,她女儿出世后那几个月,我还抱怨小家伙哇哇乱哭。其实,她女儿那时只是肚子疼才哭的,而我却编出话来,说她受了虐待,或是脑袋坏了什么的。我还一直从报纸上为母亲剪了许多节制饮食的文章,然后以虚伪、狡诈的声音读给母亲听,至于她在报纸上写的那些文章,我总是将它们说成“褊狭的破布块”。我记得自己这副德行。人们喜欢把记忆看作低缓、平静的港湾,而我自己的记忆却更像一个兴波作浪的大湖,猛烈冲击着我,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能体谅别人的人。

于是我警觉起来;我仔细倾听我脑袋里那台马达,倾听它断断续续的嘀嗒声。它就像在数珠子,在干一项挺复杂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开始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可这年结束时,我已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了。至于女人,据我所知,她们确有必要言辞过激,不合情理,然而她们却没有必要卑鄙、自私。

我以前那些自私、损人的行为在家里并未引起多么强烈的反感,这使我挺觉意外,似乎这一切只是远处偶尔传来的钟声,似乎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体谅我,为我说好话:艾丽丝

变得成熟了,他们说。艾丽丝成了一个真正的姑娘,艾丽丝长大成人了,艾丽丝脾气也变好了。艾丽丝不那么盛气凌人,趾高气扬,也不那么尖酸刻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艾丽丝骨子里一直是个虚情假意的圆滑之人,是不是?瞧,她现在变了,变成个挺惹人爱的姑娘了。嘿,您完全可以信赖她,任何时候都可以信赖她。

可不是!

下面是我父亲去世前后的家庭状况。

在父亲死前(死于脑瘤,恶性的),我们家是个甜甜蜜蜜的小家庭:充满爱心的父母和三个健康活泼的孩子。我们的父亲是农业研究所所长。他对杂交粮种的研究曾受到普遍赞扬(归尔甫大学和衣阿华大学曾分别向他授予名誉学位)。即便退休后,他也从未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一直为渥太华的《记录者》周报撰写每周园艺专栏。我母亲比父亲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这一年龄的差别却成了她的嗜好和职业——做老丈夫的小妻子,因而她一直保持了姑娘的性格,成为少女时代这一塔楼里的住户。她在那里住了下来,既安全又有人照顾。她待在家里照看孩子,缝缝补补,清扫房间——尽管她请得起帮手——还整理花园。这是她自己的花园。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花园发挥着某种比喻的作用。她做晚餐,烤肉、煮蔬菜、做馅饼和布丁,或是用模子做成的吉露牌果子冻做甜食。这些饭菜都经过事先计划,而不是临时凑成的。我们全家坐在摆好饭菜的桌上用餐。对于餐桌中央的装饰,母亲总是不断设计新的方案。她好像是那些对餐桌中央装饰循规蹈矩的中世纪妇女。吃饭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很讲礼仪规矩,总是尽量压低嗓音;饭后,琼妮、沃

伦和我总是不用提醒,便自觉地去做作业。每星期三晚上,一个名叫默纳·拉斯马森的女士来给我们上钢琴课,我们在她背后管她叫“大木莓”,这个绰号恰如其分,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的孩子,会搞些什么名堂。到了星期天,我们全家便出去散步——在我们认识的人中,还没有哪家集体外出散步的——每逢这时,父母亲便在无意中教会我们识别附近街上或是实验农场树林里各种各样的灌木、树木、花草等。

父亲去世后,甚至在他接受诊治的那几个月里,家里很快就变了样。晚餐不是开迟了,就是开早了;有时我们干脆就在厨房里吃晚饭,而不是在餐厅里,吃的是罐装牛肉丁,或是烤奶酪三明治一类的食物。母亲似乎总是围着围裙,我们得提醒她,否则她准会围了围裙跑到外面去。她很长时间没给屋子吸尘,一切都耽搁了下来,连她心爱的非洲紫罗兰也枯死了,甚至还包括她的厥类植物。家务事耽搁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母亲内心哀伤,这是很自然的;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家里发生变故的原因。父亲葬礼举行后仅两个月,母亲便承担了撰写《记录者》周报园艺专栏这一工作,成了园艺技能女士。她忽然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了名职业妇女;正如人们在那离奇古怪的年代里所说,一名“离家外出”工作的妇女。不过,她实际上还是待在家里写文章,然后在星期三下午走到托林顿克雷森特街角上,将她的专栏文章投进邮筒,以赶上星期六出版的《记录者》周报。究竟是《记录者》的编辑邀请她做这个专栏,还是她主动要求做的,我一直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她突然间便坐到了客厅一个角落里的书桌旁(那是父亲的一张桌子),拿着圆珠笔,埋头写起文章来,偶尔还抬起头来揉揉额头,像是在绞尽脑汁,要想出一个既符合植物学的事实,又令

读者满意的答案来。有时,她也会站起身,信步走到窗前站一会儿,再回到桌旁,她那宽大的臀部舒舒服服地往椅子里一坐,又重新写下去。对这一类型的写作,她好像很有点窍门,这使大家都很吃惊。她干写作一事似乎挺偶然——偶然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进入了自己真正的生活。

后来,萨斯喀彻温的贝弗利堂姐坐火车来了。她已有六个月身孕,体态庞大,简直像扇谷仓的大门板,住进了三楼的贮藏室里。贝弗利原打算把孩子给人寄养,但这一计划再也没有付诸实施,这事根本连提也没再提起过。维多利亚出生了,她是个足月生下的漂亮娃娃,后来一直就住在我们家。她起初睡在我房间的一个篮子里,后来贝弗利将楼下的那间日光浴室改造成了育婴室——将原先的常青藤图案的糊墙纸换成了小羊羔和挤奶女工。

这一切来得都很快。一九五四年那会儿,我们这个家还是个幸福而普通的家庭:巴克·弗莱特夫妇和他们三个听话的孩子。后来,仿佛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们这所房子——只剩下母亲(心烦意乱,心事重重)和一个未婚妈妈、一个患有腹痛症的婴儿、三个十来岁的孩子:诡计多端的琼、闷闷不乐的沃伦和自私自利的艾丽丝。

也许您以为我母亲会因这一系列变故而心神错乱,那您就想错了。她将一九五五年袭击我们家的这场混乱,看作是一个排山倒海、热情友好的巨大波浪,让它径直从自己身上滚过,而她则在浪里跳动着浮出了水面,冲着阳光抬起那张圆朴朴的脸,露出快乐的神色。

对于父亲的死,我们也不是没难过。

父亲身材高大,背有些弓,长得也挺帅的,七十多岁时头

发仍是密匝匝的；他总是将自己这一头浓发往后梳——这是那会儿美洲大陆一种古怪的发式。他的前额白皙、洁净，虽然硬邦邦的，却闪着柔和的光。他的脖子宽宽的，扣上领子，打上领带，显得挺好看，但他的长胳膊长腿，他那粗犷、率直的性格却又告诉您，他曾经是个乡下孩子——一个在马尼托巴的乡村长大、出生于另一个世纪的乡下孩子。尽管他温和仁慈，也很有耐心，可我还是觉得他是个令人发窘的父亲，他太客气，太喜欢清嗓子，那副身体也太不自在，又太老。然而他去世后，我却很怀念他。

我母亲也很怀念他。在他葬礼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她精神不振，心情沉重，仿佛是隔着一层不透气的膜拼命呼吸一般，她的经历、婚姻，她的一切都随着飞流而下的瀑布被冲得无影无踪。然而一转眼，她却变成了园艺技能女士。她过去的自我如同一件太大的、不合身的外衣从她身上脱落下来。

几年来，她每天上午坐在书桌旁，但仍和以前一样，身着长袍、脚穿拖鞋，以普通书写法写她的专栏文章，先是初稿，然后是第二稿、第三稿，再检查贝弗利姐姐打出来的底稿。她那锈色和灰色相杂的头发散落在前额和耳朵上，她有时在坐下工作之前梳一梳头发，但有时也不。她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忘了一切，甚至听不到电话铃声；我们几个谁也没想到她竟能如此专心致志。她写的文章，比如说，这个星期写半边莲的繁殖，下个星期则写如何以空气压条法培植橡胶植物。当她不写文章时，她便给读者写回信——她每星期给读者的回信至少为二十封；如果不写回信，她便考虑新的想法，或是将园艺方面的信息资料存进父亲那只旧的档案柜里。她就这么整整干了九个年头，而如今，突然间，这一切又结束了。

她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一个叫平济·富勒姆的男人抢走了我母亲的专栏,五十九岁的母亲于是被免了职。她拿到了解雇通知书,她被开掉了——被扔进了更深、更痛苦、更加空荡苍茫的绝望之中;这种绝望不是她丈夫的死和孩子的品行不端给她带来的痛苦可以比拟的。一年前,她还坐在那张书桌前,头发像是什么活物在她头上飘来摆去,那枝圆珠笔唰唰地爬过纸面,她还是园艺技能女士,本地的著名人物;而现在,她又重新做起了弗莱特太太。她只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体尝到了工作的滋味,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先将稿件装入信封时的那份感觉,然后便是寄来的稿酬支票。而如今,她就像一个巨大而悲哀的百货公司,显出一副沮丧、茫然的外表——宽大的窗户悄无声息地反射着日光,一把挂锁锁了门,倒闭了。

我住在几千英里之外的英国——准确地说,住在汉普斯特德——可我已离开我亲爱的丈夫本整整三个星期了,还把两个小不点儿本济和朱迪也撂在家里。我远道回娘家看看家人情况如何,结果发现母亲坐在花园的一张柳条椅里,双手紧紧抓着扶手,苍老的下巴奇怪地陷了进去,那张圆圆的、孤弱无助的嘴喃喃说道:“现在这样我没法习惯,没法摆脱心中的痛苦。”

弗雷迪·霍伊特的说法

您并不认为艾丽丝·弗莱特·唐宁会相信她母亲目前的真实状况,对吧?

当然,她爱她的母亲,她也是个好女儿,她不是越洋过海回来,想让母亲开心,帮她摆脱目前悲观失望的状况吗? 问题

是,艾丽丝不知从何着手。令人奇怪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对她母亲了解的时间还不够长,也没有我了解她母亲那么多。我和她母亲自打小时在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市时便认识了,那时我俩都是十一岁的小姑娘,扎着马尾巴辫——呃,实际上,扎马尾巴辫的是我,黛西倒是一头自来髻。她恨自己的头发,天呐!她称自己是个会滚的卷毛球。后来,长波浪发式流行起来,这使她挺开心,但到那时,也就是四十年代后期,她已移居加拿大,和一个叫巴克·弗莱特的男人结了婚,还生了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就是艾丽丝。

艾丽丝拿自己也没办法,她是铁了心要工作的。她不像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姑娘,在传统观念与反叛的冲动之间摇摆;她有自己严肃认真的追求目标,对此,她有时多少也会故作庄重,如说教般谈上一通。她二十八岁年纪,您会认为她一准和那些嬉皮士花孩^①呆在一起,是吧?侈谈和平、爱情,在公共场所闲荡,胡乱弹奏吉他,抽大麻,就这么快快活活地打发一辈子。您错了,她可不是这样的人。她很稳妥,和一个搞经济学的小教授结了婚,住在英国一所神话般美丽的小房子里。她已生了两个无比可爱的孩子,还出版了《契诃夫的幻想》一书,小获成功,眼下又在撰写另一本有关契诃夫女性题材小说的书——至于这一新选题的内容,她已在附在圣诞贺卡里的信中向我作了介绍。有关她的另外一件事,便是她每年都寄一些圣诞贺卡。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将天各一方的家人和朋友紧紧地团在一起。她的仁爱之心甚至想到了她母亲做姑娘时的朋友,主要是我和拉比娜·格林·杜克斯。拉

^① 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嬉皮士,以花朵象征其主张,故有此称。

比娜最近搬到了南边的佛罗里达,她以前曾在我面前将艾丽丝说成是“圣洁的正直小姐”。

艾丽丝在她写给我的小字条和贺卡中称我为弗雷迪“阿姨”,而在这阿姨的称呼里,我能品出她对所有权的要求及亲切、敬重的情感,当然还有爱。我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渥太华,在小朱迪的施洗礼仪式上。那次的施洗礼仪式是对艾丽丝心灵的又一次撞击。她是个不可知论者,但她仍给自己的孩子施洗礼。她其实是将孩子带过大西洋到加拿大,在纯洁或不纯洁的家人及朋友面前,以加拿大纯洁的圣水给孩子施洗礼。她说道,仪式是社会的胶合剂,它将最肤浅的冲动展现得大大的,它又构成了大脑与小脑之间的那一层隔离带。艾丽丝对每一株灌木、每一只揿钮,以及人类的每一个姿势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有时甚至还有几套理论。

在渥太华那个美丽的花园里举行完了基督教式的施洗礼仪式后,艾丽丝和我手拿香槟酒杯,站着闲聊起《女人的神秘性》一书。我能看得出,她对我读过这本书很是惊讶。如许多年轻人一样,她认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就关上阀门,闭口不谈将来了。当我开始对贝蒂·弗里顿将工作看成是一种救助的形式,并对其大加颂扬这一点提出异议时,她睁大了眼睛。“我们就是工作!”艾丽丝大喊道。“工作和自我互不可分。”

啊,天呐。我张开嘴巴准备提出反对。

“瞧我母亲,”艾丽丝打断了我,她压低嗓门,但还能听得见,并示意我朝那株盛开的丁香花看去。只见黛西站在一群朋友中间,小朱迪则倚偎在她胳膊弯里。黛西周围这群人现在已扩大到了十八个,真是个可观的数字。“我母亲在成为报纸的专栏作者之前,根本没有自我价值的观念,一点儿也没

有。她什么都不懂！真的，您想想看，她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是起着一种奴隶的作用。她没有报酬，自身价值被低估了，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现在您再看看她，她变得”——说到这儿，艾丽丝搜寻着合适的词语，向摇曳的丁香花指了指——“她变得，您知道，像个真正的人了。”

工作就是工作，我想对艾丽丝说，因为我还算知道这一点。工作并不仅仅是坐在阴暗的图书馆的角落里，每隔一两年出几篇漂亮的小论文；工作就是冬天一大早叮铃作响的闹钟，而此时外面又冷又黑，你又忘了熨烫那件配灰西装的绿色外套，你的汽车也出了毛病，这个月你没钱去修，因为自从门罗县美术馆董事会考虑给你加工资，甚至表扬你一两句以来，已过了四年了。除此以外，你那美术馆有时整个上午根本没人来参观，即便有人来，他们也只是站在那儿，拿着展品，冲着展品简介格格傻笑一阵，然后告诉你，他们幼儿园的小宝贝们只要用一瓶作手指画的颜料便可画出这些画来。再说了（哼，哼），是纳税人支持搞这种事的，而大家真正喜欢的只是那些美丽的风景画，田野啊、天空啊、画得极像的地平线啊什么的。还有什么也是工作呢？对了，还有跟各位董事们开会，结算账目；还有那些不知什么原因总是不起作用的宣传报道，不了了之的资金筹集，已批示过的申请表不知去向，展品目录打印不及时等；再就是那些疯疯癫癫的人老是打电话来，求你看看他们的代表画作，说是就瞧那么一小眼，你得去看，你欠他们的，可你算个什么，不就是个自鸣得意的小管理员吗？

接下来呢——至少最近是这样，也就是梅尔走了以后——便是下班回家，喝上一杯波旁威士忌，吃个煎鸡蛋。或许也会顺便去一下图书馆，看看那儿有没有来新书。晚上早早

便上床睡觉,因为你头痛欲裂。有时呢,你刚要闭上眼睛,你又想起你那加拿大的老朋友黛西。她呀,孩子和时间可能是完全归她所有。做起事来快慢全凭她自己掌握,将那本《有效的家务管理》一书中的理家之道,无论远近到处传播,并从别人的成功里得到报偿,那些人当然会给她戴上种种桂冠,说是回想起来,他们万分高兴,因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母亲,没出去累死累活地工作,去挣那几个神圣的加元,不像她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的老朋友弗雷迪·霍伊特那样。

嗯,一个家庭有时也得听听外人的评价,因为它有可能会被自己幻想的灰尘所掩埋。依我之见,这种情况会导致谎言和虚构的故事从家庭历史中那些共有的、无足轻重的零碎片断中释放出来。比如说弗莱特这家人吧,他们历来把有关工作的伦理道德看得很重。巴克和他的杂交粮种,艾丽丝和她的俄罗斯文学,沃伦和他的音乐,琼妮和她的——不管她在新墨西哥那儿究竟干什么——总之,他们家把黛西的精神崩溃归咎于她失去了那个报纸专栏。在开头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自己也这么想来着,可后来我逐渐觉得,她失去了那份“工作”只是根导火线,引发了始终压抑在她心头的一种强烈的欲望。

我指的是性欲,还有什么呢?

倒并不是黛西和我以前曾谈过做爱这种事。嗯,反正好长时间没谈这个问题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做姑娘时谈过的,当时我们曾试图解开性交这种行为的谜;但打那以后我们再没谈过它。我们当时曾讨论过做爱得做多长时间,它的危害有多大,你在做爱时是否得说话,说些卿卿我我之类的话,“性高潮”是个什么感觉,你怎么能肯定你是否到达了高潮,它为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没感觉到什么高潮,可你佯装有那份感觉,这算不算

欺骗等等。

然而后来,谈做爱这种事突然变得大逆不道了。

我觉得我俩都想谈,每次相聚都想谈这个问题,有时就这个话题打几个手势,那样子笨里笨气的,可我们从未对此取得过一致的看法。你也许会说,我们之间距离太大,不相称的地方太多。我俩之间的确存在很大差别。黛西的性爱伙伴主要是巴克,这个终日勤苦工作、还带点女人气的男人;也许有那么一阵子(也许没有)她跟那家报纸的一个编辑好过,那人名叫杰伊·达德利,可这家伙最终却拆了烂污,把她的专栏给了另外一个人,像国王给新任命一个大臣,赋予他权利一般——呃,这就是黛西的浪漫史。按我的计算,也就是一个半豆子发了芽吧。而我这边呢,我可是和五十三个情人(也可能是五十四个人)坐在一起。我这边吵吵嚷嚷,众情人勇敢又活跃,真感谢我的幸运之星;我向我这支五十四人的部队举杯祝酒——我把他们看成一支小部队,精神抖擞地向前开进,他们漂亮的脑袋和肩膀沐浴在阳光之中。

对这批人我是一直将他们记录在案的,我这么做也许挺不地道。我有个小日记本,里面记有日期、姓名首字母、查询地点,以及编了代码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从一九二七年记起,诸如来往时间长短、对方职位、来往次数及对方反应等等。

我那如“幽灵”般的第五十四位情人是我几个星期前在去渥太华的火车上碰到的。当时我俩并未互通姓名,只是相互哭诉一阵,说了点零零碎碎的生活经历。我俩在休息车厢里喝了太多的波旁威士忌,当时已很晚了,在我的那张下铺床上,我俩赤身裸体,情绪低落,分手前可能做过爱,也可能没有,但我印象中好像一个滥醉的男人将满是皱折的肚子顶着

我。我记得我们像在黑白影片里的人一样，吵吵闹闹，丢人现丑。当我早晨醒来时发现他走了（谢天谢地），而我的身体，我这六十岁的躯体（咳！）却拒绝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下面那地方”干巴巴挺痛的，其实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真把我给搞糊涂了。我于是在日记里打了个问号，而不像往常那样记下日期。从那个问号里我看出自己性爱生活的结束，这是件很令人遗憾的事，虽然我还不愿承认它。

弗洛伊德曾问道，女人需要什么？这个老傻瓜，大骗子，他心知肚明——女人什么也不需要，因为什么都不够好。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唯独我不知道。

我那次去渥太华是为了安慰一位处在悲哀之中的老朋友。她曾写信给我，叫我不要去，说她有侄女贝弗利照顾，眼下也不适合接待客人，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去了。当时我曾错误地认为，我能把她带到过去那些快活一点儿的年月里，在我们之间那感情的源泉中捞出些陈年旧事，可笑的，伤心的，感人的，不管什么都行。在那儿待上几天后，我想咱俩还能重新谈谈那个犯忌的话题——性爱，也好将我们心中那些想法全部活生生地释放出来。

女人有时愿意吐露自己心中的秘密，这种时候我曾见过。老朋友之间短暂的互诉衷肠，远胜于艾丽丝那种酸溜溜的同情。我要对我做姑娘时的朋友说，人的自我是弯曲的，如空间一般；我们能够反复迂回绕行，终能重温早先那些给人强烈刺激、令人心荡神移的时刻。对性爱的阵阵冲动，尽管它丑陋、令人难堪、也不便谈及，但它却是进入极乐境地的通途，而且是唯一的通途；较之我们痴痴迷迷回忆过去做姑娘时闲谈“性高潮”和用盐水冲洗之类的事，性爱的冲动又是一种更为隐

秘、远为强大的力量。我还要对她说那位第一个勾引我的波普考夫教授,那个没完没了变换身体姿势的乔治奥(我管他叫大睾丸),还有我那可怜的梅尔,他跟我只好了四年,便灰溜溜地消失了。我不想对她隐瞒任何事情,哪怕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件小小的令人遗憾的事我也不想瞒她。我相信,毫无保留地对她敞开胸怀,便会消除她心中使她郁闷、使她发狂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

然而在她那儿的一星期却真是一场灾难,任凭你如何哄她、劝她,她就是不离开她那间昏暗的卧室。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脖子和肩膀上的肌肉严重萎缩,原先如女皇般的躯体一磅一磅地消瘦下去。“别让我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一次我给她端去一盘中午饭时她对我说道,“那样太费力了。”

我回到布卢明顿家中后,给她写了一封极令人快慰、开心的信,是关于将来的。我说,终有云开日出时,将来的人世世代代都会快乐幸福,等等、等等。

一星期以后,我收到一个信封,上面的地址是她的笔迹,可里面没信,只有我那本内容隐晦难解的小日记本,准是我在关旅行箱时掉在地毯上的。

贝弗利堂姐的说法

十年前在萨斯喀彻温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可在那会儿,我跟您说,离婚还了得,简直是彻头彻尾的犯罪。可这还没完,更倒霉的事还在后头。我把我丈夫杰里(从结婚第一天起他便是个酒鬼)一脚蹬了后,刚过了短短的两年,我就被伦纳德·梅休尔基维奇给搞大了肚子。他

在一家浸洗厂工作(自然已结了婚)。他对做爱的看法,呃,我就是想一想也吓得发抖,但不管怎样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他哼哧哼哧三分钟,拼命喘粗气,好嘛,我一家伙就这么怀上了。

我原打算去卡尔加里,可我怕得要命。想想看,我这个人害怕了,我,一个在大战期间曾跑到大老远的英国,去参加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人,枪林弹雨,什么都经历过,照样活了下来。那会儿自己年轻,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后来打完仗回到萨斯喀彻温家中,原先那股子英豪气概全没了。那会儿,杰里穷追不放,硬逼着我结婚,还有我父母,妹妹,大家都催我结婚,弄得我心烦意乱,于是我很快便和杰里结了婚。可奇怪的是,结婚以后,任凭我俩使出什么绝招,我就是不怀孕。哈!我跟伦纳德·梅休尔基维奇半夜滚了一回,就那么一回,我就惹上了麻烦。有些姑娘陷入这种困境会一死了之,可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只要我想闭上眼睛,我就能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过去自己在英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会儿多勇敢,多有冲劲——当时自己那副情景如同日历上的某个日子或是电影中的什么画面能给我带来光明。我想,或许我还能摆脱这种困境,但如果我自杀了,那就肯定不可能,这是毫无疑问的。

渥太华的黛西伯母收留了我,我成了她家的一员。她让我把阁楼上那间贮藏室漆成粉红带白色,再挂上窗帘——这就成了我的卧室,谁也不允许把它搞得乱七八糟。后来,维多利亚出生了,黛西伯母又说道:“你干嘛不把楼下那间日光浴室整理一下,改成育婴室呢?”我自然照办了。

维多利亚·路易丝生下时重八磅半;您要是想到我自己体重只有九十八磅,像弗莱特这族人那么精瘦精瘦,又像我母亲

这族人那么矮小,您肯定会惊讶不已。维多利亚自从腹绞痛好了以后真是变成了个乖宝宝。她天生一头金发,柔软而漂亮。现在她已九岁,瞧她长得多漂亮!我原本打算将她过继给别人,可我没这么做,真是谢天谢地。我平时照看她,亲手给她缝制衣服,又到学校开家长会,和老师交谈,一切都包了。我还教她小心谨慎,乖乖的,别惹黛西伯母生气。我在她家做家务,一日三餐大部分都是我做,还打印保险单,额外挣点钱。最近呢,我还照料患了神经衰弱症的黛西伯母。

依我看,她目前这种状况并不是她的生活发生变化所致,也不是她神经过敏,而是她的孩子把她给搞垮了。她是个寡妇,因此总觉得自己责任重大,这我能理解,不过有些人天生就好烦。她过去曾为艾丽丝烦神,认为艾丽丝一贯脾气很犟——甯,她真是这样吗!有段时间,她又为沃伦烦心。沃伦这孩子平时挺乖,可就是好哭。他这种毛病不断发展,于是他在性格上有点胆怯,也容易伤感;但情况往往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也不会再表现得羞怯、伤感,他们要么温柔、开朗,要么很富有个性。我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沃伦已变成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他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眼下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攻读音乐理论的硕士学位,是他那个班上的顶尖学生,金牌得主。黛西伯母以前曾打算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甚至还买了一顶黄绿色的矮圆桶女帽,挺好看的,可这事也吹了。她现在几乎起不了床,只能躺在黑乎乎房间里,时常哭喊,还用手拽起床单,使劲拧,就像要把谁的脖子拧下来一般。我想她现在是为琼妮担心。小琼妮这个全家的公主可是被惯坏了,不过她精得不得了,只是现在成了个吸毒者,也不知在做什么,总之嬉皮士做什么,她就在做什么。

她说她在新墨西哥州做珠宝生意,但我敢打赌,她决不只是在贩卖珠宝。她的所作所为伤透了她母亲的心;而见到她母亲这副样子,又让我愁肠百结。黛西伯母曾救过我的命,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她给了我和维多利亚一个家,现在我想设法救她的命,不过话又说回来,她自己才是唯一能救她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搞生病了,只有她本人振作起来,才能恢复健康。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沃伦的说法

我母亲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但对此您并不了解。她于一九二六年毕业于朗女子学院,并获得过学位,但如果有谁问她当年那张文凭在哪儿,她只会耸耸肩。有一次,我在阁楼上的贮藏室里偶尔发现一个硬纸盒——就是那次我们打扫房间,准备把贝弗利姐姐接到家里住时——盒子里装了厚厚一叠文章,都是我母亲做学生时写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卡米洛·卡沃尔:政治家与幻想者》。我根本不相信母亲曾听说过卡米洛·卡沃尔其人(我自己肯定是没有听说过),也不相信她能正儿八经,甚至充满激情地去写意大利十九世纪那段十分隐晦曲折的历史。这么多年过去了,但纸上的墨迹仍十分清晰、鲜明——那上面有她画的圆圈啊,破折号啊,段落啊,还有最后那段对卡米洛·卡沃尔评价极高的结尾:“这位坚如磐石的英雄人物曾为他的同胞的权利而斗争,全世界的意大利人都对他感恩戴德……”

我母亲原先那股子运用自如的智力和劲头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谁也不记得她曾对家人提起过意大利独立运动,或

是提起过十九世纪,也没听她说过她对地中海沿岸那些如城市般大小的国家有什么看法,而这些却在她一九二六年那篇文章中写得清清楚楚。我从未想到她竟会对那位意大利农民的处境如此关心。实际上,我想我从未看过她读什么书,除非是那种从图书馆借来的爱情小说,或是什么有关怎样种好大丽花的小册子。一想到母亲那篇关于卡米洛·卡沃尔的文章,我就忍不住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似乎有什么狡诈之徒在搞破坏一样,或是埋在地下的一只盒子里装着一个外表华美闪亮的骗局。不过我又想,如果我觉得被欺骗了,那她一定更觉得受了欺骗;她一定因自己的生命被白白耗费而感到悲哀。一定有什么事,或什么人夺走了她的智力,拽去了她的舌头。我母亲是个中年妇女,属于中产阶级,智力亦属中等,并无大的志向,运气一般尚可;所以,您会以为她处于这个世界的中间地区,其实,她是在边缘地带,只要一丁点儿震动便能将她震出这个世界。

琼 的 说 法

我母亲今年一直病着,大家都说她得了神经衰弱症。所以,我姐姐给我寄来了路费,让我回来看看母亲。她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说她反复考虑过,最终认为我是能让母亲重新振作起来的最佳人选,并说我的到来会像“一杯药水”那样有效。艾丽丝就是这样,总是到处指使人做这做那。

我本以为母亲处于麻木状态之中,可我却发现她情绪暴躁。事情似乎是一个叫平济·富勒姆的人把她那个报纸专栏抢走了;她原先花在写花坛、花苗上面的时间,现在已全部用

来仇恨平济·富勒姆了。除此以外,她无法谈论,也无法思考其他任何事情。她已将自己局限在这如窥视窗般的小小的不公平之中。她举起双拳捶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最后一次同富勒姆见面的情景,反复唠叨他说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话,和他做过的那些不可原谅的事,尤其是他最后一句话:“我希望此事不致影响我们的友谊。”显然就是这句话。他说得挺轻巧,一点感情都不讲,就跟别人说这种话时一样,根本不管我母亲多么心痛,也不管他这么轻率、傲慢、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的言辞会导致我母亲精神上的彻底崩溃。

如今,她无法忘记那番情景,躺在床上反复述说他们两人最后说的那几句话,她怎样来到他在《记录者》编辑部的办公室,央求他,而他又是怎样转身对她说出那句混帐话:“我希望此事不致影响我们的友谊。”母亲用尖厉、刺耳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哭诉当时的情景,还发疯般不住地摇头,求我感受她那幕痛苦的遭遇。

我回来仅几天就发现她津津乐道于这一切,美滋滋地欣赏她对平济·富勒姆的仇恨中那股纯洁、美丽的力量;品味她因蒙冤受屈而给她带来的极度兴奋,这其中自然有几分庄严。在她的一生中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引起她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她为什么就不能喜欢它呢?喜欢这种绝妙的创伤,这种完美纯粹的痛苦的滋味?

于是,我握住她的手,任她大声叫嚷下去。

杰伊·达德利的说法

对发生的这些事我当然感到内疚,我怎能不内疚呢?虽

然我并未如别人所说的那样,真正引诱过她。(坦白地说,结一次婚对我已足够。)当然,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她。我们曾有过相聚的时刻,特别是那次在她那张老式的床上——那张古怪的、带有包了填料的床头架的大床,活像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老古董。嗯,当时感觉不错,很不错。不过我能看得出,她心里已有更为长远的安排,倒并不是她说了些什么,她并没有直接说出来。不管怎样,我俩之间最好还是保持点距离。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难过,也不知道那句话,即我们的“友谊”那句话——一切都是因为这句话——对她会有另一层含义。

拉比娜·安东妮·格林·杜克斯的说法

256

我一九二七年与迪克·格林结婚时,我还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健壮的丈夫。他腰板挺得笔直,衬衣整齐利落地塞在运动裤里,一双皮鞋闪闪发光。他打网球,还是印第安纳大学游泳队的队员。他的脸晒得黑黑的,脸形也很美。我以前很喜欢看他那张嘴——当他听别人讲话时,他的嘴有时会向下撇着张开,那样子挺让我着迷。他这下颌松弛的情景多年来一直令我难以忘怀,令我沉醉在他那浓浓的、机灵而又凝神专注的纯情之中。他常以一种过分讲究、近乎谦卑的方式移动他那宽阔的肩膀,似乎他的肩膀可供出借,或是可以折断一般。

然而,我才是个被折断了的女人,女人永远是易碎品。当然,我并不是说单单一件令人失望的大事便能将女人压垮,而是指一千件令人失望的小事,它们如下雨般一件一件堆积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它们便如洪水一般强大,而等你刚刚反应

过来,它已将你淹没了。

科拉梅·米尔汤的说法

她没有母亲,真可怜。嗟呀,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才十一岁,和她父亲坐了辆出租车来到威尼格希尔这地方。当时我正忙着洗衣服,根本没准备好接待他们父女俩,甚至连厨房里的活也没开始做。您太太在哪儿?——我刚想张口说这话,可谢天谢地,我又闭上了嘴,因为我根本没看到有什么太太,他太太几年前就去世了,是在生这个小臭丫头时送了命。这事是古德威尔先生自己告诉我的,真是一场悲剧。我是和他熟悉一些后听他说的。

像他这样从加拿大过来的人,还不习惯与有色人种打交道。所以,他直接问起我这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总之什么都问。“科拉梅,”他说,“我这个家需要个女人来照顾我女儿,因为她要学习,在我出去时,她也要人陪伴。先是她妈去世了,你知道,后来,她在加拿大时由一个老姨妈照顾她,可现在除了我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

这就是我为什么按周为古德威尔先生干活,而不是像公司所说的那样,只在星期三来干活。我所说的公司就是印第安纳石灰石公司,他们雇了古德威尔先生,大老远地把他接到布卢明顿来。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和他的小女儿。这是一九一六年前后的事,那会儿奥伦还在国外,他的两条腿全给打断了,只是我当时不知道。那年秋天,我们自己的露西尔满六岁,刚刚上学,所以,我对古德威尔先生说,那好吧,我每天一早就过来,做早饭,帮孩子穿衣,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

净上学去,再忙家务,洗洗弄弄的,什么都做。他每天付我两块钱,等他们搬到了那所大房子后,他每天付我三块钱;在那个年头,对我们这些有色人种的帮工来说,这已是很不错的工钱了。

他们待我挺不错的。古德威尔先生这人很幽默,有时,他会来厨房,把一袋炸面圈放在餐桌上。“这是什么?”我问道,他会说,“嘿,准是有人把这些炸面圈放在那儿留给你的,科拉梅,一点儿小优待,给你喝咖啡时吃。”

我一般先是掸灰,叠被子,再看情况给家具打蜡,然后便坐下来喝杯咖啡,吃点炸面圈,休息一会儿。如果小姑娘为什么事儿从学校回来,她也会坐到我身边,吃炸面圈,喝一大杯牛奶。有一次,她转过身来问我道,“科拉梅,你怎么用叉子吃炸面圈?”“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谁这样吃炸面圈的,”她说道,脸上露出一副迷惑的神情。我弄不清她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也可能她认为我无知,也可能是她自己年纪小,不懂,或只是出于好奇,就像我的露西尔,也总会这样。对于她做的事情,我总是管住自己的舌头,不去责怪她,也不太往心里去。我总是对自己说,别忘了这孩子失去了母亲,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失去母亲更可怜了。

我现在仍然这么想来着。我的露西尔现在住在很远的加利福尼亚州,她已成家,还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漂亮房子,是座平房式的建筑。嗨,我已有六七年没见她了。她几乎很少坐下来给家里写封信,其中部分原因当然是她得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她不写信回来,我一点儿也不怪她。如今,她妈在她的生活中最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离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远、很远的插曲。我妈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你只需花

五分钟,就那么五分钟便可将这个插曲讲完,你也可能会眨巴着眼睛,想不起来了,但你没法将它赶走,因为你母亲总是在你心中。你能感到她在活动,在呼吸,有时还能听到她在对你说话,反复提醒你什么事,比如,现在得当心点儿,小心,乖乖的,甯,别伤着自己什么的。

嗯,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喜欢古德威尔先生小女儿的原因。每当我为她熨烫衣服,或是给她梳头时,我就在心里想道,她所拥有的也就是我了。虽然我连半个妈也不是,但她以后所能拥有的母亲便只有我了。她以后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后又怎样才能在生活中过得快乐?我紧紧注视着她的未来,然而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她面前这个黑乎乎的地方,这个如最黑的夜晚那般漆黑的地方。

斯古特·斯库塔里的说法

我祖父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个村庄里,他是乡下一个穷犹太人的儿子。十八岁那年,他对父母亲说,他要徒步前往耶路撒冷,于是他便离开了家。可他却往西到了斯库塔里市(他把这个名字加到了自己的名字里),在那儿搭上一条船去了马尔他,又从马尔他到里斯本,然后又乘船前往蒙特利尔。一八九七年前,他一直住在马尼托巴,常常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做点家用物品的小生意维持生活。他的全名是艾布拉姆·戈赤德·斯库塔里。他是个靠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人,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建立并拥有全国性的零售批发连锁店的大老板。

然而在一开始那些年月里,他简直穷得让人伤心;过小贩

子的寒酸日子自然令他非常痛苦。那些农民和镇上的人都靠他给他们带来生活必需品,可他们时常辱骂他,管他叫犹太佬。谁也不愿客客气气地问他一声名字,住在哪儿,是否结了婚有了家室。那地方的男人都拒绝和他握手,好像他浑身长满了虱子;他因此而受到很大的伤害,一辈子都忘不了对他的这种侮辱。

后来出了个伊顿邮购服务部,人们突然间便不用再和小商小贩打交道了。通过订购单到温尼伯的那家商店买鞋油、发带什么的,既便宜又方便。可这么一来,艾布拉姆·斯库塔里怎么养活他的妻子埃琳娜(我的祖母莉娜)和他们的小儿子(我的叔叔雅各布)?

他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向银行申请贷款,自己开个店,卖工作服、安全设备、防火用具、钻孔用具等,总之,一九〇五年那会儿伊顿邮购服务部的邮购商品单上没有的货物都能卖。我祖父还想到自行车将来一定走俏。不错,汽车已经开了过来,但他发现,温尼伯的每一个年轻人很快便会渴望拥有一辆已在市场销售的那种崭新的、成批生产的自行车。

不过,对向银行贷款一事他还是很担心,因为他从未和银行打过交道,特别是和皇家银行从没有任何关系——那是一座用气势雄伟的石头和大理石盖起的建筑,坐落在温尼伯市中心,位于波蒂奇街和梅因街的交汇处,而我祖父却是个一文不名的人,连条领带都没有,英语也说得结结巴巴;也许他身上真的有虱子,这完全有可能——那时很多人身上都有虱子——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给了我祖父勇气,那是他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它改变了他的生活。

这事发生在一九〇五年的夏天,当时他还在做小生意,赶

着装满货物的马车到处叫卖。那是一个下午，约摸三点多钟，他赶着马车进了马尼托巴的一个小镇。这地方非常荒凉，和东欧任何一个犹太人村落一样，那时镇上开着些公司，人们以采石为业，开采质量上乘的石灰石。这天，我祖父赶着车路过一个采石工人的家。恰在此时，他听到屋里有人在呻吟，好像还十分痛苦。他根本没停车想一想，也没敲门，便径直从后门走了进去。

他发现厨房里躺着一个女人，两腿叉开，马上就要分娩了，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能看到那婴儿的头已经露了出来。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生孩子是女人的事——那时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在古老国家长大的犹太男人，就像我祖父这种人更是如此。

隔壁一个女人正在晾衣服，他于是急忙赶过去请她帮忙。接着，他又跑到镇子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儿的一位医生。天气热极了，那热浪，那灰尘，他后来一辈子都忘不了。当他们返回那女人家时，她已快断气了，而我祖父艾布拉姆·斯库塔里，这个犹太佬，竟是接受那女人最后目光的人——当时屋子里站满了人，可她的目光却凝聚在他的身上。他事后曾发誓说，他亲眼看到那女人脸上充满了他自己那份恐惧；待她完全沉浸在那恐惧之中后，她便死去了。

我祖父很快便发现那孩子依然活着，还在呼吸。当时屋子里很嘈杂，乱哄哄的，天又热，大家都围着那死去的女人转来转去。可是，在餐桌上却躺着一个用床单裹着的婴儿，孩子的嘴唇在动，在颤抖，他因此发现那孩子还活着，然而屋里谁也没注意那孩子，就好像没那孩子一样，好像那是放错了地方的一团面。

他伸手摸摸孩子的脸，心中突然萌生一种深沉的渴望——渴望给孩子点什么，诸如某种表示祝福的东西。他永远无法得知他那股渴望从何而来，但他有一次曾对我父亲（我父亲很喜欢复述祖父这段经历）坦言道，他完完全全地感到了那孩子的孤独；那是一种极端的、无法摆脱的孤独，一种他自己十八岁离家后便一直遭受的那种孤独。

他的口袋里有一枚来自他那个古老国家的古钱币。他将这枚钱币放在孩子的额头上，并用手按住，看着床单下的婴儿一起一伏地呼吸着。“快乐吧，”他用阿尔巴尼亚语，或许是土耳其语，或是依地语，也可能是英语说道。接着，他又重复一遍，快乐吧；然而，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在为一块石头祝福，嘴里再也说不出什么吉利的话来。他感到自己浑身发软，似乎成了个纸和稻草做成的人，根本不是一个真人，觉得自己也会就此死去。

他感到有谁将手臂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这才发现自己哭了。这个人便是那位医生，他也哭了。他们就这么站着，两人的眼泪交融在了一起。

交融——当他讲起这段往事时用的就是这个词，我们的眼泪交融在了一起。搭在他肩上的医生的手臂，他觉着像是兄弟的手臂，那份感觉使他哭得更加厉害了。

过后，大家都在死亡证书和出生证书上签了名，甚至我祖父也签了名。他竟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使众人惊诧不已。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艾布拉姆·戈赤德·斯库塔里。他写着写着，觉得有一股力量钻进了自己体内。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乱跳，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甚至敢于走到波蒂奇街和梅因街交汇处的皇家银行要求贷款。

然而,那孩子凄惨的处境一直铭刻在他的心头。他发誓自己从未见过世上竟有如此孤独的婴儿。他活了很长时间,挣了一百万,他热爱自己的妻子,也是自己几个儿子甚为体面的父亲;然而他一辈子为那婴儿悲伤,为逼近那孩子的灾难及其巨大的痛苦忧心忡忡。

弗莱特太太的说法

肯定谁也不会想到弗莱特太太会对自己的痛苦也有一番解释,因为这可怜的女人已虚弱无力,迷迷糊糊,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又怎能侈谈整理思绪,作出一番解释呢。推理阐述需要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可弗莱特太太的脑袋里却充斥着愤怒和失望。她已彻底垮了,简直一塌糊涂,成了个空有躯壳之人。在早晨的日光里,她的痛楚似乎并不持久,还能控制,但到了夜晚,她会听到各种声音,不过这些声音也可能只是她自己的灵魂在喊叫。她的灵魂沿着她另外一些痛楚——尤其是原先遭遗弃而引发的驱之不去的恐惧——的缝隙叫喊。在她的灵魂经过的某处,她作出决定,跳出过去那些事件的圈子。抑或这个决定是为她而作出的。她女儿艾丽丝曾建议她写一本园艺方面的书,弗雷迪·霍伊特也曾叫她外出作环球旅游。或者到大学去修几门课;自学织花边手艺;研究一下防过敏针剂或维他命 B 的复合药物;听听柔美、抚人心灵的音乐,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记日记,长时间散步,泡热水澡;对自己的想法提出疑问,善待自己,为现在而生活,平时悠着点儿,去教堂做做祷告;大喊大叫,诅咒这个世界;想一想自己幸运的事情,自由自在放松些,就这么活着等等。

所有这些建议一条条向弗莱特太太飞来,但她已心神错乱,根本听不进去。

您会认为她被自己这种精神状态吓得要死,可她却没有。她的头发乱蓬蓬的,指甲破裂了,家里的花木也凋零了,日常生活也弄得一团糟;但是,她像一个打洞穴居的小动物,沉睡于自我之中,这就保证了她将来定能康复。原因之一,她不相信自己苦咸的眼泪;其二,她还记得,很多年前,她和弗雷迪如何喜爱引用可怜的老威廉·布莱克的诗行:“哭吧,哭吧,带着悲哀的声调”,而悲哀这个如瞎眼的小臭虫一般的词又是如何使她俩捧腹大笑的情景。

如今,在她五十九岁之时,悲哀在她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里流淌,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她却丝毫未受影响。她知道,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平滑、柔和,一切事情都会被接受和拒绝的熨斗熨平——她认为,事情的最终结果都是这样。她的悲哀不会无穷无尽,正如她允许自己的头发乱到什么地步,或是她听任灰尘在她的梳妆台上堆多厚,都有个限度一样。这就是您的黛西。她的忍从如同物种归类一样,归属于绝灭这个门类,即如何度过一千个普通的日日夜夜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如何度过一万个这样普通的日子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把她看作是生活的幸运儿,一个生来便没有悲伤音域声音的女人,一个学会了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打洞凿孔保护自己的女人。

然而她已厌倦了自己的悲哀,已不再去理会它,甚至差不多忘了它,但即便如此,她也感到厌倦了。从她脑袋里那只菲薄的骨头盒中,她明白并且接受这一事实:自己巨大的不幸终将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即便在此刻,我也感到她身心的某

一部分已经愿意接受她过去所喜欢的东西；比如一把新牙刷摩擦牙床的感觉——就这么点不起眼的小东西。她还想再在腰间系上一条清爽洁净的围裙，用整整三分钟时间给一磅土豆削皮，再将它们泡在冷水里；或是将一只果冻罐擦亮，与它的配对物一起放到架子的最上一层；或是用舌头舔信封，将它封好，在信封的一角贴上邮票，再将它扔进邮筒。她还想哈哈大笑清洗自己的身体，任由地球引力的牵拽。这些事终会发生，一切痛苦都将被冲洗一净，这一天随时都会到来。

第 八 章

安 逸

1977 年

维多利亚·路易斯·弗莱特年仅二十二岁，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她是个豆芽般纤细的女子，大手大脚，一头直僵僵决不弯曲的金黄头发梳在耳朵后面——她的发式也不过如此而已。她喜欢穿牛仔裤、运动衫，外加一件蓝斜纹布的外套。实际上，除这些以外，她没什么其他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深色的，质地十分紧密，似乎她刻意摈斥现代生活的种种恶梦。为了矫正自己的近视眼，她戴了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在那对有些污点的镜片后面，她的眼睛显得冷漠、严肃。这是一九七七年，她已不再是一个大家庭里受人无微不至关爱的小姑娘。她的嗓音显得挺别扭，让人听起来既有成人的挑剔，又有十来岁孩子的困惑。她的感情节奏不稳定，这自然如您所料，但她却具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

例如，她曾悄悄对黛西姑奶奶说，她对自己周围突然出现的家系现象看得很清楚。她说，看到男人和女人——但大多是女人，这倒挺怪——在墓地里走过，或是看到许多人都挤在图书馆里翻阅县史资料，在他们小小的螺旋芯活页簿里记下姓名和年月，想象并希望他们无私的劳动能揭示由资产与礼仪构筑而成的网系时，她觉得很感人。维多利亚并不相信这些虔诚的业余爱好者是在探寻他们的祖先与王族或是与富有

创见的天才之间有任何联系；他们的目的只是想证实其祖先是纯朴、诚实、遵纪守法的公民，证明他们居功不傲，忠于誓言，生性快乐，自立自足，心地善良；而他们强健有力（但同时也与世隔绝）的生命能抵御、或许还能宽容现世如瘟疫般无处不在的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等社会现象。人们相互间通情达理这一宝贵的财富，似乎已从世上消失，即便维多利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维多利亚的姑奶奶黛西现已退休，住在佛罗里达。她在成年后便对她死去的两位父亲特别怀念——她的生父凯勒·古德威尔和她的公公马格纳斯·弗莱特。然而，维多利亚的姑奶奶追思她两位已故父亲的心态与通常那些写周末专栏文章的家系学者们迥然相异。她往往将较多的精力集中在一件事上；同时，她比他们更富幻想，因而显得徒劳无益。在维多利亚看来，她似乎想将自己拽进一只装了被淹没的语言的口袋里，并充当那种语言，以发出那个无法发出的词：父亲。不错，黛西姑奶奶读过一些有关社会历史、回忆录、传记等方面的书——她近几年来读的书比她侄女想象的要多得多——然而，她从未外出察看本地的图书馆，或是坟场一类的地方，也没有回过她出生的地方——马尼托巴的廷多尔，去看一看那座为纪念她亲生母亲而建造的著名的古德威尔石塔。不管怎样，在她的想象中，那座石塔已被严重破坏，景象凄凉：一块接一块的石头被搜寻纪念品的人拆走，如今，除了那可怜的一点点炸面圈般的底座尚存地下之外，什么都没了。她还没有与盐湖城的摩门档案馆取得联系，也不打算这样做，没有为此事写信去询问一下。在她佛罗里达那间房间里（三面都是玻璃的百叶窗板），她舒舒服服地，的确非常舒适地坐在那张印满各

种花卉图案的长沙发里,追思她死去的两位父亲。她对他们的怀念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她只是想他们,全神贯注地想他们,仔仔细细地想他们。至于她的侄孙女维多利亚,她已将自己两位父亲的情况向她说过,但从未说得那么活灵活现;她也曾提起过,他们是强有力的男人,她从未具体说过。黛西姑奶奶仔细琢磨他们的生活经历,心中感到纳闷:他们的生命究竟是由什么组成,又怎样结束?是像电影里那样热热闹闹地结束,还是如严寒中船离岸驶去那般冷冷清清?当然,她也不是一直这么冥思苦想,只是偶尔才想,比如说,傍晚时分,因为这时她觉得一天已平淡无味、失去特色,而她自己 also 感到烦躁不安,内心那种可怕的不真实的感觉在撕咬着她的心脏隔膜,而这时,电视节目也变得索然无味,只是坦帕^① 本市新闻,或是天气预报而已。

她七十二岁时的生活颇为悠闲。她每年要做三次高级电烫头发(较之普通电烫而言)。因此,她的头发蓬松,富有弹性,宛如复活节竹篮中的青草。她曾经听人劝告去做过(一次)面部美容,试用过(二三次)一种新颜色的唇膏,还(每日)想着去治一治静脉曲张。她已从多年前困扰她的精神萎靡中渐渐恢复过来,身体也越来越好,逐渐接近最佳状态。她在银行里有存款,数目还不小,但她日子过得挺节俭。十年前,她卖掉了渥太华那座大宅子,搬到佛罗里达西海岸,在那儿的萨拉索塔市的开发区买了一套有三间卧室的公寓房。这地方离她的老朋友弗雷迪·霍伊特的住处很近,离伯兹基也不远,那儿住着她的另外一个朋友拉比娜·格林·杜克斯·卡瓦诺(她现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港市。

与第三个丈夫巴德住在一起)。

自打搬到佛罗里达之后,黛西姑奶奶已学会了玩打硬币游戏,还学会了用胶水粘合的贝壳装饰塑料头带和手镯。她将这些东西作为圣诞礼品寄给散居在英国和美国各地的六个孙女;至于她的孙子本济和泰勒,她寄的是她自己在贝赛德妇女工艺俱乐部亲手缝制的皮夹子。她很怀疑孩子们真会喜欢她这些手工做的小玩意儿,但她一直认为(特别是自从一九六五年精神上垮了以后),应该让自己这双手经常做点什么,以越来越少的自我向世界奉献越来越多的东西。来看她的人人都发现她住房的阳台上放满了郁郁葱葱、精心照料的仙人掌和其他热带植物。她那高超的园艺技能仍显而易见;谈起园艺这个世界,她是个感觉论者,虽然她也善意地抱怨佛罗里达沉闷乏味的景致,并发誓自己决不可能接受那些外皮散乱,树冠如长卷毛狗头般的棕榈树,这种树在她看来只是给大自然开了个玩笑。

她那年轻的侄孙女维多利亚倒是为棕榈树辩护。尽管维多利亚也并不十分喜欢棕榈树,但她感到内心有一股冲动,非要激姑奶奶与自己辩论一番不可。她似乎觉得,这是年轻人至少可以为老年人做的事。她不知从哪里看到,说老年人学着往后退,以便开阔视野;而他们眼睛一眯,便可能出现许多新的可能性。

冬天,维多利亚总在北方的多伦多上课,写论文,考试,还为她自己尚不存在的爱情担忧。这时,她会想起她年迈的姑奶奶。在萨拉索塔市安享晚年的姑奶奶,有时在阳台上用镊子剔去花木上枯萎的花朵,有时打打桥牌,或在下午自愿去林林博物馆服务,有时则和弗雷迪、拉比娜在圣阿门兹基附近的

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里闲逛逛。维多利亚不无羡慕地想道，姑奶奶的日子过得多安逸，然而同时又多么接近尾声。她这辈子恐怕都无法理解这位老人，为什么她如此想念那两个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的男人——性情古怪的凯勒·古德威尔和那个销声匿迹的马格纳斯·弗莱特。她怀疑姑奶奶其实是在追寻自己的母亲，而她对两位父亲的怀念只是一种计谋，抑或是一种巧妙的平衡。

维多利亚有时觉得，如果真有什么人要追寻自己的父亲，那么，此人应是她自己。但实际上，她从来不问她父亲是谁——她姑奶奶黛西曾碰巧听她这么说来着。维多利亚·路易丝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有所了解，但她知道得并不多，只是平时听母亲不经意地说出一点情况。她父亲是萨斯喀彻温的一个傻蛋，已结了婚，肚皮老大的，现在可能已不在人世。他还可能是个酒鬼，简直麻木透顶，连她母亲怀孕都不知道，真够呛！而贝弗利·弗莱特呢，她也嫌麻烦，根本就没对他说，只是搭上火车，往东去了渥太华，与黛西姑奶奶一家过日子去了。等她怀孕八九个月时，有人问她，“你不打算把这孩子寄养给别人了？”她摇摇头说道，“不。”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事；那年头很少有人把孩子留下的。

贝弗利现在已去世四年了，她得的是胰腺癌。因此，每逢放假，维多利亚便去佛罗里达和她姑奶奶黛西过。姑奶奶总是给她寄来机票，并乘坐带空调的出租车去坦帕机场接她，还在家中的客房里铺上干干净净的床单，再在床头柜上摆一盆开花儿的非洲紫罗兰。姑奶奶还筹划着两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去林林旅馆吃复活节中餐——那儿的菜单上新增了一道菜：伴有熏鲑鱼的奶油蛋糕，外加色拉。如果能在那儿碰上和

气的女招待,如果她说,“看来两位是打城里来的,对吧?”那么,黛西姑奶奶便会把话说得柔柔的、圆圆的、似乎合计好了似的:“这是我的侄孙女,大老远从多伦多过来的,刚拿到古植物学的硕士学位,眼下正认认真真地考虑九月份开始读博士呢,”而维多利亚呢,她身穿牛仔裤和一件磨破了的T恤衫,时不时用手抚摸、整理那宽宽大大的T恤衫的领子,那样子倒挺迷人的。听姑奶奶这么说着,她倒变得忸怩不安了,在座位上动来动去,心里直犯嘀咕:姑奶奶以前可不像这么唠唠叨叨的,现在却成了个十足的佛罗里达蓝发女士——手拿念珠,脚蹬软木底便鞋,还挎着个白色塑料小提包。而她呢,也就是维多利亚啰,也会沉浸在她姑奶奶的骄傲之中,等那女招待匆匆返回厨房后,她也许还会将手伸过餐桌,拍拍那只可爱的、涂了粉的干瘪老手——她熟悉这只手,几乎如熟悉自己的手一般。

*

凯勒·古德威尔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去世的,也就是维多利亚·弗莱特出生的同一年。当时他正在莱蒙湖畔他的住宅后院干活,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他突然觉得头晕乎乎的。也许他不应该不戴帽子便到外面强烈的阳光下干活——他妻子玛丽亚总是这么说。

他这种由中暑引起的头晕症很奇怪,一开始倒还挺友好,他只是一直听到嗡嗡的叫声,眼角处看到蜜蜂的翅膀,如模模糊糊看不见的音域一般。他伸展四肢仰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那双系着带子的鞋指向天空。一阵凉风吹来,掠过他的前额,吹起他一绺稀疏的头发。几乎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有了

点力气,但他并未起来。

不着急,他对自己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整个上午都躺在这儿。

玛丽亚早先拎着她那只麦秆编成的篮子经波因特去了布里奇波特杂货店,因为家里的黄油用完了。吃早餐时她曾说起过此事,她总是这样,不是这个用完了,就是那个没有了,从来不习惯像北美人那样一买就买一大堆东西。她丈夫知道,她至少要去个把小时,因为她喜欢在湖滨路上溜达,特别是那会儿紫荆花开得正盛。再说,他们隔壁几个年轻人麦格雷戈、利迪亚和比尔也要出来在他们那新的雪松露天平台上干活。她肯定会在他们那儿歇歇脚,打发时间——可她从未想到自己打断了他们干活,也没发现那两个年轻人转溜着眼睛,来回使眼色,气得直耸肩膀,虽然他们耸肩的动作不易觉察。她不住嘴地唠里唠叨,朝着树、湖面上的波浪、无云的天空等比划着,还就甲板的托架、他们房子后部的木瓦板等提出她的看法,又问他们那些大黄植物日照够不够等等。可她说的这些,比尔和利迪亚根本连一个字也听不懂。

她在这边不停地说啊、说啊,说啊,可那边呢,一个老人却躺在了地上。

他这样躺在地上倒挺新鲜,开始也觉得很有趣;慢慢儿地,他开始感到从地下升起一股暖气——它先是透过他身子下面被压平了的青草,接着渗进他宽大的格子衬衣里。他心中很是惊奇:他竟能感到地球所贮存的巨大热量传遍他这个七十八岁老人的后背。他将自己不平整的外貌、肌肉、骨骼、软骨组织等各个部位贴在新近刚修剪过的草坪上,将自己整个儿地交付于这块草地——他上次是什么时候也像这样躺在

外面地上来着？只有年轻人才这样毫不介意地听从大地的摆布，任其支撑着他们，而他们身体的全部重量则稳稳当当地被托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他并没有多少好想的，所以便去想阳光照射下来的角度。这会儿，太阳几乎悬在了他的头顶，阳光洒满了他的身体——这具出生在另一个世纪的加拿大北部的躯体，如今已度过了七十八个春秋，而其父母则早已从这个世上消失。他早年在加拿大长大，后来却像躺在一块具有魔力的毯子上，被带到了这个地方。此刻，他正躺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块草地上；那草地挺像一块即将被花园的水龙管冲走的窗玻璃。

他躺在湖滨一所别墅的后院里，他和玛丽亚已将这别墅当作他们永久的住宅。自打他退休以后，他们已在此住了好几年了。在这块宽敞、馅饼状的地盘上，他们种上了丁香、连翘、山梅等花木，致使那些骑摩托车的人路过门前也很难看到他躺在地上；当然，时值正午，骑摩托车路过的人并不多，因为只有本地人才会走这条湖滨路，而度夏的游人还没到，因为时间尚早。

他很喜欢每年的这个时候——四月；生命从种成格子形的树间透出，无处不在——生命。

知更鸟在他的周围鸣唱，他凝视着它们，目光却变得模糊起来。这些鸟儿不住地点着它们高尔夫球般的脑袋，带着明确的目的飞来飞去忙碌着，它们看上去似乎一下子变得很重要。他头顶上方的天空光灿灿、蓝湛湛。玛丽亚这会儿随时都会回来，她会将买回来的食品杂货放在厨房的桌上，然后翻动着舌头说起杂货店里主要商品的价格，说这些东西在布卢

明顿超市的价格可要便宜得多，她倒不是想再回城里过日子，就算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再回去。她会以一种意大利语和英语混杂的语言哇里哇啦地把这些话说出来，而这个世上除了他恐怕谁也听不懂她说些什么。

他试图站起来，可他的大腿在抽筋，强烈的痉挛逼着他在原地再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吧，他对自己说道，躺着别动。为了缓解自己的头晕，他试图在脑海里展现马尼托巴省斯通沃尔镇——他儿时居住的小镇那一条条阳光普照的大街，然而他与往常一样，总被自己已封闭了的、混乱的记忆弄得灰心丧气，无可奈何。不过，他却能看见他父亲那所房子的四堵墙壁，它们将屋子里的各间卧室分离隔开。卧室里的床、瓷器、还有那只碗柜架上的果冻罐子，家里的现金——都是些软塌塌的破烂票子便存放在那里面。（空气，他想吸一口气，可他办不到。）他强行跑出母亲的园子——只有几排长得瘦弱的卷心菜和几棵细长的扁豆——沿着六十年前那条烈日烘烤下混乱的杰克逊大街走着。他经过农夫的运货马车，闻到拴在一旁的马匹那沁人心脾的浓浓的气味，过了街角那家五金店、小学、法院、那苦苦挣扎的市民花圃，以及市中心那座带有坚硬的石灰石雕刻装饰的长老会教堂；此刻，在梯形光线的照射下，这座教堂突然间化为灰烬。

他也许打了一会儿盹，醒来后突然感到一阵恐惧，那是一种似乎想钻出儿童时代的恐惧。它究竟是什么？与此同时，他的背变得僵硬了。

他猜想自己的后背现在准因上了年纪而起了斑纹，背上的皮肤已经斑斑点点，满是皱折，薄得像张卫生纸了，可又有谁曾见过自己的后背呢？您得在双面镜前扭过来转过去，即

便这样,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是永远也看不到的。您的身体还有一些部位,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们走来走去,但您从未真正拥有过它们。

这个想法,这个令他迷惑的思绪令他在自己的头脑里莞尔一笑,尽管它给自己带来了一阵怀旧的痛楚。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马尼托巴做石匠的情景——赤胸裸背在烈日下干活(采石场的石匠个个都是这样),想起下午散工后,他又是怎样出于对年轻妻子的柔情,待背上的汗水干了后再穿上衬衣,回家吃晚饭,回到自己心爱的人身边。

不是玛丽亚,不,那会儿不是她。在采石场干了一天活回到另一个妻子身边,回到那个他还是小伙子时娶的妻子的身边。

即便上了年纪,他仍然每天思念那个妻子,至少每天想一次。总有什么东西冒出来,让他想起自己那段短暂的婚姻;而这段婚姻到时候也似乎变得更像自己偶尔走进的围栏,而不是一个正式履行了法律手续的婚姻。在他的脑海里,她总是站在家门口等他回来;她的存在是一种悲哀,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其实,她从未在门口等过他,因为那会儿她要忙晚饭。然而,无论显得怎样笨拙,他都要将妻子没等他这段往事纠正过来。

可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第一个妻子的名字? 他感到一阵被压抑的狂喜。他这种健忘倒真有点粗心大意了,简直不可原谅。他的亲爱的,他的心上人。她的脸庞已如一张磨损的照片那般模糊,但她的躯体,她的每一寸躯体,他都是那样熟悉。他还记得,一天晚上他被哗哗的雨声惊醒后,发现自己的胳膊抱住她的酥胸。她那柔软的乳房,这一切多么美好。

他觉得自己傻乎乎的,于是便按字母顺序数起人名来:阿米莉亚、贝西、夏洛特,这是个老式的名字,多萝西娅……

埃玛、范妮。

他目光向下沿着自己整个身体望去,扣得整整齐齐的运动衬衣,皱巴巴的卡其布短裤,直至形成一个V字形的双脚;透过这个V字形,他能看到自己头晕发作前一直在建造的那座石头金字塔。

他对这座石塔早已厌倦。

这座石塔是埃及那座大金字塔按比例缩小了的模型,大战一结束就开始建的,至今已快十年了;可他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左右。其他人退休以后造小船,或是建游泳池,要不就做花园里用的装饰品,诸如用钢丝锯把黄杨木做成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将它们放在矮牵牛花中。其他人看着自己出了成果后,又开始搞别的东西,可他却由于某种原因让自己一直陷在这座傻乎乎、令人可笑的石塔之中。(“一次做一件事”,他以前常这么说,并相信这句话所包含的智慧。)然而,这座金字塔却成了他的眼中钉,至少他自己瞧不顺眼。真是件蠢事。他常在黑暗中听到一个声音嗔怪道,“你再也造不出能与你第一座石塔相比的东西,你的手艺已经荒废了。”这还不算,仅在一星期前他还测量过这座石塔,结果显示它已歪斜,再建下去情况还要糟糕——当然,如果他继续造下去的话。

范妮、格拉迪斯……

大多数人需要一个包裹物让自己在其中集中思绪,而凯勒·古德威尔对这座金字塔无可比拟的凝神专注却来自强加于他的视觉——他那萎缩了的老脊梁正躺在自己新近锄过的草地上,他的视角大大缩小了,因而彻底改变了。于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人的感觉玩的一个把戏。

无论怎样,他对自己的决定突然变得清醒起来——他决定停工,不再雕刻后院这座丑陋的石塔,这个他很久前为纪念妻子而造的那座石塔的苍白无力的影子(妻子叫什么名儿来着?)。对,他决定立即停工,就是此刻。明天他将打电话给布卢明顿的一个包工头,叫他们开一辆推土机来。过后,他再将剩余的碎石块运走,只需一两天时间便可完工。真令人吃惊。后院草坪中央自然会留下一块难看的疮疤,不过到了秋天,他可以种上一种长得最快、供观赏用的樱桃树取而代之。那种树可真叫美。对,其实何必要等到秋天呢?他干脆现在就种上那樱桃树。他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天种树,这真是毫无意义,简直违反常识。

我要将她击倒,他在喉咙里兴高采烈地说道,同时像打了麻药一样,脑袋里迷迷糊糊,不过,这倒可以防止自己明日心软改变主意。他说不清自己是临近了自己生命的中心,还是在出售了自身某个宝贵的部分。然而此时,他高兴得一阵颤抖,并随即明白了一个道理:可能做的事便一定能做。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遍了全身——这是那个决定奏出的朴实的音乐。

一个人平躺着做出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它会任意发出一阵阵力量,而这种力量此刻正敲击着凯勒·古德威尔的胸口,在这和风丽日的四月天给他带来隆冬的寒气。他意识到自己的四肢突然间变得冰凉,已从身体的各种感觉中分离出来,与之相连的只剩下一根坚硬的细丝——疼痛。他这会儿在哪儿?一直在想什么?——范妮、格拉迪斯、哈里特、伊莎贝尔……

他听任这股痛感侵袭着他，他已奈何不得。它占据了他的全身——完完全全地占据了他——只给他留下一小块空白，即他头脑的一小部分；在那儿，有一个问题在敲打着他。不，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样东西在请求他记住，那东西与推土机开过草地、推倒他的耻辱，他的金字塔有关；在他作出决定时因兴奋而忘却了那东西——它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呢？他在自己狂乱的思绪中被绊倒，动弹不得。他聚拢嘴上的肌肉，紧紧闭上双眼，看到一缕阴沉的雾气在他思绪的上方盘绕，以他自己的迷糊撩拨着他。他需要记住的只是一个简单而具体的细节，实际上是一样东西，就是那件固定在时间里的东西。如果他能将手举起来，他就能碰到那件东西，看清它是什么，然而它的手，那冰冷、沉重的手似乎已经睡着了。

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起来，于是他想起来了：在金字塔的地基下面埋着一只盒子——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时间盒子。他自己将它埋在那儿的。那是个钢盒子，大约十二英寸见方，约四英寸深。一点儿不错。他记得自己是在本地一家五金店买的这盒子，它和用来装渔具的盒子差不多，但它的结构质地要比一般的渔具盒更坚固些；此外，这盒子还带有一只非常合缝的盖子，甚至还有一把锁和钥匙。他花了十五块钱买的，当时一点儿也没迟疑。

伊莎贝尔、珍妮特、卡蒂、莉莲……

他记得自己曾绞尽脑汁，考虑应该在盒子里放些什么东西，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打那以后，很多事情从他记忆中消失了。过去的十年是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十年，他现在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曾认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是创造，但他一直

参与其中的却是限制、削弱自己的创造力,岂不可悲? 尽管这样,打开那只盒子,看看他在里面藏了些什么还是会给他以惊喜的;不过他得确保这只盒子不被损坏,他得向开推土机的司机仔细说明情况,告诉他地基下面埋了只小盒子。作这番解释会耗去他很大的精力,但若要保存那笔财富,他就必须这么做。

然而,这是一笔什么财富?

不知什么东西在拉扯他思绪的褶边。秘藏在那盒子里的是一件宝贵的东西,属于他年轻妻子的东西(她叫什么名字?)。他埋下那盒子已很长时间了,而自打他年轻那会儿,干完活从采石场回家,一路上将衬衣搭在肩上,背上的汗水渐渐吹干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以后发生了多少事情,说了多少话,又度过了多少岁月;他生命的居室时满时空,可他从未想过这些居室的外墙,支撑它们的横梁,以及它们质地坚硬的墙板。

此刻,从太阳的位置来看,一定已是傍晚了;实际已是夜晚了。点点繁星横贯夜空,闪烁着它们这些来访者的光辉,同时带来了它们与结婚戒指——她的结婚戒指一模一样的形状,也带来了他从死去的妻子手指上取下戒指时那闪光的一刻。(并不是当时那情景具有某种可感知的形式,更不是它体现了某种思绪;实际上,这一情景因其自身的痛苦而无法展现开来,让他人知晓。他知道,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其中亦有些居室,绝无人涉足,更不谈公开招租了。然而,它们就像一本古老的书里那些树叶标本,紧紧地贴在人的意识上。)那是他妻子的结婚戒指,他的妻子默西。啊,默西,默西,将我拥在你柔软的双臂里,将你的身体压在我身体上,给我温暖吧。

在他最后的时刻里，他可能想到自己的独生女儿，也可能没有。他这个女儿现已七十二岁了，住在阳光赐福的佛罗里达州一套豪华舒适的公寓里。

维多利亚的姑奶奶成了个爱穿青绿色女式套装的人。这种上衣和裤子相配的套装穿着舒服，也很实用，因为这种套装能掩盖她原先挺好看，而如今却裂了口的小腿肚子。她那涂了口红的双唇——宛若卷起的一小束花——啪地张开，抖动，再紧紧闭合。她的双眼已深深地陷入一道道如条纹缎子般的皱折中。她在浴室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心想，她脸庞四周那白里透出粉红的鬓发为什么就不能是自己的头发呢？（虽然她有时的确也拍拍那鬓发，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还有她那可怕的下颌，那软塌塌的上部臂膀。她傍晚在海滩散步，扔干面包喂海鸥时，那膀子上的肉都在晃动。没人对她说，她年纪这么大还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也没人对她说——这挺奇怪的——她在佛罗里达生活的这么多年竟是那样无忧无虑、轻松自在。

她遇到的一切都是那么轻飘飘的毫无重量：她那套公寓里的各扇房门都是空心的，压模电灯开关十分轻巧，阳台上的家具也轻得惊人，还有她有时去看住在伯兹基的拉比娜和她丈夫时乘坐的那连接松散、格登格登跑的出租马车、甚至她那只白色塑料小挎包——里面装着卷得整整齐齐的几卷咳嗽糖、小包的卫生纸、和替代现金用的薄薄的一盒信用卡，这一切都是那么轻飘飘的。

在贝赛德托尔斯公寓的门厅里有一棵人造的青锁龙树。她每次走过这令人厌恶的东西，总要伸手捻摸它的叶子，有时

还使劲搓,将自己的指纹留在它乙稀基的叶面上,在自己对它的厌恶中暗暗寻得一点乐趣。到了夜晚,她喜欢看电视节目里约翰尼·卡森的表演。她一直闹不明白,他的嘴巴为什么显得那样难看、僵硬,像是用笔墨画在他脸上似的,不过她还是喜欢他的开场白,即他说的一连串快速的笑话;这些笑话都是以大家熟悉的大幅度挥击高尔夫球的姿势及他反复使用的转折语:“接着向前”串起来的。

这几天来,她总是自言自语唠叨“接着向前”这句话——无论是去发廊做每周一次洗烫的路上,还是在去邮局的路上,或是去看医生、到楼下的游艺室打桥牌,她都要唠叨这句话。接着向前,向前,向前。她这辈子一直在向前走,已经麻木了,连想也不去想了。

我在前面说过,弗莱特太太已从多年前的精神痛苦中恢复过来,然而,她的生活似乎是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即她那份没有归宿、不属于任何人的失落感,即便她的梦幻也释放出强烈的空虚的气味。不错,她有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但她不知这三个孩子将来在回想她时,除了柔情和容忍之外,还会有其他想法。她的八个孙子孙女远在异国他乡,由于天各一方,与她年龄悬殊,加之他们对模糊不清的未来又是那般神往,因此,她对他们也逐渐淡忘了。也许这就是她为什么总是“反思”过去的的生活,缅怀她那两位已不在人世的父亲,诅咒她出生时被投进的那一片虚无。在那片虚无里,她发现了某种联系,而在这种联系中,她又发现了另一片虚无——这是一种给她带来无穷悔恨,令她忆及便怆然伤怀的循环往复的模式,然而,它又催她向前,给她以活力。她喂海鸥,不是吗?她每个星期天都给她已长大成人的儿女们打电话,从无例外:

在伦敦的艾丽丝、在俄勒冈荒原上的琼和在匹兹堡的沃伦(他不久便要迁往纽约)。尽管他们在电话里谈话有时会说些不理智的斗嘴话和欺瞒之词,但她仍能自始至终装出开心活跃的样子,而压抑自己心中的失望,哪怕是一点点失望都从不流露出来。她为自己做的晚餐挺不错的,对吧?——一块肋肉,或是一块鸡胸肉,外加绿色蔬菜。她不吃药,也听不到噪音。

不过,每天一早,她的确躺在床上,双眼向窗户望去,注视着佛罗里达强烈的日光从百叶窗的隙缝间悄悄挤进来,忍受它无情、刺目的亮光。她躺在床上想:又是一天,又是一天;试图置身她生活里那些不断移动的情景之中。她这么想着,有时会握起双拳,有时则双眼噙满了泪水。至于她的生活,应该说,是指她至今为止的生活,因为她会为自己向前看好多年。她“至今为止”的生活意味着接受那种用致她伤残的信息制成的药剂,每一滴药剂,再用她的渴望这一汤匙加以搅拌——她这么做已有多多年,已成了她的第二本性。遍布她卧室的两股真实与虚幻的涡流以华尔兹的节拍舒缓地沉降、升起——一、二、三,一、二、三。她就这么随着节拍不断地跳下去。

她那些神经元的触处坍塌了;算了,随它们去吧。她对提供给她的材料加以扩充、延伸,或是压缩、改造;这样组合而成、如混合药剂般的材料便是她的生活。她绕着它旋转,朝这边还是那边旋转则取决于——谁知道取决于什么——欲望或必要性这两个支点。她或许会去拜访一下她正在读的一本图书馆的书里介绍的最美的地方,或是探寻一下肥皂剧、梦幻中的什么东西。有时候(虽然并不经常)她会做一次大胆的缩减,正如弗雷迪·霍伊特说起玛丽亚·古德威尔时那样,说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几乎肯定看到这个凯勒·古德威尔的遗孀,被

个老头拥着,沿俄亥俄大街走来着——但这事不可能,太可笑了,因为玛丽亚早就回她意大利老家去了,在村里变成了一个身穿黑丧服、腿上放了一团毛线织物的居丧之人了。

如果您向维多利亚的姑奶奶黛西问起她的生活经历,她会把嘴巴——如鲜红的花穗——噤那么一会儿,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个经过修改的、混杂的版本,不好意思地将它递给您,但她并不道歉,也就是说,她一点儿也不含糊其词:这就是所发生的事,她会以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深不可测的经历对您这么说: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她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加以修改、增删,这其实表现了她的固执、任意;而对这种混杂的版本她自己是否觉着舒服就很难说了。不过,她对此已习以为常。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男男女女,每日清晨在各自的床上醒来,渴望得到他们生活的实质内容,然而每日都不得不重新将自己虚构一番。

一九七七年六月,即她俩在林林旅馆吃复活节中餐后仅两个月,侄孙女维多利亚·弗莱特便从多伦多打来电话说:“嘿,能猜猜什么事吗?——我要去奥克尼群岛搞一个研究项目。下星期动身,您跟我一块儿去吧,在那儿度假可是美极了,我们可以”——不知什么原因,维多利亚的嗓音里夹了条欢笑的彩带——“我们可以去马格纳斯·弗莱特的坟墓献花。”

“奥克尼群岛!”她女儿琼在母女俩惯常的星期日通话时喊道。“可我想,您以前说过,今年要来波特兰^①的,说要跟

① 美国俄勒冈州西北部港市。

我几个女儿待两天,好让我和罗斯抽开身,再说,她们也想见见外婆,老是念叨外婆这,外婆那的,可您倒好,这会儿跟我谈什么奥克尼。”

“您有没有在地图上查找一下这地方?”她儿子沃伦说道。
“您到底知不知道奥克尼群岛在哪儿?”

“干嘛不去呢?”艾丽丝用学会的英国口音说道。“您也该过一次大西洋了,不过您来回都得在我这儿歇歇脚,跟我和孩子们待几天。”

“你当然要去,”弗雷迪说。“你下午自愿干的那份活我替你包了,打桥牌也取消一回。”

“你护照的事我来办,”拉比娜的丈夫巴德说道。“你就去拍几张照片,把表格填好,我去坦帕的联邦政府大楼交给他们,那儿我有点关系——有个人欠我一份人情。这事从头到尾十分钟便能搞定,你放心好了。”

“你需要的是,”拉比娜(比恩斯)说道,“一套全羊毛的衣服。佛罗里达这儿混纺的衣服在那儿的恶劣天气里不管用,绝对不行。我在苏格兰的时候差点没把我的屁股冻掉,可那还只是爱丁堡,离你要去的北边还远着呢。带一套羊毛衣服,一件珀墨普雷斯大外套,再带两件质地非常非常精良的毛衣换着穿,别的你什么也不用带了。”

“要穿旅游鞋,”维多利亚在电话里说。“别管式样好坏。”

“还要带把伞。”弗雷迪说道。“那种能折叠的。”

“别带伞,”维多利亚说。“看看您能否买到带帽子的塑料雨衣。”

“很抱歉,我们不能为您提供一揽子旅游交易,”布莱登顿旅行社的人说,“实际上,您得提前三周通知我们;再说,我们

对奥克尼群岛的有关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坦率地说，”住在走廊对过的玛丽安·麦克亨利说道，“我还是愿意先看看自己的国家，而不愿逛到那么老远的地方。您有没有去看过首都华盛顿，我是说，实实在在地看过它？”

“现在去欧洲已不需要再打预防针了，”尼尔利医生对她说，“不过我给您开了治腹泻的处方，再开一个治便秘的。当然您得带上您那只抗过敏枕头，那儿的人现在恐怕还在用鸡毛或稻草做的枕头。”

“我非常希望您在旅馆订了房间。”

“就我而言，我是不想提前预定，否则就一点儿乐趣都没有了。我们喜欢随机应变，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捉摸不透——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

“您真的一九二七年以后没再去过欧洲？真的吗？哈，那您准会大吃一惊的。”

“我不知道您以前去过欧洲，”（琼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从波特兰打电话来说。）“我是说，您从未提起过。”

“千万别在那儿住旅馆，因为，听着，那地方像这种小巧玲珑的床铺和早餐什么的到处都有，像住在家里一样舒服自在，比旅馆强多了，你会真正体验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听我的劝，有两件事你不要去做。第一，别跟那些管床铺和早餐的部门打交道，这一类的部门有时硬要你睡尼龙床单，让你很为难，真的，早餐吃的是软塌塌的热番茄，我一点儿也不骗你。第二，别对着龙头喝自来水。那儿的人全喝茶，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因为喝茶是要把水烧开的——开水，明白了吧？”

“还要带旅行支票。”

“系在腰里的钱袋。”

“两只小旅行箱要比一只大的管用,这是人家告诉我的经验,一条很好的经验。”

“我们在坎特伯雷那会儿……”

“我去英国北部的湖区时……”

“……鱼和炸土豆片是用报纸包的。”

“……用一个塑料盒装上自己的肥皂,因为……”

“我的曾祖母老家是怀特岛,那地方是不是靠近……?”

“您能不能给我捎上一只精致小巧的韦奇伍德烟灰缸?不过要绿颜色的,不是蓝色的那种。”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随身携带自己的贵重物品……”

“那些个耳塞子一类的小玩意儿可在温迪克西买到。”

“奥克尼群岛?从未听说过。”

维多利亚这姑娘在米拉贝尔机场接她姑奶奶时心里七上八下,紧张不安。“我想请您认识一下刘易斯,刘易斯·罗伊。刘易斯,这是我黛西姑奶奶,”她小心翼翼,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

“您好,弗莱特太太。”

“刘易斯也要去奥克尼,”维多利亚说道,她提高了嗓门。她那张脸,正如她所说,难看得很,还有她的头发,细溜溜的,剪得也不整齐。

“噢。”

“那个研究项目,您知道,算是由他负责吧。他是,”她怪里怪气地摇动着身子耸了耸肩膀,露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是我的老师，就算是吧。”

“其实我是博士后，弗莱特太太，这个项目是维多利亚和我两人共同搞的，但主要是她的主意。”他的脸显得很有魄力，嘴巴则显得很急切，随时准备笑出来。

在飞机上，他们三人并排坐着，刘易斯靠过道，维多利亚居中，她姑奶奶则靠窗。他们喝了点香槟，吃了顿鸡肉、胡萝卜片的晚餐。飞机上那令人迷惑而嘈杂的程式，使他们相互间变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接着，刘易斯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上次去欧洲飞行途中那段甚为复杂的经历。他说着说着，真吓人，竟用起了一般现在时。“所以呢，飞行员便开口宣布道，嗨，发动机中的一台坏了，不错，我们得往回飞。这时，大家都吓呆了，可还是坐在那儿用汤匙舀东西吃，像是真的遇到了好玩的事。下面的事您知道，我们便坐在了拉布拉多一个简易机场上，可能是个军事基地什么的，我们在那儿被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厕所还出了毛病，后来……”

“我看黛西姑奶奶累了，”维多利亚嘟哝了一句。

他立即收住话头，咬着他的指关节，不断打着哈欠，四下里瞧着。

维多利亚真羞得无地自容，她知道姑奶奶对这个年轻小伙子一定会有什么感觉：他的头发像毛皮披肩一样在他肩膀上飘来荡去，他刚才那男孩子般的叙述口吻把他的才气抹得一干二净，而他原本是个极温柔的人，可现在却变得像其他男人那样漫不经心。一位空姐终于将毯子和枕头送了过来，并将灯光拧暗了些，他们三人于是都假装睡觉。维多利亚听出姑奶奶呼吸很不均匀，几乎是在抽泣。她这才明白，自己身边的这位老人一心想回家，回她佛罗里达那套公寓住房，其实去

哪儿都行,就是不要在飞机上,夜里乘坐大西洋的航班,那盏小小的夜明灯在窗框上闪亮,在她眼皮对面发光,真让她难受。

维多利亚整个是一台异常灵敏的值班雷达,这会儿她感到从刘易斯那具僵硬的躯体发射出悲哀、失败的电波。她从毛毯下悄悄向一旁伸手握住他的手,发现它在颤抖,于是便紧紧握住它。她以前还从未碰过他;他真的是她的老师,而她也的确是他的学生;因此,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

过了一会儿,她又伸出另一只手,将它放在姑奶奶那绷得紧紧的手腕上,用手指使劲儿按着,似乎在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

就这样,他们三人被维多利亚·弗莱特伸出的手臂连接起来,伤感地离开一个大陆,奔赴另一个大陆。当夜,他们或许也打了一会儿盹;个个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岌岌可危的星球上,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奥克尼群岛地势低缓,全岛植树造林,一片郁郁葱葱;岛上蜿蜒小路比比皆是,绿草茵茵的山坡上羊群在吃草,好一派秀丽景致。两百年前,或三百年前的山水画家想必曾描画过这幅美景。在这幅田园景色的背后或地下,便是史前的城堡遗迹:村落、堡垒、石塚、墓室及直立的石柱,这些石柱可能是天文观测台,也可能不是;铁器时代的遗迹形成了另一层面的遗迹。还有九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纪念碑,另有中古时期、封建时期及寺院时期的纪念碑。此外,这儿也不乏现代建筑——与这些古老而颇具田园风格的遗迹并存的便是那些奥克尼小工厂,它们生产具有地方风味的奥克尼甜饼(味道很

好)及奥克尼奶酪;还有一些手工艺企业,主要是编织业(可惜已衰落了),及旅游业(这行倒挺兴旺),再就是虽不引人注目、但永远红红火火的日常商业活动及必须的专业服务——杂货商、文具商、律师、牧师等等。

维多利亚的姑奶奶从未想到能看到这般景象,在她的头脑里这儿只有荒原、沼泽和丛生的石南。奥克尼的居民住房分布在十二个散落各处的村庄,有的则在柯克沃尔和斯特罗姆尼斯两个主要城镇里。看到几百所城镇居民住房建造得如此坚固,如此简朴,即便维多利亚也感到十分惊讶。她注视着这些朦胧依稀的住宅,想象屋子里的女人们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男人们则正穿着套头毛衣,再抹平自己的头发。几乎没人出门走动。当然那会儿还是清早。一阵疾风掠过海面,随即下起雨来。尽管天公不作美,维多利亚和她姑奶奶及刘易斯·罗伊仍在斯特罗姆尼斯的坟场读着碑文。维多利亚忽地一声大叫,发现了下面的碑文:

圣洁的生命,怡然仙逝
灵魂确已归之耶稣
在那儿,它的菁华
安然长眠

马格纳斯·弗莱特,

1584年生,1616年卒

不知什么原因,这段碑文使他们三人笑得直不起腰来,似乎弗莱特其名是奥克尼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坟场这儿到处都会冒出叫弗莱特的人来,不仅仅是马格纳斯·弗莱特,还有托

马斯·弗莱特、塞西尔·弗莱特、詹姆西纳·弗莱特、唐纳迪纳·弗莱特等等。这弗莱特家族显然是这处公墓的国王、王后。

雨还在下着，并不见停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刘易斯握住两个女人的手臂，领着她们穿过街道，来到一家小餐馆，坐在里面直至这场暴风雨停息，相互间都清醒地感到各人的存在。

“弗莱特太太，您公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刘易斯一边将黄油抹到甜烙饼上，一边以社交式的口吻问道。

“呃，我也说不大清楚。”

“可您对他一定留有某种印象。”

“他是个不幸的人，烦恼悲伤总伴随着他，他妻子离开了他，你知道。”

“哈哈！”他打趣道。“那可是个传统的幸福之家。”

“他的三个儿子都站在他们母亲一边，拒绝去看他们的父亲。他们根本不想和他有任何来往。”

“这就更使他心中难受，是吧？”

“所以他就被赶到这儿来了。”她抬手朝窗口挥了挥，注视着窗外湿漉漉昏暗的街道和黑压压的云层。“那年他六十五岁，我只能认为他心里一定非常郁闷苦涩。”

“可您也不能肯定。”

“其实——”

“什么？”

“其实，我从未见过我公公。”

“原来这样。”很显然，他大吃了一惊。

“我们从未见过面，没有；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没能在他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我总是想，呃——”

“想什么？”

“有些事情，”她顿了顿——“我们要互相说一说。”

“您对您公公的这份感情在女人中是不多见的。”

“对，我想是不多。”

“马格纳斯·弗莱特是我的曾祖父，”维多利亚插话道，或许她也想分担一点家庭破裂的责任。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这时，刘易斯决心显得快活一些，便举起茶杯，开开心心地说道：“为真正的马格纳斯·弗莱特的遗骨干杯！我们会找到他的。”

“你倒是像作诗一般，”维多利亚说道，她喜欢看别人热情洋溢的样子。

“噢，嗯，”维多利亚的姑奶奶说，她的脸上这会儿漾起了笑容，心中百感交集。

294

第二天，风渐渐停息。太阳出来了，热得出奇，游客们穿着短裤、T恤和其他夏季服装从渡口涌出，挤满了斯特罗姆尼斯狭窄的街道。他们吃着冰淇淋，购买明信片。

已到了傍晚，可天仍然很亮。刘易斯和维多利亚在灰石旅馆的餐厅里一边慢慢吃着肉馅土豆饼，一边向维多利亚的姑奶奶讲他们来奥克尼的原因。刘易斯掏出一支铅笔，在餐巾纸上画了一幅小草图，他画得很快，却画得很美——至少维多利亚这么认为，她后来将那张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折起来，塞进自己箱子后背的衬袋中。刘易斯说，这一带的岛屿蕴藏着丰富的海生动物化石，但早期植物生长的遗迹已遭破坏，只因地球温度不合适，及植物本身结构太脆弱所致。然而他俩在多伦多时，曾借助最新式的、经计算机改进的地图，研究在苏格兰北部所发现的各种化石形状。他们沿着一条大弧度的

曲线,从苏格兰西部一直追踪到斯堪的纳维亚——这条只有一点点弯度的弧线穿越了奥克尼大陆的边缘末端,因而他们认为,斯特罗姆尼斯以北仅几英里的耶桑比很可能存在某种地岩层。那儿的岩石不一样,要坚硬些。所以,岛上的人从古至今都去那个边陲之地寻找磨石,而奥克尼其他地方的岩石则太软,不能用。刘易斯提到赖尼黑硅石,提到中古红沙石,还说起他如何向加拿大科学委员会申请差旅费,如何装配设备、组建研究小组,也就是由他和维多利亚·弗莱特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他们两人只有二十一天时间去各处勘探,并写出详细书面报告,否则,他们的经费便会用完。两人都很乐观;刘易斯说,生物学总是令专家们灰心丧气,无法实现他们使事物系统化、条理化的目的,因为其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地球有时挺吝啬,这不错,但很多时候却是非常慷慨的。

维多利亚将目光投向桌子对面的姑奶奶,仔细端详着她。只见姑奶奶神态安然、闲适,脸庞因一整天热浪的烘烤而显得红扑扑的。由于天气晴好,她将自己的夹克衫留在了楼上她俩合住的客房里,这会儿她正考虑隔天是否要去本地的商店逛逛,看能否找到一件轻一点、尺寸合适的衣服。昨晚她睡得很香,很沉,这倒挺不错。

维多利亚凝视着姑奶奶,感到爱在心里涌动;同时,她也要分享姑奶奶那份满足、安详的神态。她几乎希望能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好让自己将姑奶奶解救出来,或有什么礼物能赠予她。这时,就在此刻,她似乎觉得,刘易斯和姑奶奶之间那些亲密和睦的细言碎语多么美好——看来这便是事情的开端了。

刘易斯正对姑奶奶说起他租来的自行车和背包;以便他

和维多利亚次日早上能骑自行车去耶桑比,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将开始挖掘我们那些小小的奇迹,”刘易斯对她说,“留下您去寻找马格纳斯·弗莱特。”

“您是在说马格纳斯·弗莱特吗?”旅店的老板说道。他正走到他们桌边给他们倒咖啡。

这位老板名叫辛克莱,长得高大英武、气宇轩昂。这位至今未娶妻室的男人脸上透出一股灵气,他总是用手将他那细软的银丝往脑后抹平。他在桌上放置盘子时动作优雅,几乎令人着迷,又有一副颇具乡土特色、滑稽而温柔的好嗓子,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做起旅馆生意来的?维多利亚心里觉得挺纳闷。他这个有六间客房的旅馆在打出的广告上写着“新潮、便利,现代化”,意思是他的一些客房配备了电热器。辛克莱先生身穿整洁的灰色工作服,在铺了地毯的楼梯上轻快地跑上跑下;他既管接待客人,又管打扫房间,还充当厨师、侍者的角色。

“我刚才是不是听您说在找马格纳斯·弗莱特?”他倚着桌子,彬彬有礼地说道,那样子挺潇洒。“请原谅我打断您,但我碰巧听您说起老马格纳斯·弗莱特。这马格纳斯·弗莱特,咳,就住在隔壁,您知道吧。”

“隔壁?”

“就是榕树庄园,你们一定经过那儿的。那地方住的都是些无家可归的老人。我年轻时,那宅子的后院长了些榕树,当然现在都没了。在政务会接管那宅子前,它是一所私人住房。老弗莱特就住在那儿,我该说,那个有名的弗莱特。”

维多利亚摇摇头,今晚她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我们的马格纳斯·弗莱特已经死了,”她说这话时神情挺庄重。“他生

于一八六二年。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去世的,但我们知道他出生的年月,因为我姑奶奶手里的一些法律文件上写着他的出生日期。”

“就是那位先生啰,没错的,”辛克莱先生点点头,笑道。“我是说,如果你们相信他自己说的年龄的话,而我呢,恰恰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中的一个。每年他过生日,《奥克尼人》报都要登他的照片;而今年他过生日时,他的照片还上了伦敦的几家报纸呢。这个可怜的老小伙子已是一百一十五岁高龄了,想想看。噢,对了,差不多也就是一个月之前吧,当时的那个生日晚会可是你们见都没见过的,他们做了一只蛋糕,竟和这桌子一般大;蜡烛通明,篝火旺盛,当然他是从头睡到尾的。哈,弗莱特先生,他可是英伦诸岛年龄最大的人。”

马格纳斯·弗莱特之所以出名,并非仅因为他年龄大,还因为他记性特别好。

一九七七年夏天,也就是维多利亚和她的同事刘易斯·罗伊,还有她年老的姑奶奶黛西怀着不同的目的,长途跋涉,来到这传奇般的奥克尼群岛的这一年,马格纳斯·弗莱特的确因为他一百一十五岁的高龄而闻名遐迩。这个年龄的确很大了。乌克兰有一位妇女据说已一百二十一岁,亚美尼亚有兄弟俩报出的年龄分别为一百一十八岁和一百一十六岁(有文件证明他们所说的年龄),兰金湾一位住在圣公会教堂旅店的伊努伊特妇女曾将手搁在《圣经》上发誓说,她已一百一十二岁(她八十五岁开始抽烟,九十岁开始喝威士忌)。此外,还有那位无可争辩的人类老寿星中的冠军人物:新加坡的吉先生,他已一百二十三岁高龄,可仍能走动,虽然近年来只有他妻子

(九十六岁)真正见过他。这些老人的年龄不管是否得以证明,老寿星总是令人激动,要去看一看的,所以,马格纳斯·弗莱特如此长寿,自然便成了名人。英国的几家周报曾为他写过小传(《马格纳斯·弗莱特的一生》,刊于《星期日时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第五十四页);而十年前一次,他曾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摄像机前,径直看着观众,做“他的事”。

“他的事”比他的年龄更让他出名:即他的能力——他能通篇背诵《简·爱》,一章一章地,逐字逐句地通篇背诵。辛克莱先生向他的客人们讲到马格纳斯这一才能时,心中充满了敬畏,原本柔和的嗓音变得更加柔和了。

这事简直不可能,有些人会说。其实,这些人对人脑的记忆功能并不了解;同样是这些人也可能从未听说过,很久以前,有些虔诚之人竟能全文背诵《新约全书》。即便在本世纪初,也能找到背诵《福音书》的平民百姓,这根本不足为奇。不过,后来主日学校也向一些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颁奖,诸如背诵耶稣登山训众时所说的八种幸福,或第一百首赞美诗等。多年来,专家学者们一直坚持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长诗《贝奥伍尔夫》常在宴会上由一个人背诵,而且根本没有原文可看。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二十年代在朗女子学院做学生时便听说过马格纳斯·弗莱特的非同寻常的才能;而也就在朗女子学院时,她本人也背下了《丁登寺赋》——并不是她的老师要求她背,而是因为她内心渴望将威廉·华兹华斯那些极富哲理、节奏明快的诗行融入自己体内。

当然,马格纳斯·弗莱特已一百一十五岁,他的记忆力也开始衰退,辛克莱先生也承认这一点。十年前,当电视台采访马格纳斯·弗莱特时,他只能背诵《简·爱》的第一章,不过他背

这一章时一点儿没出错,也没打顿;一年前,他只能背第一页;而现在,辛克莱先生告诉他来自北美的房客,这可怜的老头儿只能背诵第一段的前几行了。

造成我们在生活中感到更为孤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不愿操心费神,不愿采取行动,而总是抑制自己内心的想法,或拖延迟疑,或仅在心里演练一番,以求安宁舒适。为什么年轻的维多利亚竭力将马格纳斯·弗莱特排除在她的思绪之外?而她的姑奶奶黛西又为什么一天天拖着不去榕树庄园?她每天晚上都要对自己的侄孙女说出种种借口,诸如她一直在本地观赏风景啊,或是忙着买夏季穿的衣服等等。晴暖天气一直持续着,这是奥克尼六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新纪录。她提出要充分利用这前所未有的好天气,于是便穿上新的棉布裙子和外套(纯暗红色的),脚蹬刚买来的那双旅游鞋,大胆地去了斯特罗姆尼斯以北的田野,一路上还发现了石南、红莓苔子、各种蕨衣草、还有小巧漂亮的苏格兰报春花——开得正盛,一片粉红。“爱!柔情!勇气!”她对着这倾斜的大地景致喃喃自语道,她何出此言,连她自己也不得而知。对田园景色很有点鉴赏力的辛克莱先生曾几次陪她一起外出游玩。在旅馆吃了中饭,洗完杯盘后,两人便乘坐他那辆漂亮小巧的福特牌菲埃斯塔汽车,去临近村庄的教堂、坟场等地游玩。一天,他们偶然发现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的姓名已磨损不清,但日期——六七五年——及碑文却仍十分清晰:“看,人生结束了!”就这么一句铿锵有力的呼喊。(您会认为这声从阴间传出的呼喊会使弗莱特太太心神不宁,然而她却被它迷住了,似乎她看到了一幅景象,或是听到从那声呼喊处又传出一个声音,宣称一

个灿烂的光源在生命的四周闪闪放光)。

“您有没有去看过马格纳斯·弗莱特?”维多利亚每天晚上从耶桑比的岩石层风尘朴朴、晒得满脸黧黑回来时总这么问姑奶奶。

“明天吧,”她姑奶奶保证道。“明天我再安排一下。”

她俩都很清楚——甚至刘易斯·罗伊看到她一言不发、缓缓地举起茶杯的样子也心知肚明——她正在心里作好准备,以免到时失望。

弗莱特太太发现奥克尼那碧绿的景致挺能迷惑人。那看上去大片大片肥沃的黑土地原来只是薄薄的一层伪装,下面便是层层岩石。这些岛屿其实是由岩石堆砌而成,大块质地很轻的石灰石很容易便裂成碎石或扁石块,加工起来十分方便。这种石头可谓无处不在。每一个农场似乎都有自己的采石场和采石工具——锤子、凿子等——这些便是每一个农人所拥有的部分设备。由于这里缺乏木材,人们使用扁石块做屋顶、篱围、野餐桌和条凳,还用它们打制里程碑及纪念碑。看着这些碑石,弗莱特太太想起了孙子孙女最喜爱看的电视片《燧石》,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她想象着自己和辛克莱先生路过的那些住宅都是以石头做家具的:石椅、石桌、甚至床和梳妆台都是以石头做成。她想起自己的公公马格纳斯·弗莱特十八、九岁来加拿大时已是凿石这一行的能工巧匠了。

他在廷多尔采石场一直干到六十五岁,是个肌肉发达、技艺高超之人,一个工匠。大家都说他毫无温柔可言;又据他几个儿子说,他平时寡言少语。后人都认为他拘执顽强,心胸狭隘,如石头般硬邦邦的。

他能读会写,能读《圣经》,或在必要时,还能读邮购物品清单,但他并不是一个愿意坐下来好好读书的人。对此,弗莱特太太用不着别人说便看得出来。他不会读书的,从来就没想过要读什么书,特别是小说。那个叫夏洛蒂·勃朗特的英国女人写的小说,那本英国文学的奇葩珍品《简·爱》,他从未读过。

简直不可能。

“您去看马格纳斯·弗莱特时要不要我陪着一起去?”她侄孙女说道,口气里带着几分勉强。

“如果您愿意,”辛克莱先生对她说,“我可以陪您一起去拜访马格纳斯·弗莱特。”

“明天吧,”弗莱特太太说道。“明天。”

然而第二天,她和辛克莱先生却开车来到耶桑比刘易斯和维多利亚的工作现场来了。

这条路的尽头已年久失修,他们不得不将车停在东比金十字路口处,在荒原上徒步走半英里来到一处崎岖不平的海岬。维多利亚见他们走来,举起双臂,兴高采烈地大声喊着欢迎他们。她的喊声与下面传来的海鸟的叫声和汹涌的海涛声交织在一起。

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岩石上。在溜滑、闪亮的岩石平台边缘,矗立着那座著名的天门。维多利亚对她姑奶奶说,这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拱洞,穿洞而过的海水,每至第七或第八个浪头便发出轰然巨响。(五十年前,据说两个摄影爱好者曾爬进洞中的隙缝,可他们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俩被卷入海中。)

弗莱特太太在傍晚的阳光里眨着眼睛,置身于周围这浩

瀚、恢宏的气势之中，她似乎觉得自己变得多么渺小：悬崖峭壁岿然而立，崖底的大海波澜翻涌、茫无边际，还有四周伟岸、旷荡的荒原。在她视野的尽头，停着辛克莱先生那辆汽车，它远离海风的呼啸和冲击，看过去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斑点而已。辛克莱先生站在离她几英尺处，他那双大手臂悠闲地叉在宽阔的胸前，宛如翅膀一般，安卧在威武的躯体之中。她感到自己竟轻飘飘的——她的身体悬在了世界的嘈杂与广漠之间——这是怎么回事？一阵疾风吹过，她的脸庞变得柔和起来，漾出了笑容，她一时不知给这阵风起个什么名字。过后，她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幸福，她感到了幸福。

弗莱特太太最宠爱的侄孙女维多利亚和刘易斯·罗伊（两星期前她对这个人存在还一无所知）如小虫子般爬到一块突出的岩石板上，用他们一丁点儿大的工具刮擦着那隐秘世界的表层；为何目的？希望发现被掩埋了的生命的细微踪迹，即那些化为石头的生命，变成凄惨的矿物的生命。他们曾告诉她，这种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只要一想到这一点他们便十分激动；然而，证明这种发现的证据却十分轻巧，可置于手掌中，即一小块石头，印有一片叶子的轮廓，或是一朵远古时的花，甚至一种细菌的踪迹——由斑点组成的生命的代码，如织品般精美。

然而至今为止，他们仍一无所获，而所剩下的时间已不到六天了。

在灰石旅馆里，维多利亚是躺在刘易斯·罗伊的怀里度过那些漫长的夜晚的。

她等姑奶奶熟睡后爬起来，摸黑找到拖鞋，再沿狭窄的过

道悄悄来到刘易斯睡觉的五号房间，他自然已在房里等着她了。维多利亚夜晚这些冒险行动颇有点法国闹剧的味道，而她也爱体尝这种戏剧般惊恐、喜悦的颤抖心情，并将它融入自己目前堆聚起来的幸福之中。这条昏暗的走廊阴影四伏，只隐约闪着灯光。走廊里铺了地毯，放着一张旧式的柜子、一面镜子和一口有摆的座钟。辛克莱先生想得很周到，在走廊里装了一盏小巧的玫瑰色夜明灯，以方便房客，因此整条走廊里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实际上，走廊里的光线也仅够维多利亚看清洗澡间旁边墙上钉着的那块漂亮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牌匾上的字：

幸福
在我们自己的
炉边萌生
不可在陌生人的
花园中
采得

炉边！花园！维多利亚深夜两点踮着脚跟走在过道里，在此停下读着这些语句时，她简直想放声大笑。

她和刘易斯都觉得这些诗句是在劝诫他们，不要品尝他们新近几日寻得的这种销魂狂喜。一夜又一夜，在辛克莱先生这家很有品位的旅馆里，在清新白净的床单上，他俩越来越深地陷入那种秘事之中；他们睡睡醒醒，将他们认为受了阻碍的、无权享受的身体部位暴露出来。若是在一年前，甚至是在一个月前，两人还会嘲笑岛上的空气、柔和的阳光及漫长的白

昼竟会偶然凑在一块——还有科学上可能存在的计算错误，甚至失败的可能性——认为性爱的报酬只是暂时的，只是对可怜人精神上的慰藉。

维多利亚没对姑奶奶提起自己的发现，也未告诉她自己将来的打算，因为她知道，姑奶奶正为自己的儿子沃伦烦心，他已离了两次婚；再说，艾丽丝现在也与她丈夫本分了手，心中很是苦闷。维多利亚猜想——尽管她无法确信，她又怎能确信呢？——她姑奶奶黛西可能会赞同墙上那块维多利亚牌匾的意思，认为若从全面考虑，陌生人的花园更有可能带来危害而不是幸福。

*

“我应该告诫您，”贝蒂·霍洛韦太太说道：“他已完全卧床不起，大小便当然也已失禁。”

“哦，是的，我知道了。”

“还有一事，弗莱特太太，他的眼睛几乎已失明，是白内障，而且在他这个年纪已不能动手术。”

“我觉得这是可想而知的。”

“奇怪的是，他的一只耳朵还能听到一些。”

“噢。”

“不过另一只耳朵已完全失去听力，已很长时间了。”

“原来如此。”

“他很容易疲劳。”

“我不会待很长时间的。”

“您说是他的亲戚，是吗？”

“呃，我也说不清，可能是吧。是我丈夫那边的亲戚。”

“他根本就没有家人；不管怎样，这一带是没有。很惨的，不是吗？”

“确实很惨。”

“呃，人活到他这个年纪，活到这个年纪的人不多，嗯，恐怕不会有许多朋友来拜访的。”

“您是不是碰巧知道弗莱特先生曾在加拿大住过？”

“加拿大？呃，我还真不知道。过去曾有很多年轻人去加拿大待几年，在那儿碰碰运气，因为那年头我们这儿没什么机会。”

“不过，关于弗莱特先生总该有些文字记录，有写下来的东西。”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来这儿之前住在桑德威克。就他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养活自己。他种了点蔬菜，自己修整草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点像隐士，离群索居，但酷爱读书。”

“《简·爱》。”

“是，当然是这本书。”

“可当他来这居住时，他一定带着些文件，或许是过去的一些信件。”

“这我倒不清楚，没看到有什么信件，也没有个人证明；如果您指的是出生证明——没有，那种证明没有。”

“也许有结婚戒指。”

“我想不可能，没有。当然，男人们现在并不习惯戴戒指，对吧？咳，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的确如此。”

“不过他确有一张旧照片，折了又折放在衣服里面的。我

们为他保管起来了。”

“我想看看那张照片，您觉得怎样？”

“呃，既然你们是一家的——”

“噢，我没有十分的把握——”

“那张照片在我这儿，就在他文件夹里面什么地方。那上面是一群女人，有点像肖像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对，就是这张。”

“真遗憾，这照片折过了，人脸全裂开了。噢，不过我还是能看出她们都挺可爱的。嘿。”

“不错，嗯，他来这儿时照片就是折着的，准是他自己折的。我们总是尽力保管好病人的私人物品的。”

“我的意思不是——”

“照片背面写了些什么。”

“噢，对。上面写的是……是，‘妇女节奏与运动俱乐部’，可没注明日期。”

“从她们的穿戴来看，我想应该是本世纪初。”

“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点儿不错。嗯，我是不是带您去弗莱特先生的房间？”

“请吧。”

她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他眼球上一层乳白色的薄膜。他那些白色的床单，白色的床罩，让他看上去好像是裹在绷带里一样。

马格纳斯，一个流浪者、受苦受难的现代人——她这几年一直这么看他，这种想法倒也挺浪漫的。她认为自己也是个流浪者，因为她的心是孤儿的心，默默渴望着一个栖身之处，一扇

标有自己名字的屋门。眼下这个只能喘气的躯体，他的年老衰竭全都纤毫毕现，并获取了报酬，现在只剩下一层纸一样薄的皮和一副骨头架子；呃，与其说是骨头，还不如说是瓷器。

“我是黛西，”她凑到他耳边说道，想不出再说点儿什么的。“巴克的妻子。”

裹得像蚕茧般的床单下一阵躁动。

“您儿子巴克。”

没有反应。

“您以前有一位妻子，弗莱特先生，她的名字叫克莱恩廷。克莱恩廷·巴克·弗莱特。如果我没说错，您就点点头。”

还是没有反应。

“请您了，”她等着，觉得自己傻乎乎的，但也担心自己会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克莱恩廷·巴克是您妻子，您就眨眨眼吧。”

几秒钟过去了——她让这几秒钟过去——这时，他张开嘴巴；这哪里是张嘴，只是一个皱巴巴、没有嘴唇、没有牙齿的洞。她不得不弯下身子听他说话：“那天啊，”——他顿了顿——“根本不可能出去散步。”他又顿了顿。“我们以前的确在没有叶子的灌木丛里闲逛来着。”他收住话音。

“是吗，这真是太美了，弗莱特先生。”她说道，似乎在表扬一个小孩，“可是您还记不记得——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不是一度住在加拿大？是不是有个叫克莱恩廷的妻子？”她又说了一遍，这次提高了嗓门。“克莱恩廷。”

他的眼皮垂落下来。“根本不可能出去散步。”

“您的妻子，弗莱特先生，克莱恩廷。”

“克莱恩廷，”他说道。这个字，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

时成了一种发泄，一声口哨，愠怒的口哨。

“是的，”她鼓励地说道。“还有您儿子巴克。”

那如洞一般的嘴巴又蠕动了一下：“巴克。”这两个字轻轻溜出来，从声音的边缘泄漏出来。

“我是黛西，”她说道。

他似乎已停止了呼吸。接着便是可怕的沉默。

“黛西·古德威尔，”她对着他那只好耳朵大声说道。

“黛——西。”他叹息着说出这个名字。最初的辅音部分，至少是元音的气流是叹息着发出的。她听得出来，他说这个名字是顺从地、机械地说出来的。只是一声模仿而已——别的还能是什么呢？——然而，这声模仿中却有什么东西让她感到心满意足。她受了感动，很想伸手到床单下摸住他的手，但又害怕摸着什么难以想象、腐烂了的东西。因此，她只是用手轻轻地按住床罩。她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被床罩束缚住的骨头和枯萎的肌肤。床罩下一阵轻微的颤抖，散发出一股腐败的气味。

“我来看您了，”她说道，同时厌恶自己这种社交式的欢快的口吻。“我总算找到您了。”

她本想说出“父亲”这个词，试试它有无作用，但她心中涌起一阵羞涩，如同一阵汹涌的波涛将她打住。

然而，她仍然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她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以及直觉这一女人神秘的器官所提供的证据。当然，要理解自己发现的一切尚需一定的时间，需要她修正自己的视野；调节并适应目前的情况。某些零散、其本质为异常、甚至不合理的东西得用珠宝商的小锤将其敲打复位；得对其重新加工，并以推测使其固定，使其保持平衡，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尽管如此,她仍然愿意做这一切,难道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对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而言,自觉自愿这一素质她早已具备了。

老人渐渐睡去,她于是悄悄退出房间。她感到浑身松软无力,身心皆空,轻飘飘如精灵一般;似乎有那么几分钟,她将那轻飘飘毫无重量的感觉,或那意味着她生命的芳香拥在怀里。啊,她变得重新年轻,重新健壮了。她离开房间,走到斯特罗姆尼斯狭窄的石头街上,在明亮的日光下甩动着头发。瞧,她多么潇洒。

第九章

疾病和衰老

1985 年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八十岁的老奶奶弗莱特病倒了，似乎她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赶到疾病里去了。

她是一个月前病倒的，当时她正在阳台南面给她那排天竺葵幼苗浇水，突然，她心脏病发作；当她艰难地从混凝土阳台上走下来时，又跌断了双腿的膝盖。所幸的是，玛丽安·麦克亨利（她家的阳台与弗莱特太太的阳台仅隔一层薄薄的窗格子样的东西）听到了她的呼喊，因此迅速叫来了一辆救护车。

两天后，在萨拉索塔纪念医院为她施行了两次分流术。（早在一年前，弗莱特太太的心脏科医生便谈到过施行这一手术的可能性，但实施这一手术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耽搁了。）手术后一星期，正当弗莱特奶奶病情好转，逐渐恢复健康时，她又患了肾功能部分衰竭，她左侧肾脏于是被切除，手术中同时又发现这侧肾脏已经癌变。“不过至少我们已把那该死的东西干净、彻底地拿了出来，”她的泌尿科医生说道，他那模糊不清的南方口音着实让弗莱特家人觉着惊讶。

她病痛突然间变成了罪魁祸首。它是怎样让她垮掉的？它年复一年地生活在一个躯体里，还总是让躯体保持一种向前的姿势，一直到躯体被它重重地压着，无以解脱，即便是睡

眠,或是与另一个躯体短暂交融时也无法摆脱其重负。她左侧膝盖的 X 光片告诉她,她是多么脆弱,她只是一个肉做的外壳,一层薄薄的玻璃纸而已。现在,她生活在一个大大敞开着、痛苦的场所,周围是一排又一排的观众。长夜漫漫,而早晨的阳光又是那样严酷。唉,医院的早晨多么难熬!她嘴里插着温度计,血压也量得那么粗鲁,心脏监测器推进了她的病房,那东西雄壮有力,而那上面的刻度盘恰似一张人脸,随时准备谴责她脆弱的脉管。她那双伸在床单外面的脚看上去像牡蛎般呈半透明样,且总是冰凉冰凉,可奇怪的是,竟没人发现,也没人说,“弗莱特太太,您的脚怎么老是冷冰冰的?”她的小便由体内流经一根插在双腿间的导管,再与其他灰暗色的液体一起流向一个未知地,流进宇宙。她向一只面盆吐痰,吐污水;当她刷牙——那又老又硬的牙时,那咕噜咕噜的声音可真难听;而这时,她总试图回忆起以前自己身体处于对外封闭、隐秘状态的时候。

几天以后,她鼻子里的导液管被拿掉,手臂上的静脉注射针头也被拔去,医生告诉她——以祝贺、喝彩的口吻——她重新获得了吃喝的权利。“吃点柠檬会对您有好处,亲爱的。”那个专管发饮料的姑娘冲着她大声喊道。“一个人喝再多的饮料也不为多。”这个推着苹果汁、牛奶、冰茶、温可可茶等饮料小推车的姑娘十八岁,黑面孔,紫红色嘴唇,笑起来声音尖溜溜、紧绷绷的,是那种一分音符式的笑声,颇令人感到压抑。

在凌晨的那几个小时里,弗莱特太太常做恶梦,都是些极具侵害性的恶梦,往往直逼她心脏的中心;而梦里的内容亦非常激烈,尽管她后来无法回忆起来。“这只是药物的副作用,”她的医生告诉她,“是常见的一种病痛。”

她白天做的梦要温和得多；梦中，她常飘过破烂不堪的地方，譬如年久失修的后院，里面灰尘满地，花圃里和枯死的灌木堆旁散落着垃圾；还有往日的街道，白脸的男男女女在给草坪浇水——被羊角蕉、蒲公英窒息的草坪，因无知和资金不足注定无法葱茏茂盛的草坪。

在她介于睡眠与清醒的意识褶里，她能径直朝发明创造的机器大踏步走去；能画出生动的景致，还能设计对话、论点；而某些词语——无论记忆中的，还是创造出来的，在她疼痛的脑袋里咯咯作响，它们的节奏及被磨损的含义嘲弄着她。

“医院的教士来看您了，亲爱的。”

“什么？”她从淡色的、螺旋式的睡眠中惊醒。

“医院的教士，弗莱特太太，您想和教士谈谈吗？”

“谁？”

这次声音提高了些。“医院的教士，里克教士；您还记得里克教士吗？”

“不记得了。”

“咳，您记得的。你俩昨天还做了一次很好的祷告呢。还读了几首《圣经》里的诗。”

“没有。”

“咳，弗莱特太太，别对我那么说——您记得那位教士的，您肯定记得的。”

“不。”

“不什么？”

“不，我不想见他，今天不见他。”

她住的这间单人病房位于走廊的尽头，窗户很大，没挂窗

帘。她在手术后的那些日子里便一直躺在病床上，很可怜；而在她短暂的清醒时刻，她凝望着窗外佛罗里达那些淡色的混凝土建筑，有粉红的、绿的、淡紫的，宛如小小的、撒了糖粉的奶油小点心，被一只满是面粉的手捏成，放到外面晒干、变硬。阳光照射在凹凸不平的小型客车上，又在和孩子喁喁细语的母亲头上、在砰然作响的汽车门上闪烁，还将停车场四周裂缝的水泥栅栏照得白花花的。医生们将他们梅塞德斯牌和林肯牌的汽车停在紧靠医院门口的专用停车区内；这些汽车的车顶闪耀着廉价冰糖般刺目的光芒，组成了一弯五光十色的彩虹。

“不，我今天不想见那教士，”她矜持地说道，作出一副她自认为是矜持的样子。

“如果您不想见他，那好吧。”那人耸耸肩膀。

“我就这样。”

“随您便。”

“我知道。”

“听听耶稣的话可是大有好处的，在这个疯狂、混乱的世界里，耶稣的话是至善至美的。”

“我今天太累了。”

“我来让您高兴高兴。嘿，我每天都能看到谁高兴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主是我的向导，我不会穷困’，这可是世上最好的药，还是免费的呢。”

“不，我不想——”

“真没想到，里克教士来了。您好，里克教士。请您过来一会儿，让我们这位病人也振作起来，她可是整天闷闷不乐的。”

“劳驾，我——”

“这么说——弗莱特太太想谈一会儿话？”

“呃，我——”

“我总是可以明天再来的。”

“嗯——”

“我只待一会儿，当然不会让您累着。”

“噢，不。”

“请您再说一遍，弗莱特太太，您刚才说什么？”

“请坐，请您——”

“我恐怕没听清楚——”

“请您，请您。”弗莱特奶奶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她的舌头顶着下排牙齿的边缘慢慢滑过，慌乱了一阵。然后，真是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合适的词——“自便”。

“我只是想拿把椅子过来，弗莱特太太，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您能来太好了。”

上帝、耶稣和圣灵，他们突然来到了弗莱特奶奶的病房，在墙上排成一行，宛如镶着金边、画在天鹅绒上的一幅深色画。他们柔和的嘴上没有笑容，但随时准备说出恒久永存的爱。除了他们以外，一只鸟儿都不会落下——他们这三个在干什么，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以前知道的，可现在我已八十岁，忘记了。本想问问别人，可不知怎的似乎太迟了，而年轻的里克教士看起来也不太可能回答我这个问题。洗清罪孽、赎罪。在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有一摊羊羔淌的血，太野蛮了。那个长满树木的山坡可被沾污了。

“恐怕我没听明白您说些什么，弗莱特太太。”

“我说，您能来太好了。”

弗莱特太太是不是在叫喊？

没有，听起来像是在喊，可她其实是轻声说的。真可怜。那声音来自长形水槽般的被单下面，来自痛苦和迷惘之中。看看她的导管和接线。她那紧缩的八十岁的喉咙。她服下的药物。她的梦幻。她的双脚潮湿、冰凉，裸露在外，无人过问，命运凄惨。那扇豪华窗户外面的景致宛如一幅粉笔画，停车场上的车门砰然作响，耶稣、上帝和圣灵如男人般亲切地注视着她，他们心知肚明，将一切看在眼里；然而，当你真的要他们关心她时，他们却根本不来管她身体里的恐慌和病痛——就在一生中的这个年纪，现在，此刻。你们走吧，就请走开吧。

“您能来太好了。”

您听到了吧？这位老人可真是彬彬有礼。这年头您很少能遇上这种传统式的礼节了，而且您还会想到，她作了分流手术刚两个星期，体内一只肾被切除才六天。还有她的双膝，被摔得粉碎的双膝。考虑到这种情况，她还能想起用合适的词语表达，这真令人惊叹，然而又多么令人心寒，因为社交场合的种种束缚可谓死板顽固。

别去管它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弗莱特太太去经历一下做弗莱特太太的那些个活动嘛。

*

弗莱特奶奶的病房里摆满了各种贺卡和鲜花。那个发饮料的姑娘——她的名字好像叫朱比莉——看到这么多贺卡、鲜花，尖叫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装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大声调侃道：“这花不能再——来——了！我发誓，弗莱特

太太！好，您告诉我，您这儿的鲜花堆得像森林一般，如果再来一束，我到哪儿找地方给您放？”

弗莱特太太的儿子沃伦和他再婚的妻子佩吉给她寄来了一只充气长颈鹿，有五英尺高，眼睫毛是乙稀基做的，还长了一口软绵绵的牙齿。它站在窗边，风一吹进来便东摇西晃。这长颈鹿倒是能和它谈谈心，弗莱特太太想道。她感到有点纳闷，不知长颈鹿对老年人、病人是否具有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这只长颈鹿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被遗忘的家庭笑柄。她在俄勒冈州的几个孙女——雷恩、贝思、利萨及吉利——将她们替别人看孩子挣来的钱凑起来买了只用于电池的玩具寄来，那玩具名叫“自己架桥”。想到她们慷慨解囊、牺牲自我，她便喉头哽咽，泪流满面；虽然她从未积聚起足够的精力去看那印得密密匝匝的说明书。

每天下午五点钟，弗莱特奶奶都要接到她女儿艾丽丝从英国汉普斯特德打来的越洋电话（格林威治时间上午十点）。艾丽丝过去常跟母亲开玩笑，说当她母亲大限之日到来时，会举起一只手，高高兴兴地离去。挺像伊丽莎白女皇那样，躺在汽车长蛇阵里，戴着帽子、手套，向一切，向生活告别——此乃小事一桩，但神秘而又勇敢。然而现在，她知道母亲这一形象得重新设计，因为母亲病了，孤弱无助。于是，艾丽丝在打越洋电话时嗓音清晰、柔和、沉着，似乎她是从街对面打来电话，似乎她自己是在演电视剧一般。

“妈妈，我已经和医生谈过了；他说您目前状况很好，还说您体力非常充沛，您知道，只需您多那么点儿耐心就行了。照目前您恢复的速度来看，只需两个星期您就可以回家了。既然您现在得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您干嘛要急着出院呢？”

再说了,您还有幸得到医疗服务救济协会的帮助,他们将差不多支付您的一切费用。”

艾丽丝又打电话给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妹妹琼,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她决不能出院,医生说这根本不可能。她回家后怎么办?谁也帮不了她。”

她还在绷得紧紧的电话线里对纽约的弟弟沃伦说,“我已问过矫形科医生,他说她永远不可能再走路了,不用助步车是不行了,即便用了助步车恐怕也不行。我是说,唉,我们得面对这一事实,这是事情发生变化的开端。”

弗莱特太太的三个孩子心里都感到十分内疚,因为他们此刻都不在母亲身边。艾丽丝打算在她教学工作结束时,即再过一个月便飞过来;沃伦的再婚妻子最近生了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施洗礼时取名为埃玛——他觉着自己无法在这种时候弃家而去,哪怕离开几天也不成(这也是无可厚非的);琼则实际上已作过一次快速旅行——波特兰到芝加哥,再到坦帕,然后再回来——但她毕竟有四个十来岁的女儿要照顾,还有个惯于搞婚外恋的丈夫。弗莱特太太的侄孙女维多利亚尽管每隔一天写去一封幽默的短信,但她眼下有自己的工作要做,还有丈夫刘易斯和他们的双胞胎,因而也只得待多伦多。弗莱特奶奶想起自己散居各地的家人,她的儿女、孙子孙女,侄孙女,她已分不清他们各自的脸了。对她来说,那个年轻姑娘朱比莉现在反倒更加实在,还有阿伦费尔德和斯科特两位医生,他们每日来查房时,高声谈笑,发出医院里所特有的爽朗的笑声;里克教士也有自己的一套;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玛丽安·麦克亨利,她每晚都来,从不间断,尽管她的谈话内容仅限于她在克利夫兰的亲戚。弗莱特奶奶还有她那

些老姐妹花儿们！她无论到哪儿都有她们的陪伴，她们每隔两三天就乘出租车来看她一回，瞧她们一个个多开心！

即使弗莱特太太鼻子里仍插着导液管，躺在床上还不能抬头时，这些老姐妹花儿们也来到她的床边打上一圈桥牌。头一天她们只玩了两盘，后来越打越来劲儿。您心里会想，弗莱特奶奶这个时候不大可能专心去想什么红桃、黑桃，什么点数、诀窍、王牌和对家王牌，然而她行，她真的玩牌，她们也都玩真的。她们的名字是莉莉、默特尔和格拉德；格拉德实际就是格拉迪斯，而不是格拉迪欧拉^①，但她自认为是朵地地道道的“花儿”。这四个人都住在弗莱特太太这几年住的那幢贝赛德托尔斯公寓不同的楼层里；她们正是在这所公寓底层的牌室里认识的。（这已是七十年代末的事儿了，是在弗莱特太太失去她两位最亲密的朋友——突然死去的比恩斯和老死的弗雷迪·霍伊特之后；那可真是令她伤心的时期。）这四个人就像遭了火灾的一家子，又像执法队员那样齐心、团结。贝赛德公寓里的其他住户羡慕她们开朗、善良的性格和她们快快乐乐、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轻松心情。对周围人的羡慕，她们个个心里都明白；而在她们这把年纪，她们对此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满足。结果，大家都称她们是一伙学校女生，她们并未刻意叫别人这么称呼她们，然而，任何名声不就是这么得来的吗？这四朵老姐妹花儿挺幸运，因为她们相亲相爱，而她们也认为自己很幸运。莉莉来自乔治亚州，格拉德来自新罕布什尔州，而那个乐天派默特尔则是密执安人——您会说，她们来自四面八方，然而她们境况相似，志趣相投。只要看看她们即

① 原文 *gladiola*，意为唐菖蒲属植物。

可知道,这四个老年白种女士。如黛西·弗莱特太太一样,她们都是寡妇,生活都很舒适、富裕,除了作母亲、妻子外,四人都没有其他志向;她们个个都爱笑,还总笑得那样酣畅、淋漓,但每当这时,她们那样子又显得有点儿哗众取宠、滑稽可笑。每逢星期天,她们便去第一长老会教堂做礼拜,然后从那儿去寻贝壳者餐馆吃一顿任意享用的早中餐。(那儿收银台上放了块招牌,上面写道:“帮帮忙,别在家做饭。”)自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半,她们都在贝赛德托尔斯公寓的牌室里打桥牌,且每次都在角落里的那张圆桌上打,因为那张桌子离空调吹出的冷风很远。这桌子是老姐妹花儿们的专用桌,其他人不得占用。“今天姐妹花儿开得怎样?”公寓里其他住户向她们大声打招呼时都这么说。

“我丈夫以前常说,名字带了‘花’的姑娘总是老得快。”这话是默特尔有一天突然说出来的,她们几人听了都笑得浑身软绵绵的。当有人问她们,姐妹花儿开得怎样时,她们中总有一个肯定会开心地答道,“很快就凋谢了,”另一个还会以一种即兴小调式的活泼的口吻补充道,“但仍然坚强不屈。”这是她们的一个习惯,是许许多多习惯中的一个。例如,她们取笑格拉德已织了十年之久的一件米色羊毛衫;她们笑话六楼的杰利科先生,因为他总爱在自认为无人看见时将双腿分开骑在什么东西上;还有博尔特太太,她负责看管图书馆的角落,却为自己囤积了许多以大号字体排印的新书;她们取笑的对象还包括玛丽安·麦克亨利和她在克利夫兰的永久存在的侄子、侄女,以及寻贝壳者餐馆那无法回避的、遭天罚的山核桃馅饼。她们互相庆祝生日——从糕点铺买一块甜饼、再喝一杯加利福尼亚葡萄酒——每当这时,总有一朵花儿会说,“啊,为

再活一年干杯,希望我们都别入土。”

说真的,这句话才是她们最津津乐道的笑话。来看她们的家人听了这句笑话都大为惊讶,然而,她们却在舌头上品味这笑话,心里感到那样振奋,那样新鲜;她们体尝到它那细微而揶揄的颤音——说白了,这是一句关于她们自身之死的笑话。每当这时,她们的笑声便如枯萎的花朵一般,成了格格的笑声。她们四人商定,如果她们中有谁“翘辫子”,或“一命呜呼”,或“逃离人世”,或“化为灰烬”,或“突然死去”,或“与天使为伍”,那么,其余三人便隆重哀悼一二个星期,然后邀请西楼三楼那位糟糕透顶的艾莉斯·杰克曼填补她们圆桌的空缺,尽管艾莉斯有体臭,还臭得出奇,也尽管她是傻大姐一个,连清一色的梅花牌和大满贯都分不清。

一个秘密在弗莱特奶奶的体内升起,明明白白地聚积在她的腕骨上;阳光照着她手腕上病人用的白色塑料手镯,上面写着:黛西·古德威尔。

就这么几个字——只是黛西·古德威尔。住院处不知哪位粗枝大叶,将她的名字缩减了,删去了弗莱特,让她过去的名字——她做姑娘时的名字——悬在空中,赤裸裸如郁金香一般。幸亏这个错误并未出现在她的病历上,且至今尚未被医护人员和许多来探望弗莱特太太的人发现。这是个只有她一人知道的秘密。

她很珍视这个秘密,并愈发将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外部标记。

个中原因倒并非是她曾经非常重视自己的灵魂。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一直太为玄而又玄的事情操心费神——她丈

夫、孩子及一个女人所必须做的事情——而对拿撒勒^①的那位木匠则羞答答,难以为情,不愿正视他的眼睛,也不愿喊他的名字,因为她知道自己无力吸引他谈点什么有趣的事情,担心他用不了两分钟便会发现自己头脑呆板,空空如也。弗莱特太太儿时曾上过主日学校,后来又去教堂做祷告,但她从来没能摒弃这一想法:这些宗教活动只是给孩子们看的幻灯片而已,虽然挺健康,亦能振奋人的精神,但不可当真——尽管您得戴上帽子,至少在规定的时间内您还得板着面孔,目光严肃,而这时您的脑袋却在开小差,想着您是否还有足够的烤面包与其他东西拼凑起能吃顿好晚餐;晚餐时您还可以拿出去年做的辣椒酱来吃,餐具架上还有两三瓶这种辣椒酱,至少您上次看的时候还有呢。至于委员会、各种集市、婚礼、洗礼什么的,对,对,那自然是要参加的,但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负罪和超度的山啊、谷的,那就和弗莱特太太从不相干了。弗莱特太太的脑子很简单,从来不对这些事情深入思考,她干嘛要想那么深呢?她在圣诞节用手工制作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育婴堂,对她而言,并不是个圣洁之家,但它的确是圣洁之家——以极为严格的民间传说的方式雕刻出来的漂亮的小人,油漆得光亮亮的,虽然马槽里的那个婴儿并不比穿了衣服的木头桩子强多少——那便是耶稣,人类欲求之幸福。制作这个圣洁之家虽然很难,但一点儿也不麻烦。

别人是不是也谈论这些事?她说不准。

不过,里克教士在她手术后开始在上午来拜访她。他先是小心翼翼,后来便满怀情感地说起她灵魂的存在、灵魂的状态

① 西南亚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

态,以及她灵魂的光辉,等等,等等,而现在呢,到了她八十一岁时,她的灵魂便借助耶稣——我们的救世主的恩典而获得了新生。不用说,弗莱特太太并未对里克教士提起这样一个事实,即她灵魂的精华包裹在她那只病人用的手镯上的名字里:黛西·古德威尔。

在这名字之后,与这名字紧密相连的一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叫不出名儿的东西。至于这东西的形状,只有当她很快将头侧向一边,或是从自己的呼吸节奏中感到自己的呼吸即将逝去时才能看到。她通常是在凌晨时分瞥见那东西的形状,挺令她吃惊的。她几乎忘却了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时那小小的、尚未成形的原始状态,它并无思想可言;实际上,并不曾有任何思想在它的表面闪耀。然而,无论我们以后怎样,我们都会将任何事物,即便是最成熟的经验,放到这个小小的、哇哇叫的原始物质面前,让它加以评判,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许它根本就不是物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神圣的东西,从上帝那宽大的额头上撕扯下来的东西。

“我仍然住在这里,”她心中想道。在这间孤独的、满是刺鼻橡胶气味的空调病房里,她摇晃着使自己清醒过来。“仍然在这儿。”

“她的确很可爱,”朱比莉在病房里不管遇到谁都这么说。“不像这层楼上的有些人,我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她是一名战士,”护士长多尔太太说道。“一名战士,而不是喜欢抱怨的人,谢天谢地。”

“是个可爱的人儿,宝贝儿,”斯科特医生说。

“一位真正的女士,”理疗科医生拉塞尔·拉特比说道,“传统式的真正女士。”

这就是为什么弗莱特太太每时每刻,甚至日复一日地忘却黛西·古德威尔的存在,忘却那个更早一些的、在黛西·古德威尔之前的试管般的状态。她在住院期间还挺忙的——她做起了可爱的老人、充当了战士、真正的女士、毫无怨言的人;她勇敢地与困扰着她的尿道感染作斗争;她在电话里与孩子们谈话从不把痛苦放在眼里;她对朱比莉的爱情故事津津有味;她向拉特比先生卖弄风情;还不停地、勇敢地保护里克教士的感情,不过说句老实话,他的感情既矛盾,又令人心烦。“她真是个奇女子,”她女儿艾丽丝说道。艾丽丝从英国及时赶到医院,帮她母亲从萨拉索塔纪念医院搬到了卡耐里帕姆斯康复医院。“她的确令人鼓舞。”

艾丽丝说令人鼓舞,她其实是言不由衷,她的意思与令人鼓舞恰恰相反。

艾丽丝四十五、六岁年纪,是个体格健壮,风姿绰约的女人。她以前很少想到人的生命是在不断缩短,然而,她这种心态其实只延续到刚才那一刻,因为刚才她碰巧翻了翻她母亲在卡耐里帕姆斯医院用过的床头柜抽屉,发现里面乱七八糟地放了一堆东西:牙刷、牙膏、梳子、一个笔记本、一串钥匙、搽手的润肤膏、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一只小巧的天鹅绒首饰盒等——这些东西都是巴克·弗莱特太太的,而如今却装在了一个小小的钢盒子那狭窄的空间里。母亲在渥太华的那幢三层楼的宅子曾被搬空,她在佛罗里达的那套宽敞的住房也被搬空了,然而她总共只剩这么点儿东西,这怎么可能呢?艾丽丝想到这儿心头一阵紧缩,禁不住大喊了一声。

“怎么啦,艾丽丝?”

“没什么，母亲，没什么。”

“我想我是听到——”

“嘘！您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我还不是一直在休息。”

“这就叫康复——休息。那个医生不是这么说来着？”

“他呀！”

“别人对他评价挺高的，斯科特医生说他是这儿最好的医生。”

“你有没有跟护士谈苹果汁的事？”

“我跟她谈过了，说您发现那苹果汁变味了，可她说没坏，只是那品牌和医院用的不一样。”

“喝起来就像浓缩过的苹果汁一样。”

“很有可能就是浓缩过的。”

“可它连冰也没冰过，准是她忘记了。”

“我再去跟她说。”

“还有那肉汁儿。”

“肉汁儿怎么啦？”

“根本就没有，问题就在这儿，肉端来时盘子里干干的，一点汁儿都没有。”

“现在已不再做肉汁儿了，母亲，一九七四年那会儿就不做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说句笑话。”

“‘yolk, yolk^①’你们小时候都这么说，就是你和琼妮，像两

① yolk(蛋黄)与上文“笑话”(joke)谐音。

只鸡咯咯直叫。”

“是吗？”

“这窗户外面什么看的也没有。”

“那些树吗？那个漂亮的花园？”

“我还是更喜欢那所医院。”

“我知道。”

“我挺想朱比莉的。”

“噢，那可不。”

“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花儿，格拉德，莉莉——”

“她们来这儿太远了。”

“我在这儿觉着不舒服。”

“您会习惯的，用不了几天您就会调整过来的。”

“我不舒服。”

“您和我都不舒服。”

“你说什么？走廊里吵吵嚷嚷的，那女人在大喊大叫，我听不清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刚才说，我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艾丽丝已正式使用她母亲结婚前的姓氏；这姓氏现已出现在她的护照上：艾丽丝·古德威尔。她前夫的姓氏唐宁几年前便已被埋在了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尽管她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本杰明、朱迪和雷切尔仍保留着那个姓氏。就艾丽丝而言，弗莱特这个姓氏两年前随她第五本书的出版也被象征性地埋葬了，因为她那本书各方反应均不好：“艾丽丝·弗莱特的第一部小说对所有想搞文学创作的大学教师们都是一个警告”。“矫揉造作”。“卖弄学问”。“说教式的”。“纸盘上的冷粥”。

她该怎么办？她能做些什么？她去了法院，将她的名字改了。即便在做姑娘时，艾丽丝就抱怨过自己弗莱特这个姓氏。她觉得这姓氏挺遭罪的，因为它实在太简单了。弗莱特是颗小尘埃，墙上的一个斑点，什么含义也没有；而古德威尔则让人听起来很富节奏感，它发出的声波悦耳动听，且隐含着某种意思，尽管她母亲发誓道，她从未想过这姓氏会有什么含义。艾丽丝那会儿很沮丧（那该死的小说），但她对未来仍充满了希望。然而，当她来到佛罗里达，看到母亲消瘦、苍白的面容，皱缩的躯体，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她对未来的希冀泯灭了。

在来佛罗里达的飞机上，她曾为自己和母亲设计了丰富、激动人心的谈话内容。

“您这辈子幸福吗？”她打算这样问母亲。她想象自己坐在母亲的床边，床单往后折成美丽的扇形，她握着母亲的手，窗外的光线暗暗的，如教堂的光线一般。“您有没有实现自我完善？”——管他完善究竟是什么东西。“您有没有真正体尝过销魂狂喜的时刻？是不是值得狂喜？您是否曾看过什么东西，比如一幅画，或是一幢大厦，或是读过某本书里的一段话而感到这个世界突然变大，可同时又收缩、变硬，成为一个完美纯洁的核？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万事万物突然各就各位，互相协调适应；就像我们渥太华家里的那个花园一样，就那么回事。它是不是足够了，我是说，您的生命足够了吗？您有没有准备好——？您是不是害怕了？您在听我说吗？我该怎么办？”

然而，母女俩谈话的内容却是苹果汁、肉汁、走廊里的喊叫、那位医生（他是牙买加人）——这个牙买加人的事她们其

实并未谈及。

当艾丽丝伸手握住母亲的手时，她被母亲那半透明的手吓呆了。她忍不住盯着那只手看。那如珍珠般的指关节已经死了，变成了矿物。艾丽丝心想，落入大多数人生活中的那个东西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一种义务：做个好人，坚持做个好人这一理念。好女儿，好母亲，永远如英雄般富有韧性。这些自我的延伸颇令人恐惧。

“您就告诉我，我怎样生活吧。”

“你说什么，艾丽丝？”

“没什么，您睡吧。”

“刚九点钟。”

“光线越来越暗了。”

“那是窗帘挡着了，你把窗帘拉上的。”

“没有，您瞧，窗帘是开着的。瞧。”

弗莱特奶奶当然也曾有过美好的日子。当她戴上眼镜，从头到尾看报纸时；当她因其极为敏锐的观察力而被编辑们赞扬时，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一位护士曾当着她的面，说她是“feisty^①”，可这个词弗莱特太太不认识。“它是‘强硬’的意思，”艾丽丝告诉她。“至少我觉得您是这样。”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很强硬。”

“那是表扬您的话。”

“我并不是真的很强硬。”

“那您就是个软心肠的人。”

① 意为“精力充沛的，活跃的，好争斗的”。

“不对。”

“不对？”

“别说我软心肠，它让我想起以前你父亲外出回家时带来的那些馅儿软绵绵的巧克力糖。我怎么也受用不了，受不了咬进去时那感觉。”

“很抱歉，”艾丽丝以前曾听说过那种馅儿软绵绵的巧克力糖，还听说过不止一次。

“杏仁糖、黄油奶糖，还有别的那些糖。”

“拌砂软糖。”

“这种糖我一想起就恶心。”

“那就别想。”艾丽丝闭上眼睛，自己也感到恶心：爱是骗人的东西，“永远以后”的东西。

“他那时经常外出，不知你还记不记得，你那会儿太小了。他总是出去，蒙特利尔、多伦多。”

“我知道，我当然还记得。”

“我从来不知道他出去干什么。”

“开会。”

“我也从来不知道那些会议有没有必要。当然，我曾经问过他；我挺感兴趣的，至少我想培养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人们鼓励妇女关心她们丈夫的工作——可我还是一直没闹明白。不明白，就是那些会议，开的什么内容，为什么要开。”

“也许是行政会议，大家胡乱扯一通了事。”

“我那会儿大概挺担心的，心里烦得很。”

“现在别再去想它了。”

“他有时会带回来一只两磅重的盒子。哎唷，我从没说过我不喜欢那些盒子，可我还是把它们全给了曼纳利先生。艾

丽丝,你记得曼纳利先生的,他那会儿帮我们做园子里的活,干重活。”

“我当然还记得曼纳利先生。”艾丽丝知道,母亲接着要对她说曼纳利的妻子是怎么死于糖尿病的,他们的儿子安格斯又是怎样搞起政治来的。

“他那可怜的妻子年纪轻轻的就死去了。她得的是糖尿病,那年头这病没什么好治的。”她放轻了声音。“我想,她从来没吃过任何巧克力糖,至少我希望她没有。他们的儿子安格斯,那会儿他母亲死时他不过十五六岁。我想是十六岁。他后来干得挺不错,连任三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安格斯·曼纳利,我以前常在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个名字太妙了。”

“这名字挺可爱。”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倒给了艾丽丝使用“可爱”一词的权利,而且她经常使用这个词。

“你在这里我很开心,谢谢你能到这儿来。我这么说并不是心情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当然不是,您的意思是——”

“没什么,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只是想说——”

“真的,亲爱的,我真的要你什么都不用说。”

“那好吧。”

“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护士说的?”

“Feisty.”

“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个俚语,字典里能查到吗?”

“我想查不到,不过也有可能查到。”

“它听起来非常——我想不出非常什么,这个词就在我嘴

边，它听起来——”

“讨厌？”

“不，更像‘高人一等’的意思。”

“高高在上？”

“对，就是这个词，高高在上。”

“您说得不错，您知道，是高高在上的意思。其实它是‘贬低’、‘傲慢’的意思。”

“不错。”

“我们假装赞赏别人的 feistiness^①，”艾丽丝若有所思地说道，“但我们自己决不愿意 feisty，让别人这么说自己。”

“因为那味儿挺难闻的。”

“挺什么？”

“腐烂了的，就像草莓熟过了头一样。”

“一点儿不错。”

“你父亲上身很长，他从未学会跳舞，我想原因就在这儿。”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跳舞的。”

“你在这儿我很高兴，艾丽丝。”

“我能来也很高兴。”

“你说什么？”

“我说，我能来也很高兴。”

“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话，请你原谅，亲爱的艾丽丝。”

（弗莱特奶奶是不是真的大声说了这最后一句话？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已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什么不是；我在

① feisty 的名词形式。

她这个年龄也是如此。)

*

如果我们说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是真实的,我们就尊重它,即便它听起来虚虚实实,也别去管它;而如果说某事是虚构的——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真实、正确——我们都嗤之以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纪实的时代,似乎我们永远、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事实。我们打开电视机,所听到的是鸟类的生活周期、再次播放的战争场面,或是对大量杀人犯的访谈录,而报纸的内容亦如出一辙。

加拿大一位叫平济·富勒姆的新闻记者被倒下的饮料自动售货机砸死,显然他当时是在前后摇晃那台机器,试图弄出一枚卡在里面的二十五分硬币。很多年前,平济·富勒姆曾极大地伤害过黛西·弗莱特太太,因此,当她获悉他死去的消息,她无论如何也装不出十分悲痛的样子。

“我的老天,”她女儿艾丽丝说道,“您是怎么知道他死了的?”

“人家告诉我的,”弗莱特奶奶神秘地说道。“也许这消息登在了报纸上。”

“真的。这简直难以相信。”

“实际上,每年有十一个北美人被倒下的自动售货机砸死,这可是报纸上说的。我记得就在不久前读到过,我想就是昨天,也许就是今天上午。”

“平济·富勒姆就是其中之一。”

“看来如此。”

“真难以相信。”

“我想也是。”

自从那次她心脏病发作后，一切都让她感到吃惊；然而最让她惊讶不已的，还是她自己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吃惊，似乎一种新的空虚感使她甘于接受自身这一变化。她的躯体——由原子、分子及物质团块组成的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突然间充斥了新闻标题、恶梦、贺卡、药物的苦味、夜间猛烈的轰隆声、走廊里的脚步声、她自己呼吸和血液的气味，还有靠她门边的什么人哼着曲子的声音，她差不多能听出这是支什么曲子。

弗莱特奶奶收到了一个邮包，那是她英国的外孙女朱迪寄来的一件女式睡衣短外套。

哎呀，天哪！——当您生病时，若是有谁给您寄来一件睡衣外套，而不是洗澡粉，或是一本漂亮的旅行指南，您会是什么滋味？这种睡衣外套差不多跟裙撑或护衣腋下汗垫一样过时了；它意味着垂死的绝望，瞧它上面写着：再会。不过，老弗莱特太太倒也理解外孙女的一片心，她可是费尽了周折才找到这么一件睡衣外套的。现在这年头很难找到睡衣外套这东西。那些大的百货商场如果还有存货的话，那也只存着半打而已；而当您俯身看着柜台说，“你们那些睡衣外套放哪儿了，怎么找不到”，那些女售货员——四五十岁年纪的妇女便会抬起头，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这些睡衣外套是在哪儿生产的？纽约？旧金山？也许只是依阿华州中部的某个小镇才关心市场的这一需要；那个小镇便是这个国家睡衣外套的首府，世界的睡衣外套中心。可谁设计了这种奇怪的衣服呢？那有花边装饰的衣边、那小小

的、缝上花样的衣袖，还有那系在下巴下的缎子饰带，这些都是谁设计的？也许谁也没设计它们；也许它们就像那些内衣厂后架上蒲公英般的棉花一样大量生产出来。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又为什么要穿这种睡衣外套？它究竟是一种私下穿的，还是在公开场合穿的衣服？您是穿着它睡觉，还是在睡前脱了它？它出厂时有没有附带使用说明书？

“母亲，您心不在焉的，似乎想到千里之外去了。”

“我只是在想，朱迪还记得我，真是乖孩子。”

“她很喜欢您，您知道的。”

“我以前还从未有过一件睡衣外套呢。”

“您穿上它挺好看的，等里奇亚医生来了好好看看您，他一定会赞不绝口的。”

“那个人呐。”

“他人并不那么坏。您倒是快说呀。他的眼睫毛，我就不信，您没注意到他的眼睫毛？他的确是个非常可爱的男人，您现在就承认了吧。”

“嗯。”

“嗯什么呀！我可是觉着他挺让人着迷的，呃，说句悄悄话，我想您也喜欢他。”

“哼。”

艾丽丝觉得里克教士一点儿也不迷人，她对这种人很了解。有一天他来卡耐里帕姆斯康复医院，艾丽丝冷冷地，几乎很粗鲁地跟他打了个招呼，随后便找了个借口溜了，让他一个人与母亲谈话。

虽然没人对弗莱特太太说过，但她知道，艾丽丝只想保

护她不受传道布教者的逼迫，远离这个挨着病房兜售包藏祸心的货物的小贩。艾丽丝从自己一个中年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她母亲的灵魂已是纯洁无瑕——总之已够纯洁的了——因此，当她看到罪恶的幽灵袭击如此柔弱、重病缠身的一位老人时，心里便怒不可遏。

然而今天，弗莱特太太和里克教士之间的谈话却与往常截然不同，他们只字不提老年人的灵魂及做梦赎罪之类的话。

“您知道吧，我喜欢男人，”里克教士对弗莱特太太说道，“就是同性恋者。我学做牧师那会儿还不知道这一点，但后来，呃，我才发现自己的情感取向。您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将自己隐藏起来。后来，有一两个人知道了；慢慢地五六个人，而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就是我母亲不知道，这真让我为难。我要不要告诉她？我以前一直觉着纳闷，您竟和我妈年纪差不多。嗯，实际上我妈才不过六十岁左右，可不知什么原因，看到您我就想起她。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她一直问我什么时候能找个好姑娘，成个家；弄得我讨厌回家，因为我就知道，她又会问我的。”

这时，弗莱特太太身体中的某个部分渴望她闭上眼睛，沉沉睡去；而她心里也十分清楚，她完全能够摆脱这种谈话，因为她的年龄给了她这种特权。

他说的这些话太令人讨厌，太令人痛苦了。

她听到自己眼睛后面传出流泪的声音，因而知道自己被这番推心置腹的吐露逗乐了，然而她同时又感到愤慨。首先，把她与里克教士的母亲相提并论，这实在太轻率，伤害了她的感情，因为她觉得自己不会喜欢那个女人。实际上，她并不真正喜欢里克教士，从未喜欢过他，因为他的热情总带有某种贪

婪,加上他还是个塌肩膀,衬衣领子也显得无精打采的。其次呢,这个年轻人趁这么个能把人烤焦的大热天,大老远的从城的那一头驱车前来卡纳里帕姆斯康复医院,求教于她,听取她的高见,这在弗莱特太太一生中是少有的事,实际上还是头一回呢,以后决不会再有第二回。

“你有没有试一试,”她终于开口说道,“别去搞什么同性恋?”

“什么?”他将一绺挂在眼前的头发甩上去。

“你知道我的意思。给你自己找个女朋友,看看是否——呃,你也许会让自己吃一惊,发现自己的确很想有个女朋友——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的。”

“弗莱特太太,同性恋这种事并不是什么态度问题。”

她说得他不开心了。她不用转过头来直接看着他,便知道他浑身绷得紧紧的。伤害别人这种事挺让她受不了的。她平生最大的弱点——她对此一直很清楚——便是怕伤害别人;或者说,已经伤害了别人而害怕进一步伤害别人。因此,尽管她心中不悦,尽管她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爱滋病的报道,她还是向他伸过手去,并感觉到他握住了自己的手。

“别告诉你母亲,”她过了一会儿说道。

“可我总不能靠撒谎过日子。”

“这有什么?”她顿了一下。“大多数人都这样。”

“如果我们还把基督教的信仰当回事儿的话,那怎么行呢?”

“你母亲已经知道了,”她生气地说道。

突然间,弗莱特太太似乎觉得里克教士的母亲就在病房里,就跟他们在一块;觉得她毕竟还是个挺好的女人,忙忙碌

碌，劲头十足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让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母亲现在只是略有所知，但很快便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她会想法子了解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不想谈这种事，你俩也不会老去谈它，不会的。（说完这番话，她禁不住有点儿沾沾自喜起来。）

“可我俩之间总有那么一道隔阂，这日子怎么过？”他傻愣愣地轻声说道。这会儿他哭了起来，哭着，抽泣着。

“吃了他们给我的这些药片，我怎么突然觉着累得不行了。”

“您那个年头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大家都害怕说心里话，过了一辈子还像在神话里一般。”

“我很瞌睡，瞌睡得要命。”她感到喉咙里刺痛，真的很痛。“请你原谅。”

“愿上帝保佑您，弗莱特太太。”

一个人怎样回答上帝的保佑？“再见，”弗莱特太太坚决地说道。她闭上眼睛，将脑袋紧紧地贴在枕头上。接着，她以一种母亲的、祖母的、一个女人的、柔情的口气脱口说出一句祝福的话，“这会儿开车要小心点儿。”

她写支票时竟忘了写月份，又忘了写年份。糊里糊涂的，真成了个废人。她弄破了一个缺口，脑子里的东西于是如信袋上飘出来的灰色绒毛般四下里溢出，弄得家具上到处都是。她对女儿说，她的脑袋需要开胸术那种手术。

“哈，”艾丽丝殷勤地说道。

什么事儿都让她不顺心：花瓶里那些枯死的花朵发出的霉臭味、还有那尿味——她自己的尿味。她已变成了一个牢

骚满腹的老太婆了。不过,呃,您瞧,倒也不完全是吧。骨子里她还是如一碗令人激动的吉露牌果子冻,还是那个博学聪慧的老园艺技能女士,还记得她吗?不管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紧急问题,您都可以来拜访她,打电话给她,她永远是您可信赖的人。

*

在大地的隙缝里隐藏着如此之多的幽默故事,这挺让弗莱特太太惊讶的。这些幽默故事可谓无处不在,恰似上千种不同的苔藓一般。她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上或从“美国您早”这一电台节目中获悉一两件令她忍俊不禁的事情,要不呢,她那层楼里总会发生什么好笑的事,比如那些护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来回说笑逗乐。谁能想到趣闻笑话竟也绵延不绝,及至羸弱老人亦能饱享其乐?

虚荣心这东西又何尝不是如此?它决不肯销声匿迹,硬是要将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挤得皱皱巴巴、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令人如饮迷幻药般紧张、激动。她凝视着床头镜(它狡猾地藏匿在床头浅盘的背面)说道,“瞧,这就是她,我的生命的伴侣,以前我曾憩息在她的心窝里,而如今我却蜷缩在她的眼角里。”不过呢,她每天早晨在里奇亚医生来查房前,总要用那枝小小的唇膏涂涂嘴唇,在鼻子两边扑点儿香粉(她已不得不停用她最喜欢的伍德伯里牌香粉了)。她究竟怎么会有力气拿起粉扑,又怎么会知道她知道的事呢?

此外,她还察看自己的指甲。艾丽丝上星期还给她带来了一位修甲师。她一开始当然挺反感的——她一辈子也没用过专业修甲师,这简直太奢侈了!——可艾丽丝硬是要她受

用,还说是小意思。这么一来,弗莱特太太的双手便浸泡在了五花八门的肥皂液里,再放到这位年轻姑娘的大腿上,让她用毛巾擦干。然后磨修指甲表层,将指甲修成漂漂亮亮的椭圆形。“您要用影色的,还是单色的?”那姑娘问她。“你看呢?”弗莱特太太说。“嗯,这样吧,”修甲师开始说道。显然,要作出决定得认真考虑一番,商量一下才行。最后她决定使用法国式的透明擦光油修饰。“涂这种透明擦光油使指甲看上去既美观又清洁,很适合夏季使用。”似乎弗莱特太太很快要去参加一连串的花园聚会,或是去萨拉索塔哪个最豪华的宴会厅一样。

她将自己十个光亮亮美丽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放在外层床单下,不过每隔半小时左右她便拿出来,在阳光下伸开审视一番。她每天早晨要做的第一件事,以及晚上最后一件事便是察看自己的手指;其实呢,她几乎一直在心里想着它们。它们轻轻降落在她的身旁,爬上她的手腕,飘进她的臂膀和体内。它们看起来多么优雅,真的好漂亮!崭新崭新的。如果您想到她身体在不断消耗、损坏的话,您也许就会理解她近来为什么这么傻乎乎的了。然而,她如此专注于自己的指甲,像着了魔似的,已完全不是出于通常那种香粉和唇膏之类的虚荣心了。想到这种虚荣心的含义她就觉着无地自容。她的生活一定很平庸,没有给她任何回报,以致这么点儿小事都让她乐不可支。要是她不小心的话,肯定会成为那些可怜的疯老太婆中的一个,而这些人可是永远在数上帝给了她们多少赐福。

“您有没有考虑去治一治脚病?”艾丽丝问道。

一幅幅图景飞进她的脑海里,它们远比她在病人娱乐室

看的那个大屏幕电视上的画面亮得多。这简直是一场火光四射的颠覆活动，她的双耳充斥着窃窃私语声。只要她喜欢，她随时都可以收看这些图景。

这是她七岁那年，站在她姨妈克莱恩廷的花园里，正俯下身子，用手指揉捻金鱼草，好让它们的小嘴一张一合。它们有牙齿和舌头，别人知不知道？她摘下一片细香葱的叶子，放在嘴里吮吸。“黛西，”她听到姨妈在喊她，要她回去吃晚饭。克莱恩廷姨妈曾答应她晚餐吃煎饼的。

吃煎饼的念头，嘴里咀嚼细香葱时那热辣辣的感觉，还有花朵里隐藏的茎管、太阳、她自己名字的声音等等，这一切全都冒了出来——感官的压力令她突然间头晕目眩，她真担心自己会就此死去。

大雪纷纷扬扬，飘落在邻家的屋顶上；这些屋子以及它们围着栅栏的院子很快便覆盖上了一层柔软的白雪——在那个年头，这层白雪常被称为松软的果汁牛奶冻。她用双手从自己卧室的窗台上捧起一捧雪，放到额头上，直到自己冻得忍不住为止。这也算是一种考验吧——考验自己的勇气。外面的月光清冷、皎洁。

她发现了一样美丽的东西，那是路上耀眼的彩虹——一弯被印在路面上的彩虹。她发现了这奇妙的彩虹，可谁也不知道它就在那里。不过，她还是犯了个错误，竟将它指给了邻居一个比她大的女孩子看，结果那女孩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咳，那只是油，是溅在路面上的一点儿油而已，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又到了夏天。她拾起一片草叶，用指甲将它割开一些，再用两个大拇指夹住，放在嘴里吹起来。是谁这么做给她看的，

她现在已想不起来了。吹出这种悲哀的声音——如潜鸟的尖叫声——并不是什么难事。你越吹越好,一旦学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和别人一样,别人能做的事,你也能做。

枯黄的叶子已扒成一堆,准备焚烧,而她却渴望在那枯叶堆上躺一会儿,直挺挺地平躺在沙沙作响的枯叶上,双眼望着天空。她伸直双臂,毫不犹豫地向后倒在枯叶堆上。顷刻间,树枝、藩篱、棚屋、房子密匝匝地交错盘叠在一起,并如卡通片里那样,“砰”的一声冲进一小片奇异的空中,冲进那原始而突兀的湛蓝之中,除此以外,空中再无别物,而她自己则被悬在一个玻璃的球体里。您可以反复回忆那幅真实而稳定的图景,为了您的余生将它固定在您自己的脑海里。

你叫什么名字?

黛西。

黛西什么?

黛西·古德威尔。

你知道“黛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白日的眼睛”。^①

对。我以前知道的,可我忘了。

当您想到雏菊时,觉得它还真有点像人的眼睛:圆圆的花盘,四周生着睫毛,凝视着天空。

张开,闭合。

飞进黛西·古德威尔脑海里的那一幅幅图景颇为怪异,怪就怪在她总是形单形只,孤寂一人。图景中有远处传入她耳朵里的人声,有种种阴影,有种种迹象,可她仍是孑然一身。

^① 黛西一名的英文是 Daisy,此词亦为“雏菊”之意;该花颇似人眼。

在我们无所畏惧之时,抑或怯懦羞愧之时,我们似乎至少需要一个见证人,然而,弗莱特太太却尚未享受到此等权利,这便是她怆然伤怀的原因。如今她仍无法忍受这种痛苦,即使她已八十岁高龄。

弗莱特奶奶知道自己常爱唠叨,也知道自已时常重复已经说过的事情,而艾丽丝也从不加以阻止,她从来不说,“母亲,您已经对我们说过那事儿了。”

弗莱特太太这么唠唠叨叨全是为了把自己头脑里的事情梳理得井井有条,让自己记忆的重压分布均匀,并使自己人生的各段经历次序井然。在某些时刻,她感到心中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柔情;这些时刻就像一根线上的珠子,而这根线则已磨损变旧。与此同时,她知道自己的未来须努力加以想象方可达到结局,而不是板着脸孔背诵自己受压抑的、暗淡的人生经历。她越来越需要各种词汇;于是便出现了什么是生活的故事这一问题。是事实的编年史,抑或一系列巧妙编制的印象?是将她感到恐惧的事情会聚起来,还是将她随意发现的东西,即该派给她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集中?她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认真考虑一下这一浩瀚的工作,也需要一个人——任何人——听她诉说。

然而,她的欲望——将所有已做好样本的、贮存好的,或是做梦成真的东西转而让众人接受——只是一件自我陶醉之事。她不应像现在这样做下去,这样逼着艾丽丝听她说,或是让可怜的里奇亚医生厌烦得要命。她因此而指责自己变得像玛丽安·麦克亨利那样自私,总是没完没了地谈她自己关心的事情,而不考虑别人。还是要以他人为先才好。

小埃玛死了。或许她被送到一家专门收养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的机构去了。在以前更为残酷的年头,这些孩子被人们称作先天愚型儿。

关于埃玛的事谁也没对弗莱特奶奶提起一个字,怕她知道了难过;不过她还是知道了:瞧,来到她床前,清清楚楚映入她眼帘的便是她儿子沃伦和他再婚的妻子——她的名字弗莱特奶奶此刻已想不起来了。这房间从一旁滑脱错位,窗户躺在了一个棱角上,而她自己的舌头则蜷缩起来。她想要一杯水——简单的要求,简单的一句话,可她怎么也说不出来。“先天愚型儿,”她反而说道。惊讶的神色闪现在沃伦的脸上,又向下掠过他挺直而富有弹性的脖子。她想以一个眼神,或是一个柔和的字安慰他,可她自己的身体因为混乱而重重地压着她。她无意表现得漠不关心,可她还是闭上了眼睛,将儿子和他年轻的妻子关在眼帘之外,全神贯注地看着印在自己眼睑上的那个极为复杂的东西,那是一个秘密,一个梦幻,一部电影。

艾丽丝忽然间与里奇亚医生结了婚,并随他去了牙买加,住在当地海滨的一所漂亮的平房里。他们已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眼睫毛生得长长的、弯弯的,待人也彬彬有礼。

不,这不是真的;老弗莱特太太又在做梦了。

这些虚假的幻景是怎样产生的?

想一想,想一想,她对自己说。理智一些。

里奇亚医生已经结婚,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弗莱特奶奶曾看过里奇亚一家的照片——他全家站在肯辛顿帕克那幢殖民时代建筑式样的住宅前面。

艾丽丝回英国去了。夏天已经结束,下星期她就要开始

教学工作,同时还筹划好在周末邀请六七个朋友聚一聚,听听摩洛哥音乐,吃顿咖喱饭菜,喝点冰啤酒。她自己还要戴上那对摇摇晃晃的耳环,把自己打扮得艳丽俗气,让大家啼笑皆非。至于贝赛德托尔斯公寓里的那套住房,她已找到了买主;由于已取得代理人的权利,她正在为母亲处理一些次要的法律事务。各种文件已经签署,以后的事情也作了安排。艾丽丝还买了一件漂亮的佛罗里达鞣皮衣服带回多雨的汉普斯特德,尽管大家告诫她,甚至她母亲都说,佛罗里达鞣皮衣服不耐穿。没关系,反正她圣诞节还会回来的。她的生活模式已逐渐显现出来,那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适应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她一边走,一边还在不断加以补充。这种生活并不是她原先所想象的中年时期应有的生活,但等待着她的就是这种生活。

346

她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一个她似乎一直明白,但却从未说出口的道理:我们还活着时,死亡这一时刻便已存在。生命大踏步径直朝那堵幽暗的死亡之墙走去;一个极端的状态撞击另一个极端的状态,它们不喘气,不眨眼,撞在一起难分难解。一个人可以打开日常生活这台收音机,调到它那和谐悦耳的节目——食物、工作、天气、说话,不间断地听下去直至最后一刻。如此,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致缺失。

这个想法使她惊讶、振奋;她忍不住要告诉母亲自己心中的感觉。

母亲黛西·古德威尔仍然活在她那具业已衰竭的身体之中。她的状况时有变化,忽好忽坏。她就这么如别人预料的那样活着,而且还可以像这样活上几年。

第十章

逝世

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在长期默默忍受疾病的折磨之后,于一九九×年×月×日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卡耐里帕姆斯疗养院安然仙逝。

弗莱特“奶奶”的丈夫巴克·弗莱特——一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杂交粮种专家业已先她去世;她在英国汉普斯特德的女儿艾丽丝·古德威尔·斯潘纳、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女儿琼及女婿罗斯·泰勒、纽约市的儿子沃伦及儿媳佩吉,以及多伦多市的侄孙女维多利亚及侄孙女婿刘易斯·罗伊,皆因其去世不胜悲痛;她是本杰明、朱迪思、雷切尔、雷恩、特勒、贝思、利萨、吉利及埃玛(?)可敬可爱的祖母,亦是马德琳、安德鲁及莫迪凯的曾祖母,还是孪生兄妹索菲娅及休之曾姑奶奶。

追悼会定于十时于卡耐里帕姆斯教堂举行。谢绝献花。葬礼随后于朗济公墓举行。

敬纳鲜花

追忆

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

她尽己所能拥抱

记忆中
大多生长之物
花园、孩子、气球
虽极为惧怕孤独与寂静
的阴影包围
却将此种阴影认同为
其一己之生命

黛西 黛西
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白日的眼睛，白日的眼睛
镜中的脸庞就是你

“这个小小的天鹅绒盒子是放在她床头柜里的。”

“这是什么？看上去像——”

“就这东西——剪下来的指甲，我想是她的。”

“哎唷。”

黛西·弗莱特(娘家姓古德威尔)，由于历史变故，由于轻率、无知，且缺少机会与勇气，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从未享受下列刺激而富有挑战的事物与活动：作油画、滑雪、航海、日光浴、祖母绿珠宝、香烟、口交、穿耳、瑞士木履、水床、科幻小说、色情影片、宗教狂热、块菌、樱桃酒、加利佩诺胡椒、北京鸭、维也纳、莫斯科、马德里、集体心理治疗、身体按摩、饥饿、殊荣、

粗暴的非难；她从未开过车，从未买过一张彩票，（另一方面）也从未、绝对没有被另一人打过耳光或揍过身体任何部分，从未叹口气将阅读用眼镜放到头顶，从未（因惧怕被人耻笑）尝试过整形手术。或者瑜伽术的可能性，从未沉迷于那些教您善待自己、相信自己、为自己做事的杂志文章之中，尽管她知道自己一生为人所爱戴，但从未听到有谁大声说过“我爱你，黛西”这句话（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此外，也只是在她临死前那漫长、空洞、毫无意义的睡眠中，她才有了智慧（和空闲）思索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这是上帝的赐福，”著名的契诃夫研究学者艾丽丝·古德威尔·斯潘纳听说她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大声喊道。

“我母亲的生活质量曾一度处于隆冬严寒之中，”南曼哈顿公立学校音乐学专家沃伦·弗莱特说道。

“她是给拖垮的，”弗莱特家的小女儿、年近五十、失了业的琼·泰勒说道。“先是她的生命拖垮了她，后来便是死拖垮了她。”

“她曾对我说，她已作好随时离开人世的准备，”获奖的古植物学家维多利亚·路易斯·弗莱特·罗伊轻声说道。“可有谁真的准备好了？”

“她的智力竟然可以调整，真是不可思议。只要她愿意，她便能将它升起，展现出来。”

“惊心动魄，我有一次曾听她说过这个洞，惊心动魄！它就这么从她舌头上滚了出来。”

“还有神圣的烟雾。她以前常说神圣的烟雾。”

“真的？”

“好像有时候她的头脑不正常。砰，砰，有人在家吗^①？”

“还有她的衣服！从她的装束谁也看不出她花钱多少，也看不出她究竟落后于时尚四年，还是二十四年。”

“哈。”

“她难以捉摸。”

“是的，不过，难以捉摸也可以是一种进攻的方式。”

“再说一遍？”

“你听到了。”

蓝知更鸟，女少年先锋队，美国女童子军，图德雷兹，历史界，基督教活动，阿尔法泽塔联谊会，采石场俱乐部，女教徒联合会，母亲协会，竹芋，马其莫之家及学校学会，渥太华园艺协会，华美耕地委员会，卡尔顿县心脏基金会，里多系列午宴，安大略种子集团，海湾女士手工艺组，老姐妹花儿。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愿将她的任何器官捐献出来。”

“我只不过是想而已。”

“再说，她体内的一切都已损坏了。”

“我只是觉得——”

深情缅怀

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

① 此句为幽默语，意为弗莱特太太有时头脑不正常，如一家庭无人管理一般。

深情缅怀
黛西·古德威尔
她以健全的精神
不带任何恶意
不顾家人反对
经再三考虑
在遭受痛苦的折磨之后
带着疑虑,带着歉意,困难地
却毅然决然地
独自长眠地下

“她留给了你什么?”琼在电话里喊道(这次越洋电话的线路很差)。

“她那只浅底的篮子,”艾丽丝说道,她做了个鬼脸。

“浅底篮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她那只园子里用的旧篮子。那个发了霉的东西,提手很大,还箍了铁丝。”

“我想我还模模糊糊记得那东西,可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把那只盛芦笋用的银盘给了你,我想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的天。”

“你知道沃伦得了什么吗?”

“不知道。什么?”

“她上大学时的笔记,还有她写的文章。全是手写的。好

多页，装了一纸盒呢。”

“她最后的确差不多都糊涂了，对吧？”

“也许只是开个玩笑？”

“她可不是挺会开玩笑的人。”

“我也不知道。”

“维多利亚得了那些杓兰花标本。”

“老天，那些个旧标本她要了干什么？”

“她要那些东西，至少她说过要的。”

“嗯，其他东西都还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是说她的财产，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这我们得谢谢她的会计。”

“还有她的律师，尽管他自己要价太高。”

“卡耐里帕姆斯那边怎么办？”

“咳！”

“哪怕提起它，或是一想起它，我都觉得内疚。”

“我也是。”

“不过我想大家都一样。”

“当然一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毫无办法。”

今年，美国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家庭至少花了一千美元对他们的住房加以装饰或修缮。这个消息是收音机里广播的——要不就是我做梦做到的。告诉我，我为什么要知道这种事？这种毫无价值、微不足道的信息能使人的心情愉快些？不能；因为你已处在迟钝的、被充填得满满的人生末年。

就没有别的什么事对我说了吗？

黛西·古德威尔·霍德新娘服饰清单,一九二七年

两套三件式婚礼服,双绉面料,瓦朗西安花边,精美手工

刺绣和抽花手工饰物,贝壳红,象牙白

十二件女式长衬衣

十二套法国式两件头套装,包括无袖衬衣及内衣,桃红、

奶白、蓝色、茶色

六件睡衣

六件长便服,乔其绉纱面料,尚蒂伊花边

两件长连衣裙,一件为羊毛格子花布,另一件为带棱纹的

棉布

六个“火红青春”牌胸罩

六个“紫罗兰”牌丝质平针及府绸胸罩

三件日本丝绸的粉红色背心

两件戈萨德丹斯莱特紧身褙,丝质平针并带松紧镶边

十二双丝质长袜

十二双棉布长袜

三套海滨服,桔黄缎子,哥本哈根蓝、黄褐色

六件和服式晨衣,黑色、蓝色、花岗石红、玫瑰红、桃红及

紫红

两件凯勒曼游泳衣(全毛),黑色、哥本哈根蓝

一条针织海滨披肩

一只游泳帽

六条各种式样的围裙

“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刺绣。”

“这东西真漂亮。”

“你能肯定是她绣的？”

“右下角绣了一朵小小的雏菊。”

“你说得不错，是有一朵雏菊。”

“差不多跟签名一样。”

“嘿！”

“护士们总说她心眼好，对谁都笑脸相迎。”

“除了那次她弄坏了自己那台收音机，将它扔到了地上。”

“也可能是无意的。”

“不错。”

356

“有一点我就是想不通，她第一次结婚的事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

“她一定知道，她去世后我们会发现这事的。我是说，她那些文件都在那儿，结婚证书、报道，什么都在那儿。”

“霍德，他的名字叫霍德。”

“哈罗德·霍德。”

“与 toad^① 押韵，真没劲。”

“可你看看他那张照片，好吗？他是一——他那模样挺像电影明星的，我说的是无声电影。真是很帅的。”

“可为什么她瞒着我们？”

“你想想，她怎么会谈如此——如此可怕的事情？”

① toad(癞蛤蟆)与 Hoad(霍德)押韵。

“这事太令人震惊了。”

“我搞不懂。她是觉得很难堪,还是什么?”

“这个美男子是从窗台上摔下去的;那是她的心上人,她刚结婚的丈夫。试想一下,如果这事发生在你头上,你愿不愿意谈它?”

“也许她正是这样,你知道,伤心极了,连想都不愿想它,更不愿去谈起它。你想想,这事如果发生在你的蜜月里,又在——”

“又在她那个年龄。”

“她会感到压抑。不过压抑有时也是件好事,否则的话,她又怎能继续她的——?”

“他比爸爸漂亮。”

“也年轻一些。”

“年轻得多。”

“爸爸肯定知道——知道这个人。”

“他肯定知道。我是说,她可能会瞒着他,但——”

“真让我——”

“什么?”

“起鸡皮疙瘩。”

“什么意思?想到霍德先生一头栽下去?”

“不,想到她。她瞒了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守口如瓶。”

“每年到他的周年忌日,她一定会想起他。”

“你记不记得,她有时中午只想躺在床上,又不是睡觉,就这么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将那事从头到尾铭记心中,想着它。”

“我知道。”

“唉，天哪。”

花园俱乐部午宴，一九五一年

火腿面包卷/奶酪风车

什锦泡菜

甜瓜球及无籽葡萄色拉

圆形果酱馅饼

各色饼干

咖啡 茶

我仍在这儿，在这些（粉状的、碎裂的）骨头里，在踝骨、我的眼窝、肩膀、屁股、牙齿里，我仍在这儿，啊，啊。

358

“她要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也许能成为拥有自己电视节目的园艺技能女士。”

“那可真是观众最多的黄金时刻。”

“不知怎的，这事真令我难以想象。”

“这个卑鄙、守旧、多愁善感的世纪，它把她给窒息死了，像块帷幕一样，不透光的帷幕。”

“她本可以和爸爸离婚的。”

“一开始就该离。”

“什么？你说什么？”

“你怎么会那样想？我是说，总的说来，他俩生活在一起还算幸福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

“唔，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幸福。”

“不管幸福是什么意思。”

“你说给我听听。”

“我只知道过去的事决不会过去。”

“这话难道很深奥？”

“哼……”

黛西伯母的柠檬布丁

四汤匙黄油

一杯牛奶

二分之一杯白糖

两汤匙面粉

两只分开用的鸡蛋

一只柠檬的汁和外壳

359

将黄油和白糖搅拌成奶油状，加入蛋黄搅拌直至变浓并呈柠檬色，边搅拌边掺兑面粉、牛奶、柠檬汁及磨碎的柠檬皮。将蛋白打稠但不可使其变干。将蛋白和入混合物中。将混合物放在抹了黄油的烤盘里，并将烤盘置于盛了热水的平锅中，烘烤二十五分钟。烤箱温度适中，三百五十度。

“如果她是个男人，你觉得她的生活会不同吗？”

“你是在开玩笑！”

“瞧瞧这件睡衣短外套。”

“看起来还是新的，我猜想她从未穿过。”

星期二安排——

一听浓缩牛奶
一把芹菜
胡萝卜
洋葱
一磅黄油
一磅猪油
火柴
肥皂片
两听腌牛肉
猪排
打电话给 M 先生
为搅拌器配一把新搅刀
沃伦的牙
邮局
药店,咳嗽糖浆,K 盒
红松

有这么个女人,她做得一手漂亮的肉糜糕,会将枯萎的橡胶植物移栽到另一只花盆中,能打出一手绝妙的没有王牌的牌,能将帽子戴得很好看,还很讲究个人卫生,注意及时给别人写感谢信,她一直支撑着向上,但她已精疲力竭,颓然落下,落下,落下,她已不解人意,全然不懂,但对别人却从不失礼。

“还记得杰伊·达德利吗?”

“谁?”

“你知道,就是渥太华《记录者》周报那个编辑,名叫杰伊·

达德利。”

“噢，我当然记得。就是系手工编织领带，袖扣是陶瓷的那位？”

“你觉得他们，他们两人，你觉得他们有没有——搞在一起过？”

“不知道。”

“太差劲了。”

《黑美人》、《绿色山墙中的安妮》、《雀斑》、《重复的故事》、《美丽的乔》、《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波克洪特斯》、《海伦的孩子们》、《我们共同的朋友》、《内莉回忆录》、《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简·爱》、《意大利的统一》、《贝奥沃夫》、《浪漫主义诗人》、《步其后尘》、《野鹅》、《飘》、《克劳迪娅》、《起初那六年》、《愤怒的葡萄》、《永恒的琥珀》、《鸡蛋与我》、《论打贱卖》、《生命的欲望》、《蜘蛛网与岩石》、《斯库塔里世家》、《奥克尼群岛简史》、《契诃夫的女儿》、《秀色可餐》、《美好的地球》(大号字印刷版)、《即时谋杀》(大号字印刷版，只读完一半)

361

“你刚才说，谁都没有准备好，这话是什么意思？”

“天哪，我这会儿就已准备好了。”

“那是因为你没找到工作，心里犯愁。你根本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而且我敢和你打赌，她也没准备好。”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找机会问问她关于，你知道——”

“死？你哪能跟她谈这事？”

“她会改变话题。”

“她会像女学生那样做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

“眨巴着眼睛。”

“把嘴噘成个小圆圈。”

“还有她的眉毛。”

“真的谈起死的话，我可是一想它就吓得毛骨悚然。”

“全家人都害怕。”

“可我们的基因是百分之百花岗岩做的。”

“小石子而已。”

“冰雹。”

“我的确还记得，她曾在一次葬礼上说过喜欢三色紫罗兰。不是那种傻愣愣像人脸般的紫罗兰，而是那种纯紫色的紫罗兰，那些浓厚的天鹅绒颜色的花瓣。这是我唯一能记得她说过的、与死亡有关的话。”

“她只是听任自己的生活摆布而已。”

“呃，干嘛不让它摆布呢？”

“就像——”

“像什么？”

“像她总是用一根穿了线的针追逐某种小小的、漫无目的的思绪。”

“害怕窥视自己的心灵，怕万一里面空空荡荡的。”

“佛教徒不就是想达到这种境界吗？”

“佛教徒？”

“他们试图达到一种虚无的境界，不是吗？”

“真的？”

“这种想法真可怕。”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说,虚无并不是众多,你知道。”

“虚无就是没有。”

“阿门。”

必须做的事——长远规划

夏季用窗帘

贮藏室的毛皮制品

修缮后院楼梯、篱笆

重新用帽模打冬天的帽样

熏衣草——备新货

喷洒门廊里的家具

弹力带?

烤箱后面,冰箱下面

给 M 先生支票

汽油

樟脑丸

将杂志送到节俭商店

炉子

钢琴

毒药

电灯夹具

腹绞痛、水痘、麻疹、支气管炎、肺炎、过敏症、流感、经期
腹痛、湿疹、膀胱炎、分娩、血压、绝经、抑郁症、咽喉炎、动脉堵

塞、骨头断裂、冠状动脉分流术、肾衰竭、癌症、膀胱感染、中风、褥疮、腿部溃疡、排泄失禁、中风、记忆缺失、视力下降、反应失常、语言缺陷、抑郁症、中风、中风。

大家都说黛西·古德威尔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她最后病重期间，除了死亡以外，她已别无可想——而她在接近死亡之时，其体内导致死亡的器官虚弱和衰竭都已显现出来。在她最后神志昏迷的几个星期里，曾一度出现时间、季节的错位。这一情况是在她一次昏迷时突然出现的，她经常昏迷不醒，这是其中的一次。她进入了睡眠状态，似乎是通过一座地下隧道，仍在过去中摸索，并如吸进劣质氧气一般，将她生活中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事件呼吸进来。随后，她被一阵精疲力竭的感觉攫住，抑或是一阵腻烦无聊的感觉，反正接着便是线段与颜色的迅速隐褪，那种能唤起较早时期情景的机制亦陷于瘫痪；而这时重重地压在她眼睑上的却是一系列变换无常的透明物，示意她在时间中向前走，而不是往后退——向前走向她自己的死亡。您也许会说，她赋予死亡以生命，尔后爱上了它。

她最初看到的情景如演戏一般，常见的粉笔画棺材，单调沉闷的台词，颤抖的管风琴——所有被搅起的悲凄的五彩碎纸纷纷扬扬漂浮在一个住着活生生人的房间里；房里人声嘈杂，或在无谓哭泣，或在吟唱颂辞。然而，这太荒唐了。

这个光灿灿的房间倒塌了，留下一片浓浓的黑暗。只有她的躯体幸存下来，外加一个问题，即该如何处置这一躯体——它还没有化为尘埃。想到自己的四肢和器官化为《圣经》里的尘埃，甚至葬礼中的骨灰，她便恍然大悟，明白了一个闪

亮、清晰而又滑稽的道理。真是荒唐可笑。

她最终看到的自我便是石头，她那原本活生生的细胞被无知觉的沉积矿物所取代。让矿物取代其生命可谓轻而易举之事。在她最后的梦幻里，她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厚厚的木板上。这木板如她早几年在粉红色的柯克沃尔大教堂里见过的主教和圣徒们的画像一般硕大、壮观；此物欠佳，并不适合他们，也不适合她，然而，她躺在那木板上的形象却至少看上去十分平静、从容；她其实很喜欢自己这一形象，觉得自己已融汇于、并最终变成了她死去的母亲那一动不动的尸体。

此刻，她已远离自己的锁骨、多脂肪细胞、生殖器，远离自己的脚趾甲、后部牙床、鼻孔、眉毛，以及耳朵后面不知名的骨头部位。她的头脑是最纯洁的云母；您可以捧着它走到窗前，让日光将它照得透亮；不过里面是空的，这便是它美中不足之处。

在安然的沉迷中，她对自己僵硬状态里的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留恋，都要仔细察看一番，或增加点什么，或删减点什么，或进行润饰、美化。她衣服上那些原始而僵硬的褶皱因一条饰边而变得柔和绵软；那是一条贝壳镶成的钙质的边缘，有时看到的生日蛋糕便是这种边缘。一卷石制的文书卷轴向下倾斜，优雅地横过她穿着拖鞋的双脚，卷轴上的日期已年久磨损，辨认不清了。一个石枕头垫着她的脑袋，枕头边上那坚硬的卷边终于梳理得平平整整。她那双生着柔美的指关节的双手朝她身体的两侧弯曲，那双手已经大大简化，手指并拢成一体，手指上没有戒指，也没有年龄的标记，却指着（那根默默弯曲的大拇指）那超越她听觉的一大片肃穆、永恒的领域。在她漠然呆钝的脸上，双眼直愣愣的，目光如大理石般冰冷，虽然

它们睁得大大的，可茫茫然一无所见，只看到芸芸众生共有的愁苦和不幸，看到他们最终被允许吐露的话语竟是那样微少无几。

那么，她最终的姿态便是希腊式的：安详、永恒、优雅。她一直认为自己有这种潜在的能力。

只需一丁点儿力气便能召唤她岩石般僵硬的自我，并将它妥善安置。除了最响亮的回声以外，她的自我已什么都听不见，然而她却在自身蜿蜒下沉中变得活跃旺盛起来——那雪白的颜色、那坚硬不可穿透的表面——完完全全地占据了她的视野，以致以往的种种战略和安排全都被抛到了一边。黛西·古德威尔那无可挑剔的牙齿、头发和骨头拥抱了这一最后的形式；或确切地说，这最后的形式拥抱了她，终于让她进入孤独的迷幻之中，并将自身的重量压在了她那如钟摆般摇晃颤抖的心脏和僵硬的珊瑚状肺上。它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冷，并将很快占据她全身，取而代之。下星期。明天。今晚。

马尼托巴省廷多尔村格兰奇路十四号(1922年拆毁)

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西姆科街一六六号(1947年拆毁)

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东街一四四号十二室

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威尼格希尔区霍索恩街六号
(1975年指定为世袭遗产)

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市朗女子学院阿尔法泽塔女大学生联谊会(1957年改作校友办公室)

安大略省渥太华市德拉夫威街五八三号(1981年分建成若干公寓套房)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塔迈阿密路东贝塞德托尔斯公寓
四一九室(1986年被判定为不符合防火条例规定)

佛罗里达州科尔曼市马林路卡耐里帕姆斯康复医院
(1990年为美国国内妇女委员会反省与内心认识研究中心所
购)

佛罗里达州科尔曼市福纳街一二六七号卡耐里帕姆斯护
理部

“我没有安眠。”

黛西·古德威尔临终(未说出)的遗言

“黛西·古德威尔·弗莱特,本世纪的妻子、母亲和公民;愿
她安息。”

最后的祷词,由沃伦·M·弗莱特在卡耐里帕姆斯
康复医院举行的追悼会上宣读

“瞧那些三色紫罗兰,你有没有见过这么迷人的紫罗兰?”

“她一定很喜欢它们。”

“不知怎的,我希望能看到一大片雏菊。”

“雏菊,对。”

“应该有人想到雏菊。”

“是的。”

“噢,算了。”